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当代教师核心价值观研究

- 教师价值观形成的心理学分析 胡永萍(1)
儒家思想精华对当代高校教师价值观构建的启示 胡玉霞(5)

素质教育论坛

- 论教学语言技巧的运用原则 陈之芥(9)
诗歌朗诵探究 苏 叶(15)
从免费幼儿师范男生培养看教育公平
——以苏州高等幼儿师范学校为例 胡 娟 孔宝刚(18)
精英教育到普及教育转变中的困境与出路 魏 栋 李星星(21)

德育研究

- 现实语境下高校德育过程生态关系剖析 周 宏(24)
刍议思想政治教育艺术 王静波 孙玫贞(27)
浅谈红歌与国防教育 黄晓波(31)

高教研究

- SWOT 视角下的高校创新型教师团队建设探析 葛谢添 胡仁东(34)
省属师范院校人才工作路径探索 吕 挥(39)
三学期制——独立学院发展的另一条路径 刘 影 付龙海(42)
试论高师院校心理学的研究性教学 季春梅(45)
高等书法教育中的想象力培养问题探析 吴旭春(48)

政史研究

- 杨行密论 何剑明(52)
是复古还是超越?
——陶渊明“世外桃源”与老子“小国寡民”社会理想之比较 杨 林(60)
傅斯年:徘徊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学者 杨纯刚(63)

论吴德旋、梅曾亮与桐城文派在广西的传衍	陈春华(68)
略论近代中国体育之肇始	朱 宇(72)

经法研究

中国近代银行体系的建立及思考	陈国威(75)
江苏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产业分布的实证研究	成谢军 张 伟(79)
建设工程监理的法律地位探究	黄 立(84)

中国文学研究

战国秦汉之际诸子学衰微析论	杨思贤(88)
白居易诗歌本体论命题之内涵、价值及经学影响	刘疏影 吴建民(95)
柳宗元的花木种植与审美	俞香顺(98)
《西游记》“指”的艺术功能分析	丰 竞(101)
《山海经》研究述评(2000 年—2011 年)	顾晔峰(106)
论陆游所撰碑志文	赵永平(110)
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中的爱欲类型	孙 婧(115)
漫舞的喜剧 灰色的羽翼 ——论中国 90 年代以来喜剧电影的灰色幽默	张 冉(119)

外国文学研究

论假想敌与卡夫卡创作思想的关系	黄 晖(123)
试论史蒂文斯诗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杨 梅 仲 颖(127)
论《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叙事策略	刘卫平(130)
试析乔治·奥威尔的“社会主义者”身份	汪 霖(133)
超越宗教意义上的“瘫痪” ——试论《阿拉比》中蕴含的现代主义元素	叶 青(135)
美存在的不可能性 ——评《快乐王子》	汪介之 尹子茜(139)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ocial Sciences) No.5, 2012

MAJOR CONTENTS

- Psychology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Teachers' Values HU Yong-ping(1)
-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Education Teachers' Values through the Essence of Confucianism
..... HU Yu-xia(5)
- On the Principles of Applying Teaching Language Skills CHEN Zhi-jie(9)
- Studies on Poetry Recitation SU Ye(15)
- A Study on Educational Equality from the Case of Free Training of Male Student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citing Suzhou Higher School for Preschool Teachers as an example HU Juan KONG Bao-gang(18)
- Dilemmas and Solutions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Elite Education to Universal Education
..... WEI Dong LI Xing-xing(21)
- Analysis of the Ecological Relationships of Moral Education Process in Universities in the Real Environment
..... ZHOU Hong(24)
- Analysis on Constructing Innovative Teaching Personnel in Higher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WOT
..... GE Xie-tian HU Ren-dong(34)
- The Trimester System, a New Way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in China
..... LIU Ying FU Long-hai(42)
- The Research Teaching of Psychology in Higher Normal Colleges
..... JI Chun-mei(45)
- Study on Cultivation of Imagination in Advanced Calligraphy Education WU Xu-chun(48)
- Connotation, Value and Confucian Classic Influence of Bai Juyi's Poetry Ontology Propositions
..... LIU Shu-ying WU Jian-min(95)
- Art Function of "Zhi" in A Journey to the West FENG Jing(101)
- Review of the study of ShanHaiJing(2000-2011) GU Ye-feng(106)
- The Desire Types in Shi Zhecun's Psychological Novels SUN Jing(115)
- Imaginary Enemy and Kafka's Creative Ideas HUANG Hui(123)
- On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Strategy in Berlin Alexanderplatz LIU Wei-pin(130)
- Analysis of George Orwell's "Socialist" Identity WANG Lin(133)
- Beyond the "Paralysis" in the Sense of Religion——A Study on the Modernism Elements in Araby
..... YE Qing(135)
- The Impossibility of the Existence of Beauty——on Happy Prince WONG Jie-zhi YIN Zi-qian(139)

教师价值观形成的心理学分析

胡永萍

(江西教育学院教育系, 江西南昌 330032)

[摘要] 教师价值观是教师个体对教师这一职业的地位、作用和行为准则等方面的总体看法。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教师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自我教育过程,是一个不断地由“知”经“情”和“意”再到“行”的转化过程,即经历了认识的提高、情感的熏陶、意志的培养和行为的锻炼等过程。

[关键词] 教师价值观; 心理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 G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01-04

一般来说,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个体,对其所从事的职业都会产生一定的认识或看法。从事教师这一行业的每个个体,在工作实践中渐渐地也会对教师这一职业的地位、作用和行为准则等方面产生一定的认识和看法,这就是所谓的教师价值观。教师价值观的核心应当是“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具体来说就是“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教师价值观的正确与否对于每一个教师来说都很重要,因为人的行为是在其价值观或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教师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自我教育过程,是一个不断地由“知”经“情”和“意”再到“行”的转化过程。

一、认识的提高——教师价值观形成的前提

正确的认识是教师价值观形成的前提和基本发端,起着保证教师价值观正确方向的决定性作用。教师要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在认识上应当做到:

1. 努力学习理论知识。

每个教师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坚定信念,站稳立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这些指导思想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的伟大成果,对于我国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下,社会主义时代人民教师的价值观才能区别于以往一切时代的教师价值观,才能深刻地体现出教师价值观的时代性。尤其邓小平教育理论,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仅确立了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而且强调了教师是培养合格人才的关键。这就为现代教师价值观的形成指明了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

2. 汲取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教育思想。

古今中外,许多教育家和思想家经过长期的教育活动和社会实践,对教师的地位、作用和行为准则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从而形成和积淀了深厚的关于教师职业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我们教师价值观形成的宝贵的教育资源。孔子就曾提出过教师应当“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热爱学生,对学生无私无隐,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朱熹认为读书人应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则提出教师要做到“民主教育、教学做合一”。^{[1](P.214)}

在国外,捷克著名的教育家夸美纽斯认为“教师应该是道德卓异前优秀人物”,同时认为“教师职业是阳光底下最光荣最神圣的职业”。这一描述至今激励着无数教师对教师职业的热爱。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认为“教师的人格就是教育工作中的一切”;^{[1](P.214)}英国教育家洛克则把教师描述成“做导师的人”,等等,这些思想至今对我们教师价值观的

[收稿日期] 2012-05-16

[作者简介] 胡永萍(1965-),女,江西南昌人,江西教育学院教育系心理学教授。

形成仍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3. 虚心向优秀教师学习。

古今中外的教育思想是教师形成价值观的历史资源,而虚心向优秀教师学习则是教师形成价值观的现实资源。任何一个新上岗教师要变成优秀的专家型教师都有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进步的过程。在这个成长过程中,除了教师本人的努力之外,虚心向其他优秀教师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优秀教师的身上体现了当代教师的许多优秀品质。他们不仅热爱教育事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具有丰富的和组织化的专门知识,能够创造性地完成教学任务。

4. 与时俱进提高认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的教育已经呈现出多元化、国际化、信息化等新的发展趋势。这不仅对每个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也进一步使我们深化了对教师职业的认识:

(1)崇高的献身精神。激烈的竞争要求教师具有更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当代科技革命决定了各国竞争主要是教育的竞争。谁能在教育上领先,谁能培养更多的适应现代化建设和新技术革命的人才,谁就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崇高的职业,呼唤着千千万万的人民教师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为“科教兴国”奉献自己的聪明和才智。

(2)严谨的治学态度。日新月异的新科技革命要求教师不断更新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树立终身学习观念。当代科技革命已经打破了各门学科的“疆界”,学文的要懂得自然科学的一些基本知识,了解其学术前沿的发展动向;学理的也要懂社会科学知识,了解社会发展的动态。广大教师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才能适应现代教育的需要。

(3)真诚的民主意识。实行教学民主,强调师生关系和谐,倡导师生相互尊重,已是世界各国教育实践带有规律性的潮流。在学生个体意识日益觉醒的当代,教师的民主意识尤其显得重要。民主就像座搭在师生心灵间的桥,民主程度越高,这座连通心灵的桥就越坚固,越宽阔。教师要热爱学生、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差异,采取适应学生心理特点的方法进行教育。

(4)良好的团结协作精神。现代教育的发展,一方面越来越需要教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另一方面越来越需要教师形成团结协作的群体,形成教育的整体力量。

(5)严格的依法执教意识。依法治国是社会进

步、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我国的治国方略。教育也要走依法治教的道路。教师实依法执教,自觉依照国家的教育法律,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树立教育公正观念,在工作中坚持真理、秉公办事、赏罚分明、平等待人,依照法律选择教师职业行为。

二、情感的熏陶—教师价值观形成的基础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体验,是人的需要是否获得满足的反映。教师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逐渐会产生对教育和教学工作的情感、对所教学科的情感以及对学生的感情。如果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经常体验到喜悦、愉快等积极的情绪,那么该教师就容易对社会生活、对教学实践产生积极向上的反应,并从中唤起肯定的认识,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所以正性的情感是影响教师身心获得的强大精神力量,对教师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重要的作用。

教师的情感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1. 热爱学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关于教师的义务第四条明确指出,教师要“关心、爱护全体学生”。这是每个教师应当完成的义务。对教育对象——学生的热爱,是基于对学生与国家、民族关系的认识而产生的情感。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学生充满真挚的、深厚的情感,是一个教师成熟的表现,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爱优等生、爱听话的学生。

2. 热爱教育内容。

每个教师在做教师之前,就选择了自己工作的方向,即所教的学科。实践证明,大多数教师是热爱自己所教学科的,也有些教师是在教学过程中逐渐热爱自己所教学科的。教师只有热爱自己所教的学科,才能一面教学,一面钻研。这样不仅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而且可以从体验到工作的快乐,甚至会将自己对某学科的热爱传递给学生,使学生也爱学习学科知识。

3. 热爱教育活动。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每个教师都应当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都要对传道授业解惑、造就人才活动的具有热爱之情。这是热爱学生和热爱学科的落脚点,也是教师情感的最主要、最关键的部分。如果教师缺乏对教育活动的热爱,即使具有爱学生和爱学科的真挚情感,也不足以说明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热爱教师这个职业。

当然,如果教师已经具备了以上3种情感,也要善于利用自己的情感进行教学,这既是职业要求不可缺少的心理素养,也是衡量其教学技巧高低的尺度。

三、意志的培养——教师价值观形成的保证

意志是人自觉确立目的,并根据目的来支配、调节自己的行动,克服困难,从而实现预定目的的主观能动的过程。教师的职业活动是个非常复杂的活动,该活动中既包括了认识过程、情感过程,也包括了意志过程,而且三者之间密切联系,彼此渗透。良好的意志品质是保证教师完成教育教学活动顺利进行、实现预定目标的重要条件,也是教师价值观形成的重要保证。作为新时代的教师应当具备以下良好的意志品质:

1. 自觉性。

意志的自觉性是指个体自觉地确定目的,并独立自主地采取决定和执行决定。它反映一个人在活动中坚定的立场和始终如一的追求目标,是人行动和发展的重要动力。

对于教师来说,自觉性是教师对教育目的有深刻的理解和坚定的信念,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主动支配自己的行动,使之符合教育目的。教师的自觉性主要表现为,无论做什么事都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并始终如一地坚持正确的目的,不受各种内部及外部因素的干扰,克服各种困难,为实现教育目标,为培养国家需要的高素质人才而努力工作;对每一个学生都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百教不厌”;善于听取各种教学、科研、管理中的意见与看法,能在众说纷纭中汲取符合教育客观规律的东西,既不独断专行,也不人云亦云。

2. 果断性。

意志的果断性是指面对复杂多变的情境,能够迅速而有效地采取决定,并执行决定。教师意志的果断性是指教师在进行教育决策时,善于明辨是非,当机立断,及时合理地做出决定并坚决执行。教师果断性的意志品质主要表现为,在决策和处理问题时,善于选择恰当的时机,不失时机地做出判断,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在紧急情况下,能迅速做出应付客观情况的合理决定;当发现情况有了变化或自己决策有错误时,能立即停止行动或改变已做出的决定,及时纠正错误。

教师的教育对象——学生是生动活泼的,正处于成长过程中,具有复杂性、多变性,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教育情境是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教师随时都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教师必须对新情况及偶发事件,进行迅速果断的处理,使教学活动顺利进行,并收到预期的效果。如果教师优柔寡断,徘徊不前,久拖不决,束手无策,就必然坐失良机,导致教育工作的挫折和失败,甚至给学生造成难以挽回

的损失。果断不是武断,不是未经深思熟虑就轻率地做出决定;果断是建立在对学生、对事物充分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有赖于思维的灵活性与敏捷性,与对教育事业高度负责,对学生的真诚爱护等优秀品质相联系。

3. 坚韧性。

意志的坚韧性是指在执行决定阶段过程中能坚持到底,有克服种种困难的勇气,做到坚毅有恒,抵制各种内外干扰,又能审时度势,灵活激动地达到目的。教师意志坚韧性是指教师对教育目的、教育目标有明确、深刻的认识,在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中能按照教育目标的要求去做,并持之以恒,善始善终坚持原则性,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也百折不挠。

与坚韧性相反的品质是动摇性和执拗。具有动摇性的教师并不是没有行动的目的,而是立志无常、见异思迁、虎头蛇尾、半途而废,一遇困难就望而却步,放弃对预定目的追求。执拗、顽固的教师则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对自己的行动不做理智的检查,尽管事实证明他的行动是错误的,仍固执己见,执迷不悟,一成不变,一意孤行,因而往往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动摇性和顽固性虽然表现形式不同,实质上都是不能正确对待行动中的困难,因而都属于消极的意志品质。

4. 自制力。

自制性是指教师善于自我调节和自我支配的能力。自制力是针对克服一个人的内心障碍产生的。它主要是指一个人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掌握自己的心境,约束自己的言行,能够忍耐克己。自制性是意志品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教师的自制性是职业修养中不可缺少的心理品质,也是衡量教育技巧高低的尺度。

教师的自制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善于促使自己去执行已经采取的决定,战胜与执行决定有困难、有妨碍的一切因素;二是善于在实际行动中抑制消极情绪和冲动行为,自觉地控制、调节自己的行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无礼、不听规劝,损伤教师的自尊,与教师发生矛盾、冲突。教师要从培养目的出发,充分认识教师的地位与作用,充分考虑教育效果,发挥意志的自我控制机能,恰如其分地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情感、言论与行为,避免感情用事。面对学生的各种问题不应暴跳如雷,火冒三丈,要有理智,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特别要注意控制消极的情绪和由此引起的冲动行为。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教师要给学生以良好的心理影响,从而在学生心目中树立威信。

此外,教师本人的生活和工作过程中也并非一

帆风顺,如有时身体不舒服,或者工作不顺心,家庭生活出现变故,甚至遭受挫折。在这些情况下,教师不能因自己的不快和痛苦而迁怒于学生,乱批评、指责学生。

教师的自制性是顺利进行教育工作的必要心理品质,如果缺乏自制性就很难对学生进行正面教育,很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因此教师必须加强培养自制能力,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自觉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评价,有意识地经常地进行自我磨练。

四、行为的锻炼—教师价值观形成的途径

在教师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中,教师的实践活动非常重要。长期的教育实践即行为的锻炼,会使教师认识到教师职业的社会价值,从而促使其价值观的形成。教师行为的锻炼包括以下几方面:

1. 系统的理论学习。

学习是教师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尤其是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学习就显得尤其重要。教师不仅要学习有关专业的知识、社会生活规范、教育和心理科学知识,而且还要学习其他一般科学文化知识,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等,这些均有利于教师文化素养和教育能力的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教师必须终身学习。教师只有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自己,才能不断提高发展,教师应当把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方式。教师职业是永恒的,而教师个体生命是有限的,因此“活到老,学到老”应成为我们每一位忠诚教育事业的教师的共识。

2. 完善的技能训练。

完善的技能训练包括观摩和分析优秀教师的教学活动、开展微格教学和进行专门训练。在观摩和分析优秀教师的教学活动中,可以吸取他人的经验和教训,弥补自己的不足,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微格教学指以少数的学生为对象,在较短的时间内(5~20分钟),尝试做小型的课堂教学,可以把这种教学过程摄制成录像,课后再进行分析。这是

训练新教师、提高教学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进行专门训练是指尽力实施有效的教学策略,如每天进行回顾、有意义地呈现新材料、有效地指导课堂作业、布置家庭作业、每周、每月都进行回顾等。

3. 科学的教学反思。

教学反思是指教师以自己的教学活动为意识对象,对自己的教育理念、教学行为、决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结果进行认真地自我审视、评价、反馈、控制、调节、分析的过程。如果教师仅仅满足于获得教学经验而不对经验进行深入思考,没有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很好的反思,那么他再有经验也是肤浅的知识,他的发展将受到很大的限制。教师通过反思,对自己应该使用哪些方法来引导学生学习,如何安排教学环境会有更加清楚的认识,自信心将得以提高,满足感得到增强,能更加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

4. 良好的威信维护。

良好的威信有助于教师自信,有助于对教师职业的正确认识,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一个热情开朗、正直诚实、意志坚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博学多才、学有专长、有精湛的教育教学技巧、教学效果好的教师一定在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此外,教师要维护良好的威信,还必须做到保持与学生良好的交往和沟通,加强教师的仪表、言语、表情、举止、生活作风和习惯的整饰,严格要求自己 and 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也有助于赢得学生的尊敬。

综上所述,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一个教师从认识的提高、情感的熏陶、意志的培养和行为的锻炼等几个方面发展,才能有助于其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参考文献]

[1]王荣德.教师人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晨 晓)

儒家思想精华对当代高校教师价值观构建的启示

胡玉霞

(南京审计学院法学院, 江苏南京 211815)

[摘要] 儒家“人本”、“礼治”以及“君子”等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蕴含着大量超越性的思想要素,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品格,其中许多东西已积淀成中华民族相对稳定的道德观念与习惯,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当下高等教育领域,儒家文化的思想精华更需要高校教师承传和发挥,并学以致用,从而将其在对当代高校教师“学生为本”、“德治为主”以及“重在引导”的价值观构建中所具有的优生人心之功能发挥到极致。

[关键词] 儒家思想; 高校教师; 价值观; 启示

[中图分类号] G45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05-04

中国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发展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其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传承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在某些方面已不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尽管不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主流思想,但由于其蕴含着大量超越性的思想要素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其可以作为构建当代高校教师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一。儒家价值观在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朝鲜以及在中国大陆的当代化进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对其所具有的借鉴价值、世界意义以及超越时代的普遍适用性予以了充分证明。在当下高等教育领域,高校教师应该对儒家文化中的积极成分进行承传和发扬,并在价值观的自我构建中学以致用。

一、儒家文化所蕴含的思想精华

1. 处世上的“人本”思想。

孔子的“仁”、孟子的“义”以及荀子的“顺天命”的思想主张在“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哲学基础上开启了儒家人本理性的思维路向。

所谓“仁”,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整个“仁”精神是儒家“人本”思想之灵魂,贯穿于儒家忠、孝、悌、恕、恭、宽、敏、惠等伦理原则与温、良、恭、俭、让等道德条目以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敬臣忠等道德规范之中,也就是要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要洁身自爱,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亲善、关怀、照顾、支持,同时又要相互谅解、妥协、谦让、克制,一定不要相互猜疑和争斗。^[1]

所谓“义”,“义者,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他曾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他以“以非其有而取之为非义”(《孟子·尽心上》),就是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当然,儒家重“义”轻“利”一定程度上包含有抑制商品经济发展,偏重道德调整,轻视物质利益的弊端。

所谓“顺天命”,是指“治天命”、“裁万物”、“聘能而化之”(《荀子·天论》)。荀子明确地宣称,认

[收稿日期] 2012-06-11

[作者简介] 胡玉霞(1972-),女,安徽安庆人,南京审计学院法学院副教授。

识天道就是为了能够支配天道而宰制自然世界,因而主张人与自然之间也要协调。“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

无论是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还是荀子的“知天命而用之”都体现出了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以及民为政本的必然发展逻辑。

2. 治国上的“礼治”思想。

儒家的“礼治”是指依照“礼”所确定的社会等级次序和名分规定来治理国家,是一种中庸、和谐、仁爱的政治制度。即“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论语·为政》)。其理想的政治模式是“贤人政治”,“德主刑辅”的模式,即主张以“礼”治国的“人治”,反对重法苛刑,推崇德治与刑治相结合,认为刑只是“礼”的补充与手段,即先对民众进行“礼”教,教化无效才辅之以刑罚,相信只要人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遵循固有的社会地位和相应的社会规范,便可以建立与维持一个尊卑有序、长治久安、保守和睦的伦理国家。孔子将“不教而杀”(《论语·尧曰》)放在从政“四恶”之首。他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子为政,焉用杀焉,子欲善而民善矣”^①(《论语·颜渊》)。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此,“礼”成为治国的首要准则,社会关系靠“礼”理顺,是非曲直以“礼”判断。依“礼”而为者为顺民,否则即为大逆不道,会受到国法或家法的惩罚。荀子认为人能“群”(组织社会)是人优于动物的地方。而人能“群”在于“分”,即建立社会等级,从事不同的社会分工,将社会协同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以面对自然、战胜自然。而“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即“分”的标准在于“礼义”,即通过圣人的礼治,将社会分为上下有序的等级。

可见,儒家尊崇以柔性仁政与礼乐教化来劝化天下,以实现天下大同与和谐共存的政治理想,重礼轻法,或者说“内儒外法”。实际上原本的儒学堪称“内圣”之学或曰“身心性命”之学,强调“克己复礼”

(《论语·颜渊》),即节制、克制自己,修身养性,恢复一个有序、和谐、文明、进步的理想社会。儒家“礼治”之下培养的人才具有献身、进取精神,责任感、义务感强烈,与组织保持一致和忠诚。信奉儒家伦理的人,不但应该是勤劳的、具有责任感的人,更应具有集体意识、保持平静和谐的人际关系。

当然,儒家“礼治”思想的不足之处在于认为人在社会和家族中的贵贱、尊卑等差异是天生的,即人生而不平等。然而不可否认,“礼治”这种人治社会的治国原则,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要求;即使在客观上建立了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却是以和谐、稳定、安全、淳朴为理想架构。但是社会的发展表明,权力从属于法律,国家必须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则就会丧失其真正的本质和特征。西塞罗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2](P.18)}西方选择了“法治”为其根本,历史悠久且影响至今。同样,我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的正统思想对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形成了悠久的人治伦理文化传统。

3. 治学上的“君子”思想。

儒家主张治学的目的在于做人,即培养达到人格完善的君子。孟子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荀子·劝学篇》)。用当代的话来讲就是表里如一,“由内而外,由外而内”。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在教与学上,具体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是就学生而言,儒家首先强调学习必须态度谦虚、实事求是。孔子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还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其次,认为必须善于学习与刻苦钻研。孔子主张“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疑,慎行其余,则寡悔”(《论语·为政》),以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礼记·中庸》)。荀子则提倡“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

^①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

二是就教师而言,儒家首先强调教学的重要。“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其次,认为教师应该铭记自己的职责并以此为乐。孟子视“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为一项乐趣(《孟子·尽心上》)。韩愈曰:“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师说》),即教育的基本任务为:传授知识、技能与培养思想品德。再次,认为教师在做人和做学问上要以身作则。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上梁不正下梁歪也”(《论语·颜渊》)。孟子曰:“己不正,焉能正人?”(《孟子·离娄上》)最后,强调教学必须耐心且具有针对性地启发与积极引导,提高大学生闻一知十、举一反三的思维能力。孔子要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注重“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根据学生的先天禀性、个性、水平等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和“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礼记·学记》)。

三是就师生关系而言,儒家认为师生可以相互质疑问难,强调共同发展、教学相长。正如“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礼记·学记》)。

二、儒家思想精华对当代高校教师价值观构建启示

1. 学生为本。

高校教师应当领悟儒家“人本”思想的精华,处处以“学生为本”,即将培养学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首先,高校教师要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一要严格执行教学规范:按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科学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编制、公布与执行教学进程,公布联系方式,以增加师生之间的联系;二要把握教学深度与广度:注意介绍学术前沿理论,更新教学内容,鼓励学生敢于对现有规定、教师观点以及书本上、学术界权威观点提出质疑;三要注意讲授方法和手段:课堂讲授要条理清晰、重点与难点明确,可采用案例教学法、表格比较法、讨论法、实物法、视听法等多种方法以加强师生互动。

其次,高校教师要平等对待并爱护学生。要经常与学生家长交流,了解学生的个性、爱好与学习情况;要经常与学生沟通,在感情上把学生当作亲人、朋友,使学生在学校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要心胸开阔,不以权威自居,与学生共同探讨与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教学相长,才能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因材施教,才能结合专业教育有效进行人文教育,才能使大学生受到来自教师优良品格与严谨作风的熏陶,从而最终使学生学有所成、各得其所、各显神通。

再次,高校教师要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一是贯彻儒家推己及人的处世方法、不发不义之财的价值取向以及“义”与“利”冲突时“义然后取”的价值原则,培养学生诚恳待人、尊老爱幼、助人为乐、乐于奉献、热爱自然的高尚情操和道德品质,帮助学生克服“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唯财是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二是注重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后汉书·韦彪传》)、“爱亲则其方爱人”(《语丛三》),明晓“孝、敬为大”的道理,宣扬学生对孝父母、敬师长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遵守,并将此作为培养学生民族精神、爱国热情的一个起点,从而提高大学生的整体道德水平,并最终使传统文化经受住挑战和考验,并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2. 德治为主。

中国儒家“礼”思想的精神文化对国际文化影响深远。儒家“礼治”思想也是古代文化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即儒家的“礼”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不可缺少的。孝、尊、和、忠、让等“礼”的思想需要我们去坚守和维护。^{[3](PP.107-113)}因此,提高我们每个人的素养,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根本的任务,也是我们要达到法治目标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才能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指引一条宽广而平坦的路。此处的“德”指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顺应民意的道德,是包括所有真理的道德。因此,我国的各种社会政治制度的建构必须以此为基础,才能符合实际,才能推行下去。

教育制度更是如此。教育是国之根基,人才是兴国的关键。“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培养懂文化、讲礼节的高素质人才,才能更好地反映社会主义良好的精神文化面貌。尤其在物欲膨胀的当代社会,我们虽然有权追求合乎理性法则的正当个人利益、自由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地

位,但在现有物质生活水平的限制下,社会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个人利益至上”的需要,这必然产生纠纷。这种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纠纷很多都需要道德、伦理教化来调整。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弗兰克·吉布尼认为二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得益于将儒家集体主义的和谐理念与由美国引入的当代经济民主主义进行了巧妙的结合与运用,即集体主义意识为日本经济带来成功。^[4]

当前,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在各种思潮的融合以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下,大学生道德水准下降、道德伦理也越来越泛西方化。首先,高校教师应当运用儒家“礼治”思想的积极方面来反对西方社会中随心所欲的个人主义,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大学生诚信、自强以及对家庭、学校、社会、对各种使命、职责和义务的严肃态度。这不仅与当前提倡的以“八荣八耻”为标准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不相冲突,而且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其次,高校教师应当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原则,以“德”治大学生为主,以“法”治理大学生为辅。在对待大学生的错误行径上,应本着德化为主,处罚为辅的理念。对于违反纪律的大学生,先给予其纠错的机会,不得已再给与其处罚,即使处罚,也必须给予其陈述、申辩乃至听证等的机会以充分维护大学生的合法的权利。^{[5](P.345)}

3. 重在引导。

儒家充满科学性、先进性与辩证法的注重内省、循序渐进的治学思想在当代高等教育中应当发扬光大。

首先,高校教师要清醒地面对目前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仍然偏低而劳动量和社会要求偏高的现实,充分认识自己职业的社会价值,自尊自重,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其次,高校教师应注重自我发展意识与能力的培养,从严格要求与改善自身开始,不断修身养性,提高应对压力的心理素质,完善自身人格,以身作则地发挥良好的表率作用,以自己的高尚人格去感染并积极影响大学生,真正成为大学生的良师益友与引路人。

再次,高校教师应学会“善假于物”,增强教育效果。如用毛主席“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6](P.801)}为座右铭来督促大学生

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老老实实地做人,进而增强他们为促进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最后,高校教师应用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对大学生进行德育,引导大学生遵守法律、法规以及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并公平、公开、公正地做好德育测评、奖学金评定、评(推)优、党员发展等工作。当前单独对大学生进行德育与强行灌输价值观不仅不奏效,可能还会激起其叛逆与反感。儒学善于运用礼乐诗歌等易为人们思想情感所接受的形式在人们无意识的情况下传授其价值观的方法,这值得我们借鉴。因而高校教师要本着化育人心、德育为先的理念,从大学生的专业学习的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多渠道地开展各项教育,从情感体验上启发大学生以自己的感受理解、体验他人的感受,促进大学生道德认识的內化,进而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和奉献精神的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为此,有条件的高校可建立一支由专业教师组成的兼职辅导员队伍,其教育效果更佳,原因有二:首先,由于大学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学习中度过的,处于教学工作第一线专业授课教师或兼职辅导员,与大学生正面接触时间更多,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实践教学以及课外学习辅导来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可更加针对性地开展德育,德育效果会更好;其次,由于专业授课教师或兼职辅导员对本专业的研究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就业情况非常了解,可以更好地结合专业给大学生以科学指导,使大学生对他们更具认同感。

[参考文献]

- [1]孔令兴. 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J]. 理论导刊,1998(2).
- [2]王人博,程燎原. 法治论[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 [3]汤恩佳,朱仁夫. 孔子读本[M].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
- [4][美]弗兰克·吉布尼. 日本经济奇迹的奥秘[M].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
- [5]北京大学哲学系.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6]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陈晓姿)

论教学语言技巧的运用原则

陈之芥

(无锡高等师范学校, 江苏无锡 214001)

[摘要] 教学语言技巧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语言的巧妙技能和方法,其得体运用是教师教学艺术水平的标志,对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教学语言技巧是纷繁复杂的,但在具体实践中必须遵循3条原则:目标性原则、认知性原则、适切性原则。

[关键词] 教学方法; 语言技巧; 目标性; 认知性; 适切性

[中图分类号] G6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09-06

教学语言技巧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语言的巧妙技能和方法。教学语言技巧是教师教学艺术水平的标志,对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技巧的类型、品种纷繁复杂,例如,欲擒故纵、铺垫设伏、迂回侧击、类比引申等等,但不管何种技巧,运用时都必须遵循3条主要原则:目标性原则、认知性原则、适切性原则。下面分别具体探讨、论述这3条原则。

一、目标性原则

目标性原则是首要原则,就是要求教师教学语言技巧的运用必须绝对服从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是教学的方向、核心和灵魂,任何语言技巧的设计和运用都是为了有助于教学目标的顺利、圆满完成。偏离或脱离了教学目标,教学语言技巧就变成了纯粹的装饰或游戏,必然缺少生命的活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一般的语言交际技巧未尝不讲究目的性,但在受制的程度和广度方面,远不及教学语言深刻而广泛,这是由教学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

1. 教学语言技巧的设计必须紧紧围绕教学目标。语言表达的技巧一般情况下教师是可以而且应该事先作好准备,精心运筹设计的。有些语言技巧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貌似信手拈来,瞬间决策,随机运用,实际上是教师坚实综合修养、丰富教学经验的积

淀和反映,胸中自有蓝本,不过是达到了更高的境界而已。不论何种情况,教师必须严格按照既定的教学目标运筹、设计语言表达的技巧。

下面是一位教师教古诗《春晓》的片断:

师:这春风春雨的声音是诗人醒来后听到的吗?

生:不,是作者想到的。

师:最后一行写什么?

生:不知道花落了多少。

师:花落得多还是落得少?

生:花落得很多。

师:花落了是不是作者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

生:这也是作者想到的。

师:“夜来风雨声”和“花落知多少”都是诗人想到的。这两个“想到”有什么不同?

生:“夜来风雨声”是作者回想到的,“花落知多少”是作者自己想到的。

师:春风那么轻,春雨那么细,为什么作者会自己想到花落了很多?

生:花已经开“繁”了,花瓣全都展开了,这时候只要有一点微微春风、细细春雨都会落。

师:想到花落了很多,诗人的心情怎么样?

[收稿日期] 2012-06-05

[作者简介] 陈之芥(1954-),男,江苏江阴人,无锡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特级教师。

生1:他觉得很可惜。

生2:他觉得很惋惜,花儿那么美,可是现在却都落了。

师:是啊,一年之中最美的就是春天,春天百花盛开,百鸟争鸣,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花儿落了,春天也快过去了,所以诗人觉得很可惜。春天是美好的,也是短暂的,小朋友读到这里会怎么想?

生1:我好想把这美丽的春天一直留在身边。

生2:我们要珍惜时间,努力学习。

这一教学片断中,教师的语言技巧表现在以环环相扣的问题逐层引导。一个个问题,细致而有序,可以清晰地看出教师的目标就是启发、引领学生,由诗中描写的春风春雨、花落多少,十分自然地推想、体味春天的美好情景和作者隐藏的感情,融入赞美春天、留住春天的真挚感情。

2. 教学语言技巧的运用必须根据教学目标调整。教师在教学活动过程中,总体教学目标通常不会改变,一般是按照预先设计的教学程序运用表达技巧,解决什么问题,在什么时间、用怎样的方法,都有预案。但是具体教学目标在实际的教学中可能会发生局部的、个别的变化,如原来设定的某些具体目标需要补充完整,或者达到的程度需要进一步深化,或者衍生出能力等方面的新要求。另外,教学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往往会打乱正常的课堂秩序,影响到预定教学目标的达成。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就必须临时调整表达技巧,妥帖适应语言环境,力求有效地避免突发事件的不利影响。

有位教师在指导学生看图学文时要求学生观察课本上有关长城的两幅图,分析比较这两幅图有什么区别。一个同学举手发言说道:“这两幅图不同的地方是上面一幅是从远处看长城,画面上是长城的远景;下面这幅图是从近处看长城,画面上是长城的近景。”听到这位同学的回答,教师心中很高兴,因为这正是教师预料中的答案,所要达到的目的。教师正要接着讲下一个问题,未料一个女同学站起来说:“我认为上面这幅图画的是秋景,下面这幅图表现的则是夏景。因为上图中满山红叶,下图中草木翠绿茂盛。”教师愣了下,想道:这种答案事先没有考虑到,是否也是两幅图的区别呢?转眼间马上有了肯定的结论:是的!原来自己框定的答案有局限,设想的教学目的欠深刻。于是教师表扬道:“你观察得真细致!注意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区别,相信其他同

学一定也能够找出更多的不同之处。”又一个同学兴冲冲地发言:“我认为两幅图作者的观察点不一样,上图的观察点是在长城的侧面;下图的观察点是在长城的正上方。”一个同学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向大家做了介绍:“上图是画的画,下图不是画,是一幅彩色照片。”

这位教师的应对技巧很是得体。原本是想通过比较的方法来让学生体会、认识“远景”和“近景”的区别,引向下面的话题。但是当学生通过观察有了可贵的、合理的新发现时,教师不是削足适履,以预案来限制学生,而是及时地调整教学计划,以表扬、激励技巧应变,从而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了课文内容,为他们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发展创造空间,在更高的程度上达到了教学目标。

3. 教学语言技巧的评价必须根据教学目标。教学语言技巧的评价标准是多元的,但教学目标无疑是评价教学语言技巧得失成败的主要标准之一。在有的人心目中存在一种误解,以为语言技巧成功、出色,其结构必然复杂,走向必然曲折,变化必然纷繁,色彩必然多样。其实,最重要的评价标准是教学目标,凡是有助于教学目标的达成语言技巧,不管是简单或复杂、直露或曲折、朴素或艳丽,都是应该肯定的。与教学任务圆满完成关系越是密切,越是具有影响和作用力的语言技巧,那么语言技巧的层次就越高,理应给予更高的评价。

一位小学语文教师上《麻雀》一课,为了让学生更深层体会母爱的伟大,先让学生说说生活中看到的动物界中的亲子之情的故事,可孩子们却哑然了。面对一双双困惑的眼睛,教师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给他们听:

“一条鳝鱼很不幸地被人们捕获了,正在热锅里承受着煎熬,可它总是竭尽全力地弓着腰身,尽量地把自己的腹部抬高,即使已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一现象引起了一位厨师的注意,于是他解剖了这条鳝鱼,发现它的肚子里竟有着无数的卵。这位厨师讶然了,顿时,他对这条美丽的鳝鱼——一位伟大的母亲肃然起敬。”

听这个故事时班上静极了,除了几声赞叹声外,没有一丝的杂音。大家静静地坐在那儿,沉醉在爱的国度中。一分钟过去了,渐渐地一只小手举起来了,两只小手举起来了……此时孩子们喷涌出的是一个精致而细腻的爱传说,此时爱已成了这堂语文课的主旋律。

这一教学案例中,教师运用的是以事例启发的技巧,生动地讲述了一个美丽的小故事,以此感染、启发、教育学生,不局限于对文本的理解和积累,使学生受到了美的熏陶、情的陶冶、心灵的洗涤。教学目标顺利圆满达到,语言技巧的运用地非常成功。

二、认知性原则

认知性原则,就是教学语言技巧运用必须符合学生认知的规律,讲究科学性。教学的对象是学生,他们接受知识、认识事理的过程具有特定的规律特征。教学语言技巧说得彻底些,实际上是学生认知规律的艺术体现,因而教师在筹划、制定、运用语言技巧时,就必须遵循认知规律,决不能随心所欲。精当的教学语言技巧首先要求教师对授课内容理解透彻,但却不能将自己的理解过程和方法照搬给学生,而应该设身处地,从学生实际出发,设计、采用最便捷、最有效的技巧使学生深刻认知。教学语言的表达技巧不过是在认知规律上面生长起来的艳丽的花朵,违背客观认知规律建构的语言技巧必然背离方向,徒存其表,不能有效达成教学目标,甚至产生负面的影响。

首先,要求在思维矛盾的基础上建构语言技巧。认知源于主体与客体间相互作用的活动中,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充分暴露学生思维的矛盾,自己发现问题,使学生产生解决未知问题的心理要求,在围绕问题的积极探索过程中达到既掌握知识,又培养能力的目的。教学语言技巧的建构就必须高度重视设置学生的思维矛盾,并创造发展深化的契机。从许多成功教例来看,教师为了突出问题,引起学生的注意;或者为了加大爆发力,营造突破口;或者为了加强隐蔽性,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等等,因而十分重视、讲究设置思维矛盾的技巧,而且随着教学现代化手段进入课堂,语言技巧更是多姿多彩。教师采用实物生疑、背景导引、平中见深、巧妙暗示、连续追问、故设悬念、无中生有等方式,艺术地将矛盾展现在学生面前,牢牢吸引学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收到了理想的效果。

在教学《确定位置》一课时,特级教师徐斌设计了一个找座位游戏:“请学生根据老师发的座位卡片找座位。看哪些同学能正确、快速地找到自己的座位。”孩子们兴趣盎然,教室里热闹极了。不一会儿,大部分学生都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可是有3个学生拿着手里的卡片发呆,小脸涨得通红。原来第一个孩子的纸条上只写着第3组第()个,他知道应

该坐在第3组,可不知道应该坐第几个。而第二个学生的座位号上写着第()组第4个,他知道坐在第4个,可不知道应该是哪一组的。第三个学生更是疑惑:“我的座位号问题最大,上面就写了第()组第()个。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告诉我,我怎么知道坐在哪里呢?”“如果仔细观察,还是可以找到位置的,因为教室里空着3个座位。”同学们纷纷建议。3个孩子看看自己手里的卡片,仔细观察了一番,果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看到这里,徐老师小声说:“看来,要正确地找到座位,就应该写明白是第几组第几个。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有关确定位置的知识。”

在游戏技巧中,徐老师精心设计了3张与众不同的位置卡片,提供思维之“源”,引起学生的思维冲突。学生产生疑虑之际,教师适时予以启发。寥寥数语便将学生引入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学生同时也感觉到即将学习的内容是有实际需要的,积极性、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

其次,在情景体验的基础上建构语言技巧。情景体验主要是通过想象、联想、情感等心理因素的参与而获得。教师在教学中结合一定的语言情境,让学生进入“角色”,深切体味教学内容的审美意蕴,就可以使学生对教学内容产生整体而又深切的感受,从而使教学过程成为其愉悦的审美体验过程。这也是一条重要的认知规律,许多语言技巧都是植根于情景体验。

小学语文《燕子》一课将春天里的美景写得非常精彩:“阳春三月,下过几阵蒙蒙细雨,微风吹拂着千万条才舒展开黄绿眉眼的柔柳”。特级教师李吉林为让学生细细体味那春天的美景,便采用“删字”技巧与原文相比体验感悟。

师:“微风吹拂着柔柳”有什么感觉

生:我觉得柳枝好像在摆动。

师:微风吹拂着什么样的柔柳?

生:微风吹拂着才舒展开的柔柳。

生:微风吹拂着才舒展开黄绿眉眼的柔柳。

师:才舒展开黄绿眉眼的柔柳,好像柳树怎么样?

生:好像柳树刚刚从梦中醒来,睁开了眼睛。

生:这就把柳树写活了。

生:好像柳树也长了眼睛和眉毛。

师(加重语气,边说边画,用简易画再现春天杨柳万千条的情境):不是一条两条,而是千

万条才舒展开黄绿眉眼的柔柳。

(最后,学生深情地朗诵着“微风/吹拂着/千万条/才舒展开黄绿眉眼的/柔柳。”))

该课因教师高超的语言技巧而生色。试想一下,李吉林老师若只是让学生明白“舒展”、“柔”等字词是什么意思,理解作者运用的是什么手法,抑或把自己领会到作者的思想感情条分缕析地讲解就算完事,师生之间就很难有积极的情感交流,教学也就难以获得理想的效果。

第三,在知识迁移的基础上建构语言技巧。布鲁姆说过: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是学生已有的知识。迁移是指先前的经验对当前的学习的影响,以前的经验对当前的学习常常起着帮助的、积极的、正面的影响,所以没有必要的基础知识和背景知识,或者是认知结构不完备,学生就很难同化新的知识。教学语言技巧要求运用迁移理论来构建,调整学生的认知结构,关注学生以往的知识积累、学习经验及其学习方法等情况,使后学习内容与前学习内容保持信息的联系、结构的一致,力图使之对学习新知识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下面是一位小学数学教师执教《长方形与正方形》的片断:

(课件演示长方形、正方形拼成的美丽图案。)

师:老师有个神秘的礼物送给大家,请同学们闭上眼睛。(伴随着音乐课件出示一个机器人和一座房子。)

(学生听到音乐都睁开了眼睛,并欣喜的发出赞叹声:好美啊!)

师:喜欢吗?说说你看到了什么图案?(学生回答略)

师:这两个美丽的图案是由我们学过的哪些平面图形组成的?

生:长方形和正方形。(老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出示课题:长方形和正方形)

师:长方形和正方形在你们的印象中是怎样的图形?

(学生根据过去的已有认知说到:有四个角、四条边,长方形长长的,正方形方方的。甚至有部分孩子还说到了长方形和正方形边和角的特征。)

教师利用课件演示长方形、正方形拼成的美丽图案,让孩子们在欣赏美丽图案的同时找出认识的

平面图形。二年级学生已经初步认识了长方形和正方形。这样的导入技巧既激活原认识,巩固了旧知,找准教学的起点,又能调动学生探究的积极性,为接下来的教学活动做好铺垫。

三、适切性原则

适切性原则,就是教学语言技巧的运用必须适应、切合语言环境,力求做到和谐、协调、统一。语言环境包括诸多因素,例如时间、地点、对象、话题、背景等等。语言环境对语言技巧的运用具有重要的制约和影响作用,什么场合需要运用技巧、运用怎样的技巧,并不全部是由教师的主观意愿决定的。教师需要对教学过程中的各种定量、变量因素有清醒的认识,具有正确的判断,进行如实的分析,作出恰当的决策,力求语言技巧运用得体。如果语言技巧与语言环境的关系和谐、协调、统一,就是做到了适切。

1. 时机的适切性。时机是具有时间性的机会。语言技巧和教学时机存在内在的联系,课堂上的不同时机需要相应的技巧。教学开始阶段,常常需要运用特定的语言技巧创设良好的教学氛围,这对教学过程的顺利展开是十分重要的。教学过程的行进阶段,则往往需要特定的语言技巧引导学生逐步加深理解,点拨启发,攻克重点、难点,同时穿插恰当的评价“推波助澜”。教学过程的结束阶段,又常常需要特定的语言技巧,概括总结,变换角度,给学生留下清晰深刻的印象。

特级教师支玉恒执教《鼎湖山听泉》开始之前有这样一师生对话片断:

师:同学们好!今天把大家请到这儿来上课,老师不一样了,环境也不同了,有那么多老师来听课,害不害怕?

生:不怕!

师:真不怕?但是我们今天要上的是苏教版的课文,这是第一个不熟悉;老师和环境不同,这是第二个不熟悉。刚刚拿到教材,没有一点儿预习,这就要求我们上课更认真,能做到吗?

生:能!

师:认识我吗?知道我姓什么?

生:姓支。

师:你怎么知道的吗?

生:我们老师说的。

师:哪个支?

生:一支铅笔的支。

师:对了,举起手来,跟着我写一遍。(师板书)看同学们挺严肃的,怎么没一点儿笑容呢?会不会笑?(生笑)好!现在咱们就来笑一笑,我说一个词,同学们做动作。“面带笑容”“开怀大笑”。(生笑得不够开怀。)

师:既然是开怀大笑,就应该放开胸怀地笑,加上动作,咱们再来一次,好不好?预备,开始!(师生开怀大笑,师的动作十分夸张。)

师:再作一个笑,你们肯定不会。(生惊讶)冷笑!(生笑)皮笑肉不笑。这两种笑都不是好人的笑,你们不会笑,说明你们都是好人!在上课之前,先请同学们回答3个问题,这3个问题要是敢回答了,那这节课一定能上好。1、上课上得开心了,敢不敢笑?2、有话想说,举手了,可老师又没看见,敢不敢站起来就说?3、觉得老师的课上得不好听,想睡觉了,敢不敢睡?事物都是有两个方面的,你睡觉对我有好处。(生:啊?)你一睡觉,就等于是给了我一个信息。你想啊,你一睡觉,我就知道这样上课不行了,我得赶紧调整上课方式了。那前面的趴下我看见了,收到了这个信号,可要是后面的趴下了,我看不见,那怎么办?

生:打呼噜!

师:对了,打呼噜!会不会打呼噜?(全班趴在桌上打呼噜)

师:好!想说,敢不敢说?想笑敢不敢笑?想睡,敢不敢睡?

这一例,教师以别出心裁的问题、演示模仿语言技巧创设了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这是因为教师是借班上课,而且教材是新的,师生之间陌生,诸如此类的因素有可能妨碍教学的顺利进行。像这种语言技巧移植到教学过程之间或结束阶段,肯定是不妥当的,无必要的。

2. 对象的适切性。语言技巧因人而异。教学语言技巧实施的对象是学生,学生的年级有高低,年龄有大小,能力有强弱,基础有厚薄,个性有差异,所以学生个体构成是十分复杂的。因此,教学语言技巧的制定和运用又必须紧紧扣住学生,从他们的实际出发。对象的特殊性不但孕育了某些特定的表达技巧,而且即使同一语言技巧,也能使之呈现出不同的色泽。

一位教师上《月光曲》一课已接近尾声了,正引导学生概括贝多芬同情穷苦人民,热爱劳

动人民的品质。

师:同学们,学到这里你对贝多芬这位伟大的音乐家有什么新的认识呢?

生1:通过课文的学习,我认识到贝多芬是位有同情心的音乐家。

生2:我认识到贝多芬热爱穷苦人民,他的歌是为穷苦人民所写的,就像这首《月光曲》是为盲姑娘所写的。

师:说得真好。贝多芬确实是一位热爱劳动人民的音乐家。他的许多歌都是为劳动人民所创作的……

生R:老师,我有不同的看法。刚刚有同学说《月光曲》是为盲姑娘所写的,这只是个传说。昨天我看了从网上下载的有关《月光曲》的资料,其实这首曲子是贝多芬失恋的时候写的。当时他与一个小他14岁的叫朱丽叶的姑娘相恋,但由于地位悬殊,年龄又相差太多,朱丽叶的家人反对。后来她嫁给了伯爵成为伯爵夫人。贝多芬十分痛苦,就创作了这首《月光曲》。

生J:老师,既然这首曲子是贝多芬失恋时写的,为什么还要编这么美丽的故事来骗我们呢?

师:R同学自己上网查资料,让我们了解真实背景。这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很难得的。刚刚J同学提出的问题也很有针对性。这肯定也是很多同学心中的疑问吧!通过课文的学习,我们了解贝多芬热爱劳动人民的品质,现实中贝多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人们肯定是为了表达自己对这位音乐家良好品质的赞扬才编了这么一个美丽的传说,还将它编入课本,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他并学习他。

生Y:老师,可我认为,如果贝多芬真是热爱人民的音乐家,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为劳动人民创作的,那生活中不就有许多反映他这一品质的故事吗?如果从这些故事中挑选最典型的写出来,再编入课本,那不是更有说服力吗?

师:Y同学的问题提得太好了。老师现在也回答不了他的问题,因为我也赞同他的看法。是啊,选择生活中的真实事情不是更有说服力吗?你们回去再想想,还有什么原因使人们为《月光曲》编这么美丽的传说,并将它编入课本呢?或者写信问问出版社的编辑……

这一教学片断中,有5位学生发表了自己的看

法,反映出他们各自的差异,特别是后3位同学,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综合素质要高于前2位同学。教师的应对技巧也是因人而异,对前两位同学是一般性的肯定,对R侧重表扬他的精神,对J突出表扬其问题针对性、普遍性,对Y则高度赞扬。不同的对象教师运用的表扬技巧具有不同的色泽。

3. 内容的适切性。教学的内容也与语言技巧的运用密切相关。每门学科都有其特殊的性质;同一学科不同年级教授的内容各不相同;同一教材,各章节内容也是不同的。即使同是一节课的教学内容,本身有难易、深浅、长短、雅俗等之分,再加上教学目的制约和影响,所以,教师运用语言技巧就必须充分注意到教材内容的特点,突出重点、难点,确定最佳的途径,铺设有序的台阶,把握适当的尺度,力求取得最好的表达效果。

下面是特级教师钱梦龙《论雷峰塔的倒掉》教学片断:

生23:(读3号卡片)“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这句用了两个“听说”,显得噜苏,“没有亲见”和“听说”的意思也是重复的,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

师:大家想想,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生24:为了强调“听说”。

师:有点道理。但为什么要强调“听说”,而不是一听说,立即坐火车到杭州去看个究竟?你再往深处想想,揣摩一下作者对雷峰塔的态度。

生24:作者对雷峰塔没有好感,因为塔下压着白蛇娘娘。“听说而已”,就是说知道有这回事就算了,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生25: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知道塔下没有白蛇娘娘,他对塔没有好感是因为雷峰塔是封建势力的象征。

师:你们两人都说得很好,你(指生25)的纠正尤其好。不过,说作者的态度是“无所谓”,恐

怕还不够,我给大家一个字,请组成一个词,这个字是“冷”字。

生26:冷漠。

生27:冷淡。

师:请从两个词中选一个,并说明选择的理由。

生28:用“冷漠”好,因为它不但是冷淡,还有一点漠不关心的意思,表明作者对雷峰塔倒不倒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当然更没有兴趣到杭州去看。

师:这个问题挺难,想不到会解决得这样好。现在讨论下一题。

这一例,从内容上看,涉及到的是一个教学上的难点。教师先是让学生质疑提出问题,然后分三步引导学生走向认识的深处。第一步,用比较宽泛的提问请学生讨论课文两次写“听说”的意思,对“强调”作用的答案有分寸地评价“有点道理”。第二步,提出较高的要求,“往深处想想”“揣摩”,当学生回答“无所谓的态度”时,教师给予“很好”的评价——实际上能够说出这样的答案也确实不容易了。第三步,引领学生理解鲁迅的态度是“冷漠”,这是很深邃、困难的任务,教师半扶半放,给学生一个“冷”字,让他们先组词,再选词,圆满地解决了难题。可以看出,这里钱梦龙老师运用的语言技巧与要讨论、解决的内容特点是高度吻合的。

目标性、认知性、适切性是教学语言技巧运用的3条主要原则。教学语言技巧的类型丰富纷繁,走向开放多维,结构复杂变化,形式生动灵活。倘若教师要在教学实践中得心应手地运用语言技巧,那么就必须严格遵循深层客观规律,无论是形象直观的技巧,还是逻辑推导的技巧,都应该合情合理,有根有据,容不得丝毫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责任编辑 陈晓姿)

诗歌朗诵探究

苏 叶

(扬州市职业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9)

[摘要] 诗歌朗诵以作品的选择、发声和用气、联想和再现、基调和节奏、配乐和编排、评价和鉴赏等6项形成序列,对其进行分项专题研究,可以有效帮助朗诵者逐步掌握朗诵表演的技能技巧,最终领会朗诵艺术的真谛。

[关键词] 朗诵; 诗歌; 序列

[中图分类号] J8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15-03

朗诵是一种依托文艺作品文本,通过朗诵者自己的审美体验,结合有声语言的多种表现手法,对文本进行二次创造的音声表演艺术。在各种文体中诗歌是最适合朗诵艺术表演的一种。同时,诗歌朗诵也是最容易普及的一种大众文艺表演形式。朗诵学习者可以在一系列的训练过程中,掌握更具体的情声气结合技巧,体味更深沉隽永的诗歌韵味,展现更具个性魅力的艺术表演效果。

一、作品的选择

1. 客观因素。首先,作品主题的选择往往会受到朗诵主办方要求的制约,比如近些年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央文明办主办的全国“中华诵”经典诵读比赛,几乎每次一个主题,或者是歌颂党歌颂祖国,或者是赞美生命赞美生活……,虽然主题宽泛,但是还是有一个统一的中心。其次,作品内容的选择要关注本次朗诵受众的年龄、身份、文化水平、欣赏能力等情况,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审美要求会直接影响朗诵产生不同的表演效果。最后,朗诵进行时的时空语境也会制约作品内容的选择,比如重大的节日、传统的节令、特殊的庆典,从时间隐喻的层面上限定了作品内容;再如校园、车间、矿山、田野,室内、室外、舞台、演播室,从处所隐喻的层面以及交流的对象感方面也限定了作品的内容。

2. 主观因素。朗诵者挑选朗诵作品,反过来说,

朗诵作品对朗诵者也有选择性。比如从年龄上看,少年儿童不宜选择沧桑厚重、大气磅礴的历史诗;从性别上看,男性不宜选择温柔婉约以女性为第一人称的爱情诗;从音域、音色上看,甜美、深沉、粗犷、柔和各有各的风格特色,也各有适宜和不适宜的诗歌作品,只有对主客观条件有充分的认识,才能在表演中发挥最大的优势。

3. 作品要求。适宜朗诵的诗歌最好具备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意义表达明确,形象塑造鲜明,绝不艰深晦涩;第二,朗朗上口,音韵和谐,富有节律感;第三,感染力强,容易引起共鸣;第四,一定是朗诵者自身深深喜爱、感同身受并且充分理解和领悟的作品,没有这一点,前面的三点只能是无源之水、无病呻吟。

二、发声和用气

1. 吐字归音。首先,诗歌的每一个字的普通话规范读音都必须准确无误,尤其是生僻字、多音字、易误读字一定要经过反复考证以确定其标准读音。其次,吐字跟声母相关,要求发音部位准确,唇舌弹发有力、干净利落;立字跟韵腹相关,要求口腔打开、音效圆润丰满;归音跟韵尾相关,要求送气到位、完整轻松。^{[1](pp.62-63)}

2. 共鸣用气。共鸣的控制会直接影响诗歌朗诵中声音的色彩和表现力。运用口腔共鸣,音色清晰

[收稿日期] 2011-06-13

[作者简介] 苏叶(1972-),女,江苏扬州人,扬州市职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

圆润;运用胸腔共鸣,音色深沉宽厚;运用头腔共鸣,音色明亮华丽。气息在朗诵中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朗诵者健康积极投入的身心状态、正确通畅的胸腹呼吸法以及根据情感要求自如的呼吸调控,都可以让诗歌朗诵效果收放自如。

三、联想和再现

只有对诗歌作者个性经历、写作背景、诗句中展现的意境、抒发的情感充分地把握,才能得到细腻敏锐的感受,产生清晰生动的联想,最后以有效的声音效果再现自己的文体验。

1. 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精神世界,学会观察生活、体味人生;广泛阅读,勤于写作,加深艺术修养和内涵。余光中的《乡愁四韵》全诗分为四小段,每一段以一种中华传统文化的意象“长江水”、“海棠红”、“雪花白”、“腊梅香”来牵动乡愁,引发联想,如第一段由“长江水”联想到“酒”,由“酒”联想到“醉酒的滋味”,再由“醉酒的滋味”联想到“乡愁的滋味”,若没有相应的文化底蕴、诚挚的赤子之心,细腻真实的情感体验,一定无法表达出此诗中真性情。再者,诗句中运用了非常独特的修饰语,用酒形容长江水、用血形容海棠红,用信形容雪花白,用母亲形容腊梅香,从人的味觉、视觉、嗅觉和生活中人、事、物的联系等多角度呼唤人们对乡愁的共鸣,层层深入,步步推进,也一定要依托朗诵者的主观恰如其分的感受才能再现这首诗歌一咏三叹、回环往复,荡气回肠的艺术效果。

2. 全面了解诗人生活时代的大背景、诗人个性气质、人生经历的小背景以及本首诗歌写作的具体背景。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创作于国难当头、山河沦陷的抗战初期,作者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激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他执著于对苍老衰弱、备受苦难的祖国、人民、土地的那种深深的爱,甚至愿意为此奉献生命。了解了这些,才可能在朗诵中抓住“土地”、“河流”、“风”、“黎明”这些意象,用沙哑却宽厚的音色表达出虽悲哀却博大的波澜起伏的大爱情怀。^{[2](P.39)}

3. 仔细揣摩诗歌的层次结构,解读诗句文字的深层涵义,化静态的书面语言为动态的具体视像。李白的《将进酒》由悲而起,然后转自乐、转狂放、转激愤、再转狂放,最后收尾于“万古愁”,与篇首照应。解读开头两句“君不见……”表面看似汪洋开阔,内里包含人生苦短、韶华易逝的无奈,结合这首诗的创作之时正值李白“怀用世之才而不遇合”之际,就可

知道朗诵整首诗的情绪,不仅应有表层的狂放不羁、酣畅淋漓,更应有骨子里深广的忧愤和沉郁的自信。^{[3](PP.18-20)}同时,一个白袍飘飘、豪爽浪漫的诗人“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的动态视像也就栩栩如生地在受众脑海中浮现了。

4. 自我角色定位,进行艺术的再加工,朗诵者与诗人以及诗歌本身三位一体,再现意境,抒发感情。以席慕容的诗歌《莲的心事》为例,这首诗以第一人称写作,诗中主人公以一朵盛开的夏荷自喻,表达了一个处于生命最绚烂期的女子对爱情的祈盼。朗诵者必须是一位女性,在舞台上她应该洋溢着自信、美丽、舒展的气质,诗人、朗诵者、夏荷凝聚为她一人,既是自语又是倾诉,音色清朗、圆润,节奏舒缓、流畅。读到“无缘的你啊”一句时,用气声带出轻轻的叹息,表达淡淡的幽怨,最后渐弱渐慢说出“太迟”徐徐收尾,引人意犹未尽的遐思,并且散发一种中国古典韵味的意境美。

四、基调和节奏

1. 基调的确定。张颂《朗读学》对基调的解释是“作品的总的态度感情,总的色彩和分量”^{[4](P.123)}。这个定义表明两点:其一,基调指的是朗诵某首诗时所保持的态度倾向、感情色彩、语气分量;其二,基调是朗诵全诗总的精神统领,必须贯穿始终。每一个朗诵者对诗歌进行艺术再创作时,都应该对本篇作品的基调有一个鲜明的表述,“对朗诵者来说,基调是有声语言构成的总体形态。”^{[3](P.56)}

2. 节奏的起伏。诗歌的节奏来自诗歌音节的规律、文字的疏密、语义的转换,也就是说朗诵既应表现诗歌语言音乐旋律的节奏美,也应表达诗歌内容和感情变化的节奏美。只有朗诵的音声节奏与受众的内心节奏、诗歌的文本节奏完美融合,才能达到出神入化、宛若天成的艺术神韵。

古典诗词大多受格律和音韵的约束,平仄对应、合辙押韵、音步工整;大多篇幅较短、文字凝练、内容含蓄。朗诵者应尽量选择篇幅相对较长,内容情感有起伏,语言较为具体形象的篇目。第一,要避免完全依照格律诗自身音步节奏来确定自己的朗诵节奏,第二,在仔细品读作品之后,根据诗歌的内容、意境、情感的变化,进行艺术再创造,形成自己朗诵这一首的内心节奏。

现代诗歌虽然摆脱了严格的格律的束缚,但是好的诗歌作品依然讲究文辞修饰,追求炼字炼意,追求文字的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组合。因此,朗诵者必

须认真分析揣摩诗歌的形式结构是如何与它的内容情感的发展相结合的,然后才能在朗诵实践中找出符合它的情声气表达节奏。

五、配乐和编排

1. **背景乐的选择。**好的背景乐可以帮助听众很快进入诗歌的意境,也可以帮助朗诵者很快进入角色、进入状态。一首朗诵诗是否选择背景乐,选择什么样的背景乐,是由诗歌的主题以及诗歌的基调、节奏共同决定的。而是否能够从音乐的海洋中寻觅到适合这一首的背景乐,又取决于朗诵者自身的艺术综合素质和音乐鉴赏能力。

背景乐的来源一般有3种:一是现成的音乐作品;二是经过编辑的音乐作品,三是专门为这一首谱写的音乐作品。因为很难找到现成的长短、情绪、节奏都正合适的背景乐,而专门请人创作、演奏、制作背景乐的成本又太高,所以往往第二种情况更为常见。我们提倡朗诵者本人掌握一些音乐编辑技术,才能在反复地选择、编辑、磨合中,让音乐旋律的节奏情绪与朗诵者语流的缓急、高低、明暗等配合得天衣无缝、如影相随。当然,音乐何时弱、何时强,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何时留白等都应该是在朗诵者编辑时需要考虑的细节,此处不再赘言。

2. **表演的策划编排。**近些年来,朗诵舞台表演的形式日趋丰富,独诵、对诵、轮诵、群诵、表演诵等各领风骚,这些都需要精心的策划和编排。一台大型的朗诵会,从话筒的选择、舞台的位置、服装的风格,到朗诵队形的排列转换、朗诵者的眼神、表情、动作,再到音乐、舞美、灯光的设计,显然需要一个团队的合作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央视2011年全国大学生校园文艺汇演《五月的鲜花——永远跟党走》中南京财经大学《以青春的名义宣誓》节目是一个值得借鉴的编排成功的情景诗朗诵例子。五十多位演员身着红、黄、蓝、绿T恤衫,以3个领诵为首,深情讲述了3个优秀学子的动人故事。队列的穿插变换井然有序,动作造型青春动感,舞台大屏幕画面广阔明亮,背景音乐以关峡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主体,充分展现了当代大学生为了崇高的人生

理想,让青春的激情飞扬的坚定信念。

六、评价和鉴赏

一个成熟的朗诵者应该对朗诵作品的整体效果有自己的评价体系和鉴赏标准,这样也可以反过来提升自己的审美水平和艺术素养。

1. **评价标准。**目前,全国已经逐渐开展了“朗诵艺术水平考级”活动,《朗诵艺术水平等级考试大纲》对朗诵的测查项目和标准要求都拟定了相关的量化标准,值得朗诵学习者借鉴。

2. **整体鉴赏。**显然,一般受众很少用以上量化的标准去比较朗诵艺术表演的优劣,人们往往是用内心的审美需求来整体衡量艺术作品品质的高低,因此,我们说在朗诵鉴赏中“和谐”才是最基本的原则。作品主题、基调、节奏的和谐,朗诵者音色、感情、气息的和谐,朗诵文本、朗诵者、作者的和谐,表演现场策划编排、舞台效果、受众情绪的和谐,等等,才能蕴化出真正动人心魄的朗诵艺术珍品。

以上6项形成诗歌朗诵训练的序列,虽然我们大致依顺序进行分项专题探究,但是在朗诵艺术实践过程中,筹划、练习、表演,显然是应该从始至终、一以贯之地将自己的个性气质、文化底蕴、艺术素养等和朗诵技能融合在一起,从审美的角度来提升它,从理性的角度来挖掘它,最后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朗诵艺术风格。

参考文献

- [1] 仲梓源. 播音主持艺术入门训练手册[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 [2] 罗莉,王明军. 文艺作品演播选[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 [3] 陆澄. 诗歌朗诵艺术[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4] 张颂. 朗读学[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南山)

从免费幼儿师范男生培养看教育公平

——以苏州高等幼儿师范学校为例

胡 娟 孔宝刚

(苏州高等幼儿师范学校, 江苏苏州 215008)

[摘要] 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可,但也被质疑违背教育公平原则。事实上,免费师范男生教育从教育起点、教育过程、教育结果及政府职责等方面全方位的诠释了教育公平。

[关键词] 幼儿师范男生; 免费培养; 教育公平

[中图分类号] G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18-03

2010年5月17日,江苏省教育厅正式下发《关于开展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以招收培养幼儿园男教师为切入点,开展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工作,计划招收五年制免费幼儿师范男生300人,由苏州高等幼儿师范学校、南京幼儿高等师范学校、徐州幼儿高等师范学校(现已升格为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负责培养工作。免费幼儿师范男生培养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一体化政策,免除其在校学习期间学费、住宿费,毕业后由生源所在市教育局确保其在公办幼儿园有编有岗。2011年,全省再次招收五年制免费幼儿师范男生300人。2012年,这一政策仍将继续,招收人数将增至600人。

免费幼儿师范男生培养工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开展招收免费幼儿师范男生教育试点工作,在于鼓励优秀男生当幼儿园教师,创新幼儿园男教师补充机制,切实解决幼儿园师资队伍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在于形成良好的幼儿教育生态环境,促进幼儿快乐健康成长,更好地培养幼儿刚毅和勇敢的品质,进一步提高民族素质;在于进一步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教育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的事业。

但是,也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这一政

策违背了“教育公平”原则,具体表现在:

第一,幼儿师范男生免费培养,违背了《取缔教育歧视公约》,造成教育待遇不平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60年12月14日通过了《取缔教育歧视公约》,指出“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经济条件或出生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特惠,损害教育上的待遇平等”。“在学费和给予学生奖学金或其他方式的协助等事项上,除了以成绩或需要为基础外,不容许公共当局对不同国民作不同的待遇。”幼儿师范男生免费培养,与上述公约内容不符。

第二,幼儿师范男生确保有编有岗,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违反了事业单位“凡进必考”的进编原则,造成教育结果的不平等。1995年9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章第36条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学校和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女子在入学、升学、就业、授予学位、派出留学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幼儿师范男生毕业确保有编有岗,与上述法律内容不符。

其实,“教育公平”已不是新鲜话题。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就规定,“人人都有受教

[收稿日期] 2012-07-11

[作者简介] 胡娟(1978-),女,山东枣庄人,苏州高等幼儿师范学校讲师。
孔宝刚(1961-),男,江苏江阴人,苏州高等幼儿师范学校校长。

育的权利”；“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世界性的改革浪潮中，教育公平和教育平等问题就成为“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所有与教育有关的人最关心的问题”。我国有关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到20世纪90年代，教育公平才作为教育民主化的一个主要方面逐渐成为社会与学界关注的焦点，并逐渐成为近几年两会上的热点问题。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再次强调了教育公平的重要意义。

关于教育公平理论，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科尔曼和瑞典胡森的理论，他们都以“教育机会均等”这一概念来论述教育公平。科尔曼提出了教育机会均等有4个标准：进入教育系统的机会均等、参与教育的机会均等、教育结果均等、教育对生活前景机会的影响均等。^{[1](P.99)}胡森分别对“平等”和“机会”进行界说，认为“平等”有3种涵义：起点均等论、过程均等论、结果均等论。^{[2](P.206)}在当代的公平观念研究者中，影响较大的是罗尔斯(John Rawls)，他提出了公平三原则：平等自由的原则、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

我国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认为：“教育公平有入学机会的公平、教育过程的公平，而最终的公平应该是使每个儿童的潜在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都能获得教育的成功。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公平的教育。”^[3]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韩民也提到：“受教育权利平等是个大概念，它至少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入学机会的均等……这是最基本的教育公平。二是入学以后享有的教育条件和质量的公平……三是结果的公平，就是在承认人的能力差异和尊重个性的前提下，使每个人都能通过教育获得其自身才能的充分发展。”田正平、李江源则指出，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的具体内容表现为受教育权利的保证、机会均等、按照能力或者才能进行分配以及对“不利群体”进行补偿。^[4]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教育公平应贯穿于教育全过程，既要包涵起点公平，也要涵盖过程公平，更要体现结果公平，同时还应渗透政府在保障教育公平时的职责。江苏省免费幼儿师范男生培养政策不是违背“教育公平”，而是更好地体现了教育公平。

首先，从起点公平来看，如果说免费男幼师培养存在不公平现象，那也是对免费男幼师生的“不公平”。因为，从近两年的录取情况来看，各个地区免费男幼师生的录取分数线都要比当地女生的分数线高出很多（近两年录取分数线都达到各地四星级高中分数线）。当然，高分录取也是为了使政府制定的免费男幼师培养政策落到实处、发挥实效。

其次，从过程公平来看，争议的焦点在于免费男幼师入学后享有的免费培养待遇。其实，这种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恰恰体现了政府通过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来保障教育公平的基本教育职能。

长期以来，鲜有男生报考幼儿师范，地方招聘幼儿园教师更是鲜有男性应聘，从而导致幼儿园师资队伍性别结构严重失衡，更有许多幼儿园长期没有男教师。这不仅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幼儿教育生态环境，不利于幼儿（特别是男幼儿）刚毅、勇敢品质的培养，也不利于已有男性幼儿教师的发展。2010年江苏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开展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苏教师[2010]10号），决定自2010年起实施五年制师范学前教育专业男生免费培养计划，免费男幼师培养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一体化政策，免费男幼师入学前与录取学校和所在省辖市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从事幼儿教育不少于5年，市教育局确保其在公办幼儿园有编有岗，省财政给予免学费、免住宿费、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费等经费支助。免费男幼师培养政策，通过对男幼师这一相对“不利群体”的补偿，鼓励、吸引优秀男生当幼儿园教师，创新幼儿园男教师补充机制，在切实解决幼儿园师资队伍性别结构失衡问题的同时实现对幼儿发展的促进作用。以苏州高等幼儿师范学校为例，没有该项政策之前，学校办校35年，尽管招生男、女不限，但总共招到的男生不足10名。2010年政策实施后，两年共招收高分免费男生198名，报名人数更高达万人。这也验证了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讲的，公平并不是要否认差别，而是要求将差别控制在合理和适当的程度……在社会不平等的现实中，仅仅给予弱势群体“一视同仁”的对待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采取向弱势群体倾斜的“补偿性原则”，才能有效地减少不公平。^[4]

而且，在教育过程中，教育公平不仅仅是指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和享有教育资源的公平，还应该包括受教育者通过接受教育，能否合理地达到实现自我发展的条件，^[5]即公平的教育应该正视受教育者的

明显的个体间差异,进行有差别的教育,^[6]实现学生的最佳发展,而这在免费男幼师生培养过程中也有很好地体现。同样以苏州高等幼儿师范学校为例,在招收免费男幼师生以后,为了更好地实现教育的过程公平,学校从师资的配备、到培养目标的确定、到课程内容的选择、课时的安排等都进行调整。例如将免费男幼师生独立编班,独立设置课程方案——一方面,考虑到男生在幼儿园健康领域活动、科学领域活动、信息技术的应用、教学科研的管理等方面具有的优势,免费男幼师生班的数、理、化、生、政治、体育、计算机等课程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提升;另一方面,考虑到男生在钢琴、舞蹈、声乐等艺术技能课程的相对弱势,部分课程计划在三、四年级时作为选修课开设。同时,在第二课堂的安排上,也专门为男生设置针对性强的活动,如电子竞技大赛、男子篮球比赛、男子排球比赛等,并开设了深受男生喜欢的社团活动,并积极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全校及市级以上的各种活动比赛和社会实践活动等。与此同时,不间断地组织男生班下幼儿园考察和见实习,早一些接受专业熏陶,请男幼儿教师为他们现身说法介绍成长经历,介绍工作经验,提升男幼师生的专业认同感受,激励他们学习、发展的信心。从“人”的层面满足教育过程公平的要求。

最后,从结果公平来看,争议的焦点在于免费男幼师生毕业后有岗有编。其实,这正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最重要的保证。教育最终的公平应该是使每个学生的潜在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每个学生都能获得教育的成功。免费男幼师生“有岗有编”是为了更好地使每个幼儿(特别是男幼儿)获得教育的成功。当代社会舆论和青少年研究专家普遍认为,幼儿园、小学、中学直至大学都面临重重男孩危机。当人们关注男幼儿种种不如意表现时,也发现在幼儿成长环境中男性的缺失。在中国,在现存比例不足万分之七的男幼儿教师中,还有一些人在持续的流失中,男幼儿教师在教育中的优势很难发挥。免费男幼师生培养政策为增加男幼儿教师数量提供了前提,“有岗有编”则为留住男幼儿教师、充分发挥男幼儿教师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对拯救“男孩危机”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免费男幼师生“有岗有编”,更是为了实现免费男幼师生的教育成功。以苏州高等幼儿师范学校为例,为了将政府制定的免费男幼师生培养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实效,为了使免费男幼师生在未来的

工作岗位上发挥男性幼儿教师的优势特长,学校将男幼师生培养目标从以往的“思想品德优良,文化基础扎实、幼教理念先进、专业技能过硬、英语、计算机能力突出、个性特长明显”调整为“培养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文化素养、扎实的幼教知识和艺术创造力、健康的体魄和健全的人格”的幼儿园专职教师”。这样,有利于他们形成坚定的职业认同感、强烈的职业成就感和归属感,从而对幼教事业和自我发展充满自信,获得教育成功。

而且,在免费幼儿师范男生培养实施过程中,政府也在不断对政策进行调整修善。首届江苏省免费师范生培养协议规定:“做好接收和安排免费师范毕业生到公办幼儿园任教的各项工作,确保其有编有岗。”第二届免费师范生培养协议规定:“做好接收和安排免费师范毕业生到幼儿园任教的各项工作。对经公开招聘、双向选择未落实工作单位的,负责协调安排到当地农村公办幼儿园任教。”政策的调整,一方面体现了政府为了更好地激发免费师范生5年学习中的学习动力,将确保在公办幼儿园有编有岗调整为与公办园双向选择,择优录取;另一方面,安排免费男幼师生到当地农村幼儿园任教,也体现了政府通过发展农村教育来促进教育公平的决心。

综上所述,免费幼儿师范男生培养不是违背教育公平,而是从“起点”、“过程”及“结果”等各个层面更好地体现了教育公平的理论,使男幼师生的潜在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在实现幼儿和男幼师生的共同的教育成功中促进教育公平。

[参考文献]

- [1][美]莫琳·T·哈里南.教育社会学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2]胡森.平等——学校和社会政策的目标[A].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 [3]顾明远.为每个学生提供最合适的教育[N].中国教育报,2010-04-19(002).
- [4]刘晓华.论我国政府落实教育公平责任的现状与对策[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8.
- [5]周建波.政府行为视角下的高等教育公平[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8.
- [6]朱家雄.再谈教育公平——一个必须解决到位的学前教育问题[J].幼儿教育,2011(9).

(责任编辑 陈晓姿)

精英教育到普及教育转变中的困境与出路

魏 栋 李星星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教育发展经历了从精英教育到普及教育的转变,同时也存在很多负面影响:教育功利主义人群的滋生,教育产业化的扩张,教育改革的结构性错位,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教育制度的惯性现象;教育改革应明确改革理念与实践方向,立足教育软实力体制的建设,扩大地方教育制度的创新和对外开放以及解决好教育市场的微观因素。

[关键词] 精英教育; 普及教育; 软实力体制; 惯性现象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21-03

一、从精英教育到普及教育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发展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人才的培养是按照国家的意志,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而服务,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1995年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表明每10万人口接受过各种教育的人口大专以上的2,065人;高中的8,282人;初中的27,283人;在教育经费方面,建立了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在教育内部发展中,学校的规划与发展、教师队伍质量、课程与教学、考试评价都是择优与标准化,所谓“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精英教育模式。^[1]无论从教育规模、学生数量还是从教育政策上与培养目标上都是为国家培养精英人才,人才标准是统一的。精英化取向导致了狭隘的学科训练和应试怪圈,这固然扶持了精英人才的选拔,但也付出了片面发展的沉重代价;^[2]但另一方面,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主义精英教育的模式化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制约的结果,符合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因此,对于理解我国历史时期精英教育的概念,揭示精英教育的历史性,尤其我国当前社会转型对教育产生的影响及教育改

革与发展大有裨益。

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的多元性的影响,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与教育之间产生抗拒性矛盾,只有扩大教育的普及性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2010年教育部统计: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中,各级各类教育普及水平进一步提高,国民受教育机会进一步扩大。2010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56.6%,比上年提高5.7个百分点;义务教育普及水平处于高位,小学净入学率达99.7%,比上年略增0.3个百分点;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100.1%,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普及水平提升较快,毛入学率达82.5%,比上年提高3.3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6.5%,比上年提高2.3个百分点。^[3]所以,教育大众化、普及教育是整个社会的需求,由精英教育向普及教育的转变是社会力量推动的结果。当社会对人才供不应求时候,教育只是面向少数人的,为一定时期社会制造人力资源,教育内外部的结构都是单一的,教育方式、课程设置、专业设置都是固定不变的,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教育是可以实现的;当社会对人才供不应求时,整个教育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收稿日期] 2012-03-12

[作者简介] 魏 栋(1987-),男,山东青岛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李星星(1985-),男,山西朔州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变化,面向大众的教育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二、教育转型中的负面影响

1. **教育功利主义人群的滋生。**基于教育改革的开放性,必然存在多元价值主体的参与,这样也就少不了利益的竞争,许多人都看到了商机,因为他们关注的是教育改革所带来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希望教育改革带来实际的待遇、能够利用教育资源增加自己的利益,而不在乎教育本身的意义,或者是教育改革的不完善带来的弊端,也不必承担更多的后果。如教育补习已经演化为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它吸引了大量的民营资金进入,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市场岗位,消耗了巨额的资金,占用了学生非常多的时间。^[4]

2. **教育产业化的夸张。**机遇就是商机、商机就是利润,这些都是市场经济下的营利规则。我国实行教育改革产业化多年来,历史已经证明:教育与金钱的联系必然导致了各种唯利是图的教育手段和行为。教育考试的泛滥、辅导培训机构的铺天盖地,教育行政、监督、评估过程中官僚化的现象一日高过一日,再加上教育出版商带来的各种炒作试题、教辅书的发行,再有甚者就是教育系统内部以利益为目的的各种招生、校中校、课中课屡禁不止。所以在这种市场主义经济体制下,个体、团体、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和教育行政者都有可能成为商业教育产业化主体,加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以教育改革为目的的各种活动都是商业利益的牺牲品。教育市场化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与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本身的发展。^[5]

3. **教育改革的结构性错位。**(1)教育改革由社会政策向实际行为中演化过程中,市场化中效率优先的规则导致了教育改革的结构性错位。社会转型中社会阶层贫富差距,再加上经济资本、权力资本、文化资本弱势群体的受教育逐渐发生改变,就表现在受教育机会发生改变、学校的选择上以及专业的冷热选择上,作为历史上最具有地位的弱势群体在教育上表现出了不公平。

(2)政策导向与实际状况的不对等性。政策导向是教育改革的目标所在,表明了行为活动的政策导向。然而真正主导作用是掌握权力的人,他们总按照自己的利益与导向进行一轮一轮的改革。同时,权力拥有者考虑到实际行动中的各种顾虑和不确定因素,并且按照他们的阶级利益进行教育改革,文件上总会产生这样抑或那样的妥协性问题。关键

性问题是指导思想的模糊性与妥协性,改革的理念是什么,有待进一步做出解释。

4. **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在人类追求教育公平的历程中,无论是以人性人权公平为依托的同质的平等观,还是以适应人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为根据的不同质的平等观,都意味着公平趋向的发展。^[2]建国初期,教育的发展依赖于政治决定于社会性质。那个时候学业成绩改变着大众的社会地位;文革时期,政治依然挂帅,文化科学质量水平下降,入学的标准是群众的推荐,所以在没有刚性的标准下,同时也滋生出了教育上的腐败问题;改革开放后,社会的转型、城镇化的加快导致了阶级层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对教育的影响就是越是条件优越的受教育就越多,当个人获得个人知识技能,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学会社会规范,学会扮演社会角色以及在社会中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促进了人的社会化,也导致了不平等的加深。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化,从传统的规模演化为小型家庭,加上我国传统思想根深蒂固,这种情况越演越烈。

5. **教育制度的惯性现象。**当前,高等教育招生使得学历人群增加,缓解了就业压力,继而社会需求和用人单位的人才高消费也随之增加,造成就业市场竞争的白日化。即人才的标准逐渐提高,加上人们对学历的不断追求,又重新导致了学历人群的增加,所以形成了这种无限的恶性循环的发展模式而不是接力模式的发展。这种社会的转型带来了许多复杂的问题,文化、资源、消费的变迁使得社会结构张力不断夸大,而我们现有的改革政策不能很好地满足,必然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形成教育制度的惯性现象。

三、教育改革的实践策略

1. **明确教育改革理念与实践方向。**(1)教育改革以学生发展为本,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一个都不能少。随着社会的发展,国际竞争的激烈以及人们对教育认识发生的变化,教育逐渐开始走向对公民素养的培养,教育不再是培养人才的教育而是一种为整个民族发展奠定基础的教育,教育规模越来越大,随着教育规模的夸大,就会产生学生数量的扩大,继而相应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也初见呈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群差异性很大的人,如何实施好这一教育,如何制定出满足这一人群的意愿的教育才是教育改革理念中真正的以学生的发展为本。

(2)满足每一个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借鉴西方

社会的经验,越是发达的国家,教育水平越高的国家,他们对于个性的尊重越明显,社会的自由度越高,国家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就越明显。所以,我们要追求个性的教育,追求尊重学生的个性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也正是今天教育改革不断实施的结果与成绩。

(3)关注学生终生可持续发展。有人说基础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教育,这是十分荒谬的说法。笔者认为分数本身是没有好坏意义的,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分数在实施过程中的影响,导致了我们的功利性,功利主义的泛滥是今天社会的主要病症。即教育是理想性很浓的一项事业,今天学校教育对人才的培养只是人才的毛坯不是真正的人才,评价人才的好坏就要看几十年后有没有影响社会的人才出来。

2. 立足教育软实力体制的建设。教育改革不仅仅是物力的问题,同时也是教育内在发展的制约,需要我们在旧体制与新形势下寻找发展的平衡点,随着我们综合国力的提升,教育改革与发展不在是资源的多与少而是人力资源的开发,是教育内涵的发展,如:教师队伍的水平、课程与教学的水平、学校领导水平等。多元化的环境下追求教育的内在发展,要立足于教育软实力体制的建设,如教学上怎样关注学生的发展,素质教育怎样落实到学科教学,落实到课程中是真正的难点;三维目标的提出针对学生、老师、教材分别又如何实施与评价等等。

3. 扩大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和对外开放程度。教育改革十几年,自主合作、探究的教育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从经济利益的客观角度来看,行政部门教育资源的不放松,教育商业者对教育市场的垄断,学术机构的坐而论道、哗众取宠,弄虚作假、新闻媒体的似是而非,其中根本的还是利益在作祟。我国的公共教育体制应当是一个多元化的体制,从事的是公益性事业。构成公共教育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机构应当是一种非政府的和非企业的社会组织,提供的是公共物品^[6]。因此,扩大地方教育管理的权限,给予充分的教育监管力度,增强地方教育制度的创新,针对地方教育的发展加大对外开放程度,而不是仅仅限于某些发达地区的开放。

4. 解决好教育市场的微观因素。教育变革不是线性的,它是一个不稳定的动态过程,是各种合力的结果,教育本身具有不确定性,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机制。教育市场不仅是教育本身的问题,更是一个微观的社会性问题。我国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与“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结合又使得教育承载了更多

的内容,在传统的人事制度下,缺少职业选择的自由空间,也缺乏畅通的流通渠道,对大多数人来说教育是唯一的途径。我国的人事制度制约着分配制度,分配制度就会作用于教育过程中,对于大多数人群来说也只有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才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再次分配,所以,加在教育上的负担会日益突出。再次,经济浪潮推动了就业的标杆,就业压力起到了推波助澜,鉴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就业压力日趋严重,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所有这些都反映到教育中,就会对学生的造成影响,学校在减负而家长在增负或者是家长问责学校的局面也就不可避免。^{[7](P.107)}一方面要建立规范的教育法制市场,强化教育作为公共、公益事业的价值信念和道德追求,消解种种教育腐败与社会不公导致的教育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迷失;^[8]另一方面,教育市场不是完全的市场,而是一种有限的市场,它需要政府的规制和引导。政府要确保教育的非营利性,建立弱势群体的补偿制度,克服市场对公正的不利影响,使教育市场化与教育公正构成一种融合关系。^[9]

[参 考 文 献]

- [1] 教育部. 中国教育发展概况[EB/OL].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63/200408/2692.html. 2012-03-22.
- [2] 杨启亮. 关怀普及,淡化教育教学实践中的精英化取向[J]. 教育研究,2003(9).
- [3] 教育部. 中国教育概况——201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EB/OL].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business/htmlfiles/moe/s5990/201111/126550.html>. 2011-11-14/2012-03-23.
- [4] 程蹊,李忠斌. 我国城乡补习教育发展及其经济成本的调查研究[J]. 教育与经济,2011(2).
- [5] 邓俊英. 关于教育市场化的哲学思考[J]. 哲学研究,2003(2).
- [6] 劳凯声. 面临挑战的教育公益性[J]. 教育研究,2003(2).
- [7] 袁振国. 教育政策学[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 [8] 戴双翔. 基础教育市场化改革及其伦理审视[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 [9] 冯建军. 教育市场化与教育公正[J]. 高等教育研究,2008(6).

(责任编辑 晨 晓)

现实语境下高校德育过程生态关系剖析^{*}

周 宏

(安徽工业大学思政部, 安徽马鞍山 243002)

[摘要] 引入生态学的方法,高校需要对德育过程的构成因子进行优化,需要结合德育生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对其中出现的德育资源输入与输出比例的失衡、德育资源的损耗现象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德育结构,强化整体德育观念,协同其他德育形式,构建良好德育氛围等方面的综合平衡治理措施。

[关键词] 高校德育; 生态关系; 失衡; 治理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24-03

近年来我国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毒胶囊”等事件极大地刺激了国人的神经,这也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社会上劣化的道德风气必然会渗透到大学校园的每个群落,影响到大学生的行为和思想。为此,我们需要高度重视高校道德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努力寻找应对的思路,应对外界的诸种挑战。

一、高校德育实践置身的两种语境

在现代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1](P.1)}的高校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是毋庸置疑的,高校德育是整个社会道德生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良性或恶性发展都能折射出整个社会的道德面貌。

高校德育置身于两种语境之中,首先是传统的相对平面的德育环境,这种环境表现为活动内容和活动场所的统一。活动内容主要指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文化、心理等因素。活动场所包括以高校为主,向家庭、社区、社会公共活动场所的延伸。其次是随着众多社交网站的勃兴,特别是类似于推特、微博等的广泛应用而生成的高校德育虚拟舆论环境,这种迥异于传统的实践情境给高校德育带来了

巨大的挑战,同时为德育主体提供了实践创新的契机。但是,前者应该是做好后者的前提,只有立足于传统的高校德育环境,才可以利用新兴的意义符号与技术手段,做好虚拟环境下的高校德育工作。本文仅从传统现实语境下的高校德育生态这一视角进行分析。

“教育不可能置身于思想和行动的新潮流之外,它在更新价值观念方面大有作为。”^{[2](P.101)}“道德教育是一个需要多学科共同研究的领域,仅仅通过一门学科来探讨这一领域既是有限的,也是危险的。”^{[3](P.56)}这就要求高校德育挣脱传统德育框架的诸种约束,引入新的德育理念与方法,以取得更好的德育效果。

二、高校德育的过程:一种生态学视角的考察

近年来,为了提高高校德育的效果,学者们置身于高校德育的现实语境,从多种视角汲取与整合了多方资源,总结出许多值得推广的经验。其中,以生态学的方法来探索高校德育内在规律是一种有益尝试。

美国教育家克雷明认为生态学的概念是有用的,因为它强调联系,教育生态学的方法就是把各种

^{*} [基金项目] 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虚拟时空下高校德育舆论环境调控研究”(项目编号:11YJC710081),2011年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风险社会视域中的高校德育生态研究”(项目编号:2011sk727)。

[收稿日期] 2012-05-17

[作者简介] 周宏(1972-),男,江苏东海人,安徽工业大学思政部副教授,博士。

教育机构与结构置于彼此联系中,以及与维持它们并受它们影响的更广泛的社会之间的联系中来加以审视。^{[4](P.36)}而所谓的教育生态学则是依据生态学的原理,特别是生态系统、生态平衡、协同进化等原理与机制,研究各种教育现象及其成因,进而掌握教育发展的规律,揭示教育的发展趋势和方向的一门学科。^[5]

从生态学观点来看,我们选择高校德育过程中4个要素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方法与德育评估进行初步的解析,并试图揭示它们之间存在的生态关系。生态学原理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生态平衡,它是“一定时间内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与环境之间、生物各个种群之间,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使它们相互间达到高度适应、协调和统一的状态”^{[6](P.11)},我们同样可以将高校德育过程视为一个由诸生态因子(过程成分)构成的一个生态系统,它要想取得良好的效果,当然也必须使自己和各个组成部分达到一种平衡,它也应具有自身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

三、当前高校德育生态过程中存在的两种问题

1. 德育资源输入与输出比例的失衡。对高校德育生态环流系统来说,德育资源输入与输出比例的失衡是指德育资源输入与输出过程中表现的过剩与稀缺现象。过剩是指德育过程的要素出现了冗余现象。稀缺是指德育要素在相互关联中出现的不足现象。这种过剩与稀缺,主要体现为高校德育过程“生态链”的4个构成部分即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方法与德育评估在量与质方面呈现的不平衡的现象。

德育目标不可避免地具有抽象性。但是,当我们制定的教育目标在抽象的程度方面不加节制时,就会加深我们对之理解与操作的困难。对于过于抽象的东西的理解,在同样正确的立场下,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结论。在综合平衡与考量后,我们可能会发现对这种德育目标分化后的层级目标的过剩现象。而与之相反,我们稀缺的是那些既具有一定抽象性又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德育目标。

德育内容方面出现的“过剩”与“稀缺”现象主要表现在规制德育内容时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取舍。在某些情景下(例如在高校的德育课堂),我们当然应该集中对德育内容进行系统化的阐释。但在另外的场合(例如在课外实践活动中),我们便不能这样做,否则就会容易出现德育内容的过剩,而应

该结合实践,将抽象的德育内容以具体形象的方式体现到活动中去。

在较多情形下,运用多样的德育方法有助于提高德育的效果,但在方法运用时也会出现过剩与稀缺现象。有些德育主体片面追求方法的奇、新与多,而不顾它与德育过程的其他3个方面的协调与匹配。过多的频频轰炸的德育方法的实施是一种过剩,具有针对性的德育方法便是一种事实上的稀缺。每一种德育方法都有其最佳适用的场合,我们应该根据变化的德育时空条件慎用各种德育方法。

德育评估出现过剩主要是指德育评估时所建立的指标体系过于琐碎,它并未完成与德育过程其他3个环节的有机配合,不能反映出这种生态环流系统运行的实然状态。在诸种评估指标体系中,凡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却又现实存在的指标,就是过剩,而能够反映真实情况却未有的指标便是评估中呈现的稀缺。

2. 高校德育活动过程中资源的损耗。德育主体与德育客体在德育过程中属于人的因素。但当我们的人的因素契合进高校德育这一生态环流系统时,我们发现了由于人的因素的介入而导致的德育资源的损耗问题。

首先是人的因素介入后出现的内部损耗。这主要包括由德育主体与德育客体两者的性格的内向与外向、行事特点的内敛与张扬、彼此间人际关系的紧张与松缓等所产生的冲突。这些矛盾的存在会导致双方互动的困难。当双方由个性因素产生冲突的问题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解决时,便会出现德育生态资源的内部损耗问题。

其次是人的因素介入后出现的外部损耗。它主要是由外部环境所致,也即外部环境对高校内部的德育产生了效果抵冲的现象。高校是社会存在的一个部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影响。社会风气、社会思潮、时尚流行、社会舆论等都浸染着高校里的人群,无论是德育主体还是德育客体,都可能会在心理及行为方面对之作出回应。

另外,当德育客体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占据意识世界的中心地位而无法理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时,也会几何级地加大德育资源外部损耗的程度。其实,体现在教育客体身上的各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也反映出我们在德育方面存在的问题,至少反映出我们在心理疏导方面做得不够,没有让受教育者认识到德育是令其未来成为全面的社会人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高校德育过程生态关系的综合维护

1. 优化德育过程诸要素自身的结构,做到诸要素间的有机结合。根据前面的分析,德育目标必须是在国家、社会与个人三者互动与博弈的过程中产生,由三者的平衡而制定的德育目标,对于整个德育过程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德育目标也不能过于抽象,过于抽象的德育目标实际上是由许多观念与范畴编织而成的,而“要把抽象的观念生硬地应用于现实,那就是破坏了现实”^{[7](P.11)}。对于德育内容的规制,也必须针对现实,处理好政治主导性内容、规范主导性内容等的权重,既避免“泛政治化”现象的出现,也反对“去政治化”或“无政治化”的倾向。对于德育方法,我们必须根据德育目标与内容的特点,既认清德育方法所具有的中性特点,又能够在运用中体现其价值取向。将德育目标与内容赋予一种难以察觉其价值意蕴的外观,在潜移默化中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而在德育评估中,我们必须在定性评估的基础上拓展定量评估的途径,力求在科学性与实用性方面做到契合。

2. 引入整体性德育观念,协同其他德育形式。对于高校德育实践来说,正规的课堂德育离不开其他学科的补充与辅助,高校的德育主体应该对全体从教者进行德育意识强化的养成教育。应该认识到,高校所设的所有课程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完成教育客体的社会化(包括政治社会化),正如英国教育家纽曼所说:“若大学课程一定要有一个实际的目的,我认为就是为了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它的艺术就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这个世界。”^{[8](P.98)}

网络虚拟时空的出现与深入发展已经对高校德育产生了双重影响,它们与高校德育之间同样也存在着相生与相克的现象,因而净化网络德育环境,也是高校德育主体的一项持久而艰巨的任务。同样,高校周围社会环境影响复杂,各种社会思潮与舆论、社会时尚与流行等因素时刻都可能会对校内的德育形成强有力的冲击。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对校园内的各种传播媒介的影响方面,设法通过校内广播、海报、讲座等各种影响途径,营造一种适合提高德育效果的良好氛围。

3. 重视德育过程中人的因素,营造良好的德育氛围。在高校德育中,形成融洽的师生关系是重要的,这需要双方的努力共同去营造。为此德育主体必须改变以往的教育模式,即“必须竭力摒弃那些进

行道德说教、布道或置学生于窘境的问题,因为它们貌似问题,实则不容置疑的陈述”^{[9](P.79)},而要以积极的态度去发挥能动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激发德育主客体之间互动的热情,才有可能提高其领会与接受德育的可能性。

不同类型的高校、不同生源质量的高校的德育客体在入校时的初始素质不同,这便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开展道德教育。我们既不能将德育效果不佳的原因简单归咎于生源质量问题,也不能无视现实,回避与德育客体之间进行良性互动的努力。我们需要根据德育客体的特点因材施教,在“大课程”理念的指导下,通过校内外的综合努力来提高德育的实效。

同样,德育主体也不能疏于对德育客体的求职与就业心理指导。学生的就业期待有时会极大影响到其能否以平静的心态去接受道德教育,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与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重视提高学生的耐挫与克服困难的能力,剥离其错误的归因心理。

对于高校德育生态过程的维护与平衡措施的设计,并不能局限在以上方面,因为这种生态环流系统涉及的范围过于广泛,影响其发展的因素也过于繁杂。这里只是从总体上对之进行有所侧重的分析,以求为高校德育的有效开展提供有益的思路。

[参考文献]

- [1][西]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 [2][伊朗]拉塞克等.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 [3]Elias. J. Moral Education- Secular and Religious [M]. Robert E. Krieger Publishing Co. Inc, 1989.
- [4][美]克雷明.公共教育[M].纽约:纽约基础书籍有限公司出版,1976.
- [5]刘煜,卢金树,李宝斌.教育生态学视野下的高校德育[J].高等农业教育,2010(9).
- [6]吴鼎福,诸文蔚.教育生态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 [7][德]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 [8][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 [9][美]路易斯·拉里斯.价值与教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师 语)

刍议思想政治教育艺术

王静波¹ 孙政贞²

(1. 江苏教育学院思政中心, 江苏南京 210013;
2. 中国矿业大学理学院, 江苏徐州 221008)

[摘要] 思想政治教育艺术是为了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展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技巧和技能的综合。思想政治教育艺术是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是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统一。

[关键词] 艺术;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艺术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27-04

一、思想政治教育艺术的定义

艺术是什么?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路径去探究艺术的本质,应该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都揭示了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部分内在的规定性。但是,如果用包容性、排他性和引导性以及与实践的贴切性等指标去进行衡量,都不尽如人意。”^{[1](P.19)}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阐述,都不能涵盖艺术本身内涵的丰富性和历时的多变性,要给艺术下一个确切的、周密的定义非常困难。英国的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在1914年出版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的“艺术是意味的形式”的观点最有说服力和影响力。他认为:“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情感。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我们称之为意味的形式。”^{[2](P.4)}由此,我们可将思想政治教育艺术定义为思想政治教育“意味的形式”,即人们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而采用的教育技能和技巧的总和,它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艺术表现为对于这些统一关系的把握的技

能和技巧的综合。

二、思想政治教育艺术是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修辞学家和理论研究者通用一个公式,即定义=特征+类别。据此,克莱夫·贝尔将艺术定义为“有意味的形式”;华中师大陈万柏老师把“思想政治教育艺术”定义为“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为了有效地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而创造性地运用的具有感染力的教育技能和技巧的总和,它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学识、才能、智慧、品格、经验、胆识和灵感的综合体现。”^[3]艺术是一种形式,但是形式只是艺术的表象,而艺术的真正内涵是其“意味”的“特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行为,总是以一定的形式来进行,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艺术在类别上是“教育技能和技巧的总和”,而思想政治教育艺术真正体现在其“意味”的特征上,是为了体现其特定的价值和功能的形式,是“为了有效地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而创造性地运用的具有感染力”为特征的形式,而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区别的特征来自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艺术首先是思想政治教育独特内容与教育共性形式的统一。

[收稿日期] 2012-04-05

[作者简介] 王静波(1972-),女,江苏盐城人,江苏教育学院思政中心副教授。
孙政贞(1971-),女,江苏徐州人,中国矿业大学理学院讲师。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社会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4](P.44)}“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决定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领域独特的有意义的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有意味”的特征,是其与其他教育类型的根本区别,是使其“有意义”的独特的学科特性。从思想政治教育艺术的排他性、独特性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实效性 etc 指标去衡量,思想政治教育艺术首先是针对思想政治教育独特的教育内容采取恰当的形式,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谈到思想政治教育艺术,人们往往从手段、途径、技术、方式等角度去判断,事实上形式只是表明思想政治教育艺术与其他教育艺术的共同的类别特征,真正彰显思想政治教育艺术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特殊性。

思想政治教育艺术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反思、探寻思想政治教育低效甚至无效的原因,即绝不能为了形式而忽视内容。没有科学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任何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只能是一种摆设;把精力放在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的优化上的思想政治教育艺术,不可能发挥任何积极作用。我们经常讲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两张皮”现象,主要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脱节的问题,是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化的问题。

三、思想政治教育艺术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

成功的思想政治教育艺术展现包括两个方面:即形式方面的成功和内容方面的成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的成功取决于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活动的把握和掌控的技巧和能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面的成功则取决于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化、价值化的主观把握和表达能力。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化、价值化构成思想政治教育艺术的内容和灵魂,是思想政治教育艺术的内在生命力。从这个角度讲,思想政治教育艺术是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统一。

1. 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的论断,我党我军和

国家领导同志、中央文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表述。”^[5]我们判定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不是因为国家领导和中央文件断言式的判定,而是因为思想政治工作符合作为一门科学的标准和条件,是思想政治工作随着社会历史发展作用发挥和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门科学概括和总结于国家领导和中央文件中。从“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6](P.71)}概念出发,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科学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合规律性和前瞻性。

(1)客观性,或是真实性。真实是科学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首先必须是客观的,要符合实际、符合事物本来面目。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紧贴社会现实,紧贴人的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疑难问题。

(2)历史性。任何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是各要素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相互作用构成的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是历史的、现实的,要不断地发展和重构。

(3)合规律性。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7](P.9)}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宣传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成果的学科,它必须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能经得起实践检验。

(4)前瞻性。思想政治教育最终目的是一定社会为了维系社会的存续、发展,着眼于推进人的发展、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它具有未来的价值取向,指向未来。

2. 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

“广义的社会意识形态是指特定的社会集团(或共同体)对自身社会地位和利益要求的自觉意识和自我表达,他们通常以理论形态表现出来,表现为哲学、价值观、社会信念、组织信条等。于是,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都可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但这种意识形态未必以整体性的思想体系表现出来,也未必在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就比较习惯的狭义理解看,社会意识形态特指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反映和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需求和意志,是统治阶级巩固或改变一定社会关系,聚合社会成员的的思想认识与行为方向,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工具。”^[8]综合以上定义,意识形态包含两个要素:即它是阶级或阶层利益的表

现,同时是具有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意识形态性,具体表现就是阶级性(或党性)和矛盾性(或斗争性)。

(1)阶级性(或党性)。阶级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特征。阶级性反映的是其政治功能,反映了其阶级属性。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或是党性。我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中国反映其根本利益和要求的思想,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当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为主要内容,这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他们的根本要求。

(2)矛盾性(或斗争性)。这种矛盾性或斗争性说明,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地位和功能发挥是在各种思想观念之间相互激荡、冲突的过程中确定起来的。目前,在我国这种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确定一方面来源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特征和说服力本身,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当前我国社会“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思想观念的冲突斗争,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在引领人的思想和行为方面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3. 思想政治教育艺术是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统一。

与其他理论体系相比,思想政治教育艺术的突出特征是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统一。科学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它能否具备说服力和感染力,最根本的是看它是否具备和展现了科学品格。意识形态性是其价值属性或功能属性;科学性是意识形态性的前提和基础,意识形态性是科学性的目标和实现,意识形态性应该渗透到科学性中去,通过科学性来体现,越具有科学性就越能充分地体现其意识形态性,二者辩证统一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说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就好;什么时候在二者的关系上出现偏废,我们工作的威信就会降低。建国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有。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只讲阶级斗争不讲科学、只讲成绩不讲问题、只讲同一不谈差异,那么就会产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厌恶、逆反;如果打着“科学性”的旗号,

否定思想政治教育,就会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国家的人才培养和社会建设发展出现方向性错误。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曾反复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思考,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9](P.290)}“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最大的失误。”^{[9](P.306)}

四、思想政治教育艺术是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统一

“艺术”只对人有意义,艺术的创造者和享用者都是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艺术的创造者和享用者都是人,要展现思想政治教育艺术就是要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统一。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活的要素,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人被分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二者不是和谐的统一而是矛盾的共生。以思想政治教育艺术的视角考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将人看作是整体的要素和和谐的要素,思想政治教育艺术作为能“激起我们的审美情感的有意味的形式”,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心灵的感应、情感的呼应、情操的共进,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和谐统一的双方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提升。

我们往往将思想政治教育艺术理解为教育者应用各种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手段作用于受教育者的过程,教育者各种方式、手段出神入化的应用就是艺术。这在现实生活中不仅背离了人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更是背离了我们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艺术的初衷。我们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艺术的目的是展现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的思想行为转化过程中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美的状态和体悟,而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不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是一种外在的生硬突兀的压力。

从思想政治教育艺术的角度讲,对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不是外在于受教育者的一个个体,它首先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够尊重受教育者,在平等、公正的平台上,对受教育者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有深刻的体察和了解,在思想

政治教育过程中能启迪心智、陶冶情操、交流情感、增强信心。其次,对他所传递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真信。所谓真信就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政治要求,如果没有从思想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就不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持久和精深研究,那么从形式上进行创新就无从谈起。再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修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由于其特殊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职责,对其德行有更高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具备高尚的品德。这种品德集中于他应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不断进取的科学探索精神和谦虚高尚的人格魅力。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善导”。要对社会生活有深刻的体察、要对社会现象和问题有敏锐的观察和分析、要了解受教育者的心理需求和成才需求、要对教育内容有深刻的了解,这也是对所从事的职业的尊重和爱。

思想政治教育艺术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和教育者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享用者,是双向的审美享受和人的提升的过程,二者统一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

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艺术是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有意义的形式”。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具备有意义的形式,就要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统一、使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统一、使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统一,实现人格行为的提升。在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其针对性、实效性不强及说服力和感染力弱往往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进行技术、技巧上的改进,而恰恰是我们太

在意,或者说是太着重于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上的创新,而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形式的结合,忽视了自身所具有的科学魅力和社会价值。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艺术,不仅仅取决于形式、手段、技巧的完善,更在于在实践中其自身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完美展现和统一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统一。

[参考文献]

- [1]康尔. 艺术原理通论[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2][英]克莱夫·贝尔. 艺术[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 [3]陈万柏. 思想政治教育艺术简论[J]. 思想教育研究, 2010(18).
- [4]陈万柏,张耀灿.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2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 [5]董耀鹏.“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论断的提出与发展[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7(11).
- [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Z].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邱柏生. 论意识形态功能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关系[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7(10).
- [9]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光 翟)

浅谈红歌与国防教育

黄晓波

(江苏教育学院党办、院办,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红歌反映了我国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优良作风,是马克思主义在艺术领域的具体表现,也是其中国化和大众化的表现。在国防教育过程中,运用红歌元素,可以发挥其时代记忆的历史教育功能、道德立范的德育教育功能和精神食粮的美育教育功能,有利于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关键词] 红歌; 国防教育; 爱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 G4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31-03

我国的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产生了一批反映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脍炙人口的歌曲,我们把这些歌曲称之为主旋律歌曲,进入21世纪初以后也叫红歌。从2006年江西卫视首创《中国红歌会》开始,随着改革开放30周年、建国6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建党90周年等重大纪念日的到来,全国各地兴起了一股“红歌热”。红歌具有多方面教育意义,本文拟就红歌对国防教育的意义,略述管见。

一、红歌的产生及其意义

我们现在研究和传唱的红歌,可以追溯至我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危难时期产生的多改编自民间小调和民歌的歌曲,如《十送红军》本是客家采茶戏《长歌》、《送郎当红军》本是赣南民歌《十送郎》、《八月桂花遍地开》本是河南信阳民歌《八段锦》。由于这些民歌旋律淳朴自然,历经锤炼,为民众口口相传广为传唱,所以一经歌词改编能为人们较快的接受。我们可以从著名红歌《东方红》歌词的演变窥其一斑:其原曲调是在晋西北流行的民歌《芝麻油》,在1938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危难时刻由著名音乐家安波等人按这个曲调填词改变为《骑白马》,1944年由陕北群众再次改编其歌词成为歌颂党和毛主席的《东方红》歌词原型,1945年经过公木、刘炽等人润色成

为现行的《东方红》歌词。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兴办早期新式学堂的过程中,产生了一批由李叔同等文人改编自欧美音乐填词而成的宣传改革、民主和革命的学堂乐歌,这可以看做是红歌最初的雏形。

可见,一般意义上的红歌就是“主旋律歌曲”的俗称,主要指“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各历史时期的革命经典歌曲,广义上指所有进步的、健康的、励志的歌曲,也包含世界各地的经典革命歌曲。^[1]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潮中,涌现出了大量的红歌,也在不同时期涌现出了唱红歌的高潮。《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歌曲唤醒了民众抗日意识,激励了抗日志士。在民族危难的时刻,红歌起到很好的唤醒民众、宣传政策的作用。1984年,一曲《我的中国心》,以海外游子的口吻直抒胸臆,歌词壮阔而自然,从而征服所有人,风靡全国。2006年江西电视台首创《中国红歌会》,近50万人报名参与,开新世纪唱红歌风气之先;2008年重庆市掀起了“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群众文化活动高潮;2011年中央电视台开始录制《红歌90年》。这些活动都在当地乃至全国人民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红歌不光是中国的特产,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出现了诸如《共青团员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大

[收稿日期] 2012-03-15

[作者简介] 黄晓波(1981-),男,江苏常熟人,江苏教育学院党办、院办工作人员,东南大学军事教研室硕士研究生。

量的红色歌曲。这些歌曲内容不回避爱情、不回避离情别绪、不回避战争残酷,却在广大爱国青年和人民群众间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并通过留苏青年流传到中国。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红色这种艺术形式,在我国得到了最好的发扬。

我国历来重视音乐社会教化功能。儒家意识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指出音乐是人的主观意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反映和提升,认为“乐者,德之华也”,把音乐提升到道德的高度;也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强调了音乐与政治、道德的关系;更提倡音乐在“和民声”、“治人心”方面调和矛盾、教化道德的功能。著名音乐教育家冯光钰认为,音乐艺术作为人类审美创造成果之一,尽管它离不开创作者的情感活动和想象,但它最终又不能不反映社会历史活动和时代精神。^[2]

由此可见,红歌这种艺术形式既具有一般音乐的社会教化功能,又具有其特殊的国防功能。人们在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中创作的歌曲,反映了社会现实,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寄托了革命理想信念,抒发了革命和爱国激情,积极向上、催人奋进,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正是由于红歌的这些特性,在蕴育红歌产生的时代,她担当了国防教育的重要手段,是革命宣传者的战斗武器,是广大群众的精神食粮,使受众在艺术享受的同时,接受思想教育,使公民增强国防观念,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忧国之情。历史证明,一首优秀的红歌能够广泛地动员爱国群众,唤起他们齐心协力保卫祖国。不管是平时还是战争状态或者紧急状态,红歌都是国防教育的有效载体。

二、国防教育的产生及其意义

国防的行为主体是国家,自国家产生即有为保卫国家而发端的训练军队、教育人民、增强边备、保卫国家的一系列国防行为,在此过程中国家对全体公民进行的各种国防教育活动,主要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国家安全教育、国防责任教育等,就是国防教育。因此,国防教育是国家为增强国民的国防意识、提高公民的国防行为能力而进行的教育,^[3]是国防建设和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爱国主义教育,目的是使公民增强国防观念、发扬爱国主义、履行国防义务。

国防教育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也是促进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但是国防意识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培养出来的。在国防危机的时刻,人们很容易形成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意志和氛围,但是在

长期的和平时期却能够使得人们丧失斗志乃至失去国防意识。以法国为例,在大革命和一战期间,法国人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一战后赢得了短暂的和平,却未能够对国防教育有足够的重视,以致在二战中军队不到两个月就投降的恶果。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的经验再一次告诉我们国防教育应该常抓不懈。

国防教育是国家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加强国防力量的重要手段。通过国防教育培育的民族精神,在和平时期,可以凝集人、激励人,从而对敌形成一种威慑力;在战时,可以直接转化为战斗力。以瑞士为例,虽然是中立国数百年不打仗,但是每年均有40多万人参加军事演习,48小时能够动员数十万精兵,这是瑞士二战时能免遭纳粹德国铁骑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见,深入持久的开展国防教育,有助于提高公民的国防责任感,加强国防建设。

近30年来,我国把每年9月份的第三个星期日确定为全民国防教育日,并在全国深入开展国防教育活动尤其是加强对青年学生进行国防教育,形成了丰富的预备役资源。以江苏为例,实现了“军训工作学校全覆盖、大学生全覆盖、军事理论教育和技能训练全覆盖,累计有215万余名大学生参加了军训技能训练和理论教育”,国防教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1年9月24日,在南京理工大学又一次成功举行江苏省在宁高校大学生军训成果汇报大会,汇报会既有传统的方阵队列,也融入了格斗术、地震应急救援等,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三、运用红歌元素,服务国防教育

1. 红歌是革命历史的艺术反映,具有历史教育功能。

在国防教育中,红歌具有时代记忆的历史教育功能。不同时代的红歌,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人民进行的可歌可泣、风云激荡、辉煌灿烂的革命和建设历程,并且以其具有强劲的精神力度、恢弘的精神价值和厚重的人文关怀彰显了时代主题的追求。红歌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各族人民进行的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能在一首首红歌中再现。《当兵就当红军》《还我地来还我天》《土地革命歌》等通俗地明确了革命内容、宣传了革命思想;《八月桂花遍地开》《游击队员之歌》《三大纪律八项主义》等生动地再现了革命时期军民鱼水情以及革命斗争的艰苦历程;《兄妹开荒》《二月里来》《南泥湾》等自豪地讲述了党带领革命军队和群众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情境;《社会

主义好》《团结就是力量》《石油工人之歌》《打靶归来》等真实地反映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美好愿望;《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在希望的田野上》等形象地描绘出改革开放时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红旗飘飘》《为中国喝彩》《怒放的生命》等热情地讴歌了人们对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果的无比喜悦之情。

因此,在国防教育中,红歌能够再现其所表现的历史事件。用红歌讲述我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让广大青年人重温峥嵘岁月,接受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洗礼,对培育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有着重要的教育价值,是营造有风有化的校园文化氛围的天然载体,通过音乐旋律的感染,使学生具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可以达到陶冶情操、升华精神的教育目的。

红歌是能够达到“寓教于乐”音乐功能的一种艺术形式,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载体。对于广大青年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既要发挥教育的德育作用,又要不要靠说教和灌输,经过血与火洗礼的红歌就是极好的教育载体。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军队中,红歌被运用于军队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

2. 红歌是民族精神的优美赞歌,具有德育教育功能。

在国防教育中,红歌具有道德立范的德育教育功能。红歌以其特有的民族精神感染了中华儿女,帮助一代代热血青年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饱满的爱国情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洪流中,产生了巨大的导向作用。在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一歌简练明了地把党当时在革命根据地开展的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情景进行了描述;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昂扬的曲调,鼓舞着抗日志士前赴后继地奔向前线,《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则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了侵略者的丑恶嘴脸,诉说了沦陷区人民的悲惨遭遇……红歌德育功能的发挥,不是靠说教,不是靠灌输,而是通过优美动听的旋律和简明深刻的唱词来发挥作用。^[4]

红歌乃至红色文化是国防教育的第二课堂。青年人思维敏捷、可塑性强,对于以红歌为载体的教育模式有着较高的接受兴趣,红歌和红色文化可以营造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的文化氛围,弘扬先进文化,激励青年人不断前行。高校可以利用重大节庆日、纪念日为契机举行歌唱比赛,陶冶大学生情操;也可以通过影视社团和军事社团活动,让大学生明白在

军事题材的电影中音乐的作用,在举行社团活动的同时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3. 红歌是民族发展的精神食粮,具有美育教育功能。

在国防教育中,红歌具有精神食粮的美育教育功能。红歌的创作是一定社会时期的真实写照,能被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人热情传唱,也说明了红歌的形式完美、艺术精湛,审美价值高,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融合,并且红歌的传唱对社会进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红歌的创作,都是发自内心的歌唱祖国、歌唱社会主义、歌唱党和人民、歌唱人民军队、歌唱英雄模范,是真善美的载体。她能够培养青年人对美好和谐的生活状态和理想信念的渴望与追求,激发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自信心,勇于克服各种困难,创造美好未来。

在全民国防教育过程中,红歌起到了很好地普及知识、宣传政策、凝聚人心的作用。通过优秀的红歌作品吸引人、鼓舞人、凝聚人、引导人,拓宽了国防教育的宣传途径。红歌运用于国防教育,与国防理论教育和行为教育、经常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有利于提升国防教育的实效性。

总之,红歌是马克思主义在艺术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艺术载体,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表现手段,是代表着先进文化方向的艺术形式。红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优良作风,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把红歌运用于国防教育,有利于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参考文献]

- [1] 吴志菲. 唱响红歌的意义[N]. 人民日报, 2011-02-18(24).
- [2] 冯光钰. 再谈音乐功能——致友人书[J]. 人民音乐, 1991(2).
- [3] 吴温暖. 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
- [4] 欧阳小华, 张保和. 红歌教育功能在“井冈山精神与当代大学生”课程教学中的运用[J]. 教育与职业, 2010(30).

(责任编辑 光 翟)

SWOT 视角下的高校创新型教师团队建设探析

葛谢添¹ 胡仁东²

(1. 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 2. 江苏师范大学发展规划处, 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 时代的发展需要创新教育, 创新教育的实施呼唤创新型教师团队。高校肩负着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担, 因此发展高校创新型教师团队建设迫在眉睫。通过运用战略管理中 SWOT 方法分析当前高校创新型教师团队建设是如何受制于制度建设、人才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和科研建设等 4 个主要因素, 并针对高校创新型教师团队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策略。

[关键词] 创新; 高校教师; 团队建设; SWOT

[中图分类号] G6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34-05

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高校教师团队建设不仅关系到高等学校的生存与发展, 更关系到我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决策路线。《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 “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 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 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都凸显了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靠人才, 基础在教育。”实现教育现代化、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迫切需要通过提高教师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 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而高校教师在整个师资队伍中起着总领性的推动作用。

一、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提出及新世纪创新教育的必要性

1. 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提出。

自古以来, 世人往往对“创新”赋予某些神秘色彩的偶然性。人们常认为创新的发生是一种偶然随机的小概率事件, 且含有不确定性、非一蹴而就的渐

进性和高风险性。自 20 世纪以来, 人们普遍认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 它既是历史和分工的产物, 也是工业化发展的反映, 普遍存在于很多地区, 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西方对于创新的研究始于美籍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 他于 1921 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创新理论, 接着又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1942) 中加以系统阐述。

熊彼特的“创新”, 并非指的是创造发明新的东西, 而是指“新东西”的应用或“旧东西重新组合”的新应用, 以获得“企业家利润”的经济过程。^{[1](pp.14-15)}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 所谓创新, 就是建立一种全新的生产函数, 也就是说——把一种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2](pp.73-74)}这种新组合包括以下 5 种情况: (1) 产品创新, 是指创造一种产品的新特性, 或创造一种新产品; (2) 工艺创造, 是指采用一种新方法, 这种新的方法不仅是采取新的科学技术, 即不一定非要建立在科学的新发展基础之上, 它还可以是以新的商业方式来处理某种

[收稿日期] 2012-06-20

[作者简介] 葛谢添(1988-), 女, 江苏南京人, 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胡仁东(1968-), 男, 四川广安人, 江苏师范大学发展规划处副处长, 教育学博士, 硕士生导师。

产品;(3)市场创新,是指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这个市场可以是新出现的,也可以是以前存在但并未开发进入的;(4)资源开发利用创新,是指获得或控制原材料、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来源,无论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5)体制和管理创新,是指实现任何一种新的产业组织方式或企业重组,例如造就一种垄断地位(例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2](PP.73-74)}可以说,熊彼特式创新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偶然、不确定、渐进、高风险,将创新规则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去。

2. 新世纪教育创新的必要性。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作为一种观念,作为一种行动,作为一种素质,只能从教育中训练和培养。一个人是否具有创新精神,或创新意识的强与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从所受到的教育中是否吸收了创新意识。由此可见,教育在培养创造性人才和创新精神方面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杜威是美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位著名的教育革新家。他的“思维五步法”为创新教育定下了基调。杜威认为,教学应引导学生从各种活动中进行探索性的学习。概括起来,其基本教育过程是暗示、问题、假设、推理、验证5个步骤。“思维五步法”不是一个封闭的过程,而是一个观察—认识—再观察—再认识、不断修改完善结论的思维过程。^[3]它打破了固定的形式主义的思维模式,认为“怎样的安排,全看思想者个人的理智的机巧和灵敏”。^{[4](P.191)}这说明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不能固定化、模式化。通过“思维五步法”得出的结论既要参照过去的经验,充分吸收和利用人们过去的旧有经验,又可以指导人们展望和预测未来,确定未来的行动趋向,从而使人们能发挥出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与杜威同时期提出创新教育的思想,他号召教师要“发古人所未发,明今人之未明”,要“创造值得自己崇拜的创造理论和创造技术”。^{[5](P.13)}可惜当时的中国仍处于知识教育阶段,创新教育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时代呼唤创新人才,时代呼唤创新教育。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在教育会议上明确指出,素质教育的重点是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教育在培养民族创新精神和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这就要求我国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跨入创新教育阶段。由此可见,新世纪的创新教育

迫在眉睫。

二、高校创新型教师团队建设的重要性

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风向性指标;教育成败,系于教师。建立一支规模适当、结构优化、素质优良、富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高水平高校教师队伍,以适应新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提高高校教师团队的创新能力,将对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起到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1. 知识经济社会需要高校创新型教师团队建设。

新时期的知识经济社会具有如下两个特征:(1)知识的膨胀与贬值;(2)知识的积累与创新。它们具有相互对应的关系。不可否认,膨胀必然带来更新与淘汰,从而使具体的知识不断贬值。^{[6](P.443)}但知识不可能总是贬值,相反,对知识进行创新,将会使知识在创新这个源泉的发展下不断积累,最终获得比以往更大的积累。

高等教育和高校教师团队建设应成为知识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其在知识创新、人才培养、生产力实现等方面正发挥着重要作用。每一位高校教师必须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努力提高综合素质,特别是创新能力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提升高校教师团队建设的整体实力。

2.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需要高校创新型教师团队建设。

江泽民在2001年底的“加强合作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新挑战”讲话中指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是今年和未来工作的核心内容。”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已逐渐成为提升我国软实力的有效保证。高校肩负着为国家培养输送高级人才的使命,高校教师团队建设是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关键,高校创新型教师团队建设驱动着人力资源能力的发展。

3. 学科发展需要高校创新型教师团队建设。

随着知识不断更新和发展,学科间呈现交融形式,催生了新生学科、边缘交叉学科。学科发展与知识创新融为一体加速了学科发展的进程。而教师的学术载体既是学科,学科要发展,就必须依靠高校教师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三、高校教师创新团队建设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是在西方应用很广的一种战略选择

方法。SWOT 是 4 个英文单词的缩写。S 和 W 是指企业内部的优势和劣势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 和 T 是指企业外部的机会和威胁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SWOT 分析即是企业在选择战略时, 对企业内部的优劣势和外部环境的机会与威胁进行综合分析, [7](P.103) 进而帮助组织制定出与其自身条件和所处环境相适应的发展战略, 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内部优势和外部机会, 同时尽可能地少受劣势和环境

威胁的影响。

运用 SWOT 分析法, 对高校创新型教师团队建设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进行全面地、多角度地分析, 有利于我们系统、客观地评价高校教师队伍, 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表 1 能够帮助我们更直观地看清当前高校创新型教师团队建设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表 1 高校创新型教师团队建设的 SWOT 分析

思考角度 考虑对象	内部条件		外部环境	
	优势 Strengths	劣势 Weaknesses	机会 Opportunities	威胁 Threats
制度建设	大多高校的用人和引进人才机制较为规范; 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配置机制与学校实际情况基本相吻合。	高校分配制度、考核激励机制不尽合理; 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不能满足于学校的实际需要。	借鉴企业经验之后, 高校开始实行岗位职称绩效工资制度, 与国家推行的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适应。	率先实施创新型教师和创新团队培养的高校, 较尚未采用此举的单位来说, 经验更丰富、团队管理更成熟有效。
人才建设	现阶段高校教师学历普遍提高, 职称评定更科学。	高校往往缺少建立特色学科的高层次人才; 校际间交流不足, 导致学科带头人无法及时分享国内外某领域前沿成果。	国家自 2004 年起实施高等学校“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	新世纪高校人才战略愈演愈烈, 211 及 985 高校的名校效应更能吸引高层次人才, 其他院校多采取“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情感留人”策略, 以吸引高级人才。
教师队伍建设	高校教师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学缘结构和职称结构逐步走向合理化。	高校教师创新意识不强, 创新能力不足, 团队凝聚力不够; 教师队伍“近亲繁殖”, 学缘结构不合理; 缺乏对高校教师后续再教育和因人而异的分类培养制度; 人才结构和层次分配不够合理。	各高校逐渐放开人才流动政策, 可以改善学缘结构, 扩大人才国际国内间的交流与合作; 师资力量不断补充调整, 完善教师队伍, 有利于提升创新能力。	一些高校较早关注教师队伍的建设, 高校教师的团队建设发展迅速, 竞争力强。
科研建设	高校教师科研实力较 20 世纪末相比明显提高; 高校逐步形成若干特色学科, 科研队伍具竞争力, 学术论文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数量与质量有所提高。	某些高校缺乏学术创新所需的民主、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 缺乏富有个性化的弹性管理, 学术流派之间无法相互切磋、交融, 导致高水平研究成果稀缺。	国家对科研的支持力度加大, 科研经费逐年递增; 积极参与组织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推动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基地建设。	国家、省级基金项目申报会随着申请人数的增加提高门槛; 知识经济社会呼唤高校科研水平, 知识的更新换代速度更快。

由以上分析可知, 制约高校创新型教师团队建设的因素源于表中的劣势部分, 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高校教师创新意识不强, 创新能力不足。

首先, 受传统教育影响, 教育界曾一度强调“知识本位”思想, 教师停留在对知识层面的理解, 普遍缺乏知识的发散创新。其次, 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跟不

上高校的发展需求, 导致高校教师创新意识单薄, 创新能力不足。再次, 高校尚未制定一套完整可行的激励机制, 高层次人才缺少创新动力, 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

第二, 高校缺乏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良好学术环境。

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 高校往往忽略对教师创造

力的培养,教师与外界学术交流较少,知识面狭窄,导致学术难以得到创新;其次,高校常受制于经费不足,在勉强维持学校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无力维系精神层次的创新建设,高校并不主张学风、校风创新,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提起教师的创新积极性。再次,众所周知,创新与自由是一对孪生兄弟,与国外高校相比,我国高校普遍缺乏学术自由。这样使得教师的学术视野不开阔,局限于学校的框架之内,不利于学术观点交互融合。

第三,高校教师团队建设运行机制不健全,评价考核标准未对团队的集体业绩予以高度重视。

目前多数高校采取的是以量化考核为核心的评价考核体系,质量无从保证,致使个人主义色彩浓重。团队建设是指团队成员为了共同利益组合到一起,而此处的团队成员无凝聚力可言,更不会为了团队发展全心作贡献。

第四,高校教师“近亲繁殖”现象未得到有效解决,学缘结构有待调整。

高校在选拔聘用教师时,习惯于在本校及兄弟院校挑选。学校和教师相互熟悉,也结下了较深厚的感情,教师在母校任教通常会比较尽心尽职。但“近亲繁殖”弊大于利,容易造成学科信息量有限、专业知识陈旧、学术思想僵化保守封闭、科学研究能力止步不前等后果。

第五,高校凸显提高学术科研能力为主的培训与教师多样化的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

具体表现为:一方面,高校教师培训多以提高学历和科研能力为主,忽视教师的其他方面需求。^{[8](P.236)}当前,受市场经济驱动的影响,很多教师容易产生个人主义、功利主义色彩,他们的培训动机不单纯,为了能迅速提高学历为目的,往往选择速成培训。另一方面,培训方式单一,忽视培训内容和方式的多样性。^{[8](P.238)}高校教师的工作能力和工作能力企图通过单一狭隘的培训方式得到改善,效果甚微。

四、高校创新型教师团队建设的战略选择

高校创新型教师团队建设是一项涉及群体的、处于动态中的、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培养高校教师团队的创新拓展能力并非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当前我国大部分高校仍处于不断摸索阶段。针对我国高等教育背景,并结合国外高校的创新成功典范,尽可能地规

避上述制约高校创新型教师团队建设的因素,提出以下点对策:

1. 充分发挥院校领导的创新能动性。

首先,高校领导应深刻意识到学校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创新,在校园内提倡创新教育,发校内文件推行创新建设,以各种形式开展诸如“争先创优”的创新研讨会、学术讲座、活动,鼓励教师创新。其次,高校领导在推行创新教育的进程中,应充分借鉴西方高校的创新成功成果,对东西方高校的创新观念作出比较和调整,经总结后在校内倡导吸收能推动教师队伍创新的理念。再次,领导的创新精神应及时传达到教师中去,充分尊重并理解教师的处境,允许并鼓励教师们就创新建设畅所欲言,换位思考教师们的心声,支持并帮助教师钻研科研,为教师提供更加广阔的创新平台。

2. 建立高校教师团队管理改革创新。

高校教师团队管理的改革创新可以从多维发散思考:高校应首先推行规范式的教师聘任制度,严格引进创新型的高层次人才。高校为了发展创新型教师团队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位教师的创新能力,这就需要高校人事部门在招兵买马时独具慧眼,严格把关,秉承一贯的“公平、公正、公开、平等、竞争”的原则,深入考察创新型人才的思想道德、业务素养,不拘一格选人才。其次,高校应制定科学的考核评估标准和选拔体系,对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进行系统的测评;可适当增强教师的忧患意识,学校教务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去教学场所、办公地点、实验室进行抽查,对符合考核标准的优秀教师给予适当的物质鼓励,反之,对首次考核不通过的教师允许一定时期内调整和提升,多次考核不通过者可借鉴美国成功企业通用电气的做法,实行“末位淘汰制”,分层次采取缓聘、转岗及离职的方式淘汰不合格者,但相关部门在制定这套看似严格的制度时,要控制好比例和人数,不能造成适得其反的负面效果,反而违背高校主张的创新精神。再次,设计一套合理公正的教师薪资分配制度。为了鼓励教师队伍创新,可以单独设立一项“创新基金奖励”政策,对某一阶段取得创新成果的教师给予表彰和物质奖励,推动教师队伍整体创新业绩。另外,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的核心观点,高校教师的需求呈现出多样性,这必然要求学校的分配制度不单一,学校在经费允许的前提下应满足大部分教师的需求,完善薪酬、生活待遇、医疗、保险等方面的保障,注重满足创新型教师的成就感。

3. 优化高校教师队伍建设。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叶澜曾用3个等级划分人类对活动的态度,即最低的等级是被动应答;第二个等级是自觉适应;最高等级是主动创造。^{[9](PP.232-233)}这一层级相对于前两级来说,主体在活动过程中带有一定的探索性和创造性。同样,当教师从事教学工作时,若能达到这里所说的最高层级,就会富有很强烈的主体积极性。具体到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高校应优化教师学历结构,充分挖掘博士学历及以上的高层次人才,提高教师学历层次。其次,高校应改善年龄结构,使高校教师的梯队更趋于合理化。再次,高校应进一步改善教师学缘结构,打破“近亲繁殖”的形式,为了提高学科发展水平、实现各种学术观点融合、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相互渗透,高校应提倡教师队伍来源广泛。最后,高校应构建全面化的教师培训体系,鼓励教师定期参加校内外组织的培训,重点培养教师的创新意识,使他们在培训学习中获取灵感,为创新团队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建立科学有效的教师流动制度,鼓励有突出创新贡献的高校教师去国内外其他高校分享交流学术成果。

4. 营造高校创新型教师团队建设所需的文化氛围。

众所周知,高校是开启智慧、追求真理、弘扬文化的重要场所,古今中外世界著名高校在多年的治学过程中逐渐形成独特的办学理念,这一点在高校的校训中得以体现。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吹拂”,享誉世界的“硅谷”就是在此理念下形成的。从国外高校的办学理念中不难得出,自由和创造力不可分割,因此在高校营造学术自由,一定程度上开放教师的教学、科研自主权,可以提升高校教师团队的创新能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第一次提出“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这是一次进步,说明我

国的高等教育开始注重完善学术自由的培养,为创新型人才提供了更好的平台。

[参考文献]

- [1]蔡晓月.熊彼特式创新的经济分析——创新原域、连接与变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 [2][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3]刘新科.杜威“思维五步法”新探[J].陕西师大学报,1991(2).
- [4][美]杜威.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 [5]朱坤.创新教育新探索[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1.
- [6]朱卫国等.教师队伍建设研究与实践[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
- [7]柳思维.市场营销学[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
- [8]徐延宇.高校教师发展——基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经验[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 [9]叶澜.教育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 [10]刘献君.关于师资建设和管理的几个问题[J].高等教育研究,2003(4).
- [11]曾绍元.新中国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和发展五十年与展望[J].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学报,1999(5).
- [12]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A01_zcwj/201008/xxgk_93785.html.
- [13]教育部文件.教人[2004]4号.创新团队支持办法[EB/OL].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A16_xxgk/200406/xxgk_61060.html.

(责任编辑 陈晓姿)

省属师范院校人才工作路径探索

吕 挥

(南京师范大学人事处,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做好人才工作,对省属师范院校来说,既是一项光荣的使命,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通过分析当前高校人才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发现省属师范院校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建设性地提出了今后人才工作的建设路径。

[关键词] 师范院校; 人才管理; 工作思路

[中图分类号] G6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39-03

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各高校普遍意识到,谁拥有一流师资队伍,谁就赢得发展的先机。而近年来,地方高校为了发展也加大了人才引进力度,但是在引进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从省属师范院校角度,来探讨、研究高校人才引进工作的实施路径。

一、当前省属师范院校人才工作面临的形势

从宏观方面来看,高等学校是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人才问题始终是高校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与头等大事。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成功经验和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跨越发展的历史性成就证明,高校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高校发展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各类人才队伍建设,着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从近年来,省属师范院校发展情况来看,各项主要办学指标多数实现了增长,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办学实力也显著提升,但是与国内外一流大学相比,在学科水平、教学质量、科技创新、人才质量、社会服务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距。从总体上看,省属师范院校的人才储备与学校事业发展需求之间还存在着矛盾,人才工作的力度和水平与高水平大学尚存在一定的距离。特别是高层次创新性人才匮乏,领军人物数量不多,人才资源开发投入还不足,团队建设步履不

快,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创新有待深入等问题仍比较突出。今后省属师范院校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人才强校”之路。

二、省属师范院校人才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人才观念、意识的落后。**缺少“人才强校”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人才观念相对落后,人才意识不足,视野不够宽广。为此,高校要努力营造高层次人才成长所需的良好、宽松的环境,使人才有实现自身价值的满足感,贡献社会的成就感和为社会所承认的荣誉感。实现引进工作观念的创新,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树立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科学人才观,不断提高高层次人才引进在人才强校战略中重要性的认识,统一思想。^[1]

2. **人才成长环境建设亟待加强。**人才是在特定的环境下生长起来的,是与校内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省属师范院校需要不断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体制环境、机制环境、工作和生活环境,以有利于优秀人才的成长,有利于优秀人才的价值创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也有利于优秀人才来校工作。

3. **杰出人才极度匮乏。**省属师范院校经过近年来的发展提升,学科带头人队伍基本形成,但学术造诣深厚、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富有科研组织能力的学术领军人才数量偏少,难以适应学科建

[收稿日期] 2012-07-02

[作者简介] 吕 挥(1978-),男,江苏高淳人,南京师范大学人事处助理研究员,管理学硕士。

设和发展的需要。同时,有的院校、部分学科存在梯队断层隐患,短期内缺乏足够数量的、能够接替的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在进一步巩固学科优势地位、寻找新的学科生长点、加强学术队伍建设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

4. **师资队伍学缘结构狭窄单一。**一段时期以来,省属师范院校在引进人才工作中,过于看重自己培养的人才,对校外应聘的人才重视不够,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教师更是比例偏低。学缘结构相对单一,不利于学术思想的交流与碰撞。

5. **学科创新团队建设步伐缓慢。**这表现在学科创新团队建设意识有待增强,团队数量有待增加,团队质量有待提高,团队特色有待凝练,团队建设步伐有待加快。

6. **青年教师亟待培养提高。**青年教师代表着一个学校的未来核心竞争力,与国内一流高校或部属师范院校相比,省属师范院校的青年教师在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国际交流能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尚存在距离,需要进一步培养、锻炼、提高。

7. **人才的创新和服务社会能力有待加强。**作为省属师范院校来说,学科原始创新能力较弱,能够置身于国际前沿研究领域的创新型人才偏少;能反映原始创新能力的高质量论著和具有突破性的专利数量偏少;解决国家和社会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能力偏低;教师中仍然存在着重基础、轻应用,重理论、轻实践倾向,服务社会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等。

8. **人才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不够。**学术交流不仅是教师教学科研创新的重要条件,也是提升学术影响力的重要途径。省属师范院校的教师对于学术交流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举办和参与各类学术会议,尤其是高水平有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更是不足;国际学术交流规模小、层次低,缺乏稳定的对外学术交流机制,与国内一流大学、部属师范院校相比,在合作科研、派出进修、举办国际会议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9. **人才管理体制有待创新。**省属师范院校的人才管理体制,目前还难以适应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制约着学校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人员聘用、人才评价、职称评聘、教师考核等人才管理的模式等,还存在着许多不足,需要进行改革和创新。

10. **各类人才发展平台建设有待突破。**与国内一流大学相比,省属师范院校各类人才发展平台建设均有待突破,特别是有重大学术和社会影响的平台还相对较少。今后很长时间内,省属师范院校应

将各类平台建设作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三、新形势下省属师范院校人才工作的思路转变

1. **改变观念,更新意识。**新形势下省属师范院校应做到“三个确立”,即“确立以用为本的人才观,确立服务发展的人才观,确立确立整体开发意识”。在使用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充分发挥各类人才在学校事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围绕用好、用活人才来引进人才、培养人才、锻炼人才,积极为各类人才干事创业和实现价值提供机会和条件。应把服务科学发展作为人才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学校科学发展目标,制定人才工作方针,确定人才工作任务,检验人才工作成果。在实际工作中,高校应尊重人才成长规律,遵循人才使用规律,注重理想信念教育和职业道德建设,同时,更要努力培养领军人才。

对于师范院校来说,需要的不仅是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更是需要管理精英、服务精英,一大批优秀工程师、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等职业化、专业化的领军人才。

2. **拓宽思路,激励发展。**要采取灵活措施,按照“不求所有,只求所用”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方式,实行人才的智力引进。要更新观念,注重“智力流动”,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作用,吸引优秀人才。建立“刚性引进”与“柔性引进”相结合、固定编制与流动编制相结合、长期聘用与短期聘用相结合的人才引进新机制,构建开放式人才管理模式,实现人才资源的合理共享。省属师范院校应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强化依法行政、依法治校,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等组织的作用,重视基层学术组织制度创新,促进决策与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充分发挥教授治学的作用,使他们在学校事业发展规划、重要制度建立等决策方面,有更大的参与权和影响力。

3. **营造氛围,力争创新。**省属师范院校要在全校形成浓厚的创新氛围。大力倡导求真务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于创新科学精神。活跃学术气氛,努力形成和谐、宽松、向上的民主意识。应着力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增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教师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教师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加强学术道德建设,抵制学术腐败,净化学术风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加强校风、教风、学风、工作作风建设,积极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良好环境,促使各种人才充分施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在学校事业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四、提升省属师范院校人才工作质量的路径探索

1. **大力引进和积极培养领军人才。**随着国内高校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的推进,高校在引进人才时由过去大规模补充转变为精英型选拔,高校人才引进正在实现由补充教师数量向更加注重人才质量转变。为此,省属师范院校应积极调整人才引进策略,积极探索领军人才培养方式改革;依托国家“千人计划”、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国家杰青计划、各省特聘教授计划等高端人才引进计划,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同时,要在住房补贴、校内津贴、科研配套、出国访学等方面对高端人才都应给予一定的倾斜。此外,应进一步实施各类举措,加强高层次人才后备队伍建设,大力引进和培养基础研究功底雄厚、原始创新能力突出、能胜任学科建设重任的优秀拔尖创新人才。

2. **实施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一是制定青年骨干教师发展规划,加大对优秀青年人才的发现、培养、使用和资助力度,帮助青年骨干教师尽快成长;二是完善青年骨干教师岗位培训体系,健全学校、学院、学科三级培训管理体制,建立有针对性的培训方案和个性化事业发展支持计划;三是实施青年骨干教师导师制度,完善青年教师助教制度;四是启动青年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省属师范院校面向校内选拔一定数量的年龄在40岁以下、德才兼备、思维活跃、富于创新精神、具有团队意识、学术成就突出、有较好发展潜力的优秀青年教师,加大培养和资助力度;五是健全青年教师社会实践制度,组织青年教师到企业或科研单位开展合作研究或产学研项目开发活动,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六是拓展青年骨干教师海外研修项目,鼓励青年教师到国内外著名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开放实验室访问或合作研究。

3. **实施团队建设计划。**加强校内重点科研创新基地与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创造机会,搭建平台,鼓励不同学院、不同学科教师加强合作,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团队,促进科研与教学互动。同时,设立创新团队建设基金,支持创新团队的建立。实施教学团队建设计划。以核心课程体系和精品课程建设为牵引,重点建设一定数量的高水平教学示范团队,促进教学水平的整体提高。实施科技创新团队建设计划。以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培育)学科、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重大科技创

新平台为依托,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团队。

4. **加快造就高素质职业化的管理人才。**一流的高校必须要有一流的管理。省属师范院校与国内一些一流高校的差距,除了在学术领域之外,还体现在管理能力和水平上。向管理要质量、要效益,建设一支高素质职业化的管理干部队伍,是今后省属师范院校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要坚持职业化发展方向,逐步推进管理人员职员制;建立健全干部任期管理、监督、考核、激励办法,积极引入竞争机制;加大管理人员理论培训和校内外轮岗交流、挂职锻炼的力度,有计划选拔优秀管理干部到国内外高校学习先进管理理论与经验;重视和加强学院领导班子和管理团队建设,强化管理人员服务意识,使省属师范院校管理工作迈上科学化、规范化、民主化的台阶。

5. **构建现代大学人才管理体制和机制。**一是深化改革,创新管理制度,完善教师绩效评估方法、评估体系,完善人才引进和使用的标准、办法和程序;二是规范队伍建设的学校、学院、学科三级管理体制,统筹学校人才力量,建立人才队伍整合、运作和保障的机制,健全人才遴选、补充、引进、培养、使用、晋升、考核等在内的系统工作机制;三是针对不同学科的特点,制定以业绩为核心,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分类分级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并简化考核程序和办法,逐步实现由过程管理向目标管理转变,由年度考核向聘期考核转变;四是科学设置岗位,完善岗位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学院自主聘用权力,加快推进以教师聘用制为核心的全员聘用制改革,逐步过渡到真正意义上的聘用制;五是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倡导追求真理、勇攀高峰、宽容失败、团结协作的创新精神,营造科学民主、学术自由、严谨求实、开放包容的创新氛围;六是提升师资队伍建设的国际化水平,加大国内外高水平专家特别是有发展潜力的博士引进力度,逐年增加派遣到海外大学研修学习的人员数量,推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参 考 文 献]

- [1] 余斌. 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的误区及对策[J]. 人力资源开发, 2007(8).

(责任编辑 晨 晓)

三学期制——独立学院发展的另一条路径*

刘 影 付龙海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4)

[摘要] 在独立学院推行三学期制,有利于推动和深化独立学院教育教学体制改革,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能够增强独立学院毕业生竞争力,利于独立学院长远发展,使独立学院在健康发展的同时,能更好地为我国高等教育服务。为此,要加快教学改革力度,以新模式代替旧模式;要加强学期制度建设,以新制度代替旧制度;要加大宣传解释力度,以新观念代替旧观念。

[关键词] 独立学院; 应用型; 三学期制

[中图分类号] G6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42-03

学期制指一个国家的学校教育制度,一般将一学年划分为若干学期,每学期持续若干学周的教学管理制度,它对高校的教学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是高校进行教学组织与管理的框架与基础。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学期制作为学期制度的新生事物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些国内知名高校根据自己人才培养定位、市场发展要求及学校自身管理发展需要对双学期制作了改革,推行三学期制。三学期制这一崭新教学管理理念,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高校推行三学期制现状分析

1. 国外高校推行三学期制概况。依据2005年英国《泰晤士报》的调查显示,分属欧、亚、美三大洲的31个国家的国际最知名200所大学中,使用三学期制的大学已占43%,在排名靠前的20所大学中,使用三学期制的大学占47%,已接近半数。三学期制已经成为国际高校所采用的主流学制形式之一。以美国为例,1736年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率先实行三学期制,后为其他国家(如英国及许多英联邦国家)的全部或者部分高校采用。^[1]二战期间,为了满

足服役的大学生完成学业以及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要,三学期制迅速发展。在《泰晤士报》评选的全球200所著名大学中,美国有54所,其中33所高校采用的是三学期制。^[1]美国高校的三学期制是根据节日或地理环境的要求来划分的,将一学年划分为3个相等的学期,每学期为期15或16周。由于美国各地区的差异,高校也会因地制宜划分学期的起止时间。

2. 国内高校推行三学期制的现状。我国部分高校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学期制度改革,实施“两长一短”的三学期制,即除了传统的两个春、秋长学期,在暑期安排3周左右的短学期。目前进行学期制改革,实行三学期制的高校已达50多所,大约占到国内高校数量的3%。其中既有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著名高校,也有一般普通院校;从短学期的教学内容安排看,综合性的著名院校,一般在短学期侧重安排国际交流项目与前沿性课程,一般院校则侧重安排实践性教学活动、专题讲座类课程等。各种类型的短学期课程,丰富了学生的知识,扩大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但

* [基金项目] 江苏省“十二五”规划课题“‘高校综合改革’视阈下江苏省独立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C-c/2011/01/60)。

[收稿日期] 2012-06-14

[作者简介] 刘 影(1981-),女,安徽阜阳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讲师,硕士。
付龙海(1983-),男,河南南阳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讲师,硕士。

存在课程形式比较单一,且在试行过程中显示出
不适应等问题,并没有有效发挥出三学期制的优势。

3. 独立学院实行三学期制的现状。独立院校作
为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不断深化的产物,自 20 世
纪 90 年代产生至今,发展迅速,承担着全国 20% 本
科生的教育教学任务,业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有个别独立学
院为深化教学体制改革,开始试行三学期制。

据了解,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推行三学期制,对学
生分流培养,以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多元化需求。其
第三学期时间为 4 周,一般自 6 月中旬至 7 月中旬。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第三学期教学工作规范(试行)》
第三条规定“试行第三学期的目的,是进一步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着力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创新能力。推
动教师按照‘优化课内、强化课外’的教学原则,进
一步精简课堂教学内容,使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空
间主动学习,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充分发展学生个性,促进教学质量的整体提高”,同
时“原则上不安排教学计划内有关课堂教学活动。
各系根据高、低年级学生具体情况安排教学活动”
等。

武汉长江工商学院(原中南民族大学工商学院)
也从 2009 年 3 月开始推行三学期制。该院培养
的是适应市场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尽早让学生接
触行业,深入行业,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该院
整体安排数千学生到校外实习基地教学与实习。

此外,2011 年 3 月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
盟第三次年会上,联盟内的 14 所高校决定改变
传统的一年两个学期为 3 个学期,增加一个每
年 7—8 月的暑期学期,作为实践教学的小学
期,让学生深入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以专业
实习实训、技能提升、产学研合作教学和辅
修专业实践等项目为内容,丰富体验教学形
式,培养职业素养,提升实践能力,以适应社
会对大学毕业生“高素质、应用型、强技能”
的需求。

总体而言,目前独立学院推行三学期制具有
如下几种特征。第一,推行学校较少,且目前
尚在探索阶段,存在争议,学生对此也有一定
程度不适应。第二,通过制度层面的安排要
求学生广泛参与到实践、实习中,且第三学
期都以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为主,注重培养
适应市场需求的应用型人才。第三,三学
期制大多是一种 2+1 学期制,即两个长学
期加一个小短学期,时间较短,第三学期或
者小短学期多集中在 6 月中旬和 7 月中旬。
第四,三学期制都注重学生深入校内外的
实训基地。第五,有关三学期的实

施情况规章制度尚未完善。目前,仅有南京
大学金陵学院出台《南京大学金陵学院第三
学期教学工作规范(试行)》。

二、独立学院推行三学期制原因探析

我国独立学院多实行传统的两学期制,两学
期中间有很长的假期,尤其是长达两个月的
暑期,这导致学生“无所事事的假期太多”。
并且两学期制并不适合独立学院,也不利于
独立学院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
独立学院推行三学期制的原因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有利于推动和深化独立学院教育教
学体制改革。有学者认为我国当前大学本科
人才培养的主导模式应是“‘更加注重素质
培养的宽口径的专业教育’,它在培养目标上
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知识能力结构的
综合化、基础化、前沿化,重视实践能力
以及科学知识与人文学知识的融合”^[2](P.194)]。
大学教育要实现“掌握理论性知识”与
“实际操作性知识”的融合,从对科学知
识的“行上追求”到“行下把握”,真正
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现理论与实践
两条腿走路,以构成理论知识与实践能
力相互促进的张力结构。独立学院兴起
于 20 世纪 90 年代,是介于一本二本
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之间的一种新的
办学模式,不同于一本二本教学研究
型的本科院校,也不同于教学服务型
(或称技术技能型)的高职高专院校,
它既注重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又强
调学生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推
行三学期制,减少理论课程的学习,
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可以实现独立学
院这类三本院校既着重理论教学
又着重实践和应用能力的培养的
办学定位。因此,通过推行三学
期制,通过修订教学计划,调整课
程设置,形成新的教学内容、教
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促进学生个
性化培养,从而深化三本院校
教育教学体制改革,进而解决
独立学院教育教学中存在的
不足。但是目前绝大多数三本
院校照搬一本、二本院校
的教育教学理念,对一本、
二本的教育教学理念完全
是一种原封不动的拷贝和
翻版,缺乏创新,也违背了
独立学院设立的初衷。

第二,有利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高独立
学院毕业生竞争力。培养创新人才的核心
是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形成创新人才
层出不穷的局面,根本上要靠体制机制
改革,逐步探索形成科学基础、实践能
力和人文素养融合发展的适应创造型
人才培养需要的机制。从这一方面说,
独立学院通过调整学期制度,推行三
学期制,可以真正把“应用型”“实践
型”人才

培养定位落到实处,真正培养出既有坚实理论水平又有实际操作和动手能力的社会急需的拔尖创新型人才,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独立学院毕业生竞争力不强,学生创新能力较低的状况。从独立学院学生特点上看,独立学院的学生具有性格活跃、思维灵敏但学习主动性差的特点,但创新创造思维能力并不比考取一本、二本的学生低,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也较强。目前个别独立学院在暑期安排一个短的第三学期,聘请各专业领域著名专家作报告和讲座,拓宽了学生的视野,拓展了他们的知识面,提高了他们的创新思维能力。在第三学期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为独立学院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供了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独立学院学生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提高了独立学院的竞争力。

第三,有利于独立学院走得更远、发展得更好。复合型人才与通识教育的要求,使得独立学院在推行三学期制,努力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方面更有优势。推行三学期制,有利于独立学院培养“理论型”+“实践型”(或“应用型”)的新型复合人才,也才能真正把独立学院的人才定位落到实处。独立学院办学时间不长,在进行以三学期制为主体的教学体制改革中,更容易突破传统两学期制办学模式的羁绊,迈入实施三学期制发展的道路。同时,在实施三学期制过程中,独立学院若根据自身的发展特点,合理安排教学及实践,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将更有利于独立学院更快更好发展。

三、独立学院推行三学期制的对策

第一,加快教学改革力度,探索适合独立学院长效发展新路径。独立学院推行三学期制,势必要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原有两学期的教学时间,从而为第三学期留出时间保障。两学期教学时间的缩减,必然会影响到原有教学内容、教学日程以及教学计划的实施,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都会受到影响或冲击。另外,从目前推行三学期制的独立学院的实际操作情况来看,第三学期即一个小短学期,多集中在6月中旬至7月中旬,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教师与学生的暑期时间,无形中改变了他们原有的学习生活习惯,会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排斥心理。要加快独立学院教材改革,在兼顾理论性与应用性原则的基础上,推出适合应用型本科层次人才的新

教材。同时要修订教学计划,安排新的教学日程,设置新的教学规划,对学年、学期、假期做出具体安排。调试独立学院师生的心理,使其尽早适应,逐步通过新的教学模式代替旧的教学模式,探索独立学院长远发展的新模式。

第二,推行三学期制,打破原有学期制度下的管理模式,加强学期制度建设,以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独立学院在建立之初就拷贝了一本二本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从教师的配备、薪资的发放、人员的管理、考试制度的确定到资产的管理及运作,比较全面继承了母体学校的相关制度。独立学院应以改革双学期制、推行三学期制为契机,深入研究,科学规划,根据实际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新的学期制度。要通过新的政策和新的规章制度完善三学期制,使之成为独立学院学期教学的一种常态,成为学院学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新制度促稳定,促发展,促学生能力全面提升。

第三,加大宣传解释力度,更新观念,协调独立学院与其举办者或上级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矛盾。推行三学期制会挑战母体高校或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权,造成独立学院与其举办者或上级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矛盾。独立学院应通过各种途径的宣传以及与独立学院的办学主体或上级行政部门的交涉,逐步取得更多的办学自主权;通过宣传、教育使师生逐步认识到第三学期的重要性,并通过认真实施,使学生真正在三学期中受惠,学到真本领,掌握真能力,逐步消除种种不解和排斥心理。

探寻独立学院发展的三学期制道路,并非是对原有教学体制的否定,而是对两学期制的丰富和补充,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不断丰富和完善。独立学院推行三学期制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要全面考察并兼顾独立学院多方面的问题才能得以实施。

[参考文献]

- [1]王敏.美国高校三学期制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教育学院,2011.
- [2]杨杏芳.高等教育的科技哲学基础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师 语)

试论高师院校心理学的研究性教学

季春梅

(江苏教育学院教管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以往的高师心理学教学存在目标单一、内容陈旧、方式呆板等弊端,开展心理学的研究性教学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选择。研究性教学是一种现代教学思想和教学理念,是一种教学反思和教学智慧,是教师以现代教学思想为指导,以问题解决为中心,引导学生通过合作性和研究性学习的方式,运用已有的知识基础,自主解决学习中问题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模式。高师院校在心理学的研究性教学中应明确教学目标,做好教学设计,科学组织教学实施。

[关键词] 高等师范院校; 心理学; 教学方式; 研究性教学

[中图分类号] G65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45-03

普通高等师范院校肩负培养合格的基础教育师资的使命,其教育和人才培养的质量水平,直接影响基础教育的发展,因此,如何提高高师生的专业思想道德素养,培养高师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便成为当前师范院校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课题。

心理学是高师院校设置的培养教师专业内涵的公共教育类课程,也是区别于其他综合大学的特色课程,它集中体现了教师的专业特点和学生未来的职业定向及职业能力。心理学作为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类课程中一门主要课程,它为高师生的专业发展提供了教育心理学知识基础,在培养师范生的教育素养及教学能力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教学质量如何将直接影响师范生以后的职业能力和专业发展。但多年来高师心理学教学在培养高师学生的教师专业素养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教学效果远不能体现出该课程设置的价值所在,也远不能适应现代基础教育发展特别是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要求和高师生的专业发展需要。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高等师范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及质量,也影响了师范生未来的专业成长和职业发展。高师教育类的公共课心理学教学基本上是“教师中心、教材中心、

课堂中心”的传统教学方式,处于“教师不愿教,学生不想学,学了没有用”的尴尬局面,主要表现为几点。(1)学科地位不高,高师心理学在高师课程体系中没能把它作为师范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予以应有的重视,在课程设置上地位不高,重视程度不够。(2)教学认识不足,教师缺少专业课教学的认识高度,在研究方面投入不足。学生则认为心理学与专业课相比仅是较为次要的一门基础性理论课程,学不学都无所谓,思想上对心理学的学习认识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3)目标定位不准,在教学中过于强调学生掌握心理学的知识,缺乏对学生职业心理能力的培养,缺乏指导学生运用心理学的知识解决教学中实际问题能力的训练。(4)教学内容陈旧,此前,高师心理学教材有诸多版本,这些教材的内容多有重复,且较为滞后。理论体系僵化,前沿理论关注不够,距学生的实际需要相去甚远,针对性不强,既不注重学生学习需求,也不贴近中小学教育教学实际,在心理学知识应用于中小学教育教学方面缺少具体的可操作的指导方法。(5)教学方式单一,心理学教学大多采用合班、统一、单向灌输的方式进行教学,缺乏多样化、个别化和集理论、兴趣、实验、行动为一体的综合性教学模式运用。^[1]

[收稿日期] 2012-06-19

[作者简介] 季春梅(1976-),女,江苏南通人,江苏教育学院教管院讲师。

目前高师心理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客观上对高等师范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及质量有很大的影响,也影响了师范生的个人专业发展,需要我们加以研究和有效解决。我们必须着眼于高师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取向,改变传统的心理学教学模式,积极开展研究性教学。这不仅是提高心理学教学质量的需要,也是促进师范生个人成长和专业素养提高,提升教师专业化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研究性教学的概念内涵有两个层面、4个维度的认识和理解。两个层面:从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层面理解,它是研究教学本身,探讨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促进学生能力的发展,提高教学的效果和质量;从学生培养的取向和目的层面理解,它是通过教学促进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发展,使之具有较强的科研意识和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它有4个维度:将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主动把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纳入教学内容;研究性教学要突出教学中的研究性,加重教学研究的分量;教学的重点应放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上;通过教学,让学生学会在课堂之外自主探索式学习。笔者认为,研究性教学首先是一种现代教学思想和教学理念,应依据现代教学理论,确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价值观,改变传统的师生关系,运用基于问题解决、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合作教学的教学组织方式。其次,它是一种教学反思和教学智慧,教师教学要注重基于经验的教学反思,要通过自我教学的反思,提升教学理念,改进教学实践,生成教学的实践智慧。再次,它是一种教学方式和教学模式,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以问题为中心,以研究性学习为基本方式,以学生能力发展为本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模式。鉴于以上的认识和理解,研究性教学可以作如下界定:研究性教学是教师以现代教学思想为指导,以问题解决为中心,引导学生通过合作性和研究性学习的方式,运用已有的知识基础,自主解决学习中问题的教学方式。在教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不仅能发挥教师的教学组织和引导作用,而且能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动作用;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变学生思维方式,而且能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不仅让学生系统掌握基础知识,而且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操作技能,克服传统的接受性教学的缺陷。通过研究性教学,最终可以达到提高学生可持续的学习力、创新力和实践力的目的。当然,研究性教学中的“研究”并不是说学生要脱离教师指导,

脱离课堂教学,脱离教材,学生的学习过程主要是从课堂开始,在课堂中能否有效开展研究性教学尤为重要。我们也不是完全否定包括传授式教学在内的其他教学方式,而是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认知水平,通过以研究性教学方式为主体并整合多种教学方式,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积极生成建构新知识,培养学生正确地分析问题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说,研究性教学以及研究性学习的要义在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实践能力。根据对研究性教学的认识和理解,我们在心理学的教学过程中,应在传承和优化已有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加强教学的研究性比重,变单一的传授式教学模式为研究性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具有研究性意识、创新能力和可持续的学习力。

基于以上关于研究性教学的概念和内涵的理解,笔者认为,高师院校在心理学的研究性教学实践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明确心理学研究性教学目标

心理学研究性教学目标的确立应以教学目标理论为指导,以教师的专业素质为基础,以学生能力发展为核心,制定出明确合理的目标。从教学实践的角度,应该依据心理学课程标准、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身心发展水平以及教师自身教学风格来确定心理学研究性教学的目标。高师心理学研究性教学目标的定位包括两个方面:(1)为高师生的学校生活和专业学习提供心理知识和理论的指导,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心理品质,为其将来从事教师职业,实现专业发展奠定较好的心理素质基础;(2)帮助高师生掌握青少年心理发展的规律和特点,认识学校教育教学中各种心理现象,使之能具备运用心理学的理论知识解决青少年心理问题的能力,为高师生将来从事教师职业做好专业准备。

2. 做好心理学研究性教学设计

心理学研究性教学的设计是教师根据心理学教学对象和心理学研究性教学目标,以心理学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为中心,以研究性学习为方式,以学生能力发展为取向,优化组合各教学要素,确定心理学教学程序,形成心理学研究性教学方案的过程。心理学研究性教学设计的要点是:现实问题提炼→课程资源整合→教学内容安排→教学方法选择→训练载体建构→教学效果评价。(1)现实问题提炼。研究性教学是从问题出发的。研究性教学首先在于教

教师要创设问题情境,提炼出心理学教学要研究的问题,让学生在一个真实的问题情境中去识别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2)课程资源整合。心理学研究性教学的课程资源是一个开放的资源体系,具体包括课内资源和课外资源、文本资源和非文本资源、静态资源和动态资源等。在这种多元的课程资源中,要根据研究性教学所提炼的问题和要达成的目标进行教学资源整合,为心理学的研究性教学提供条件。(3)教学内容安排。心理学研究性教学内容不是以书本的知识逻辑为取向的内容安排,而是以问题为中心,以知识逻辑、思维逻辑和活动逻辑的综合为取向的教学内容安排。因此,心理学研究性教学内容安排应包括学生知识和经验、思维资源和方法系统。(4)教学方法选择。心理学研究性教学的方法应围绕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在方法上既可以是解释性的,也可以是批判性或建构性的,方法的选择应是多样的,要突出针对性、灵活性和实效性。(5)训练载体建构。心理学的研究性教学不只是心理学知识的传递,还包括诸如心理实验、技能训练等多方面的内容,因此,心理学研究性教学要建构训练载体,促进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的研究性教学目标的实现。(6)教学效果评价。研究性教学效果的评价所采取的方式取决于研究性教学的目标。它既可以是行为性的,也可以是结果性的,还可以是行为与结果相统一的。教学效果评价应根据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及不同的教学取向、不同的研究性教学目标,运用不同的教学评价方式。

3. 心理学研究性教学组织实施

心理学研究性教学的组织实施不同于学科教学

的组织实施,首先,从实施的主体来看,它不仅是教师,还包括学生;从实施的方式来看,它不只是在课堂进行单向的知识传授,而是在一个开放的学习环境中,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的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的研究性学习。心理学研究性教学从静态结构来看,其组织实施一般可以分为3种形式:教学组织、学生组织、教师组织。从教学组织来看,在进行心理学研究性教学中,可以以班级为单位,这种班级可以是原有的教学班,也可以是重新组织的班级。从学生组织来看,主要是采用组建专题研究课题组的形式。由于专题研究课题组是学生自行进行的课题研究,是学生主体的探索性实践,所以,要有效地进行研究性教学的组织实施,就要组建学生课题研究组织。从教师组织来看,可以根据教师的素质和条件,组建学校心理学研究教学实施的教师集体,进行群体攻关,共同探索。^{[2](P.87)}心理学研究性教学从动态过程来看,主要包括研究性问题设计、系列专题研究或系列案例分析(包括运用开放性的资源,选择基于问题的学习方法)、发现问题、提炼结论、完成研究报告写作并作陈述。

[参 考 文 献]

- [1]张海芹.高师公共心理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4).
- [2]程振响.研究型课程论[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师 语)

高等书法教育中的想象力培养问题探析

吴旭春

(南通大学艺术学院, 江苏南通 226007)

[摘要] 在当代高等书法教育中注重想象力的培养,有利于改变传统书法教育中想象力缺失、模式化训练、成效缓慢等弊病,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及艺术创造力,为书法的持续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文章对传统书论在想象力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从书法鉴赏、技能训练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促进想象力培养的措施。

[关键词] 高等书法教育; 想象力; 培养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48-04

在新世纪我国大力提倡传统文化教育的背景下,书法这一中国特有的民族艺术受到了高度重视,高等书法教育事业得到迅猛的发展。但是在新的文化语境下,书法教育目的、受教育群体状况、教学形式等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传统的教育思想、方式已很难适应当今高等书法教育教学,必须加以改革,以适应新时期书法教育的要求。笔者认为在教学中加强学生想象力的培养,以想象力带动书法鉴赏与创作水平的提高,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想象在艺术创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邱振中先生主张“将想象力、敏感从众多驳杂的知识和技能中单独抽取出来置于训练的首位”^{[1](P.309)}。不同的艺术领域对想象力的要求以及想象力发生的机制也各不相同。文学、绘画等艺术与自然、社会接触紧密,想象力在这些艺术创作中的作用较为明显。但是书法则与之有着很大的区别。书法以抽象的汉字为基础,是不摹写具体物象的艺术。书法的抽象性使其发展几乎全靠字体的演化及书写风格的缓慢演变,而很难通过想象与自然、社会直接发生联系。因此从古到今书法创作中很少涉及想象,古代书论中偶尔谈及的想象,也都是间接的比喻和联想,与书法创作本体之间关系却不大,从而造成传统书法教育中关于想象力培养方面的缺失。如何在当代书法教

学中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成为一个急需研究的课题。

一、古代书论在想象力方面存在的问题

古代书论中涉及想象力的大多集中在书法鉴赏部分。中国书法一贯强调书法与自然的统一关系,因此古人在赏评书法时习惯用瑰丽无比、天马行空的自然形象来进行描述。如成公绥《隶书体》云“或若虬龙盘游,蜿蜒轩翥,鸾凤翱翔,矫翼欲去;或若鸷鸟将击,并体抑怒,良马腾骧,奔放向路”^{[2](P.10)}。汉魏这种论书传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世的论书也大多借助自然物象的联想对书法作品进行描述。直至晚清康有为仍然采用这样的方法。

古代这种论书方法与书法抽象性的特质有关。书法无论从所用的载体——汉字,到笔墨、线条等形式语言,都极具抽象性,与自然、社会没有直接的联系,无法将自然物象直接引用到书法中来。但是古人又将书法作为表达内心情性的载体,视书法为人的主体生命的笔墨化。因此古人在书法赏评中便使用大量的拟人物化的比喻想象,追加到抽象的书法作品之上,试图以具体物象之美来阐释书法的深刻内涵。

古人的这种赏评方法具有很强的文学意味,与个人的生活体验、文学修养都有很大的关系,具有很

[收稿日期] 2012-06-15

[作者简介] 吴旭春(1979-),男,江苏海安人,南通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强的个体性。同样的书法作品,不同的鉴赏者会给出截然不同的意象联想。同时古人所联想的天马行空的物象大多不涉及书法的具体技法,与书法作品本体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因此审美指向性较为模糊,其陈述感觉很难令人准确把握。这使得后学者在面对诸多论书时感到无所适从。

前人已经发现这种论书方法的弊端并提出批评,如米芾云“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何等语?或遣辞求工,去法逾远,无益学者。故吾所论要在人人,不为溢辞”^{[3](P.360)},可谓一语中的。

传统的这种赏评方法对当今的学书者而言更是非常不适合。当今社会已经丧失了古人的文化语境,学书者无论是文学修养、书法功底都远低于古人,对传统论书中提及的意象很难正确理解,因此如果在书法学习中继续采用古人的这种方法,会使大多数学书者无法把握,无法领会书法的精髓。

除此之外,古代论书中的想象力运用只存在于鉴赏过程中,而对书法创作的阐述则很少有想象力的介入。书法赏评中物象化的比喻很难与具体技法之间形成敏感的联系,对书法技巧方面缺少精致精微的分析描述。这使得传统的书法训练几乎完全依赖于对古代经典作品的临摹,很难使想象力的运用加入其中,也无法通过想象力的培养促进书法技能的快速提高。因此学书者在对传统的创新方面进展缓慢,同时在利用传统的技巧模式表现内心生活深刻体验时遇到很大困难。

在当代新的人文语境下,我们应当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改革,建立新的书法教学体系,将想象力的培养引入书法鉴赏、书法技能训练的学习中,通过想象力来提高书法教学的效果。

二、书法鉴赏中的想象力培养

书法鉴赏与技法训练是高等书法教学中两个密不可分的部分,书法鉴赏是技能训练的基础,通过书法鉴赏可促进书法审美水平的提高,引导书法创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想象力的运用在书法鉴赏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书法鉴赏很大程度都是依靠想象力来完成的。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得知,传统的赏评方法中对想象的运用存在着诸多弊端。因此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可尝试如下变革,使之更适合当今的学书者。

1. 丰富书法的表象积累,培养学生对书法构成要素的感性想象力。人们对各种事物的感知是想象

的基础,只有丰富的表象积累才能为想象提供广阔的天地。古代论书中的比喻联想与书法作品构成本身缺少紧密的关联,使得书法赏评语句具有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给学习者带来很多困难。因此我们在书法鉴赏教学中首先要紧密联系书法作品本身,引导学生具体分析书法的各种构成要素,丰富学生对书法的表象积累。书法的表象积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种是对各种书法构成要素的表象积累,一种是对各种类型作品风格的表象积累。

书法的构成要素包括线条、结体、墨法、章法等,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对这些要素的感性把握,如线条有轻重、方圆、枯润、肥瘦、刚柔、疾涩等多种矛盾关系;结体有疏密、开合、松紧、虚实、聚散等关系。引导学生对各种要素展开想象,使各要素与物化形象或情感表现之间形成敏感的关联。如对笔画形态的各种联想:点如“高山坠石”,撇似“长空掠雁”等;再如线质与情感之间的联系:流滑的线条给人轻快愉悦之感,生涩的线条给人苍茫沉重之感等。

熟悉更多的书法作品是积累丰富的书法表象的另一种重要方式。每一个时代、每一种书体、每一个书家都有极富个性化的审美追求和艺术特点。如对颜真卿作品分析时需要将之与大篆线条进行比较分析,以把握其线条的“篆籀气”的重要特点。再如对苏轼、黄庭坚行书鉴赏时,可结合“石压蛤蟆”“树梢挂蛇”的形象类比来具体分析苏黄二人的结体风格。大量书法作品表象的积累丰富了学生的形象思维,为技能训练、书法创作提供经验积累。

2. 感知作品的情绪意境,培养学生的情感想象力。“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书法能够将作者的生活感受、学识修养、性情趣味通过作品折射出来,是作者情感因素与文字完美融合的产物。对作品情感的想象与体验,是书法鉴赏的重要内容。通过观赏和品味书法作品,感知作品创作时的情绪意境,复现作者创作时的情绪状态及心理活动,从而体验作品所蕴涵的情感。我们所欣赏到的不仅仅是书法本身,更主要的是可以从中看到历史背景下书法的精神内涵和作者内心世界的原始面貌。

为了能使学生更好对作品情感进行想象体验,教学中需要注重两个方面:一方面需要对书法作品产生的背景进行了解。任何一件书法作品都是特定社会环境、文化背景、情绪意境下的产物。在鉴赏学习时,首先要对作品产生时的社会背景、文化特点、创作环境、创作缘由、作者情绪等做详细的了解学

习,并充分展开想象,使观赏者回归到作品创作时的特定情境,与作品产生心灵的亲近感,使观赏者内心与作者的情感表现发生碰撞,从而产生情感共鸣。比如赏析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时,需要对安史之乱这段历史及颜真卿兄侄的事迹进行深入了解,在这样的社会及情感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作品中大量渴笔的运用以及多处的涂抹,正是这样的随心所欲、不计工拙、一气呵成,才准确表达了作者悲愤激昂的心境。利用自己的文学基础,对作品内容中的文字语意的意象指向进行联想,深入体悟作者的悲愤之情。

另一方面需要对书法线条及构成具有很强的感性想象力。如《祭侄文稿》用较多生涩的线条表现内心的悲痛与纠结;而《兰亭序》中遒媚飘逸、行云流水的线条则表现了群贤毕至时欢快畅达的心境。

3. 鼓励学生寻找自己独特的体验方式。观赏者对书法鉴赏的经验积累各不相同,书法作品本身的形象及其包含的艺术内容又很丰富,所以不同观赏者对作品的理解及切入点也常常不同,所获得的艺术体验也有很大的差异。

因此教学中要鼓励学生寻找自己独特的视角及体验方式。鉴赏时鼓励学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切入,如线条、章法构成、节奏、情感意境等多个方面,并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文学基础,从中提取并想象出比兴意象,来描述对作品的直观感受。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必过多考虑传统书论中对作品定势化的描述,而应按照自己独特的体验方式,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语言,使书法形象转换为比较具象、比较鲜明带有欣赏者个性倾向的比兴意象,这样的鉴赏方法一改古代书论中空洞、不切实际的描述,显得更丰富生动,更有内容,且更具有现代意义,使学生更易掌握。

三、技法训练中的想象力培养

传统的书法教学中,临摹经典作品是训练的重要内容,靠的是“整体移入”,“想象作为艺术家重要的才能之一湮没在看不到边际的临摹之中”^{[1](P.308)},这样的教学方式成效缓慢,且严重影响了学习者艺术想象力的培养,易使学习者走入僵化、模式化的误区,使作品缺乏灵性,阻碍了学习者个性、创造力的发挥。因此在当代高校书法教学中必须引入想象力,将想象力作为书法训练的一个重要部分进行培养。书法训练中的想象力培养大致可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1. 观察与转换。书法创作首先要观察。一方面

是对自然形象的观察体验,通过观察客观形象各具特点的姿势形态,从中体会出客观形象的轻重、开合、动静等构成原理,把这些原理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去。另一方面是书法鉴赏中对经典作品的独特感悟,把鉴赏的成果用到创作中来。

古人在这方面的事例较多。王羲之见浮鹅划水悟其书意,张旭看担夫争道而悟到书法的结构与布白,黄庭坚看船夫荡浆而悟得笔法等等,都是善观物象并用到创作中的成功之例。

其次要转换。要把观察体验的物象转化为创作的要素应用到创作中去,需要对物象进行加工提炼,即古人所讲的“悟”。这是创作中最关键的一部分,然而古人却讲得较为含糊,往往一带而过。提炼转换的过程是一个抽象思考的过程。在天马行空的想象后,将复杂多变的物象进行简化提炼加工,淡化其具体的形象,而将其概括凝炼为点、线、黑、白、速度、节奏等抽象要素,并与书法创作联系起来,从中找出形式上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进行夸张和舍弃,用线条和布局等书法语言将之表现出来,从而实现从物象到创作的转变,达到“囊括万殊,裁成一象”^{[4](P.148)}的目的。

教学时可结合书史中经典事例进行具体分析。如《僧怀素传》中记“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遇圻壁之路,一一自然”^{[5](P.4421)},怀素从“飞鸟出林”悟出用笔的快速劲直;“惊蛇入草”当为速度的迅疾及体势的蜿蜒;而“圻壁”的痕迹则可悟出用笔要随机应势、任其自然,不可矫揉造作。

通过具体的分析,教给学生体悟转化的经验和方法,从而使学生能将观察产生的物象运用到书法训练中去,创作的书法充满灵性,气象万千,避免机械临摹带来的僵化、死板的弊病。

2. 线条训练中的想象力培养。丰富的线条质感是书法艺术表现力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技法训练的重要内容。

柔软的笔头可以在书写时进行各种复杂的运动,从而写出千变万化的线条。不同质感线条的产生与笔法、墨法密切相关,而笔法又是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

古人对笔法的论述较多,归根结底笔法实际是指控制毛笔运动的方法。毛笔的运动包括平动、提按、绞转等多种方式,是一种复杂的三维立体空间的运动,再加以速度的变化如疾、迟、驻等,这种复杂运动最终影响了线条的外部形态和质感。邱振中先生

认为线条的运动变化可分为两部分：“其一，书写时线条作为轨迹整体推进的速度变化；其二，在线条边廓内部，为控制边廓形态而产生的运动变化。”^{[6](P.4)}前一种为线条整体推进时的运动变化，这种运动比较容易被观察和掌握；而后一种则为线条推进时内部的细节运动变化，这种运动很难被观察、被模仿，但也正是这种运动赋予了书法线条丰富生动的内涵，是书法的魅力所在，书法线条的丰富多样性大多是靠第二种运动完成的。如王羲之行书中，侧锋的运用起了很大作用，通过转折处笔锋的顿挫翻转，笔锋由一个侧面转为另一个侧面，接触纸面的笔锋锥面不断发生变化，再加入笔锋的绞转运动，使其线条轮廓变化丰富，妍美流转。

在线条训练中引导学生感知掌握第二种运动变化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种线条内部的运动非常细微，很难被直观的观察感知到，因此需要培养学生从点画边廓的形态来分析笔锋的三维空间运动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则要借助空间的想象。通过教师的具体示范和分析，引导学生进行空间想象，还原作品书写时的笔锋运动方式，感悟体会笔锋运动的细微之处，从而使学生对作品线条与笔锋运动方式之间形成敏感的联系，通过作品能想象到笔锋运动的过程，并将这种体悟运用到书写实践中去。

在碑刻的教学中，更是需要这种想象力的介入。碑刻因为经过了书丹、刻石、拓印等一系列的工序，从拓本上仅能看到字形的的基本轮廓，加之风化、剥蚀的影响，根本无法观察书写者的用笔细节，但也正是这样的模糊性，给了学习者更多发挥的空间。因此在教学中，需要引导学生充分发挥想象，窥测其笔锋的运动方式，在想象中加入自己对笔法的理解，不必受他人左右，从而通过学碑能形成自己的风格。

3. 空间构成训练中的想象力培养。多变的空间构成是书法艺术表现力的另一个主要来源。书法的空间构成包括字内空间的安排及整体章法的空间安排。但是在传统的书法教学和学习中，书法的空间构成却很容易被“字”所束缚。书法自诞生以来一直以汉字的书写为基础，字是组成书法的基本单位。传统教学中，书法欣赏是以对汉字字形、字意的解读分析为基础；而书法训练中的笔法、结体、章法的学习也都围绕着单字而展开。这种情况下，学生对字内空间的安排很容易受汉字结构习惯定势的影响，对经典作品中字内空间巧妙的布白缺少关注，对结

构体势的变化也缺乏敏感，因此对单字的安排容易平正呆板、模式化；在整体章法安排上也容易使作品变成汉字的排列堆积，而忽视空间的流动与变化。

因此在教学中要让学生摆脱对“字”的束缚，转换视角，以线条（作品中黑的部分）和被线条分割的空间（作品中白的部分）为关注的重点。如在字内空间（即结构）的安排上，引导学生打破字结构的习惯定势，注重观察字内被线条分割的各个空间，充分发挥空间想象，采用收放、斜正、开合等手段，试图让字内的分割空间产生各种面积、形状上的对比变化，从而使一个字能产生多种生动变化的结构体势。通过这种空间想象的训练，可提高学生对字内空间布局的敏感性，使结体更放松、更生动、更自由。

在整体章法布局的训练中更需要借助空间想象力。以行草书章法为例，要引导学生关注每行的外部轮廓、行气线、行间空白的轮廓形状等要素，把每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布局，使学生通过想象尽量使每行的外部轮廓产生丰富的形态变化，并使行气线有节奏的动荡，同时使行间空白的轮廓也能富有节奏的变化。这样可打破“字”的束缚，能有效避免“排字”“状如算子”的弊病，使作品布局生动多变。在此基础上，还需引导学生对同一个题材内容进行反复构思，为同一题材找到众多的空间构成形式，以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

[参 考 文 献]

- [1] 刘小华. 关于书法艺术想象力培养问题的个案研究——以邱振中《书法技法的分析与训练》为例 [A]. 2010 杭州国际高等书法教育论坛论文集 [C].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10.
- [2] 成公绥. 隶书体 [A]. 历代书法论文选 [C].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
- [3] 米芾. 海岳名言 [A]. 历代书法论文选 [C].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
- [4] 张怀瓘. 书议 [A]. 历代书法论文选 [C].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
- [5] 陆羽. 僧怀素传 [A]. 全唐文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6] 邱振中. 书法的形态与阐释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师 语)

杨行密论

何剑明

(江苏教育学院历史系,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杨行密, 唐宋之交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唐末, 他在江淮举起割据大旗, 遏止中原藩镇朱全忠南进的步伐, 成功避免了全国更大范围的动乱。经略淮南过程中, 其政治方略、经济措施和军事思想, 对五代十国及其后来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他奠基的杨吴政权, 初步实现了由藩镇向王国的转型, 继而, 南方割据势力与北方中原政权并存的局面得以实现, 在政治上为禅代的南唐国奠定了基础, 开启了唐宋之交政治整合和经济文化中心南渐的先河。将杨行密看作“十国第一人”应算不得刻意拔高。

[关键词] 杨行密; 经略淮南; 奠基杨吴; “十国第一人”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52-08

大唐衰变后, 群雄并起。杨行密在江淮地区强力阻止朱全忠南进, 其奠基的杨吴政权, 初步实现了由藩镇向王国的转型, 在政治上为禅代的南唐国奠定了发展基础。南唐是南方最为重要的割据政权, 我国古代经济与文化中心的初步南移实际上是在以南唐为龙头、以吴越和马楚等政权为呼应的统治区域内实现的, 这个时期是唐宋之交社会分野的标点, 为后来社会的强劲发展提供了前瞻、新鲜的要素。将杨行密看作“十国第一人”应算不得刻意拔高。

一

安史之乱后, 分裂因子在大唐母体继续孕育。穆宗时, 卢龙、成德和魏博三镇复叛。当是时, “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 列为侯王者, 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 大者连州十余, 小者犹兼三四”, “自国门以外, 皆分裂于方镇矣”^[1](卷五十)]。“迨至德之后, 天下兵起, 始以兵役, 因之饥疠, 征求运输, 百役并作, 人户凋耗, 版图空虚。……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 皆厚自奉养, 王赋所入无几。”^[2](卷一二二)]唐王朝处于火山口之上。

藩镇割据愈演愈烈, 唐帝国大厦将倾。当时江淮、江南一带富甲天下, 东南藩镇仅以其丰厚岁供支

撑着苟延残喘的唐朝统治。韩愈感叹: “当今赋出于天下, 江南据十九。”^[3](卷五五五)]明末王夫之曰: “唐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矣。”唐国大厦“终不倾者, 东南为之根本也。唐立国于西北, 而植根本于东南, 第五琦、刘晏、韩滉, 皆藉是以纾天子之忧, 以抚西北之士马而定其倾。”^[4](卷二十六)]今人黄仁宇曾惊讶于在藩镇问题十分严重的情况下, 唐王朝尚能继续达百年之久, 他认同陈寅恪先生的解释: 朝廷能继续以东南的物资支持西北的边防。^[5](P.125)]然而, 江淮并非长治久安之地, 随着黄巢起义的爆发, 争夺江淮的战争使东南地区顿时烽火连天。

黄巢退出长安后, 义军转而向东向南发展。唐宰相郑畋上书道: “自沂州奏捷之后, 仙芝愈肆猖狂, 屠陷五六州, 疮痍数千里。……若使贼陷扬州, 则江南亦非国有。”^[6](卷二五二)]当时已近末日的唐朝成了武人的超级角斗场。各路军阀疯狂攻伐, 百姓朝不保夕。天灾人祸, 致使良田尽丧, 饥荒更甚, 家邻相食, 恐怖异常。

为保卫东南财赋重地, 唐政府急调荆南节度使高骈为镇海节度使。眼见王仙芝、黄巢来势凶猛, 唐廷改命高骈为“淮南节度使, 充盐铁转运使”。广明

[收稿日期] 2011-12-28

[作者简介] 何剑明(1952-), 男, 江苏如东人, 江苏教育学院历史系教授, 江苏省文物保护学会副会长。

元年(880),“高骈遣其将张璘等击黄巢屡捷,卢携奏以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骈乃传檄征天下兵,且广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万,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6](卷二五三)}

黄巢遭遇劲敌,屡战屡败,“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张璘急击之,巢以金啖璘,且致书请降于高骈,求骈保奏;骈欲诱致之,许为之求节钺”。时昭义、感化、义武等军皆至淮南,诸路大军云集,本是聚歼黄巢的极佳时机。但“骈恐分其功,乃奏贼不日当平,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朝廷听信了高骈的奏求。黄巢见大军“已北渡淮,乃告绝于骈,且请战。骈怒,令璘击之,兵败”,“巢势复振”。由于高骈私心作祟,面当黄巢摧枯拉朽之势,抵抗效微。

此时,如果让黄巢继续南进,后果不堪设想,淮南将领毕师铎“言于高骈曰:‘朝廷倚公为安危,今贼数十万众乘胜长驱,若涉无人之境,不据险要之地以击之,使逾长淮,不可复制,必为中原大患。’”但高骈“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诸将严备,自保而已”^{[6](卷二五三)}。同年,黄巢攻入长安,唐僖宗仓皇出逃蜀中。当时高骈正在“大阅军师,欲兼并两浙,为孙策三分之计。”^{[2](卷一八二)}

中和元年(881),高骈野心暴露,朝廷“遣中使趣高骈讨黄巢,道路相望,骈终不出兵。”不日又加“东面都统”,但高骈终“无赴难心,但欲襁雉集之异耳。高骈召石镜镇将董昌至广陵,欲与之俱击黄巢。昌将钱镠说昌曰:‘观高公无讨贼心,不若以扞御乡里为辞而去之。’昌从之,骈听昌还。”^{[6](卷二五四)}

中和二年(882)正月,朝廷不得已下诏:“高骈但领盐铁转运使,罢其都统及诸使。”五月,又“加淮南节度使高骈兼侍中,罢其盐铁转运使。骈既失兵柄,又解利权,攘袂大诟,遣其幕僚顾云草表自诉,言辞不逊,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负陛下。’”“骈臣节既亏,自是贡赋遂绝。”^{[6](卷二五五)} 显见,朝廷对高骈已经毫无约束之力。

既君臣失序,忠义倾覆,高骈愈加为所欲为。他本“好神仙,有方士吕用之坐妖党,亡命归骈,骈厚待之,补以军职。”高骈竟让吕用之掌管盐铁大政。吕用之为防范军民,“又欲以兵威胁制诸将,请选募诸军骁勇之士二万人,号左、右莫邪都。”荒唐的是,“用之侍妾百余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辄留三司纲输其家。用之犹虑人泄其奸谋,乃言于骈曰:‘神仙不难致,但恨学道者不能绝俗累,故不肯降临耳!’骈乃悉去姬妾,谢绝人事,宾客、将吏皆不得见。有不得

已见之者,皆先令沐浴赍被,然后见,拜起才毕,已复引出。由是用之得专行威福,无所忌惮,境内不复知有骈矣”^{[6](卷二五四)}。由于吕用之弄权,诸将怨愤,高骈陷入孤立境地。此时,中原强藩纷纷酝酿进犯淮南,这就为杨行密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二

杨行密(852-905),庐州(今安徽合肥)人。“少孤,与群儿戏,常为旗帜战阵状。”^{[1](卷二一一)} 他为人“长大有力,能手举百斤。”^{[7](卷六一)} 陶岳《五代史补》记载:“(行密)尝为合肥县手力,有过,县令将鞭之,行密惧且拜。会有客自外人见,行密每拜,则厅之前檐皆叩地,而令不之觉。客知其非常,乃遽升厅揖令于他处,告以所见,令惊,遂恕之,且劝事郡以自奋。”自此,杨行密开始了传奇般的经历。

1. 初据庐州,蓄势待发。

史载“唐乾符中,江、淮群盗起,行密以为盗见获,刺史郑荣奇其状貌,释缚纵之。后应募为州兵,戍朔方,迁队长。岁满戍还,而军吏恶之,复使出戍。行密将行,过军吏舍,军吏阳为好言,问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奋然曰:‘惟少公头尔!’即斩其首,携之而出,因起兵为乱,自号八营都知兵马使。刺史郎幼复弃城走,行密遂据庐州。中和三年(883),唐即拜行密庐州刺史。”^{[7](卷六一)}

既得庐州,杨行密便运筹帷幄:一是广纳能臣骁将,打造庐州人集团。杨行密很快建立起威信,形成以他为核心的庐州人群体,包括田頔、陶雅、刘威等,号三十六英雄。“行愍闻州人王勛贤,召,欲用之,固辞。问其子弟,曰:‘子潜,好学慎密,可任以事;弟子稔,有气节,可为将。’行愍召潜置门下,以稔及定远人季章为骑将。”^{[6](卷二五五)} 欧阳修《菱溪石记》载有刘金者,“与行密俱起合肥,号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8](卷四十)}。刘金系盱眙人,说明庐州人集团并非局限庐州,而是以庐州人为核心的能人群体。二是抑制群盗,立威地方。时庐州群盗肆虐,杨行密“乃以田頔为八营都督,陶雅为左冲山将,讨定乡盗。”^{[1](卷二一一)}“群盗陈儒攻舒州,濩(笔者注:高骈从子左骁卫大将军,知舒州事。)求救于庐州,杨行愍力不能救,谋于其将李神福,神福请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赍旗帜,问道入舒州,顷之,引舒州兵建庐州旗帜而出,指画地形,若布大陈状;贼惧,宵遁”。“久之,群盗吴迥、李本复攻舒州,濩不能守,弃城走,骈使人就杀之。杨行愍遣其将合肥陶雅、清流张训等将兵击吴迥、李本,擒斩之,以雅摄州刺史。秦宗权

遣其弟将兵寇庐州，据舒城，杨行愍遣其将合肥田頔击走之。”^{[6]（卷二五五）}三是寻找政治肩膀，伺机出山。高骈当时炙手可热，杨行密便刻意与其接近：“初，吕用之因左骁雄军使俞公楚得见高骈。用之横甚，或以咎公楚，公楚数戒用之少自敛，毋相累，用之衔之。右骁雄军使姚归礼气直敢言，尤疾用之所为，时面数其罪，常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与其党会倡家，归礼潜遣人薰其室，杀貌类者数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旦，穷治其事，获纵火者，皆骁雄之卒。用之于是日夜潜二将于骈。未几，骈使二将将骁雄卒三千袭贼于慎县，用之密以语杨行愍云：‘公楚、归礼欲袭庐州。’行愍发兵掩之，二将不为备，举军尽殪，以二将谋乱告骈。骈不知用之谋，厚赏行愍。”^{[6]（卷二五五）}

2. 兵出扬州，试剑淮南。

此间，杨行密的三个动作引关注：首先，击败毕师铎。僖宗光启三年（887），扬州发生兵变，左厢都知兵马使毕师铎联合高邮镇遏使张神剑、淮宁军使郑汉章赶走吕用之，囚禁高骈。吕用之假以高骈名义向杨行密求援。谋士庐江人袁袭认为这是夺取淮南的好时机，曰：“高公昏惑，用之奸邪，师铎叛逆，凶德参会，而求兵于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6]（卷二五七）}“行密率兵数千赴之。”^{[7]（卷六一）}毕师铎曾乞师于宣歙观察使秦彦，并且许以克城之日迎秦彦为帅。高邮张神剑“求货于毕师铎，师铎报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剑怒，亦以其众归杨行密。及海陵镇遏使高霸、曲溪人刘金、盱眙人贾令威悉以其众属焉。行密众至万七千人。”^{[6]（卷二五七）}甲午，秦彦带领宣歙军队三万余人，乘坐竹筏沿着长江向下开进，赵晖在上元拦截阻击，斩杀和溺死水中的人将近一半。丙申，秦彦进入广陵城，自称暂理淮南节度使事务，仍然委任毕师铎为行军司马，补授池州刺史赵为宣歙观察使。戊戌，杨行密率领各路军队抵达广陵城下，安设八个营寨自守，秦彦则关闭城门固守。

“丁卯，彦悉出城中兵万二千人”，“行密乃积金帛米于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于其旁，自将千余人冲其阵。兵始交，行密阳不胜而走，广陵兵追之，入空寨，争取金帛米，伏兵四起，广陵众乱，行密纵兵击之，俘斩殆尽，积尸十里，沟渎皆满，师铎、汉章单骑仅免”。甲戌，秦彦“命其将刘匡时杀骈，并其子弟甥侄无少长皆死，同坎瘞之。乙亥，杨行密闻之，帅士卒缟素向城大哭三日”。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当时“城中无食，米斗直钱五十缗，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

饿死者太半。宣军掠人诣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积骸流血，满于坊市。彦、师铎无如之何，蹙而已。外围益急，彦、师铎忧懣，殆无生意，相对抱膝，终日悄然。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还。”己巳夜，杨行密军借大风雨突袭成功，秦彦、毕师铎弃城而走。城中惨状果然令人瞠目：“遗民才数百家，饥羸非复人状。”^{[6]（卷二五七）}杨行密急忙赈济饥民，同时自称淮南留后。

其次，对垒秦宗权。蔡州秦宗权有晚唐吃人魔王之称。广明元年（880），秦宗权逐蔡州刺史，遂据蔡州。杨行密据扬州后，秦宗权欲与杨行密决一雌雄。“遣其弟宗衡将兵万人渡淮，与杨行密争扬州，以孙儒为副，张佶、刘建锋、马殷及宗权族弟彦晖皆从。十一月，辛未，抵广陵城西，据行密故寨，行密辎重之未入城者，为蔡人所得。”^{[6]（卷二五七）}秦彦及师铎“还自东塘，与宗衡合，行密闭城不敢出。已而宗衡为偏将孙儒所杀，儒攻高邮破之，行密益惧。”^{[7]（卷六一）}

孙儒，蔡州人，秦宗权麾下都督，隶秦宗衡。秦宗权虽屡败于朱全忠，但兵力仍强，企图染指富庶的淮南地区。孙儒自恃功高，并不愿意听命于秦宗权：“丈夫不能苦战万里，赏罚繇己，奈何居人下，生不能富贵，死得庙食乎？”此时秦宗权抵挡不住朱温的凌厉攻势，只得召回秦宗衡部。孙儒意在淮南，称疾不往，与主帅秦宗衡翻脸。孙儒大宴部众，于座上斩秦宗衡，与刘建锋、马殷和大将许德勋等盟誓，率骑兵七千人南奔，号称“土团白条军”^{[1]（卷二一一）}。这次对阵，杨行密明显处于劣势。

再次，避孙儒，返庐州。“辛巳，高邮镇遏使张神剑帅麾下二百人逃归扬州。丙戌，孙儒屠高邮。戊子，高邮残兵七百人溃围而至，杨行密虑其为变，分隶诸将，一夕尽坑之。明日，杀神剑于其第。”^{[6]（卷二五七）}这时，形势变得复杂起来，“其客袁袭曰：‘吾以新集之众守空城，而诸将多骈旧人，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诸将持两端、因强弱、择向背之时也。海陵镇使高霸，骈之旧将，必不为吾用。’行密乃以军令召霸，霸率其兵入广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长，袭曰：‘吾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复用乎？且吾能胜儒，无所用霸，不幸不胜，天长岂吾有哉！不如杀之，以并其众。’行密因犒军擒霸族之，得其兵数千。”^{[7]（卷六一）}扬州人心尚未归附，一旦决战，杨行密可能全军覆没。谋士袁袭再次“言于行密曰：‘广陵饥弊已甚，蔡贼复来，民必重

困，不如避之。’”^{[6]（卷二五七）}行密将奔海陵，袁袭劝归庐州，“海陵难守，而庐州吾旧治也，城廩完实，可为后图。”^{[6]（卷六一）}杨行密“从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将延陵宗以其众二千人归和州，乙卯，又命指挥使蔡侁将兵千人，辎重数千两，归于庐州。”此时，朝廷因为江淮久乱，任命朱全忠为淮南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朱全忠“遣内客将张延范致朝命于杨行密，以行密为淮南节度副使”^{[6]（卷二五七）}。文德元年（888）二月，“朱全忠奏以杨行密为淮南留后”。“壬午，孙儒袭扬州，克之。杨行密出走，儒自称淮南节度使。”^{[6]（卷二五七）}

3. 另辟蹊径，转战皖南。

围取宣州：杨行密与袁袭在发展方向上产生分歧。杨行密主张攻打洪州（今江西南昌）的钟传：“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袁袭主张向宣州（今安徽宣城）的赵锽寻找机会：“钟传新得江西，势未可图，而秦彦之入广陵也，召池州刺史赵锽委以宣州。今彦且死，锽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为人非公敌，此可取也。”^{[7]（卷六一）}袁袭指出：“赵锽新得宣州，怙乱残暴，众心不附。公宜卑辞厚币，说和州孙端、上元张雄使自采石济江侵其境，彼必来逆战，公自铜官济江会之，破锽必矣。”行密从之，使蔡侁守庐州，帅诸将济自糝潭。”^{[6]（卷二五七）}

杨行密按照袁袭的计划，汇合孙端、张雄所部，包围宣州。龙纪元年（889），“城中食尽，人相啖，指挥使周进思据城困逐赵锽。锽将奔广陵。田頔追擒之”。宣州士兵见大势已去，执指挥使周进思而降。“诸将争取金帛，徐温独据米困，为粥以食饿者”^{[6]（卷二五八）}。人心既附，杨行密实力大增。

激战宣、常：孙儒欲乘杨行密立足未稳遣兵攻打庐州，守将蔡侁投降。杨行密趁孙儒军还未进攻宣州，以“田頔攻常州，为地道入城。”“旌旗甲兵出于制置使杜棱之寝室，遂虏之”，随即“以兵三万戍常州”。形成东西遥相呼应之战略态势。“戊寅，孙儒自广陵引兵渡江，壬午，逐田頔，取常州，以刘建锋守之。儒还广陵，建锋又逐成及，取润州。”^{[6]（卷二五八）}一时宣州告急！

朱全忠打败秦宗权后，决不允许孙儒淮西兵卷土重来。在他解决了感化（今江苏徐州）节度使时溥之后，便派大将庞师古率大军从颍上（今安徽阜阳）直趋淮南，声援杨行密。

大顺元年（890），庞师古军沿庐、寿、滁一线，“攻下天长，壬子，下高邮”，“与孙儒战于陵亭，师古兵败

而还”。虽然庞师古战败，却为杨行密争取了宝贵时间。利用孙儒军回救的有利机会，杨行密调整部署，“遣其将马敬言将兵五千，乘虚袭据润州。李友将兵二万屯青城，将攻常州。安仁义、刘威、田頔败刘锋于武进，敬言、仁义、威屯润州。”不久，孙儒再次攻下润州，又“遣刘建锋攻拔常州”。“己丑，孙儒拔苏州。”^{[6]（卷二五八）}在拉锯战中，杨行密面临的形势严峻起来：宣州以东的固城湖、石臼湖、南漪湖挡住了他撤退东北的线路，三湖中间仅剩两条路，一旦孙儒扼住溧水（今南京溧水）、当涂（今安徽当涂），情势就十分糟糕。如果往东南撤，可经宣州、宁国入杭州，杭州钱鏐正结仇于杨行密曾攻陷常州，不会手下留情。往西，可经宣州、池州入长江，然后或走湖北黄州或走九江入江西腹地，但武昌的杜洪和洪州的钟传不会轻易放行。

在孙儒看来，解决了东线，杨行密就成为瓮中之鳖。在完成东线攻势后，孙儒军进至溧水、黄池（今安徽当涂境内）一线。杨行密“遣其将刘威、朱延寿将兵三万击孙儒于黄池，威等大败。”“孙儒军于黄池，五月，大水，诸营皆没，乃还扬州，使其将康晁据和州，安景思据滁州。”杨行密得天时地利，赶紧“遣其将李神福攻和、滁，康晁降，安景思走”^{[6]（卷二五八）}。

在北侧，一直觊觎淮南的朱全忠“遣使与杨行密约共攻孙儒。儒恃其兵强，欲先灭行密，后敌全忠，移牒藩镇，数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当引兵入朝，除君侧之恶。’于是悉焚扬州庐舍，尽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老弱以充食。行密将张训、李德诚潜入扬州，灭馀火，得谷数十万斛以赈饥民。”泗州刺史张谏请求借粮以度军中饥谨，张训“以行密之命馈之，谏由是德行密”^{[6]（卷二五八）}。

孙儒意在江南决战，他将镇守常州的刘建锋、马殷所部调来，沿苏、常、宣州一线成功包围了宣州，一时气势汹汹。杨行密“诸将田頔、刘威等遇之辄败，行密欲走铜官”。戴友规曰：“儒来气锐而兵多，盖其锋不可当而可以挫，其众不可敌而可久以敝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7]（卷六一）}“今悉众致死于我，我若望风弃城，正堕其计。淮南士民从公渡江及自儒来降者甚，公宜遣将先护送归淮南，使复生业，儒军闻淮南安堵，皆有思归之心，人心既摇，安得不败！”^{[6]（卷二五八）}刘威亦曰：“背城坚栅，可以不战疲之。”行密以为然。^{[7]（卷六一）}

杨行密听取了刘威、李神福、戴友规的意见，防守上屯据险要，坚壁清野以老其师，时出轻骑抄其馈

饷，夺其俘掠；又护送淮南百姓返回故乡，恢复他们正常的生活，从心理上瓦解孙儒军的斗志；再派李神福为宣池都游奕使，陶雅守润州，张训攻楚州（今江苏楚州），再以轻兵袭常州。景福元年（892）五月，“杨行密屡败孙儒兵，破其广德营，张训屯安吉，断其粮道。儒食尽，士卒大疫，遣其将刘建锋、马殷分兵掠诸县。六月，行密闻儒疾疫，戊寅，纵兵击之。会大雨，晦冥，儒军大败，安仁义破儒五十余寨，田頔擒儒于陈，斩之，传首京师，儒众多降于行密。”^{[6]（卷二五九）}只有刘建锋、马殷率领残部七千人逃脱。孙儒将死，仰观见威曰：“闻公为此策以败我，使我有将如公者，其可败邪！”^{[7]（卷六一）}

战胜孙儒后，“丙辰，杨行密遣田頔将宣州兵二万攻歙州”，“以雅为歙州刺史”^{[6]（卷二五九）}。“……朝廷以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同平章事，以田頔知宣州留后，安仁义为润州刺史”。乾宁二年，杨行密“表朱全忠罪恶，请会易定、兖、郛、河东兵讨之”，揭开了反击朱温南渐的序幕。

4. 纵横南北，全有江淮。

此后一个漂亮的转身，杨行密渐渐掌握了主动：

先是用兵吴越地。董昌，唐末任义胜军节度使，割据两浙。时天下贡输不入，独董昌赋献加倍，朝廷赖其赋，故拜检校太尉、使相。乾宁二年（895）董昌据越州自立为帝，国号“大越罗平”，以钱镠“为两浙都指挥使。”钱镠将兵三万来到越州城下，晓以厉害，“昌惧，致犒军钱二百万，执首谋者吴瑶及巫覡数人送于镠，且请待罪天子”。但钱镠仍“表董昌僭逆，不可赦，请以本道兵讨之”。董昌称帝为杨行密进击南部藩镇揭开序幕。此时杨行密“遣使诣钱镠，言董昌已改过，宜释之；亦遣诣昌，使趣朝贡”。在钱镠坚持下，朝廷“以钱镠为浙东招讨使，镠复发兵击董昌”。董昌求救于杨行密，杨行密“遣泗州防御使台濛攻苏州以救之，且表昌引咎，愿修职贡，请复官爵。又遣钱镠书，称：‘昌狂疾自立，已畏兵谏，执送同恶。不当复伐之。’”又“遣宁国节度使田頔、润州团练使安仁义攻杭州镇戍以救董昌，昌使湖州将徐淑会淮南将魏约共围嘉兴。钱镠遣武勇都指挥使顾全武救嘉兴，破乌墩、光福二寨。淮南将柯厚破苏州水栅”^{[6]（卷二六〇）}。是年，朝廷诏拜行密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弘农郡王。明年，“淮南兵与镇海兵战于皇天荡，镇海兵不利，杨行密遂围苏州。钱镠、钟传、杜洪畏杨行密之强，皆求援于朱全忠”。杨行密战略触角并没有因

此收缩，“淮南将安仁义攻婺州”^{[6]（卷二六〇）}，战火依旧在吴越腹地燃烧，同时将战争触角转向江西等纵深之地。乾宁四年（897），“诏以杨行密为江南诸道行营都统，以讨武昌节度使杜洪”。杜洪为杨行密所攻，求救于朱全忠。“全忠遣其将聂金掠泗州，朱友恭攻黄州。行密遣右黑云都指挥使马珣等救黄州。黄州刺史瞿章闻友恭至，弃城，拥众南保武昌寨”。癸亥，“两浙将顾全武等破淮南十八营，虏淮南将士魏约等三千人。淮南将田頔屯驿亭埭，两浙兵乘胜逐之。甲戌，頔自湖州奔还，两浙兵追败之，頔众死者千余人。”^{[6]（卷二六一）}及至光化元年（898）间，虽还有苏州、昆山、婺州等地的战事，但已非主流战役；而经略江西等地的战斗依然在继续。

再是淮南拒朱温。杨行密虽有扬州，但淮南侧翼不稳，朱全忠南下志在江淮。杨行密当时两头作战，向北，杨行密“浮淮至泗州”，又“攻濠州，拔之”。淮南重镇寿州，最是兵家必争。乾宁二年（895）“丁亥，行密围寿州”。杨行密部将朱延寿“执刺史江从勔，行密以延寿权知寿州团练使”。失去寿州，朱全忠岂能罢休？未几，汴兵数万攻打寿州，“州中兵少，吏民惶惧。延寿制，军中每旗二十五骑。命黑云队长李厚将十旗击汴兵，不胜；延寿将斩之，厚称众寡不敌，愿益兵更往，不胜则死。都押牙汝阳柴再用亦为之请，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战，再用助之，延寿悉众乘之，汴兵败走。”^{[6]（卷二六〇）}

乾宁四年（897）的清口（今江苏淮安西）之战，则奠定了南北分野的区域基础。《资治通鉴》记全程如次：

杨行密与朱瑾将兵三万拒汴军于楚州，别将张训自涟水引兵会之，行密以为前锋。庞师古营于清口，或曰：“营地污下，不可久处。”不听。师古恃众轻敌，居常弈棋。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师古，师古以为惑众，斩之。十一月，癸酉，瑾与淮南将侯瓚将五千骑潜渡淮，用汴人旗帜，自北来趣其中军，张训逾栅而入。士卒苍黄拒战，淮水大至，汴军骇乱。行密引大军济淮，与瑾等夹攻之，汴军大败。斩师古及将士首万馀级，馀众皆溃。葛从周屯于寿州西北，寿州团练使朱延寿击破之，退屯濠州，闻师古败，奔还。行密、瑾、延寿乘胜追之，及于淝水。从周半济，淮南兵击之，杀溺殆尽，从周走免。遏后都指挥使牛存节弃马步斗，诸军稍得济淮，凡四日不食，会大雪，汴卒缘道冻馁死，还者不满千人。全忠闻败，亦奔还。行密遗全忠书曰：“庞师古、葛从周，

非敌也，公宜来淮上决战。”行密大会诸将，谓行军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寿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师古败，从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赏之钱万缗，表承嗣领镇海节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俨甚厚，第舍、姬妾，咸选其尤者赐之，故二人为行密尽力，屡立功，竟卒于淮南。行密由是遂保据江、淮之间，全忠不能与之争。^[6](卷二六一)

光化二年(899)，杨行密与朱瑾用兵数万攻打徐州，将与朱全忠的决战引向徐淮地区。天复二年(902)，唐昭宗“遣江淮宣谕使李俨拜行密东面诸道行营都统、检校太师、中书令，封吴王”^[7](卷六一)。此后杨行密以淮南为根据地，转战江南、占据江右，遏止了北方藩镇南渐的势头，避免了全国卷入唐末动乱的漩涡，为五代十国政治格局的形成举行了奠基礼。唐哀帝天佑二年(905)杨行密病歿，因奉唐正朔，谥武忠王。其子杨隆演建立吴国，武义年间改谥孝武王，杨溥称帝时又被追尊为武帝，庙号太祖。史臣对杨行密的评价是“兴贱微，乃得志，仁慈善御众，治身节俭，无大过失，可谓贤矣。然所据淮、楚，士气剽而不刚。行密无霸材，不能提兵为四方倡，以兴王室，熟视朱温动天子而东，谋穷意沮，愤死牖下，可以大长矣！”^[1](卷二一一)杨吴政权延续了三十多年后为南唐禅代。在南方政权中，南唐最强，皆因杨吴基础坚固，后来南方相继割据，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一个以地方王国政权全面经营的必要阶段。杨行密经略江淮，实为十国第一人。

三

作为五代时期的一方枭雄和十国核心的创业领袖，杨行密成就一番事业的原因是什么呢？下面试做分析：

1. 前提：因应大势。

黄仁宇对五代十国有独特论述：“十国”在南方之“国”，经常在同一时期只有四个或五个。这样的疆域与面积也比较便于管理，而以发扬各地区经济的潜势力，则较统一的大帝国凡事都要着重均一雷同的办法有效得多。……这样的安排不见得比统一的大帝国为低劣。^[5](P.139)他认为：传统的历史家对于五代十国没有多少好话可说。要不是“僭窃交兴，称号纷杂”，则是“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他们不知道在唐宋之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重过渡时期，将军事与财政的管理权放在地方政府头上，使一切更趋紧凑和实际，然后再集中归并。否则就不能构成北宋这样一个带竞争性的体制去和北方少数民族用

骑兵为骨干有农业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5](P.138)

历史选择了五代十国，而顺应这一时代潮流是杨行密成功的前提。王夫之谓：“当行密之时，朱温、秦宗权、李罕之、高骈之流，凶风交扇于海内。乘权者既忘民之死，民亦自忘其死；乘权者既以杀人为乐，民亦以相杀为乐；剽夺争劫，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若不容已者，莫能解也。行密起于卒伍，亦力战以有江、淮，乃忽退而自念，为固本保邦之谋，屡胜朱温，顾且画地自全，而不急与虎狼争食。……行密之为功于乱世，亦大矣哉！”“杨行密不死于朱温淫昏之前，可与有为者，其在淮南乎？”^[4](卷二八，五代上)杨行密深明大义处理好与唐廷关系，保持了唐末五代的平滑过渡，赢得后人好评：“行密足未尝履王都，目未尝见宫阙，起于卒伍，无尺寸之诏可衔，削平之而抚仅存之生齿，是草泽崛起，无异于陈胜、项梁之于秦也。霸局已成，唐不能禁，授以爵命而姑为维系，其君臣之义，盖已浅矣。天下已非唐有，而人民必有恃以存，力捍凶锋，保江、淮之片土，抗志崛起，独能不附逆贼，甘奉正朔，如王师范、罗绍威、韩建之所为，亦可谓之丈夫矣。唐一日未亡，行密一日不称王，而帝制赏罚之事，听命于朝，循分自揣，安于其位，而特不屑臣服于逆贼之廷，亦可谓之不妄矣。”^[4](卷二七，昭宗)那么，杨行密与他的“英雄”们建立的是一个怎样的政权呢？卞孝萱先生分析道：杨行密与吴国的将领，担任着州、县长官。但“杨行密虽是他们的首脑，只是用‘智略’约束他们，而不是靠权力统率他们。这是因为：唐帝国虽仅保存着招牌，毕竟还没有正式垮台；淮南地区虽已形成独立割据，但吴国还没有宣告建立。此时，吴国中央政权表现为：吴王‘与诸将皆为节度使，虽有都统之名，不足相临制’；地方政权表现为：‘诸将分守郡府，虽尊奉盟主，而政令征伐，多以便便宜从事。可见，吴国的国家机构还是不健全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是不正常的，国境内的政令还是不统一的。’”^[9](P.30)

2. 保障：顺应民心。

王夫之对南方许多割据政权顺应民心民意的做法很以为然：“王潮约军于闽海，秋毫无犯；王建从蔡毋谏之说，养士爱民于西蜀；张全义招怀流散于东都，躬劝农桑；杨行密定扬州，糴米赈饥；成汭抚集凋残于荆南，通商劝农。此数子者，君子酌天地之心，顺民物之欲，予之焉可矣。存其美，略其慝，不得以拘致主帅之罪罪王潮，不得以党贼之罪罪全义，不得以僭号之罪罪王建，不得以争夺之罪罪行密，不得以

逐帅自立之罪罪成。而其忘唐之尚有天子，莫之恤而擅地自专者，概可勿论也。”^[4]（卷二十七，僖宗）时“天下已非唐有，而人民必有恃以存”，杨行密“力捍凶锋，保江、淮之片土，抗志崛起”^[4]（卷二七，昭宗）。

杨行密注重治理根本。江淮有茶盐之利，虽经战火破坏，但基础还在。杨行密曾经“以用度不足，欲以茶盐易民布帛”，掌书记舒城高勛曰：“兵火之余，十室九空，又渔利以困之，将复离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邻道所无，足以给军；进贤守令劝课农桑，数年之间，仓库自实。”^[6]（卷二五九）他采用高勛建议，未强行交换百姓布帛，而以茶盐同邻道物物交换。楚州盐城县有盐亭百二十三，常州一带则产茶叶。杨行密招抚流散，发展生产，这些产业在战后都被恢复起来。田頔为宁国节度使时，宣州地区“民室未完，民逃未复”，田頔采取措施，轻徭薄赋，让逃民复业，“不期岁，荷耒秉锄犁，撬播于泥，如云之稼，穰穰在畦”，其时“食廩实矣，田野辟矣”^[10]（卷一一）。南唐史虚白即谓“广陵殷盛，土庶骈阗”^[11]。

杨行密因地制宜制定的税收政策很有创造性。“先是，吴有丁口钱”^[6]（卷二七〇）。陶雅入歙州后，开始实行按亩征钱制度，这是五代十国时期田税改革的前兆之一。如果说丁口钱的征收具有临时性，按亩征钱则向定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云：“予里中有僧寺，曰南华，藏杨李二氏税帖，今尚无恙。予观杨行密时所征产钱，较李氏轻数倍。”“产钱”是南宋人对地产的习惯称呼，即田税。税帖反映的史实是，杨家初征时税额较轻。由于苦心经营经济，“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6]（卷二五九）

3. 根本：立足强军。

争战之初，由于杨行密赖以起家的将士主要由淮南人组成，战力远不如北方燕赵及河东军队。孙儒覆灭后，“行密收儒余兵数千，以皂衣蒙甲，号‘黑云都’，常以为亲军。”^[7]（卷六一）平时厚其禀赐，逢战使之先登陷阵。黑云都成了淮南的王牌部队。但由于像黑云都这样的客军发生兵变几率很高，于是，杨行密“又并盱眙、曲溪二屯，籍其士为‘黄头军’，以李神福为左右黄头都尉，兵锐甚”^[1]（卷二一一）。这支以淮南人为主体的部队的存在，不仅使杨行密实力增加，还可以防止黑云都这样的客军独自坐大。乾宁四年（897），河东朱瑾为汴兵所逼，与史俨、李承嗣拥州民渡淮投奔杨行密。“淮南旧善水战，不知骑射，及得河东、兖、郢兵，军声大振。史俨、李承嗣皆河东骁

将，李克用深惜之。”^[6]（卷二六一）杨行密军声益振。

如何治理指挥不断组合或整合中的军队，是特殊时期杨行密面临的课题。杨行密坚持以德立威，取信将士，留下许多佳话。

他广纳将才，不拘一格。龙纪元年（889），杨行密击败赵锽，锽将周本，号称勇冠三军，被俘后杨行密用其为帐下牙将，每战都能“奋跃先登，攻坚摧锋。”^[10]（卷十四）作战中伤口遍体皆不顾及，战后则自烧烙铁，烫治创口，依然谈笑自若，了无惧色。杨行密受封淮南节度使，即以淮南马步使授周本，统领兵权，成为亲信。

“锽既败，左右皆散，惟李德诚从锽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6]（卷二五八）秦宗衡部将安仁义，骁勇善战，投淮南后杨行密甚爱之，安仁义名冠军中。”乾宁三年（896）“癸未，苏州常熟镇使陆郢以州城应杨行密，虜刺史成及。行密阅及家所蓄，惟图书、药物，贤之，归，署行军司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钱公所。失苏州不能死，敢求富贵！愿以一身易百口之死！’引佩刀欲自刺。行密遽执其手，止之，馆于府舍。其室中亦有兵仗，行密每单衣诣之，与之共饮膳，无所疑。”^[6]（卷二六〇）

即便对海陵镇使高霸这样的骍之旧将，“欲使霸守天长”，袁袭曰：“吾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复用乎？且吾能胜儒，无所用霸，不幸不胜，天长岂吾有哉！不如杀之，以并其众。”行密这才因犒军擒霸族之。^[7]（卷六一）但事后杨行密深感自责，以致袁袭死时，杨行密哀外有音：“吾好宽而袭每劝我以杀，此其所以不寿与！”^[6]（卷二五八）

《五国故事》称“行密雄豪而颇有度量”^[12]（卷上）。《新五代史》亦称其“宽仁雅信，能得士心”^[7]（卷六一）。庐州刺史蔡传先前曾附于孙儒。儒既败，传遂阻兵以拒行密。景福元年（892）十一月，蔡传发杨行密祖父墓，并求救于朱全忠，与舒州刺史倪章连兵拒行密。行密遣李神福将兵讨传。景福二年（893）四月，行密会田頔兵合围庐州（今安徽合肥），庐州将张颢逾城来降。七月，杨行密克庐州，斩蔡传。左右请发传父母冢，行密不从：“传以此得罪，吾何为效之！”^[6]（卷二五九）同年，“蔡人张颢以骁勇事秦宗权，后从孙儒，儒败，归行密，行密厚待之，使将兵戍庐州。蔡传叛，颢更为之用。及围急，颢逾城来降，行密以隶银枪都使袁稹。稹以颢反复，白行密，请杀之，行密恐稹不能容，置之亲军。”^[6]（卷二五九）

杨行密善于用将，正确论功，往往帅尽其才，不

疑不弃。史称“袁袭运谋帷幄、举无遗算，殆良、平之亚邪？以览济宽，事非得以，盖时会有固然尔。高勔志务农桑，仁者之言藹如也。戴友规数言决策，独探本源，可谓谋臣之杰出矣”^[10]（卷十二）。在破秦、毕军中，李神福“居功多，会选卒为黄头军，选神福为左右黄头都尉”，后多建功勋。刘存，在战斗中曾“为流矢中目，存战自若”^[13]（卷一），在神福病归后，代为招讨使。“秦宁节度使朱瑾率部将侯瓚来归，太原将李承嗣、史俨、史建章亦来奔。行密推赤心不疑，皆以为将。于是，兵锐甚，强天下。”^[1]（卷二一一）

杨行密治军以宽，对于谋叛将士，也不妄杀。天复三年（903），杨行密同乡田頔与安仁义、朱延寿举兵叛变。叛变失败后，行密“赦其（田）頔母殷氏，行密与诸子皆以子孙礼事之”。安仁义据城叛变一年有余，杨行密仍然愿意赦免他，“杨行密使谓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能束身自归，当以汝为行军副使，但不掌兵耳。’”^[14]（卷一三四）田頔属吏宣州长史骆知祥善治金谷，观察牙推沈文昌善于文词，曾为田頔撰写檄文辱骂杨行密。杨行密以骆知祥为淮南支计官，掌管财赋，以沈文昌为节度牙推，居幕府右职。

4. 韬略：以谋制胜。

唐末军情十分复杂，强弱互见，朝夕多变。杨行密善于以逸待劳，捕捉战机。文德元年（888），孙儒将攻庐州，时宣歙观察使赵锽遣部将苏塘、漆朗率军两万屯据曷山。袁袭曰：“公引兵急趋曷山，坚壁自守，彼求战不得，谓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从之。塘等大败，遂围宣州。^[6]（卷二五七）景福元年（892），孙儒兵逼宣州，杨行密谓诸将曰：“孙儒之众十倍于我，吾战数不利，欲退保铜官，何如？”刘威、李神福曰：“儒扫地远来，利在速战。宜屯据险要，坚壁清野以老其师，时出轻骑抄其馈饷，夺其俘掠。彼前不得战，退无资粮，可坐擒也！”^[6]（卷二五九）淮南军遂坚壁清野，待儒军食尽纵兵击之，儒军大败。宣州之役，杨行密以逸待劳，后发制人，获战术成功。

审时度势，借力藩镇，也是杨行密成功的诀窍之一。时“儒恃其兵强，欲先灭行密，后敌全忠”，杨行密最初兵进扬州，势单力薄，通过与高骈部将高霸、张神剑的联合，并取得吕用之的支持，变被动为主动夺取了扬州。虽然知道北方终极对手是朱全忠，杨行密还是遣使大梁，“陈归附之意”。是时，朱温“兼领淮南，乃遣牙将张廷范使于淮南，与行密结盟”^[14]（卷一三四）。除联合朱温外，还求救于两浙钱镠，“镠以兵食助之”。为了争取有利的战略空间，他还与死敌马殷结为兄弟，当得知部下马骥是马殷的亲兄弟，主动放他回湖南，向湖湘方面作出友好姿态。终于赢得战争主动，大败孙儒，尽得淮南诸州。

[参考文献]

- [1][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后晋]刘昫，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清]董浩，等. 全唐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明]王夫之. 读通鉴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5]黄仁宇.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 [6][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 [7][宋]欧阳修. 新五代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8][宋]欧阳修. 欧阳文忠公集[C].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 [9]卞孝萱. 五代时期南唐代吴的研究——兼评李煜词讨论集中的一个有关的历史论点[J]. 学术论坛，1957(3).
- [10][清]吴任臣. 十国春秋[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1]史虚白. 钧砚立谈[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 [12]佚名. 五国故事[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 [13][宋]路振. 九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 [14][宋]薛居正. 旧五代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责任编辑 光 翟）

是复古还是超越?

——陶渊明“世外桃源”与老子“小国寡民”社会理想之比较

杨 林

(江苏省东台市教育局, 江苏东台 224200)

[摘要] 人们在对陶渊明“世外桃源”社会理想进行评价时,都认为其受到老子“小国寡民”社会理想的影响,甚至判定这种影响是复古的、消极的。若将老子的“小国寡民”社会理想与“世外桃源”的情境进行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笔下的“世外桃源”已经扬弃了老子“小国寡民”社会理想中消极倒退的内容,表达了积极的向往追求,是作者归隐生活的一种理想境界。显然,“世外桃源”是对“小国寡民”社会理想的超越。

[关键词] 陶渊明; 老子; “世外桃源”; “小国寡民”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60-03

在对陶渊明“世外桃源”社会理想进行评价时,都会提及到它的消极之处,认为他的社会理想受到老子“小国寡民”社会理想的影响。如苏教版《教学参考书》说:“文中也反映了作者受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影响,对上古时代自耕自食、无识无知生活的仰慕”^{[1](P.34)}。人教版《教师教学用书》中说:“它又带有一定程度的复古倾向,在阶级社会中也只能是一种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2](P.176)}。那么,“世外桃源”与老子所叙述的“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有哪些联系与区别呢?陶渊明是否受到的是一种消极影响呢?我们可以把老子的“小国寡民”社会理想与“世外桃源”的情境进行比较,才能得到比较可信的结论。

老子的《道德经》里,对“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有专门的叙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3](P.211)}其意是说,使国家变小,使人民稀少。即使有各种各样效率高的器具,却并不使用;使人民重视死亡,而不向远方迁徙;虽然有船只车辆,

却不必去坐它;虽然有武器装备,却没有地方去布阵打仗;使人民再回复到远古结绳记事的自然状态之中。在这样的国家里,人民住得安适,过得快乐。国与国之间互相望得见,鸡犬的叫声都可以听得见,但人民从生到死,也不互相往来。

老子之所以主张回到那个“小国寡民”的社会之中,是基于减少社会的管理成本。治理的人俭约不奢,不劳民众。因为国家很小,人口很少,不需要设立国家机器,那么也就没有了苛捐杂税,这样,人民才能够“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因为国家大了,必然需要管理,那必然会有兵役、徭役、赋税,必然会有阶级、剥削、战争。同时,他又是主张清静无为的,所以才认为“虽有舟舆,无所乘之”。人民不去追求安逸享乐的生活,不好出入游娱。因为“老死不相往来”,还需要船和车做什么呢?至于“虽有甲兵,无所陈之”,那是人们之间没有怨恶,不必动干戈,那些武器也就派不上用途。但他理想中的消极内容不可忽视,如主张人民无知无识,反对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不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人们过着封闭的生活。更为过分的是,他要求复古倒退,“使民复

[收稿日期] 2012-02-28

[作者简介] 杨 林(1958-),男,江苏东台人,江苏省东台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结绳而用之”，认为这样才是返朴归真。这些主张表现出的是社会的一种倒退。所以，老子的社会理想与孟子提出的“王道”社会理想、或者“大道之行”的“大同”理想的最大区别，就是他无视社会发展的现实以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后人谈及这种社会理想时，只能取其合理的内核，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内容。

如果说“世外桃源”受到了“小国寡民”社会理想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也只是积极方面的，而不是消极的。它既与“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譬如，人民生活安定幸福，没有战乱而能安居乐业。都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不满，进而通过这些理想或者幻想进行批判与否定。但“世外桃源”的社会理想更多的却是对“小国寡民”社会理想的一种超越。

其一，崇尚悠闲的隐居生活。陶渊明从出仕到隐居，这是他人人生之路的行迹。而他更看重的是自己的隐居生活，因为在这里可以远离政治而自得其乐。读一读《桃花源诗》就可以知道，他描写的“世外桃源”生活图景，其实就是隐居者的理想社会。他说：“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4](P.194)}他从贤者隐居的原因说起，接着说“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是说夏黄公、绮里季、东园公、角里先生等“四皓”（四位须发皓白的老者）去商山隐居，而桃花源中人的先世也就带领“妻子邑人”来此绝境。这很自然地交代了桃源中人的来历。他们其实和黄、绮一样，都是来此避世隐居的。这正是作者隐居生活理想的显性与寄托。这里才能得到作者希望的悠闲快乐的生活，“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人随自然一起生活，无忧无虑，不需要操心劳神，更没有尔虞我诈。由此可以想到他在《归去来辞》所说“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5](P.527)}，春天到了而事劳作，那是农人告诉他的，这样的生活真是“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而且，诗作的结尾“愿言躋清风，高举寻吾契”，更是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理想追求，愿意追踪前贤，高飞远举寻找和自己意气相投的人。所以，“世外桃源”是作者的一种理想归宿，是他用文学的语言进行的描绘与诠释。如果我们读一读他的其他诗作，就会发现那些作品中有着许多“世外桃源”的影子，而“世外桃源”是他其他诗作中对理想社会生活描写的一个荟萃。

其二，崇尚自然的田园诗情。作者是一位田园诗人，我们可以从“世外桃源”中感受到作者所流淌的田园诗情。先看看那“世外桃源”的外景：“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明媚的春光，艳丽的桃花，而且是一望无际，空中地上，都是花的世界。这是一个怎样的迷人情境啊。但这里的描写还只是一种衬笔，以此暗示桃源中的景色一定更加迷人。当渔人进入桃源中，看到的景象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土地平旷则视野开阔，屋舍俨然则生活富足，良田美池桑竹则是一派田园风光。肥沃的土地，美好的池塘，吐绿的桑树，碧翠的竹林，一景一景进行叠加，给人一种美不胜收之感。这里的写景并不是作者表达的重点，他只是用这种概括的手笔，把桃源中的景象进行提取，而作为社会生活的背景。但已经不难发现其中流淌出的田园诗情，并且与他所写的田园诗景的风格是一致的。譬如，桃源中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和《归田园居其一》^{[4](P.195)}所写“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景物是一样的境界，或者说这两句诗与《桃花源记》里两个句子是相互诠释，表现出悠闲恬静的田园风情。这里的“鸡犬相闻”不是“小国寡民”社会中的那种“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自我封闭的情态。所以，决不能把“鸡犬相闻”等同与老子所设想的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状态。它是田园诗情的一种点缀。

其三，崇尚自由的耕织生活。桃源中人过的是一种自由的耕织生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这样的耕种生活，真是其乐融融。而作者也是曾经有过这样的劳作，如《归园田居》中，“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作者从不同角度描写自己归隐田园后的劳作生活，并且从这样的生活中获得自由快乐。并且认为“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希望自己的劳作能够有收获，自己归隐躬耕的生活不会改变。所以，我们看到作者在描写桃源中的生活时，起笔就是写他们的劳作。他曾在《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中写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4](P.200)}作者把耕种劳作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他还在劳作中怀古，表现对古代隐者的羡慕之情。也是同样在这首诗中说：“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

“沮溺”是指长沮与桀溺,他们是春秋时楚国的两位隐居躬耕而不愿出仕的人。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里,他再次用典:“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4](P.199)}这里也是以长沮、桀溺自比,怀念躬耕的隐士。从作者的劳作与表现劳作的诗歌中,都可以看出他对归隐后耕种生活的赞美与崇尚。“世外桃源”就是寄托了他这种归隐耕种生活的理想。

其四,崇尚纯朴的古道热肠。与“小国寡民”社会中“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形不同,“世外桃源”中的人却是有着纯朴的古道热肠。请看作品的几处描写:“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因为这里已经与世隔绝几百年,见到渔人自然非常吃惊。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交往,更不妨碍表达自己的热情。“便要还家,设酒杀鸡做食”,“设酒杀鸡”,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最好的款待了。如孟浩然的诗句:“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那是老朋友才有的招待。而桃源中人与渔人素昧平生,却是这样热情而丰盛的招待,这是多么纯朴而真挚。并且家家都是这样的,“咸来问讯”、“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大家都是如此的纯朴善良,可见这是一个多么理想的社会。而“停数日,辞去”,渔人能够游玩几天,受到食宿款待,这在今天看来,可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这就是一种纯朴的民风。正如作者在诗中所写:“淳薄既异源”,桃源内外世风不同,而桃源内是质朴敦厚,这样的世风也是作者一直所希望与追求的。如他在《五柳先生传》中说:“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6](P.171)}他自己希望成为无怀氏与葛天氏时代的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在他们的统治下,社会安定,民风淳朴。作者这样看重纯朴的民风,其实就是对当时尔虞我诈的社会风气的批判与否定。而他所崇尚这样的理想,绝不是一种复古倒退,而是对一种社会道德的期待与重建。这也是与“小国寡民”社会理想中复古倾向的本质区别。

其五,崇尚和谐的社会秩序。因为作者崇尚的是一种田园诗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与社会,应当是没有剥削、没有王税、没有战争、没有朝代更迭的。他在《桃花源诗》中说:“秋熟靡王税”。“王税”是中

国古代社会人民最沉重的负担。从《礼记·檀弓》中记叙的孔子所说“苛政猛于虎”^{[7](P.16)},到唐代的柳宗元所叹“孰知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者乎”,赋税一直在残害百姓。因此,没有赋税,没有剥削,就成为最高的理想境界。作者直接说出“秋熟靡王税”,就是对这种最高社会理想的肯定与向往。在那个生活力水平还很低下的时代,没有赋税才有人民的幸福生活,才有和谐的社会秩序。所以,我们才看到桃源中人的生活情境:“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诗中对老人小孩的幸福生活写得更具体更形象。一个社会是否幸福,老人孩子的生活状况是一个衡量的标志。作者特别写到老人小孩,其实就是表现老人小孩快乐幸福的社会才是真正幸福的社会,才是真正和谐快乐的社会。这个社会,自然也就是远离战乱,没有追名逐利,没有尔虞我诈。这样才有了桃源中人对渔人叙述桃源外社会生活情形后的“皆叹惋”。这一“叹惋”,不仅反衬了世人生活的不幸,更表现作者对没有剥削与压迫、没有战乱、和平恬静社会理想的追求。

基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世外桃源”,其实是他归隐生活的一种理想境界,他把这种生活诗化后变成了一种归隐生活的理想。而后来的人们从他这种隐居躬耕生活的理想中,感受到了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生活蓝图,进而吸收并演变成为中国古代的又一种社会理想模式。

[参考文献]

- [1] 本书编写组. 语文数学参考书(九年级上册)[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 [2] 本书编写组. 语文教师教学用书(八年级上册)[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 [3] 王弼. 老子道德经注[Z]. 北京:中华书局,2011.
- [4] 沈德清. 古诗源[M]. 北京:中华书局,1963.
- [5] 古文鉴赏辞典[Z].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
- [6] 本书编写组. 古诗文诵读[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 [7] 文言文精品阅读[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光 翟)

傅斯年:徘徊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学者

杨纯刚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傅斯年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以独立的学者身份参与政治,针砭时弊,推崇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但同时他也深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提倡经济平等、铲除豪门资本、缩小贫富差距、要求国家对经济领域进行干预。因此,在他身上有着突出的自由社会主义的色彩,而这种思想的形成和傅斯年的家庭出生、求学经历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傅斯年; 自由主义; 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K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63-05

傅斯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他既是一位历史学家、教育家,更是一位对政治有着强烈关注的爱国民主人士,在他身上我们既能发现大量自由主义的色彩又能看见社会主义的光芒。自由主义作为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潮,在培养独立精神以及推进自由、民主的发展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贡献,而傅斯年则是研究中国自由主义所无法绕过的人物,通过对傅斯年成长环境、求学历程、政治实践及理论形成等诸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对傅斯年的自由社会主义思想有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傅斯年自由社会主义思想之形成

1. 年幼时期家庭教育和生活环境对其性格的塑造。

傅斯年出生在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其远祖傅以渐是清朝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傅以渐以后,傅氏家族名人辈出,在朝为官或出任封疆大吏者更是数不胜数。傅以渐下传至第四代傅淦家道则开始衰败。傅淦是傅斯年的祖父,也是对傅斯年幼年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傅淦少年成名,诗词书画、经史子集无所不通,但淡泊名利,不乐仕途,对清末政治黑暗更是深恶痛绝,平时靠在私塾教书和卖字画来维持生计;而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在傅斯年9岁时便逝世,因此傅斯

年从小是在其祖父傅淦的教育之下长大的,傅斯年三四岁时便开始背识《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同时每天有其祖父口授历史故事,使其从小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傅斯年的母亲李氏是另一个对傅斯年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傅斯年的父亲死后,家庭日趋贫困,尽管其母精打细算但生活仍旧窘迫。但无论经济多么拮据,李夫人从未放松对傅斯年兄弟的教育,无论生活多么困难,傅斯年兄弟俩从未失过学。生活的艰辛让傅斯年更加珍惜学习的机会,无论是在私塾,还是东昌府立高等小学,或是天津府立中学,傅斯年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年幼时的勤奋给傅斯年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功底,为其以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传统文化的精深了解,使其对儒家文化中的糟粕有着更深的认识。

傅斯年的家乡山东聊城位于山东省西部,历史上这里是交通要道,经济繁荣,但近代以来,鲁西的发展逐渐滞后和鲁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傅斯年所说:“拿山东西北部的农民和东部的农民比,我们觉得有几样不同。第一,东部的农民比较的还算能稍和工商业接触;西部乃真土头土脑的农民。第二,东部的农民常不安于家,泛海而往东三省,或经商在外;西部的农民虽然也常有“下关东的”,但终不若东部的人迁徙

[收稿日期] 2012-03-10

[作者简介] 杨纯刚(1988-),男,江苏常州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出去的多。第三,东部的农村富的很富,贫的很贫,这因为山地便无出产,而非山地,非海滩便极沃腴;西部的农村比较的齐一,各地的土地肥瘠差不多。第四,东部的农民比较强悍,滨海的尤其厉害;西部大半是顺忍的农民。第五,东部的农民间多诈谋,西部大半是平易的农民,但也有时性情上不免刻薄。”^{[1](P.371)}

山东的西部在近代以前并不是最为落后的地方。一条运河贯通南北,当地的经济水平还算富庶,但也就是因为当地富庶,一般工人和农民不肯迁地求事业,远不如鲁东百姓具有开拓精神。就聊城市一地而论,聊城在当年是山东西部三大埠之一(三埠是济南、聊城、临清,商贸水平在济南之上),同时也是山东西部直隶南部的“八股文化中心点”,于是地方上颇少刚气,而多怠性。傅斯年也承认“一切社会都受运河和八股文化的影响,农民的思想也不免如此流露。沿运河皆这样,不止聊城。沿运河的农民远不如去运河远的。现在经济上的状况一落千丈了,只有当时造成的恶根性存着,妨害生活的发展。八股文化也无用武之地了,但仍用着旧精神妨害新文化的进来。”^{[1](P.372)}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出生书香世家,再加上天赋与勤奋,傅斯年走上了研究学术的道路,而祖父傅淦的不乐仕途、淡泊名利的人生观也深深影响了年幼的傅斯年,可以说傅斯年后来大力宣传自由主义思想,敢于抨击时政、远离政治中心与其祖父不无关系。同时因为家道的衰败,傅斯年无论在北大还是在英德留学都饱尝了求学辛酸,使得傅斯年少了几分传统官僚子弟的纨绔,多了几分对贫苦大众的同情。因此这对其以后提倡经济平等、铲除豪门资本、救济难民、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发展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另外,清末民初的鲁西北经济落后,传统的封建思想仍旧统治着这个地区,使傅斯年从小缺少新式文化的教育,而当傅斯年考入北大、接受自由主义思想熏陶以后更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之大和对自我的危害之深,这也令他成为五四时期反对传统文化的干将。

2. 求学于北大和欧洲接受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洗礼。

1913年,傅斯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的预科乙部,对文史等社会科学进行系统的学习,三年以后进入本科中国文学系。当时北大的文科为章太炎等传统经学家所统治,但同时蔡元培、胡适等新一代知识份子又给北大带来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因此傅斯年受到了传统国学和西方思想的双重洗涤,这对年轻傅斯年产生了双方面的影响。第一,傅斯年受章太炎等

人的反清排满思想影响较深,因此傅斯年从那时起就初步形成了大汉族主义和较为强烈的民族主义,这从他以后的政论文章中可以看出。第二,接受了胡适的英美自由主义思想。胡适是把傅斯年从传统文化阵营引入新文化阵营的直接导师。“当时的胡适除了用西方的科学方法研究学问外,还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傅斯年的文言文写的非常典雅流畅,但也懂得白话文的意义和道理,因此,一经胡适的启发和引导,便毅然投身于‘文学革命’的阵营。”^{[2](P.42)}他的好友顾颉刚也曾回忆:“傅斯年本是‘中国文学系’的学生,黄侃教授的高足,而黄侃则是北大里有力的守旧派,一向为了《新青年》派提倡白话而引起他的痛骂的,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3](P.210)}

如果说求学于北大只是对自由主义有一个间接了解的话,那么在欧洲的留学历程则让傅斯年对当时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

1919-1926年,傅斯年先后求学于伦敦大学和柏林大学。在欧留学期间,傅斯年广泛涉猎各类科学文化知识,而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度大不如前。但其思想已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对五四运动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主要体现在:第一,对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再抱积极支持的态度,而主张青年进行自我的改造。第二,他对德国的经济政策比较欣赏,认为英美的自由经济是自私自利的经济,其思想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德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较多,人民也有服从国家管理的习惯。因此,德国当时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对他有着较大的吸引力。

傅斯年在英德留学将近7年,而英德两国所奉行的不同的自由主义思想对傅斯年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传统的英国自由主义者奉行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一种典型的个人功利主义思想。但与英国不同的是,在德意志民族的观念中国家的自由、民族的自由才是自由的最高境界,而作为战败国的德国能在战后迅速恢复国力,让傅斯年深刻体会到了国家对经济干预所带来的巨大力量,他的内心非常希望能在在中国借鉴德国的成功模式。因此,可以说在英德留学的期间是其自由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

二、傅斯年自由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

1945至1950年,这是傅斯年人生中最后的岁

月,也是他自由社会主义思想最终确立的时期。傅斯年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位自由社会主义者,即坚持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融合,就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坚持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在经济领域要运用某些社会主义原则,要求经济平等,缩小贫富差距。

在《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一文中就集中体现了他关于自由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他认为,自由主义是美国革命和法兰西革命的产品,但是“整个看来,在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之后的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却因与资本主义配合而变质了……纯正的自由主义,尤其是偏于人道主义者,几乎全被赶入好事者的沙龙,作家的论撰,学校的课堂里去了”^{[4](PP.290-291)}。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大行“财产自由”,但“财产自由”的后果却带来了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人道主义的丧失。直到罗斯福当政期间,才改变了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利用的局面,开始用新自由主义理念指导经济领域的改革,而这些改革措施中不乏许多温和的社会主义成分。1941年,罗斯福在国会阐述了他关于自由主义的四大新理念即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傅斯年认为“免于匮乏的自由”即经济上的平等。傅斯年认为:“百年来,自由主义虽为人们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却帮助资本主义更形成了经济的不平等,这是即可恨的。没有经济的平等,其他的平等都是假的,自由也不是真的。但是,如果只问平等,不管自由,那种平等久而久之也要演出新型的不平等来,而且没有自由的生活是值得生活的,因为没有自由便没有进步了,所以自由与平等不可偏废,不可偏重,不可以一时的方便取一舍一。利用物质的进步(即科学与经济)和精神的进步(即人之相爱心而非相恨心),以促成人类之自由平等,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使命。”^{[4](P.294)}

他在《评英国大选》一文中认为二战结束后英国工党政府之所以能在选举中战胜保守党,正是走了一条温和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新自由主义的道路。这从工党的社会经济方案中就可以发现,因为“这方案比罗故总统的新政更多好几倍的含了社会主义,例如矿产国有、钢铁国有、内地交通国有、土地国管、银行国管、物资继续实行管制分配制等等,毫不含糊的是一个温和社会主义制度。”^{[5](P.297)}文中的最后则清晰体现了傅斯年对一个既拥有政治自由又具有经济平等的国家的强烈向往:“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

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所以我极其希望英美能做成一个榜样,即自由与社会主义之融合。”^{[5](P.297)}

三、傅斯年自由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

傅斯年的一生中,其参政而不从政的自由主义理念表现得特别突出。他多次拒绝国民党当局邀其参与政府的请求,反而多次以体制外的学者身份对国民党的执政弊端加以针砭;他既维护国民党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又痛恨国民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充分体现了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立场。

1. 维护国民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傅斯年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论证了当前国民政府的存在对于时局之重要。他认为“九一八”以来中国的危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内部文化崩溃,社会分裂,外部面临亡国之危险,“是若干倍危险于一九一四年的局面”^{[6](P.11)}。通过对时局的分析,傅斯年认为:“照这样形势,虽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忘,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所以好政府固是我们所希望,而没有了政府乃是万万了不得的。最可怕者,是中国此时大有没有政府的可能,因此在此时中国形势之下,能组织政府的花样是很少的。”^{[6](P.11)}

傅斯年认为国民政府必须存在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此时中国政府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国民党施政之成败另是一问题,然国民党在此时的中国中是比较上差有组织的一个政团,此外除共产党有一种潜势力以外,中国并没有第二个有组织的政团。请国民政府交出政权,固不易,而接受政权为尤难。”^{[6](P.12)}傅斯年认为国民党绝对不是一个完善的政党,但和当时其他政团包括共产党、安福系、研究系、政学系、江苏省教育会,以及皖系、奉系、直系等军阀相比则是最站得住脚的。如果国民党垮台,则中国更要增加十倍的紊乱。第二个原因则是认为国民党中央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三位领袖的个人品格,保证了国民党政权的稳固。文中谈到“汪蒋合作而以汪负政治责任正面的政府,似乎远不是在此日局势下的一个不好的事情。尤可顾虑者,是汪之行政院若塌台,我们颇想不出能更有一个政府出来,能够真有政府的效用。”^{[6](P.13)}

2. 揭露国民政府的腐败行为。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于1938年4月召开五届

四中全会,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吸收一部分有声望的社会名流,为抗日救国献言献策。傅斯年在1938年至1947年间连续四次被推选为参政员,在参政会上,他一方面积极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宣扬抗日必胜的道理,另一方面猛烈抨击国民政府内部各种腐败现象,这其中以抨击孔祥熙、炮轰宋子文这两件事影响最大。

1938年2月,傅斯年上书蒋介石,阐明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的弊端:第一,孔祥熙担任院长为外国所不满,不利于中国获取外援,从而影响抗战。“在孔院长任内,英美之财政协助事实上恐不可能也。按:历年来在中国之英美人士对孔院长颇多不满,尤以整理公债及施行法币两事,在宣布前上海市场紊乱十余日,为讥评之要点。当时各外报攻击不留余地,甚至伦敦、纽约报纸已有所讽刺。”^{[7](P.175)}第二,国人对孔祥熙所作所为深感失望,上至文武官僚,下至普通百姓无不怨声载道。傅斯年在信中说:“孔院长之实任院长,在国人心理中深感失望,其最近言语举止深致社会不安也。……若与之辩,则必举例曰:”若孔氏者,非贪污腐败之结晶乎?”其中是非,非斯年今日所深论,然既有此普遍的影响,似不可不留意其根源。且此评论不特在一般民众中为然,即文武百僚,亦多心怀此意,私下议论而不敢昌言耳。”^{[7](P.176)}第三,孔祥熙掌权不利于外交工作的展开。信中认为当时外交部长王宠惠绝不是努力用心之人,然而“其实王部长亦有不能尽负其泄泄之责任者。盖上有孔氏指挥自决,外长等于跟班。纵外长为用心之人,亦不能发挥其作用。且孔氏无权不揽,无事不自负,再积以时日,恐各部皆成备位之官,不只外交失其作用而已。”^{[7](P.177)}

傅斯年的质询提出后,轰动朝野,而蒋介石也迫于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宣布免去孔祥熙一切职务,从此孔祥熙的仕途之路到此终止。

孔祥熙下台后,蒋介石仍然用自己的心腹宋子文任行政院院长,虽然傅斯年对蒋介石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大不满意,但也无可奈何,只希望宋子文能比孔祥熙强一点。所以在宋子文上台伊始,傅斯年采取支持的态度。

宋子文上台不久,就制定了《黄金献金条例》,规定凡储存、购买黄金二两以上者,在兑取黄金时皆须拿出原额的40%缴纳给国家,而自己取得原额的60%。此条例一出,便在国统区引起轩然大波,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中产阶级,都大加抗议,但却得到了

众多普通大众和有识之士的赞同。傅斯年在其《黄祸》一文中也赞同这种做法,认为这是抗战以来政府第一次损害既得利益阶级的事,他认为和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既得利益阶级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实在太少,何况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国家,“在民生主义中,没有真正的经济自由,因而“契约”、信用等名词都非绝对性。换言之,“契约”、“信用”,发现了重大毛病,私而害公,政府应该有权修正。”^{[8](P.301)}他还大声疾呼:“要打仗,必须侵犯既得利益,要社会公平,必须侵犯既得利益,要实行民生主义,必须侵犯既得利益。”^{[8](P.304)}

但是,傅斯年这种美好的祈盼不久便被残酷的事实打碎。1946年3月,宋子文以行政院的名义颁布《管理外汇暂行办法》、《黄金买卖细则》,放开外汇与黄金市场,而后指令中央银行大量抛售美元外汇和黄金,宋氏、孔氏经营的公司则大量予以收购。此后,宋子文主持制定并颁布了《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将高利润物资的进口权留给官僚资本家。孔宋等官僚企业利用进口许可证,大肆进行非法进口倒卖活动,谋取暴利。结果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1947年初,终于酿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并迅速席卷国统区的“黄金风潮”。

此时,傅斯年分别在《世纪评论》、《观察》上发表《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和《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三篇文章,不断“炮轰”宋子文。傅斯年写道:“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唯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所以,今天能决定中国将来之命运者,必须会悟今天的政治的严重性不再党派,不在国际,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事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9](P.344)}傅斯年的连续抨击对已是焦头烂额的宋子文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宋最终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

3. 坚持不组党派。

傅斯年作为一个对政治高度关注的学者,始终徘徊于政治和学术之间,但是他参与政治完全是个人意志的体现,从不参与任何党派组织。谈到组党

的问题,傅斯年曾说:“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但办报也须三思,有实力而后可”^{[10](P.327)}。1947年3月,蒋廷黻曾致信傅斯年商量组建中国社会党,并起草了党纲并征求傅斯年的意见,傅斯年始终没有同意。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以后,陈诚也曾找傅斯年商谈组党事,傅斯年也没有答应。在傅斯年看来,政党有自己的党纲、党章、施政方针等一系列“契约”,就“契约”本身来说,它可能也只能照顾到多数人的意见、利益,但少数人的意见呢?并且一旦入党就要遵守这些“契约”,遵守“契约”就要泯灭“真我”,这仍没有摆脱对自己自由身的束缚。因此,不管是参加任何一个组织、党派都会遇到“契约”、“体制”的制约,所以要保持自由身只能是远离政府、政党等任何组织,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身最大限度的自由,从而独立表达自己的意愿。

四、傅斯年自由社会主义思想的欠缺

傅斯年自称是自由社会主义者,他一生的理念和实践也证实了他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但同时,他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在他的身上又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正统主义思想,因而在某些方面,傅斯年的思想也受这两者的制约。

第一,他始终坚持反苏反共。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是傅斯年一生最基本的思想理念,这种思想在抗战期间表现为对抵御日寇的坚定信心,而抗战结束以后则体现为强烈的反苏反共思想。作为一个爱国的历史学家,他对历史上俄国对中国的侵略怀有深深的戒心,而1946年《雅尔塔协定》中有关苏联侵害中国的主权的条约被曝光以后,傅斯年反苏的情绪达到了顶峰。由此及彼,傅斯年对中共的态度也由抗战时期的支持变成了坚决的反对,他认为中共和苏俄有密切的关系,受苏联的指挥和控制。中国共产党若夺取政权,将成为苏联的附属国和殖民地。我们不难发现,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严重影响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局势发展的理性认识,他把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简单的划等号,这样的观念是由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所决定的,即缺乏阶级分析的视角与观点,反映出其历史的局限性。

第二,他始终坚持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傅斯年出生于孔孟之乡,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忠孝节义观念在他身上表现得相当充分。这些思想观念制约着他,成为他为人处世的主要标准,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特别是对待国民党政权

地位的问题上,始终将国民党视为正统,而把共产党视为流寇。他对国民党腐败无能、专制贪婪的认识不可为不深刻,但他从没有脱离或背弃国民党,对蒋介石本人也是忠心耿耿,这种思想观念制约和影响了他自由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五、结语

从傅斯年的思想和行动中可以看出,“对于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自由知识分子来说,尽管他们对自由主义有着终极的、共同的价值认同,但是他们在实际运作层面上对一些重大价值资源的理解并非铁板一块。这些都使得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在学理层面上无法向纵深发展,在政治诉求上无法回应其它政治团体的严重挑战”^{[11](P.59)}。另外,自由主义思想经常与民族主义意识、传统观念等诸多因素相混杂,他们之所以选择自由主义,并非为了深层次的制度建构,而更多的是基于救亡及启蒙等工具性意图,这也注定了20世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参考文献]

- [1]傅斯年. 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A]. 欧阳哲生. 傅斯年全集(第1卷)[C].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
- [2]焦润明. 傅斯年传[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3]顾颉刚. 我与古史辩[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 [4]傅斯年. 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A]. 欧阳哲生. 傅斯年全集(第4卷)[C].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
- [5]傅斯年. 评英国大选[A]. 欧阳哲生. 傅斯年全集(第4卷)[C].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
- [6]傅斯年. 中国现在要有政府[A]. 欧阳哲生. 傅斯年全集(第4卷)[C].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
- [7]傅斯年. 上蒋介石[A]. 欧阳哲生. 傅斯年全集(第7卷)[C].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
- [8]傅斯年. 黄祸[A]. 欧阳哲生. 傅斯年全集(第4卷)[C].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
- [9]傅斯年. 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A]. 欧阳哲生. 傅斯年全集(第4卷)[C].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
- [10]傅斯年. 致胡适[A]. 欧阳哲生. 傅斯年全集(第7卷)[C].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
- [11]李广臣. 傅斯年政治思想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光 翟)

论吴德旋、梅曾亮与桐城文派在广西的传衍

陈春华

(苏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苏州 215006)

[摘要] 吴德旋、梅曾亮与“岭西五大家”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对桐城文派传入广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桐城文派传入广西,先后有两条路径,其一是吴德旋与吕璜一线,其二则是梅曾亮与王拯、龙启瑞、彭昱尧一线。

[关键词] 桐城文派; 岭西五大家; 吴德旋; 梅曾亮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68-04

吴德旋、梅曾亮与“岭西五大家”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对桐城文派传入广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朱琦的《日记所藏〈古文辞类纂〉旧本》中有一段文字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记载:“伯言居京师久,文益老而峻,吾党多从之游,四方求碑版者走集其门。先是吾乡吕先生以文倡粤中,自浙罢官讲于秀峰十年。先生自言得之吴仲伦,仲伦亦私淑姚先生者。是时同里诸君如王定甫、龙翰臣、彭子穆、唐子实辈,益知讲学。及在京,又皆昵伯言,为文字饮,日夕讲摩,当是时海内英俊皆知求姚先生遗书读之,然独吾乡嗜之者多。”^{[1](P.2462)}

吴德旋、梅曾亮与“岭西五大家”的关系,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也作了说明:“(吴)仲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2](P.2867)}

由此可见,桐城文派传入广西,先后有两条路径,其一是吴德旋与吕璜一线;其二是梅曾亮与王拯、龙启瑞、彭昱尧一线。

一、吴德旋与岭西五大家

吴德旋,字仲伦,江苏宜兴人。受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影响,对姚鼐仰慕不已:“侧闻今天下

为古文者,惟桐城姚惜抱先生学有本原,而得其正,然无由一置身其侧,亲承指教以为恨。”^[3]从此以后,吴德旋“一意宗法桐城,深求力索于子长、退之之义法。其论文专主于法,以为文之不可不讲于法。”“其为文优柔恬淡,洁而不芜,屈而不突,议论有根据,深造自得,几于自然,于古人法度无不合;而柔淡之思、萧疏之气、清婉之韵、高山流水之音,与归有光、姚鼐为近。”^{[4](P.221)}吴德旋40岁时“始获亲谒惜抱先生而请益焉”。^[5]“先生(姚鼐)以禅喻文,谓须得法外意。德旋闻之而若有证也,而先生亦深许德旋为可与言文”。^[3]“先生海之曰:子之论文主于法,是矣。然此学者之始事也,其终也,几且不知有法而未始戾乎法。子其归而求之周秦诸子及司马子长之书乎?德旋曰唯唯。”^[5]正是在姚鼐的精心指导下,吴德旋的古文风格倾于“优柔恬淡”,古朴典雅,与归有光、姚鼐非常接近。而且名望愈来愈高,“当乾隆季年,已以文学服海内”,^[6]“数十年来,宇内言古文家,罄才智,剏精神,各欲陵藉乎当世。惟桐城姚刑部为澹荡闲远,而一泽于渊醇。盖穷经主乎义理,时藉有宋大儒之书厚其养焉,匪惟熟讲于古作家律度,独有师承也。先生(吴德旋)文置诸刑部集中,殆无以辨,岂非探其源于至道之归,而博其趣味于浩乎?沛然长短高下之皆宜,于刑部无不合焉……刑部往矣,方今文章学殖,先生实巍然于斗之南。”^[7]

[收稿日期] 2012-06-21

[作者简介] 陈春华(1976-),男,江苏宿迁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吴德旋在文学上成就显著,在生活中也乐为人师,诲人不倦。“笃好论诗文,津津乐道而不厌。有能信受听从,无不以夙所闻于师友之训及平日辛苦于古人而仅有之者,倒廩倾困出之以相授,故成就弟子甚众。”^[4]当时,许多人都拜吴德旋为师。据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记载,师事、私淑吴德旋者有20余人,其中,吕璜就曾得到吴德旋的精心指点。吕璜“师事吴德旋,往复议论,深得德旋古文义法,为桐城嫡派。……粤西能古文者,实璜有以开其先。历主榕湖、秀峰两书院讲席十余年,以桐城古文义法倡导后进。其能得璜之真传虽无几,能传璜之义法者亦有人。”^[4]据吕璜自编年谱所记,吕璜与吴德旋相识是在道光八年,其时吕璜52岁,因会稽德清案褫职,在杭州滞留。“璜削籍当去,乃久不去,而使得邂逅先生,遂其平昔仰企,以止此文字趋。虽自顾才分蹇浅,万万无能为役,亦安得不踊跃欣抃,思出其臃肿不中绳墨之所有,以求进于大匠耶?”^[8]这一年,吕璜先以文就质于吴德旋,获益良多;又恰逢吴德旋经杭州返宜兴,吕璜于是邀请他来到自己的住所从桂山房,留住二十余日,畅谈古文义法。吴德旋回忆说:忆岁在戊子(1828年)之春,予授经甬上,君在杭州,于友人处见予文而善之,以其所撰述邮视于予,商榷可否。是年冬,予归途过杭州,造访之,宿留于其所居之丛桂山房二十余日,议论往复,益切深。自是予每过杭,必就与谈艺。君年少予九岁,予故弟畜之。及君别予而归,各以不得复相见为恨,然邮书通问讯无虚岁,几忘其为相隔五千里之远也。”^{[9](P.429)}正是由于吕璜与吴德旋在杭州的这次会晤,以及今后的不断交往与切磋,吕璜于“古文义法乃益窥其深”^[8],古文修养得到极大的提高,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古文创作理论。之后,吕璜将其与吴德旋在从桂山房的谈话内容条而记之,整理成册,这就是著名的《古文绪论》。《古文绪论》所收六十条语录涵盖面较广,多为心得之语,基本反映了姚鼐的古文理论要旨,成为吕璜回广西在书院讲学的重要内容。

应该说,吕璜之所以能够成为“岭西五大家”的领军人物和桐城文学传入广西的第一人,吴德旋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精神上,都给予了吕璜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吕璜曾经在给陈用光的信中写道:“然硕师既不可遇,其所为上继归太仆以追蹶唐宋名人之故,未之能窥。且方絀于吏事,亦无暇讲此也。削籍后,稍稍治旧业,获交宜兴吴仲伦明经,聆其绪论,然后知南宋以来,其理裕而未吐辞者务修词,而故示晦涩险诡佻巧以自矜许者,气暴不静者,虽一时负盛名,终无与于文章

之正轨。于是昭昭然若有以启其蒙矣。然自顾所尝试为之者,其庠隘蹇浅非惟无望于古人,且无以自侔于并世能文之列。间出以示明经,虽亦蒙谓为可,实未敢遽信其然。”^[10]吕璜自称其学习古文是由吴德旋启蒙的,虽然是自谦之辞,但吴德旋对吕璜的影响和点拨之功显而易见。这也集中体现在吕璜对吴德旋古文理论的继承与发扬上。

其一,吕璜和吴德旋都肯定“六经”是古文的典范。吕璜说:“六经之道简严易直,得其粹者为宇宙之正人。而发之于文,亦多浩然之气,而籀所矢合乎自然,即作者亦不知所以然也。”^[11]这显然是吴德旋所倡导的六经是文章本源的翻版,吴德旋说:“六经,圣人之文,其言至精至大,万物毕具。圣人既没,迄乎战国之时,诸子百家纷纷淆乱,惟孟子、荀卿采六经之文以著书,发明仁义礼乐之旨,粹如也,廓如也。自是厥后,作者代兴,而司马子长、韩退之杰然相望于千百年中,如山之有泰华焉。即其辞考之,违于道者亦鲜矣。盖古之为能文者,理莫畅于孟子、荀卿,法莫备于子长、退之。此四君子者,其文皆本于六经,由其道可以上达孔氏,后之学为文而求合于圣人之道者,舍四君子,其奚适哉?”^[12]而关于怎样由“四君子之文”上达“圣人之道”的路径选择,吴德旋在给吕璜传授古文义法时,作了明确的说明:“上等之资从韩入,中资从柳、王二家人,庶几文品可以峻,文笔可以古。人皆喜学欧、苏,以其易肖,且免艰涩耳。然此两家当于学成后,随笔写出,无不古雅。乃参之以博其趣,庶不流于率易。”^{[13](P.23)}由此可见,吴德旋深刻体会到,学习古文最重要的是寻找门径,掌握方法。而吕璜也牢记吴德旋的教诲,按照其所指引的路径潜心研究,终有所获。吕璜还将这一路径、方法运用到今后的书院教学中,为培养后进提供了方便之门。

其二,吕璜和吴德旋一样,注重古文义法,尊崇桐城为古文正宗。吴德旋“一意宗法桐城”,特别强调遵守古文义法的重要意义,“以为文之不可不讲于法。如弓之有规矩焉,如射之有彀率焉;虽曰神明,而变化之存乎其人。然欲舍规矩、彀率而别求所以神明变化之方,其究恐归于迷谬而无所适。”^[5]吕璜年轻时就倾心于桐城古文义法,“弱冠时,即闻古文一脉,惟桐城为正。顾年三十许,始得方侍郎文读之。及成进士,作令浙中,乃先后得读姚刑部、刘徵君两集,因以略识义法韵度之粹美。”^[10]吕璜在丛桂山房亲承吴德旋“口讲指画”之后,“于古文义法乃益窥其深。”^[8]从此,他开始埋头研究桐城派的文论,并在今后的书院教学中不断强化桐城古文的正宗地

位。“自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童而习闻者。然雅密固文，疏淡亦未必不文。吾人性有所近，习亦因之，及濡染既久，遂若各悬一鹄于意中，期以必至。苟不怠弃而毕殚其智力，则适肖。夫量之大小而皆有所成，子固之于班，永叔之于司马，途轨殊而所至则一，不相訾，亦未始不相入也。师承在近日惟桐城为正，由之而光益烂焉，则务加其膏尔。”^[14]

其三，吕璜与吴德旋都以韩愈、归有光作为学习的楷模。吴德旋十分推崇韩愈、归有光的古文，他曾说过：“德旋所为文去归熙甫尚远，何敢望入昌黎突奥，但生平志向实在于此。”^[15]吕璜对韩愈、归有光评价也非常高：“其（韩愈）所取材则自秦汉以上之书，莫不抉择浸淫咀之，而撷其粹精。夫是故成一家言，雄视百代如彼，其卓卓也。”^[16]“昔归太仆以古文雄一代，初读之若平平，反复把玩，始悟其揖欧曾而追史汉，乃神似非貌似也。”^[17]所以，吕璜“为文章必遵韩欧之正轨，其或岐而出者，虽有鸿才绚采足以惊动一世，视之若不肖也”。^[18]

吴德旋对吕璜的影响，不仅仅在古文理论方面的指导，还有精神上的鼓励。吕璜“尝欲治古文，苦无师承，又牵于事，不果为”。后来，二人在杭州相遇，一起探讨古文义法，吕璜深受启发，并坚定了回乡传播桐城古文理论的决心。吴德旋鼓励吕璜担负起恢复古文传统的重任：“德旋之所期于执事者蒙庄、史迁，以执事之宏才卓识而从事于斯，深以数年之功力，震川、惜抱宜可绍而兼也。……德旋闻桂海间往往平地孤岩拔起，削立千仞，造物者之为，至是而复，无以尚其气，郁积数千年，必有所属以发之者，今安知非执事邪？”^[19]吕璜并没有辜负吴德旋的期望，他在回乡后通过书院讲学，致力于古文传播，并以此报答吴德旋的知遇之恩：“贤子过杭，既拜大集之贶，春木出示手书，又感先生不鄙璜，而垂眷之者甚厚且殷。璜于此事诚无望矣，然僻处岭表，交游中或颇有志乎此。他日还山，得举所闻先生之训，广其流传，安必无知而为，为而竟焉者，持此以报先生，倘亦先生之所许耶？”^[7]吕璜回乡以后，不仅精心传授古文义法，而且注重培养士风和文风，得到朱琦、龙启瑞、王拯、彭昱尧等人的积极响应，在他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古文创作群体。他们以桐城派古文义法为指导，不断尝试创作，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为“岭西五大家”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梅曾亮与岭西五大家

梅曾亮在岭西五大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这么说，吕璜将吴德旋的古文理论带回广西，使得岭西五大家得以有机会全面接触桐城古文义法，因此吕璜也就成了广西传播桐城古文理论的第一人。但是，真正让广西桐城古文生根落地、枝繁叶茂的，离不开当时享誉京城、担负桐城派传承重任的大师——梅曾亮。

梅曾亮（1786 - 1856），字伯言，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原籍安徽宣城。他与管同、方东树、姚莹（一说刘开）并称“姚门四杰”，成为姚鼐的得意门生，姚鼐对他们也寄以厚望。道光二年（1822），梅曾亮考中进士；道光十二年（1832）入都任职，担任户部郎中，从此开始了其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京师交游活动。到了道光后期，由于刘开、管同相继去世，方东树、姚莹也久离京城，传承桐城派的重任自然落到了梅曾亮的身上。“当时异之与梅伯言、方植之、刘孟涂称姚门四杰。然孟涂、异之蚤卒，植之著述虽富而穷老不遇，言不出乡里。独伯言为户部郎，官二十余年，植品甚高，诗古文功力无与抗衡者，以其所得为好古文者倡导，和着益众，于是先生之说益大明。”^[20]梅曾亮一生的交游经历，对桐城派的发展、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京师的近二十年中，其文名远播，一时之间，“治古文者，必趋梅先生，以求归、方所传”，^[21]李详在《论桐城派》中所说：“至道光中叶以后，姬传弟子，仅梅伯言郎中一人，同时好为古文者，群尊郎中为师，姚氏之薪火，于是烈焉。复有朱伯韩、龙翰臣、王定甫、曾文正、冯鲁川、邵位西、余小坡之徒，相与附丽，俨然各有一桐城派在其胸中。伯言亦遂抗颓居之不疑。”^[22]（P.248）梅曾亮借助自身的学识和声望广泛传播桐城文法，使其周围形成了一个规模相当的古文圈子，其中江苏有许宗衡、鲁一同、邹鸣鹤，山西有冯志沂，浙江有邵懿辰，江西有吴嘉宾、陈学受，湖南湖北有曾国藩、孙鼎臣、刘传莹，广西有王锡振、龙启瑞、朱琦等。这些人并不都是单纯的文人，他们之间也并不拘于严格的师承关系，而是一个介于师友之间、亦师亦友、互相切磋的圈子。并且他们中一些人在当时及此后都有比较大的影响，于是桐城古文的影响也随着他们的流动而继续传播，最终从京师流衍至全国各地。故朱庆元说：“我朝之文，得方而正，得姚而精，得先生而大”，^[23]此说法确有道理。

梅曾亮在以文会友的交游过程中，对文学后进的指点颇多，其中对于桐城派的传播，意义最为重要的是岭西五家和曾国藩。岭西五家中，朱琦与梅曾亮的关系最为深厚。他在《柏视山房文集书后》一文

中记叙与梅曾亮交往相得益彰：“先生亦谓琦曰：自交吾子，天下之士益附”。文中还提到他自己“识先生差早”，结识梅曾亮在众人之先，并且“迹虽友而心师之”^[24]。道光十九年（1839）朱琦来到京师，结识梅曾亮并从其游。此后，龙启瑞、王拯、彭昱尧等人相继进京赴考，同时有意进一步求得古文真谛。王拯记载了在京中求学时与梅曾亮等师友相互论文的情形：“往时上元梅先生，在京师与邵舍人懿辰辈过从论文最欢，而皆嗜熙甫文。梅先生尝谓舍人与余曰：‘君等嗜熙甫文，孰最高？’而余与邵所举辄符，声应如响，盖《项脊轩记》也，乃大笑。”^[25]

此外，“岭西五家”的诗文中，有些批注也出自梅曾亮之手。例如彭昱尧现存的《致翼堂文集》两卷42篇中，很多文章都曾得到梅曾亮的点定。字里行间看似简短的评语，使彭昱尧得以及时弥补不足，如《谢氏家庙碑》《天穷子哀辞》等都是在梅曾亮的点评之下完成的，因而成为彭氏后期的代表作。^{[26] (P.45)}“岭西五家”从游于梅曾亮，在梅的悉心指导下，古文创作皆更趋成熟，文章风格日益显现。同时他们也与从学于梅曾亮周围的邵位西、冯志沂、吴嘉宾、余坤一等交往密切，相互切磋。“岭西五家”于梅曾亮处得桐城古文之法，桐城派遂流衍于广西之地，一时人文荟萃，蔚为大观。梅曾亮也对广西文人之盛表示赞赏，曾谓：“天下文章，其萃乎粤西乎？”^[27]

应该说，正是在吴德旋与梅曾亮的倡导、引导和指导下，已显衰态的桐城派才能在广西生根、兴起，直至确立“岭西五大家”这一文学群体的历史地位。当然，吕璜与朱琦也在桐城文派传入广西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纽带作用，成为了“五大家”其他成员学习桐城古文的领路人。

[参 考 文 献]

- [1] 朱琦. 自记所藏<古文辞类纂>旧本[A]. 怡志堂文初编(卷三)[C]. 同治四年运甓轩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 [2] 曾国藩. 王澧华校点. 曾国藩诗文集[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3] 吴德旋. 姚惜抱先生墓表[A]. 初月楼文集续钞(卷八)[C]. 光绪十年(1884)刻本.
- [4] 刘声木. 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M]. 合肥:黄山书社,1989.
- [5] 吴德旋. 七家文钞后序[A]. 初月楼文集(卷五)[C]. 光绪十年(1884)刻本.
- [6] 姚椿. 吴仲伦先生墓志铭并序[A]. 缪荃孙. 续碑传集

- (卷七十七)[C].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C]. 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69.
- [7] 吕璜. 与吴仲伦先生书[A]. 月沧文集(卷二)[C]. 桂林:桂林典雅铅印本,1935.
- [8] 吕璜. 自撰年谱[A]. 月沧文集(卷末)[C]. 桂林:桂林典雅铅印本,1935.
- [9] 吴德旋. 吕月沧墓表[A]. 月沧自编年谱(卷首)[C]. 道光二十一年刻本(北京图书馆年谱珍本丛刊本).
- [10] 吕璜. 上陈硕士先生书[A]. 月沧文集(卷二)[C]. 桂林:桂林典雅铅印本,1935.
- [11] 吕璜. 应未堂先生时文序[A]. 月沧文集(卷三)[C]. 桂林:桂林典雅铅印本,1935.
- [12] 吴德旋. 小岷山人文集序[A]. 初月楼文集(卷四)[C]. 光绪十年(1884)刻本.
- [13] 吴德旋. 初月楼古文绪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 [14] 吕璜. 答毛生甫书[A]. 月沧文集(卷二)[C]. 桂林:桂林典雅铅印本,1935.
- [15] 吴德旋. 答张皋文书[A]. 初月楼文集(卷二)[C]. 光绪十年(1884)刻本.
- [16] 吕璜. 陈厚斋文集序[A]. 月沧文集(卷三)[C]. 桂林:桂林典雅铅印本,1935.
- [17] 吕璜. 归春泉诗集序[A]. 月沧文集(卷三)[C]. 桂林:桂林典雅铅印本,1935.
- [18] 吴德旋. 月沧吕君墓表[A]. 吕璜. 月沧文集(卷首)[C]. 桂林:桂林典雅铅印本,1935.
- [19] 吴德旋. 复吕月沧书三[A]. 初月楼文集续钞(卷二)[C]. 光绪十年(1884)刻本.
- [20] 姚堂. 惜抱先生与管异之书跋[A]. 东溟文集外集(卷十)[C]. 同治丁卯安福县刊本.
- [21] 吴敏树. 梅伯言先生谏词[A]. 梓湖文录(卷六)[C]. 同治八年(1869)刻本.
- [22] 李详. 论桐城派[A]. 清文举要[C].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 [23] 朱元庆. 柏视山房文集跋[A]. 柏视山房诗文集[C]. 咸丰六年(1856)杨以增杨绍谷刻本.
- [24] 朱琦. 怡志堂文集(卷六)[C]. 桂林:桂林典雅铅印本,1935.
- [25] 王拯. 归熙甫项脊轩记后[A]. 龙壁山房文集(卷一)[C]. 岭西五家诗文集[C]. 桂林:桂林典雅铅印本,1935.
- [26] 张维,梁扬. 岭西五大家研究[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
- [27] 龙启瑞. 彭子穆遗稿序[A]. 经德堂文集(卷四)[C]. 岭西五家诗文集[C]. 桂林:桂林典雅铅印本,1935.

(责任编辑 晨 晓)

略论近代中国体育之肇始

朱 宇

(江苏教育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鸦片战争揭开了近代中国的序幕,近代体育运动也悄然而至。在洋务运动新式学校里,萌生了体育课程,当时称作体操,又称“兵式体操”;教会学校成为近代体育的主要载体,体育课程增加了球类和田径运动,建设体育场馆,召开运动会等等;青年会将体育运动从学校推向社会,召开全国运动会甚至远东运动会,建设更多体育场馆向市民开放,培养专业体育师资等等,使体育成为民众参与的生活内容。

[关键词] 近代中国; 近代体育; 教会学校; 青年会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72-03

1840年的鸦片战争,拉开了近代中国序幕,也开始了西学东渐的脚步。近代中国体育亦随着这步伐来到了中国。在近代中国,体育作为教育的内容才得到推广。本文试图从3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中国本土新式教育直接催生了体育;第二,教会学校是体育的主要载体;第三,基督教青年会推动体育传播,使体育成为大众的生活内容。

—

丧权辱国条约签订后,经历了炮火劫掠的清朝统治者,终于决定改玄更张,开办洋务。在洋务运动中,中国近代化开始起步,教育近代化亦随之开启,近代体育也悄然而至。

首先,洋务运动中文化教育革新成为仅次于开办工业的重要内容。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1863年上海设立同文馆,1867年,上海同文馆改名为广方言馆,移入江南制造局。到甲午战争前,洋务派官僚还创办的官办学校有上海电报学堂、江南制造局附设操炮学堂等。这些新式教育使学生们开始接触体育,那时的体育课程是以“体操”命名的。日后张君勱回忆自己在上海广方言馆读书时的情况,当时广方言馆四天读英文、三天读国文,读英文的四天下午“先生改课本,学生自修或者上体操课”^{[1](P.58)}。洋务官僚设立的

专供军事和工艺的学堂,多仿照外国同类学校设置课程,聘用外籍教员,一般都设体操课。

清政府设官办新式学堂的同时,传统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书院,也开始把西学引入教学内容。19世纪70年代后,出现了一批以书院命名,但教学内容,办学指导思想均不同于传统书院的新型教育机构,主要由中外绅商兴办,有格致书院、中西书院、梅溪书院等等。梅溪书院后改名为梅溪学堂,“举德、智、体三育而兼之,与东西洋教授之法多暗合者……有击球、投沙囊、投壶、习射、蹴鞠、八段锦诸课,分日轮流演习”^{[1](P.241)}。可见,梅溪学堂非常关注学生体育教学。最有特色的是,它的体育教学以发掘传统文化为主,诸如投壶、习射、蹴鞠等等都是中国本土竞技、游戏、民俗等等,与西方运动项目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新式教育呈现出近代体育萌芽之外,洋务运动与近代学校体育密切相关的重要方面是“练兵”。“练兵”是指“用西洋新式武器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套西洋式操练方法……,清政府倡导练兵,不仅是军事上的一项革新,而且也应该说是洋务运动的一个显著标记”^{[2](P.40)}。洋枪洋炮洋操,成为各省练兵及各级武备学堂的训练内容。洋务派新军先练英国

[收稿日期] 2012-02-28

[作者简介] 朱宇(1963-),女,安徽巢湖人,江苏教育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兵操,后又练德国兵操。到19世纪末,清军大多练习洋操。西方兵操的传入,对近代中国体育初期发展产生极大影响。近代学校的体育课程设置,是从兵式体操开始的。早期学校的体操教师,许多都是军人。这也是中国近代学校体育的特别之处。

洋务运动的重点是军事与科技,洋务派教育体制也受此影响。近代教育在西学中不占主体地位,体育在很长时间内是服务于军事的需求。它的名称叫“体操”(很长一段时间实为兵式体操)。这既是它赖以发展的基础,又是它想要全面发展的最大障碍,因为清末,体操,特别是“兵式体操”成为体育的全部,对学生的培养也是以“尚武”为目的,希望能够通过体育教育训练国民,拯救国家。这也造成对“体育”理解的局限性,限制了体育的发展。

二

当近代体育在本土新式教育体系中步履蹒跚时,在基督教会学校却是另一番景象。中国近代化新式学校是西方传教士首创的教会学校。1840-1900年,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教会学校发展很快,步步升级,渐渐发展成为小学、中学、大学的三段式学制模式;教会分散办学也发展成联合办学,并有专门管理机构“中华教育会”。教会学校是最早(大约是19世纪下半叶)提倡体育运动的,开始时学校是希望通过体育改善中国孩子体格较弱、体质较差的状况。随着教会学校的发展,体育运动被列入教会大学的正式课程中。教会大学自始至终都是体育活动的最为重要的传播基地,对近代中国社会亦产生了颇大的影响。这里以圣约翰大学为例看它的体育运动开展情况。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1897年创办的。创始之初的体育活动非常简单,“体育方面,无甚设备。一任学生自由。踢毽子、跳绳索,游纸鸢,皆通常之游戏也。晚餐之后,可出外散步,东西两面,有规定之路线。校址之南,为大广场。故无限制。惟七时半以前,必须一律返校。”^{[3](P.6)}1890年5月,圣约翰举行了第一次运动会,以后每年春秋举行二次,中国学校有运动会,实以此为开始。同年,在学生中组织棒球班。

1897年,圣约翰学校青年会成立,体育部设有广场一座,体育事业有了较为全面的发展。1898年,圣约翰成立学生体育会,开展网球、足球和田径运动。1904年4月,圣约翰与南洋、东吴、英华公学四校共同组织中华大学联合运动会。同年在苏州河岸购置

运动场地84亩,从此,田径赛及足球比赛都有了相应场所。1925年,远东运动会的全国预选赛就在该运动场举行。

20世纪头20年,是圣约翰大学的鼎盛时期,在此期间,圣约翰大学开展了近20项体育活动,并把全年分成网球、篮球、足球、垒球、田径等五个赛季,在国内外各种比赛中也获得很好的成绩。

1914年5月成立华东六大学体育会(圣约翰、南洋、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杭州的之江大学),经常组织各类比赛。

1915年,约大率先在国内开展篮球运动。

1917年至1921年,约大连续五年蝉联华东各大学网球锦标赛冠军。

1919年举行顾斐德纪念体育室奠基礼,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大学体育馆,建筑面积881平方米,建筑和购置运动器材耗资48900美元,体育室为二层,上层为室内运动场,有看台,下层为游泳池。

1921年,约大对所有学生实行两年强制运动制度。

从约大与近代教育关系上看,不难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体育作为正式的课程被列入教学之中,体育课程除了兵操之外,很重要的是球类与田径运动。第二,教会大学对引进及普及各类体育项目做出贡献。第三,不断进行体育设施及场馆方面的建设。第四,以运动会带动学生体育。第五,体育活动有组织、有体系,成立较早的是棒球、网球和足球等球队。

教会学校采用现代学制系统,体育完全作为现代教育的一部分出现在国人的视野中。

教会学校是以入侵的姿态进入的,是对中国文化与教育主权的践踏,所以,中国政府和民众始终没有完全接纳过它。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政府采取对基督教宽容政策。20世纪初到清政府被推翻之后,北京政府基本采取消极限制政策。1921年以后则实行取缔基督教学校和收回教育权力的政策。1922年甚至爆发了非基督教运动。所以,教会学校始终是处于在国人限制或反抗中。这对它自身的发展十分不利。圣约翰大学这所最早提倡体育,并有深厚基础的大学,到20年代后开始滑坡并一蹶不振。教会学校的体育传播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三

除了教会学校,基督教组织青年会也是传播体育的重要基地。

青年会以最初是英国商人乔治·威廉于1884年创立于伦敦。1851年青年会传入美国以后,发展成为以“德、智、体、群”四育为宗旨的新教社会活动机构,后组成青年北美协会,获得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财政支持,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传播基督教。20世纪初,美国基督教在华势力迅速发展与青年会运动兴起有直接关系。^{[4](P.363)}

1902年到1912年是青年会在中国成长期。1910年上海被确立为青年会全国中心,并建筑会所。1912-1922年是青年会发展时期,它的发展与它提倡“社会福音”思想有关系。它认为宗教不仅仅应该注重个人灵性培养,而且它有社会内容,所以青年会不仅局限于学校、它还深入社会,做了相当多的社会工作。而其工作重心之一即为体育。^{[4](P.370)}

对于青年会最初致力于体育传播情况,马约翰是如此评价的:“基督教青年会是活跃并热衷于现代体育的倡导者和创始者……,早年举办运动会和体育会是学校专有的。它的发展实在是低水平的,或者说谈不上什么水平,因为人们除了比赛时热闹一阵,对它实在缺乏兴趣,或者说仅仅在比赛的时候才有一些兴趣。于是基督教青年会引来播下了最初的种籽。1905年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共田径运动会在青年会组织下,在一个巨大的露天场地上举行了……。人们都成群结队地观看大会,观众大约有5000人,这个巨大的聚会具有共同的社会意图,它的效果和价值是什么呢?——它明显地促进一年一度运动会的召开,大大唤起了学校在校体育方面的兴趣。它同时表露出真正的民族和爱国的感情。”^{[5](PP.9-10)}

从马约翰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学校对于体育的传播有其局限性,而青年会则沟通了学校与学校、学校与民众,使得体育及其精神真正得以在公众中进行传播。下面以青年会在成长和发展时期的活动为例证,说明它对近代体育推广的作用。

1908年,上海青年会健身房和游泳池竣工,举办了一次室内运动会,并成立篮球会组织。艾克斯纳任青年会体育干事,他挑选20名青年进行训练,培养体育人才。这个训练班一度改名为“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专门学校”,利用上海青年会的健身房、游泳池、运动场进行教学。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之青年会和教会学校体育教师,他们经培训,从事专业的体育教学,推动全国体育的初期发展。

1910年10月18日-22日,青年会体育干事艾

克斯纳筹办了“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有田径、足球、网球、篮球项目,全国各地出席运动员150人,参观人数达万人以上,后被认为是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它以田径、球类等近代体育中较正规的项目及竞赛方法进行比赛。比赛未设清末流行的各种兵操器械操及游戏等项目,它标志着我国近代体育的一大进步。

1912年青年会开始进行卫生讲座,大力提倡开展篮球、手球等户内运动,并开始设晨操班、业余健身班、游泳班。

1916年,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此次远东运动会是远东各国青年会所共同发起的。

创办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该校以培养体育师资为宗旨。

1922年开始,中国民族主义思潮高涨,非基督教及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兴起,青年会发展遭到挫折。

青年会对于体育传播的方式有这样的特点:第一,全面的体育概念,对田径、球类和游泳事业的开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第二,致力于运动会的组织与推广,组织和参与各种国内、国际比赛,使近代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真正接轨。第三,建设了许多场馆,更好地向市民传播体育。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体育萌生于中国洋务运动中开设的新式学校和引进西学的书院中。但其并不占重要地位,并长期局限于“兵式体操”,这限制了体育的发展。而教会学校自始至终都是体育的载体并开展体育运动,体育课程除兵操外,有球类和田径运动,并不断有体育场馆、设施建成。青年会的全民体育观念极大地向社会、市民传播,推广了体育,使体育真正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生活内容。

[参考文献]

- [1]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 [2]夏东元.洋务运动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 [3]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J].档案与史学,1997(1).
- [4]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5]黄延复.马约翰体育言论集[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光 翟)

中国近代银行体系的建立及思考

陈国威

(湛江师范学院基础教育学院, 广东湛江 524037)

[摘要] 近代银行体制是近代工业化生产系统的核心。在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中国传统信用制度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以近代信用制度为运作机制的近代银行体系。而中国自己创办的近代银行的晚出,以及本国工业近代化的先驱人物——洋务派的领导人物对近代银行功能的误解,则是中国工业化历史的一个悲剧。

[关键词] 中国; 近代银行; 工业化; 洋务派

[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75-04

中国近代银行体系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新鲜产物,是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中新一环。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近代银行体系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心脏,如民国学者朱斯煌所言:“银行业一经发达,必操金融之枢纽、执工商之命脉。”^{[1](P.1)}近代银行体系作为近代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环,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近代社会的变迁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而近代银行体系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处于何种角色?这是本文所要论及的问题。

一、中国自己创办近代银行之前的中国金融体系

在中国自己创办近代银行之前,中国金融体系主要包括:钱庄银号、票号、官银钱号(局)及外国近代银行。前二者主要为私人经营,属民间金融;官银钱号(局)是清政府面对窘困的财政,由各省自发办起来的,或官办,或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但都由各省藩司直接管理;而外国银行是在《南京条约》之后由西方列强在中国设立的近代银行,其目的是以不平等条约等为护身符,操纵中国的金融,掠夺中国的财富,进行经济侵略。

1. 钱庄及银号。钱庄、银号的出现大约在明末清初。^{[2](PP.647-648)}其主要业务有:存款、放款、贴现、汇兑、买卖生金生银。有的银号同时还涉及收解官款,成为各省藩库、远库、道库的外库,并发行银票,

如胡光镛的阜康银号。钱庄以上海为最盛,上海钱庄有南北市之分,“南北两市,操赢制余,各有挟持”^{[1](P.16)}。其分五类,范围最大、势力最厚者是“汇划钱庄”,或称“大同行”,其余四类为“元”、“亨”、“利”、“贞”,是未入园之钱庄,不能轧算票据。钱庄银号虽在当时的金融体系占着重要地位,但由于资本、业务手段、经营方式等等因素,随着外国新式银行的入侵压迫,渐依附着外国银行。在近代银行兴起的潮流之中,其已成强弩之末,势必将渐被淘汰。

2. 票号。关于票号的起源,说法众多,但“比较可信的是发源于日升昌颜料铺的说法”^{[2](P.657)}。据说在乾隆嘉庆年间其由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创办,主要为“山西票号”,多为合伙组织。主要业务有:存放款、汇兑(官款存兑)、会票、代办捐官、择垫。主要是埠际汇兑,如1824年日升昌,就专营汇兑。由于票号主要经营的是官款承汇及京饷汇兑业务,基本上依赖官府,“中国向无银行,各省富商所设票号钱庄,大致虽与银行相关,特公家未设有银行相维系,则国用盈虚之大局,不足资以辅助。”^{[3](PP.67-68)}所以,随着近代银行尤其是大清银行的出现,靠官而盛的票号也逐渐走向消亡之路。

3. 官银钱局(号)。官银钱局,据记载是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兴起的。“官钱局之权舆,创始于二十年以前(即公元1893年),其时张文襄为广东都督,因该

[收稿日期] 2012-04-22

[作者简介] 陈国威(1968-),男,广东湛江人,湛江师范学院基础教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省缺乏现金,乃设官钱局,用全省收入为担保,以票援之富商,俾资流转。”^{[4](P.42)}官钱银号主要发行钞票、制钱等,用于解决市场现金不足及财政不足。

4. 外国银行。随着条约制度的逐步展开,外来经济入侵不断加剧,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环,外国近代银行也介入晚清信用贸易体系。其中主要有英、日、法、德、俄、美、荷等国,其中以英商丽如银行(即东方银行)最早,1845年4月于香港设分行;以英商汇丰银行(创于1867年,总行在香港)势力为最大,足以左右晚清之经济。它们主要业务包括:发行纸币、吸收存款、国际业务、贷款与投资。其中钞票发行不加控制,发行情况对外不公布。据统计,大清银行成立前后,各外国银行在华的发行总额约在1-2亿银元之间,而大清银行(清政府的央行)在1905年发行银两票53万余两,仅及其发行额的十分之一,晚清的财政金融状况可想而知。

人类历史上,新思想之产生总是先于新制度、新体制之产生。鸦片战争前,“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思想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思想,占着支配地位。而鸦片战争后,由于“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制夷患,必筹夷情”^{[5](PP.926,933)},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一番探索的基础上,“重商富民”的思潮开始蔓延。李鸿章认为:“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6](P.22)}薛福成言:“生财大道端在振兴商务”,“利用厚生之政,探本握要之图”^{[7](PP.260-261)}。陈炽也说:“富国强兵,非商曷倚?”“商务盛衰之枢,即邦国兴亡之券也。”^{[8](PP.12,38)}王韬在《英重通商》中说:“英之国计民生全恃乎商”;在《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中也说:“且夫通商之益有三,工匠之娴于艺术者得以自食其力,游手好闲之徒得有所归,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糗饩。”^{[9](PP.68,150)}而郑观应在其“以理性的自觉态度冷静地揭明中国必须改弦更张走西方发展工商业道路的”《盛世危言》中说:“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通血脉也。”“凡致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10](PP.604,614)}……这种重商思想之提出,无疑有助于中国近代银行体系之形成。而战后清政府财政危机又迫使时人苦思良策。铸大钱和发钞票是其中的两种主张。其中的“钞者,纸而已矣,以纸取钱,非以纸代钱也。”^{[11](P.123)}“不知钞法以实运虚,虽虚可实,大钱以虚作实,似实而虚。”^{[12](P.137)}这已具有近代金融货币之思想。而近代银行思想的提出,客观上又蕴涵了足以对整个近代中国金融体系提出颠覆性质疑的资源。“银行之盛衰隐关国本,上下远近,声气相通。聚通国之财,收通国之利,呼应

甚灵,不形支绌……”,“有此种种便益(按:指银行的便益),是民生国计所交相倚赖者也。”^{[10](PP.679,690)}“银行之责任在于整齐币制,划定价值,既不便于市侩之把持,亦有碍于官吏之中饱。”^{[3](P.68)}“银行必须速办。……一因已准俄国到京城各处开设中俄银行,户部附股五百万两,已画押。如中国不先自设一银行,势必中国利权一网打尽。故政府焦急,立待成功。……惟铁路招股借债,若无银行,势必棘手。……国势商情已逼到此境界”^{[13](P.12)}。这些思想,再加上对外资银行近代化经营方式的感性认识,无疑培植了近代中国金融体系变迁的土壤。

二、中国近代银行体系的建立

纵观整个晚清历史,可以看出当时晚清的金融体系显然已不适应近代经济的发展,观居当时金融界主体地位之钱庄银号,便可了然。1883年,上海金嘉记源号丝栈,因亏损款项银56万两,突然倒闭,钱庄被累及者共40家。1883年2月,上海钱庄开市,南市大小钱庄仅23家,较去年(1882年)少一半;北市仅35家,较前一年少三分之一。更令人吃惊的是,同年因受江西候补道胡光镛投机失败而牵累,上海78家钱庄关闭68家,南北市行号停业者达三、四百家,镇江60家钱庄倒庄45家。^{[14](P.469)}风波波及全国,出现了全国性的金融危机和商业危机,市面萧条,手工业、农业凋疲。而官钱银号(局)由于频发制钱与钞票,更成为“钱币膨胀,百物飞腾”状况的祸首之一。它们无限制频发的巨额铜元,充斥于流通领域,不仅造成金融风潮,造成货币价格、商品价格紊乱,且引起了社会混乱。而外资银行不仅在中国不加限制地乱发钞票,扰乱中国经济金融秩序,掠夺中国财富,而且囊括中国的国际汇兑业务、结算业务,操纵中国的对外贸易,成为西方列强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的中心机构。

由此,随着近代商业的展开,中国人自己创办近代银行已势在必行。正如盛宣怀《愚斋存稿》里所言:“中国银行亟宜创办,毋任洋人专我大利……非急设中国银行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1897年5月27日,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总行于上海开业,属商业银行。其也许是“官僚买办的金融机构”,或者是“山西票号的化身和准备偿付外债的厘金盐课收存所”^{[15](P.392)},抑或其成立破坏了国家银行的计划,^{[16](P.364)}但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近代银行,它所发行的钞票也是中国最早的由自己银行发行的钞票,揭开了中国金融发展史上新的一页。1904年,户部银行获奏准予北京成立(后改为大清银行);中国首家商办储蓄银行——信成银行总行于1906年9月11日

在上海南市开幕;1907年5月,浙江出现了第一家银行——浙江兴业银行;1907年12月交通银行在北京成立;1908年,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在上海成立;各省银行亦相继成立。这一批新式银行开创了我国自己创办近代银行体系的新局面,从此以后,中国近代银行体系逐步形成。其中,特别是大清银行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第一家国家银行与中央银行正式出现,意味着中国近代化银行体系已开始形成。大清银行业务主要为三大类:一为特别业务,即由于处于央行地位所发生的业务,包括:发行特权、经理国库及其他官款;二为普通业务,包括存放款汇兑及代收公司股款、发行票据等;三为救济市面。大清银行虽然还不能与当时西方各国的央行相比,但它确实在晚清扮演了中央银行的角色,力求维护中国金融体系的健全,寻求中国财政制度的完善,不懈地维护当时中国——晚清政府的利益,为中国的信用制度由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型跨出了关键的一步,为中国近代银行体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三、对中国近代银行体系建立的几点思考

近代银行在近代商业中十分重要。在文艺复兴时期,作为资本主义发源地之一的佛罗伦萨,“银行业与其羊毛贸易息息相关”。同时期的伦巴第总是“率先创立了大型金融商号”,以“发展世界性商品贸易”^{[17](PP.666-667)}。而在德国,“创办银行的运动早于该国政治和货币的统一进程,它汇入了广泛的海关统一和工业化进程的洪流中。”^{[18](P.77)}这都充分说明了银行业与近代化进程的利害关系。而作为中国近代化初级阶段的洋务运动,与近代银行体系关系如何呢?洋务派对近代银行的态度又是如何呢?假设近代银行在洋务运动时已经出现,是否会有另外一种历史发生?

洋务派标榜“自强新政”,开办洋务企业,进行洋务运动。可是,作为“纸糊的房子”^[19],洋务派其实只是从西方移植过来近代机器工业,而作为一个近代工厂所依赖的条件,如运作体系、管理体系和信用体系,洋务企业几乎没有。因而摆在洋务派面前的是一大堆问题,如人才、原料、运输、技术等,而最突出的尤其是资本危机问题,也即清政府是怎样去解决资本流通的问题。洋务派近代军事工业的资本,主要来自清政府财政拨款。而近代民用企业,除财政外还吸收了一部分官僚、地主、买办和富商们的投资,“据估计在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对近代工业的投资(包括军工企业的生产运作经费),累计大约在6500万两左右军用工业占四分之一以上”,即5000

万,民用工业占“1500万两左右”^{[16](PP.304-306)}。由于洋务企业大部分是由政府财政投入,因而生产的产品也就几乎由政府统筹分配,“不参加市场的交换”^{[20](P.500)},作为“占有使用价值,满足需要的手段”。也就是说,洋务运动缺乏一个近代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特别是能将民间资金纳入企业或工业运行的近代银行体系。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21](P.174)},这就迫使以工业化为目的的洋务企业必须依赖清财政之盈虚,一旦财政发生危机,企业的资金就失去了来源。而当时的晚清政府不仅有着一系列的高额赔款、外债及外债利息,而且海关权、路权、税率的制订等等皆受制于西方列强,财政情况岌岌可危,如“甲午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支出了巨额战争费用及偿付高达2.3亿两的战争赔款和赎辽款,财政陷入严重危机。由官方直接投资的洋务企业的兴建实际陷入停顿状态。1895—1899年兴办的三家军工厂总计投资仅11万两……有一批官办企业因‘经营累岁,所费不貲,办理并无大效’,被‘招商承办’”^{[16](P.306)},这也为洋务企业的灰暗前途埋下了伏笔。

在商业发展中,有三种前后相承的形态:第一种形态以物物交换(自然经济)为特征,第二种形态以货币(货币经济)为特征,第三种形态以信用(信用经济)为特征,而信用经济在近代银行的出现之后才始成熟。近代银行是信用中介机构,在商业发展中,它是以信用为媒介,收集社会闲散资金,再在信用关系的作用下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其资金在生产过程中是扮演借贷资本的角色,从而在生产流通领域得到剩余价值。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近代银行的支持,势必迫使洋务企业参与市场流通(其产品是否有市场另当别论),从而创造剩余价值。可以讲,没有近代金融体系的参与,是洋务运动企业受到极大影响的因素之一。科大卫曾经有言:“有关资本流通的制度,在中国是否已经充分发展,是否足以提供大规模使用新技术所必需的投资,才是‘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核心所在。”^{[22](P.61)}即是说,资本的流通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关键所在。资本主义生产也就是近代工业化的生产。而在近代中国,作为传统(或旧式)金融机构的钱庄、票号等,虽然在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经济的入侵,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发生了较多的联系,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但由于其自身制度上的种种缺陷,从而决定它们是不可能承担起将国民剩余收入(或言储蓄收入)纳入工业化生产中去之重任。何况,钱庄、票号皆私人性质,唯利是图的商人本性,也会促使它们以利为主。

其实,洋务派人物如李鸿章、郑观应、盛宣怀等,对近代银行是有所认识的。1886年,美国人米建威通过晚清驻美公使张荫桓,送给李鸿章一份最新的美国银行章程,并且提出了建立华美银行的计划。计划得到了李的认可,可惜最后在顽固派的反对下而流产。作为英商买办达30年之久的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中说:“夫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泰西各国多设银行,以维持商务,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总枢,以浚财源,以维大局……中国钱庄资本二、三万,放款数十万,稍有倒欠,呼应不灵……今为之计,非筹集巨款创设银行,不能以挽救商情,而维持市面也。”^[10](pp. 679-682)而在光绪廿二年九月,盛宣怀奏请创办银行时说:“中国银行既立,使大信孚于商民,泉府因通而不穷,仿借国债而代洋债,不受重息之挟持,不吃磅价之亏折……银行助于泰西,其大旨在流通一国之货财,以应上下之求给。”“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愚斋存稿》)可惜,“洋务派办银行的着眼点是:有了银行,一可以便于借外债,二可以便于发行货币,三可以解决洋务企业的资金需要。当时李鸿章还看不到通过银行来广泛聚集社会资金的重要意义……这说明他们金融活动的意图,与现代资本主义银行通过信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还相距很远”^[23](p. 118)。洋务派近代银行功能的观点也许是一种“狭隘的财政观点”^[16](p. 282),但毕竟这里面已有了近代金融思想的色彩。洋务派没有超越现实固然可悲,但中国自己创办的近代银行的晚出更是中国近代化史上的一个悲剧。

中国近代银行体系作为近代社会的一环,也是西方列强为蚕食中国而订立的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它的身上拥有殖民条约的烙印。也许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银行在近代中国并不是非常引人注目,可是在自然经济逐步瓦解的近代中国,它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它打破了外国银行对中国金融的垄断,削弱了外国银行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如发行钱币等),开创了近代公库制度,初步建立了近代财政,特别是会计公库制度,为中国近代金融业培养了一批金融人才(大清银行就拥有自己的银行学堂)。它在近代金融领域里开创了民族自我意识,促使中国固有的传统金融观念发生了变化,为能与近代世界金融体系接轨做出了努力。

[参考文献]

[1] 朱斯煌. 银行经营论(民国丛书第34册)[M]. 上海:

- 上海书店,1989.
- [2] 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 [3] 孔祥贤. 大清银行行史[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4] 马肃. 组织国家银行论[A]. 孔祥贤. 大清银行行史[C].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5] 魏源. 海国图志[A].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一辑)[C].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
- [6] 吴汝伦.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8)[C]. 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
- [7] 薛福成. 强邻环伺仅陈愚计疏[A]. 近代史研究所. 洋务运动(一)[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 [8] 陈焜. 庸书外编(卷上)[A]. 丁伟志,陈崧. 中西体用之词[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9] 钱钟书. 馥园文新编[C]. 北京:三联书店,1998.
- [10] 夏东元. 郑观应集(上)[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11] 许楣. 钞币论·通论[A]. 陈绍闻. 中国近代经济文选[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 [12] 王茂荫. 论行大钱折[A]. 陈绍闻. 中国近代经济文选[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 [13] 盛宣怀. 愚斋存稿(25卷)[C]. 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
- [14] 李允俊. 晚清经济史事编年[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15] 翦伯赞. 中国史纲要(下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16] 周育民. 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17] [美]詹姆斯·W·汤普森. 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18] [法]让·里瓦尔. 银行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19] 李喜所. 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反思[J]. 河北学刊,2001(3).
- [20] 戴逸. 洋务历史试论[A].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中国近代史论文集(上)[C].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21]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22] 科大卫.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J].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 [23] 洪葭管. 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A],周育民. 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光 翟)

江苏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产业分布的实证研究*

成谢军¹ 张 伟²

(1. 江苏教育学院经济系, 江苏南京 210013;
2.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十一五”期间江苏经济发展在全国处于前列,但江苏内部经济发展很不均衡,特别是苏南、苏中、苏北之间差距明显。本文试图从江苏人力资源在三大区域中的产业分布状况来研究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进而为江苏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提供建议。

[关键词] 江苏; 区域经济; 人力资源; 产业分布; 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79-05

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会第73届年会(1960)上,发表了“人力资本投资”的讲演,指出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的增加重要,确立了人力资本的重要地位。^{[1](P.4)} 人力资源作为一个政策概念,由于缺乏明确的统计识别标准,使得各研究者在采集数据时缺乏一个统一规范的标准,主观性很大,不但不能与国际接轨进行国际比较,而且国内各研究者之间也不能进行比较。^[2] 因此,在实证分析中,往往由于缺乏对“人才”的统计数据而无法提供具有较强说服力的论证。在本文研究中,我们以人力资源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为研究对象,试图证明人力资源分布与江苏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而为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分布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国内关于区域人力资源流动研究的文献回顾

人力资源是蕴藏于人体内的体力、知识、经验、技能等可以创造财富的能力,它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生产活动中的能动要素。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源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或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内关于区域人力资源流动(包括对劳动力、人才流动的研究

在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关于发达地区人力资源流动的研究。

关于发达地区人力资源流动的研究是国内关于人力资源区域流动的一大热点。杨上广等(2010)论证了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中劳动力迁移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相关性,并进而分析了人口迁移流动所产生的受教育程度影响效应、人才密度效应和城市化水平效应。^[3] 赵曙明(2009)以泛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为研究范围,指出应在建立有效的一体化人才培养和开发机制以及高等教育投资合作化、社会保障机制规范化和统一化、企业人才开发层次化和系统化的基础上,努力构建一体化的、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系统化和层次化的人才市场流动机制。^[4] 郑江淮等(2009)运用江苏省苏南苏中和苏北13个地级市1996年-200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市场的发展、劳动力的转移、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政府行为并不能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一致的影响,但却深受区域因素的影响。^[5] 付尧等(2007)以修正了的Solow模型为分析框架,利用广东和上海的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地区分割对区

*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破解之道”(项目编号:2011SJB790008)。

[收稿日期] 2012-04-20

[作者简介] 成谢军(1978-),男,山东菏泽人,江苏教育学院经济系讲师。
张 伟(1981-),女,山东济宁人,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讲师。

域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6]

2. 关于区域人力资源流动的经济学分析。

有部分学者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或模型对人力资源的区域流动进行了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分析人力资源流动的效应、成本、效益。宫禄尧等(2010)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系统分析了人力资源区域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认为人力资源区域流动是由个人收益、流动成本和环境效应3个因素所共同决定的。^[7]武增贵(2009)通过经济学模型对人力资源区域流动对流入地、流出地以及个人产生地效益进行了分析。^[8]王锐兰等(2006)运用进化博弈的方法分析不同因素对创新人才流动概率的影响。^[9]

3. 人力资源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或发展的相关性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刘冰(2010)从劳动力流动、企业区位选择与产业聚集,劳动力流动的区域增长效应,劳动力流动对我国区域差距的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就业效应,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回流及价格区域传递效应等五个方面得出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性结论,并对我国未来劳动力流动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10]李涛(2009)认为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提出应根据不同区域的具体实际,从确保劳动力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规范劳动力科学流动3个方面来推动区域经济增长。^[11]

王飞等(2006)从区域间劳动力流动的视角出发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12]许召元等(2008)也利用CGE模型(包含30区域),定量分析了区域间劳动力迁移的经济影响。^[13]

4. 关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流动的研究。

关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流动的研究成果相对比较少,实证研究也比较匮乏。岳红敏(2003)^[14]、马先仙(2002)^[15]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西部地区人才流动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张巧(2010)则从跨区域的人才流动角度,分析了东西部人才流动对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把造成人才流动现状的原因归结为历史因素、政策因素以及产业集聚等3个方面,并提出了加强东西部人才逆向流动的途径。^[16]

刘兰(2006)通过对我国不同区域、不同产业间就业压力的比较以及对外开放对就业机会影响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要充分发挥劳动力流动对地区间

人均收入水平均等化的促进作用,真正实现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17]

5. 关于人力资源流动原因的研究。

张再生(2000)指出,影响人才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宏观上看,人才所处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国家与地区就业政策、法律法规、用工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劳动力市场发育情况、经济发展状况等都会对人才的流动产生影响。从微观上看,工资、福利待遇等物质利益因素对人才流动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单位所属行业类型及职业类别对人才流动也有重要影响。同时,人才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和所处的人际氛围也与流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8]熊丙奇等(2006)对我国区域人力资源流动失衡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他们把原因归结为经济环境差异、收入差距;教育环境;政治法律环境差异;人文环境差异;科技环境差异;自然环境差异等6个方面。^[19]武博等(2006)通过在广东省、上海市、北京市、海南省等(除台湾、西藏外)28个省、市、自治区对白领阶层的抽样调查,分析了我国不同地区人才资源流动的动因,他们认为我国人才资源流动的动因对不同地区的人有显著差别,同时又存在一定的共性。^[20]熊丙奇等(2006)^[21]、沈国琪等(2009)^[22]还分别研究了教育对区域人力资源流动的影响。

二、江苏三大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产业分布的实证研究

本文所用数据中区域经济发展指标用GDP或人均GDP表示,人力资源分布用就业人员在3大产业中的人数表示。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2000—2010)。

我们对3个区域的人均GDP与就业人员在3大产业中的分布做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令 y_1 = 苏南人均GDP, y_2 = 苏中人均GDP, y_3 = 苏北人均GDP, x_{11} = 苏南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 x_{12} = 苏南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数, x_{13} = 苏南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数, x_{21} = 苏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 x_{22} = 苏中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数, x_{23} = 苏中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数, x_{31} = 苏北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 x_{32} = 苏北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数, x_{33} = 苏北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数。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1. 苏南人均GDP与就业人员在3大产业中分布的回归分析。

由表1(见表1、表2)和表2得回归模型为:

$$y_1 = 399.382 - 1.575x_{11} - 0.266x_{12} + 1.085x_{13} \quad (1)$$

2. 苏中人均 GDP 与就业人员在 3 大产业中分布的回归分析(见表 3、见表 4)。

由表 3 和表 4 得回归模型为:

$$y_2 = -1138.12 + 1.21x_{21} + 2.24x_{22} + 0.58x_{23} \quad (2)$$

3. 苏北人均 GDP 与就业人员在 3 大产业中分布的回归分析(见表 5、表 6)。

由表 5 和表 6 得回归模型为:

$$y_3 = 39.036 - 0.077x_{31} + 0.696x_{32} - 0.31x_{33} \quad (3)$$

三、结论及建议

根据配第一克拉克定律,人才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分布比例变化规律是:第一产业人力、人才资源所占比重不断降低;第二产业人力、人才资源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第三产业人力、人才资源所占比重终将超过第一、二产业。可见,人才流动和产业结构变化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根据上述统计分析得到的 3 个模型关系式,可以得知,江苏 3 大区域产业的发展与人力资源分布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苏南地区第三产业的人力资源绝对数量上虽然相对苏中和苏北偏低,但第三产业的贡献却明显超过苏中和苏北,这应当得益于该地区十年来所吸引的大量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苏北地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对人均 GDP 的贡献严重不足,特别是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拉动系数为 -0.31,反映了在这两大产业中人力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均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苏北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明显偏离,第一产业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急需向二三产业转移。因为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很大的组成部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自身素质的提高。经过一定的专业技术培训,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为第二产业所需的技术工人或第三产业所需的服务人员,可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改善。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增加可以提升劳动力技术水平,提高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增加创新成果,从而改变各产业间的从业人员数量的转换,进而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23]目前苏北正处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的阶段,二三产业也正在进行重大的结构调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吸引的人力资源数量并不少,但需要的是有一定教育基础的技术工人。而苏北农村居民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6.8 年,人力资源的素质偏低,影响了经济发展的质量。这不仅影响到了第一产业的发展,对第二、第三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这点在国内其他研究者的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根据徐晓刚的结论,

在 3 大产业中,苏北只有第一产业的中高级人才在全省同类人才中比苏南同类人才高出 3 个百分点,在二、三产业中,中高级人才则只是苏南苏中的 52.8% 和 33.1%。^[24]所以,对苏北地区的发展而言,要想进一步提高工业化水平、提升第三产业的比重,必须要培养、引进更多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因为缺乏人才支撑的产业必然是后劲不足的行业。高素质人才比例过低的产业势必会制约苏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所以,这一方面需要政府运用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也要实施合理的人力资源战略,改变各产业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提升二、三产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 [1] [美]舒尔茨. 人力资本投资[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 [2] 罗守贵,王爱民,高汝熹. 高级人才空间流动因素分析及建立反区域筛选机制的意义[J]. 地理科学, 2009(12).
- [3] 杨上广,王春兰. 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迁移流动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0(4).
- [4] 赵曙明. 泛长三角人才培养、开发和流动机制研究[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3).
- [5] 郑江淮,高彦彦. 从劳动力流动到区域产业转移——江苏双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机制分析[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9(4).
- [6] 付尧,赖德胜.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广东、上海为例[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2).
- [7] 宫禄尧,王成军. 人力资源区域流动的经济学分析[J]. 技术与创新管理, 2010(2).
- [8] 武增贵. 人力资源区域流动效益分析[J]. 中国集体经济, 2009(16).
- [9] 王锐兰,顾建强,刘思峰. 区域创新人才流动的进化博弈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6(5).
- [10] 刘冰. 我国人口与劳动力流动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J]. 科学与管理, 2010(3).
- [11] 李涛. 区域经济增长路径选择的再思考——以劳动力为视角[J]. 华东经济管理, 2009(7).
- [12] 王飞,郭颂宏,江崎光男.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劳动力流动——使用区域连接 CGE 模型的数量分析[J]. 经济学季刊, 2006(4).
- [13] 许召元,李善同. 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对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2).
- [14] 岳红敏. 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合理流动的措施[J]. 现

- 代企业,2003(2).
- [15]马先仙. 人才流动与西部人力资源开发战略[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2).
- [16]张巧. 加强东西部地区人才逆向流动的途径研究[J]. 现代经济信息,2010(4).
- [17]刘兰. 劳动力区域流动、就业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J].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 [18]张再生. 人才流动态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天津市为例[J]. 人口学刊,2000(1).
- [19]熊丙奇,黄培清. 我国区域人力资源流动失衡原因[J]. 河北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 [20]武博,马金平. 我国不同地区人才资源流动的动因分析[J]. 东岳论丛,2006(6).
- [21]熊丙奇,黄培清,全林. 教育对区域人力资源流动的影响与对策[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8).
- [22]沈国琪,陈万明. 基于教育因子的区域人才资源流动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17).
- [23]陈辉,沈正平. 人力资本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以苏北为例[J]. 科技经济市场,2006(9).
- [24]徐晓刚. 苏北地区实施人才战略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 唯实,2004(11).

表1 苏南人均GDP与就业人员在3大产业中分布的相关性分析

		苏南人均GDP (百元)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 (万人)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 (万人)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 (万人)
Pearson Correlation	苏南人均GDP(百元)	1.000	-.946	.977	.976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946	1.000	-.941	-.881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977	-.941	1.000	.974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976	-.881	.974	1.000
Sig. (1-tailed)	苏南人均GDP(百元)	.	.000	.000	.000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000	.	.000	.000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000	.000	.	.000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000	.000	.000	.

表2 苏南人均GDP与就业人员在3大产业中分布的回归分析及统计检验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B	Std. Error	Beta	t	Sig.	
1	(Constant)	399.382	204.670		1.951	0.99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1.575	.530	-.477	.2.970	.025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226	.306	-.248	-.739	.088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1.085	.326	.797	3.323	.016
	R	R Square	Adjusted R Square	Std. Error of the Estimate	Durbin-Watson	F
	.993(a)	.986	.979	22.91656	2.301	143.182

a Dependent Variable: 苏南人均GDP(百元)。

表3 苏中人均GDP与就业人员在3大产业中分布的相关性分析

		苏中人均GDP (百元)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 (万人)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 (万人)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 (万人)
Pearson Correlation	苏中人均GDP(百元)	1.000	-.920	.963	.970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920	1.000	-.986	-.940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963	-.986	1.000	.974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970	-.940	.974	1.000
Sig. (1-tailed)	苏中人均GDP(百元)	.	.000	.000	.000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000	.	.000	.000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000	.000	.	.000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000	.000	.000	.

表4 苏中人均 GDP 与就业人员在 3 大产业中分布的回归分析及统计检验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B	Std. Error	Beta	t	Sig.
1	(Constant)	-1138.12	511.9713		-2.223	.068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1.21	.784	.855	1.553	.071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2.24	1.217	1.517	1.845	.015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58	.795	.296	.733	.091
	R	R Square	Adjusted R Square	Std. Error of the Estimate	Durbin-Watson	F
	.981 (a)	.963	.944	25.01049	1.661	51.374S

Dependent Variable: 苏中人均 GDP(百元)。

表5 苏北人均 GDP 与就业人员在 3 大产业中分布的相关性分析

		苏北人均 GDP (百元)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 (万人)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 (万人)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 (万人)
Pearson Correlation	苏北人均 GDP(百元)	1.000	-.838	.989	.943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838	1.000	-.870	-.948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989	-.870	1.000	.970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943	-.948	.970	1.000
Sig. (1-tailed)	苏北人均 GDP(百元)	.	.001	.000	.000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001	.	.000	.000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000	.001	.	.000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000	.000	.000	.

注:从苏北人均 GDP(百元)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万人)的相关系数为 0.838,也反映出线性关系一般的特点。

表6 苏北人均 GDP 与就业人员在 3 大产业中分布的回归分析及统计检验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B	Std. Error	Beta	t	Sig.
1	(Constant)	39.036	153.621		.254	.008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077	.125	-.125	-.618	.059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696	.135	1.379	5.172	.002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310	.249	-.513	-1.247	.059
	R	R Square	Adjusted R Square	Std. Error of the Estimate	Durbin-Watson	F
	.993 (a)	.985	.978	8.80720	1.837	131.902

Dependent Variable: 苏北人均 GDP(百元)。

(责任编辑 光 翟)

建设工程监理的法律地位探究

黄 立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监察处, 江苏南京 210031)

[摘要] 对建设工程监理法律地位的界定,目前我国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学术界也一直有争论,主流观点有“中立第三方的观点”、“代理人的观点”以及“折中的观点”。将建设工程监理的法律地位界定为业主的代理人,既符合法理,也与最新版本的FIDIC合同条件中的观点相一致。

[关键词] 建设工程监理; 法律地位; 代理

[中图分类号] D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84-04

我国自1988年开始在工程建设领域实施建设工程监理制以来,历经20余年的发展,已基本趋于完备。但在建设工程监理制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对建设工程监理法律地位的界定不够明确,相关法律法规及合同范本的规定存有不相统一甚至是相冲突的现象,使得社会上对建设工程监理的法律地位就存在模糊的认识。

一、有关建设工程监理法律地位的观点

我国的建设工程监理制度自建立以来,对其法律地位的争论就一直存在,纵观建设工程监理法律地位的各种观点,主要有以下3类:

1. **中立第三方的观点。**^[1] 该观点认为建设工程监理是独立于业主和承包商之外的绝对公正的第三方,处于完全中立的地位,其不得有偏袒于业主和承包商中任何一方的行为。建设工程监理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监理业务,公正地处理业主和承包商双方的事务。当业主与承包商之间出现争议时,建设工程监理应从中立的立场出发,依照“公正、独立、自主”的原则进行调解;当争议调解不成提交仲裁时,建设工程监理应当承担公正的举证责任。此种观点的出现,缘起于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普遍存在于工程法律界。

2. **代理人的观点。**^[2] 此观点认为业主与建设工

程监理之间是代理法律关系,业主是本人(被代理人),建设工程监理是代理人,业主通过与建设工程监理签订的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对监理进行委托授权,建设工程监理作为业主的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以业主的名义为意思表示,行为的法律效果直接对业主发生效力。

3. **折中的观点。**^[3] 此观点认为业主与建设工程监理之间是委托与受托的法律关系,业主是委托人,建设工程监理是受托人,建设工程监理依据其与业主签订的委托监理合同,在业主的委托授权范围内代其处理事务。同时,建设工程监理具有中立第三方的职能,当业主与承包商之间有争议出现时,建设工程监理应按照“公正、独立、自主”的原则,从中立第三方的角度出发进行调解,当争议经调解不成提交仲裁时,建设工程监理应承担公正的举证责任。

二、对建设工程监理法律地位观点的评析

1. 中立第三方的观点评析。

首先,该观点认为建设工程监理相对于业主和承包商是完全公正独立的第三方,当业主与承包商之间出现争议时,建设工程监理要承担起类似于仲裁人的职能,对争议进行初步的判断,在争议进入仲裁或诉讼程序时还要承担公正的举证责任。从法律人的角度出发,每提及公正与独立,我们首先想到的

[收稿日期] 2012-04-20

[作者简介] 黄立(1984-),男,江苏徐州人,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监察处助理工程师。

是司法的公正与独立,因为法律人从内心里接受,只有作为公权力机关的司法机关才能做到相对的公正与独立,那么建设工程监理是否是一个公权力机关呢?事实上,似乎没有人会将建设工程监理与公权力机关划等号,那么建设工程监理就回归到私法范畴内的主体,即为一个普通的民事主体,将公正独立的职能赋予一个民事主体,使其超然于业主与承包商之外,其公正与独立的职能行使将会出现令人难以忍受的结果。于此,也许有学者会提及仲裁机构,仲裁机构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应该属于民事主体,那么仲裁机构为何可以公正独立地居中裁决呢?原因在于仲裁机构是争议双方充分协商并于合同中约定的争议裁决机构,是在双方充分了解信任前提下的选择结果,仲裁机构唯一的职能就是当双方将争议提交仲裁机构时,仲裁机构居中裁决,仲裁机构本身与当事双方并无其他关联关系;而建设工程监理则不同,建设工程监理是由业主单方聘请,协助业主完成工程建设目标的专业人员,代表业主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对承包商的建设行为实施监理,其与业主的关系不可谓不密切,允许建设工程监理公正独立地解决业主与承包商之间的争议,其公正独立性如何得到保证?

再者,从建设工程监理的取费来看,业主通过招标投标程序聘请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监理的费用完全由业主支付。要求建设工程监理在业主和承包商之间保持利益上的真正独立,这种“独立”对业主不公平,同时承包商也难以信服建设工程监理能真正做到独立,其结果只能是双方对建设工程监理都不信任,从内心不能接受建设工程监理的存在。持中立第三方观点的学者们也意识到这个状况,提出了折中的解决方式,即建设工程监理原有的工作内容和权利义务不变,其不但接受业主的报酬,在工程施工开始之时也接受承包商的报酬以期通过如此之方式达到中立的效果。这种方式看似合理,但在现实中却难以运行。第一,与建设工程监理制的初衷相违背。^[4]首先,业主之所以需要聘请建设工程监理,就是因为业主在工程建设领域的技术与经验不足,需要有专业经验的监理人协助以实现他与承包商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建设工程监理的专业优势平衡承包商的技术经验优势,克制承包商有可能利用其在技术经验上优势损害业主的利益,使得业主能够获得一个符合设计要求的工程项目成果。如果建设工程监理接受双方的聘请将再次打破专业技术经验优势的平衡,业主处于不利地位;其次建设工程监理如果接受业主和承包商双方的费

用,其在进行意思表示时“必然要为双方的利益行事,建设工程监理的中立地位非但无法保证,反而陷入维护双方利益的两难困境”^[4],这也是此种解决方式不可克服的最大障碍。第二,承包商分担费用的理由不充分。^[4]折中的主张还要求,在业主与承包商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时就共同选定建设工程监理。但目前的工程实践中,业主均是首先进行建设工程监理的招标,之后才会进行工程承包的招标。另外,建设工程监理在工程施工过程中还要承担监督者和项目管理者的职责。监督者的职责要求其对其承包商的工作进行审查和提出改进措施;项目管理者的职责要求其制作颁发相关凭证。监督者和项目管理者的职责原本都是应由业主来履行的,业主聘请建设工程监理代替自己来履行此项职责,而费用却要承包商来分担,对承包商来说显然不公平。

2. 折中观点的评析。

首先,此折中说赋予建设工程监理两种“身份”:其一,受托人的身份;其二,中立第三方的身份。在委托合同中,受托人的基本义务是依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当委托人有指示时,应尽可能地遵守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当在情势紧急时,受托人得变更委托人的指示,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负有事后报告义务。^[5]受托人具有忠实勤勉的义务,依照委托人指示忠实勤勉地为委托人的利益考虑,处理委托事务。而中立第三方的身份需要他从中立的立场出发,按照“公正、独立、自主”的原则处理事务,为双方的利益考虑,不偏不倚地公正处理双方的争议。如果建设工程监理兼具这两种“身份”,既要维护业主的利益又要为双方利益考虑公正地处理业主与承包商之间的争议,诚如体育比赛中需要建设工程监理既是一方的运动员,又是比赛的裁判员,明显是相互矛盾的也是不能为人所接受的双重身份。

其次,在上文中,通过对“中立第三方观点”的分析也可得知,建设工程监理的中立性是非但无法得到保证,也同时招致了业主、承包商及政府部门对其的不满。此折中说依然固守建设工程监理的中立性是不合时宜也是不能够成立的。

最后,从委托与代理的关系来看。委托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制度,《汉谟拉比法典》中就对其作了规定,然而罗马法并不区分委托关系与代理关系,而是将两者混为一体,认为委托合同必然含有代理权的授予。《法国民法典》即沿袭了这一传统,《德国民法典》之后,各国立法才将委托合同与代理权的授予区分开来,认为委托合同是产生代理权的依据,而代理行为则是为了实现委托合同的内容,代理制度在总

则中予以规定,委托合同则规定在债编之中,我国现行立法也采用此种体例。^[6]代理权是使以被代理人名义所为法律行为的效力直接归属于本人的法律上的权能。此种法律上的权能本质上是一种资格或地位,虽为独立的法律之力,但非属所谓的权利或能力。^[7]“代理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而使所产生法律效果效力直接及于本人,这是一种外部法律关系。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则是内部法律关系,外部法律关系要以内部法律关系为基础。”^[8]在委托合同中,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是内部法律关系,当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的指示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后,则在他们之间形成外部法律关系。1866年德国法学家保罗·拉班德发表了《依德国商法典完成法律行为时的代理》的重要论文,对委托和代理概念的区别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拉班德将代理制度中代理权的授予与基础法律关系相分离,认为委托合同关系只是形成代理法律关系的其中一种基础法律关系,承揽合同、雇佣合同甚至事务处理合同均可形成代理法律关系。^[9]委托关系并非全部都能构成代理权的授予进而形成代理法律关系,但绝大部分委托合同关系都可形成代理法律关系。业主与建设工程监理之间的委托监理合同,是业主对建设工程监理进行授权的主要方式,更进一步讲是对建设工程监理进行代理权的授予,最终会在业主与建设工程监理之间形成代理法律关系。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将建设工程监理的法律地位界定业主的受托人,业主作为委托人,在委托监理合同中对建设工程监理进行授权,建设工程监理在授权范围内实施监理。将业主与建设工程监理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基于委托监理合同所产生委托与受托的法律关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委托与受托的法律关系只是形成代理权授予的其中一种基础法律关系,并不影响将建设工程监理的法律地位界定为业主的代理人。持折中说的学者们将建设工程监理的法律地位依然定义为中立的第三方,这种中立的职能本身就与其受托人的身份相矛盾,非但没能给中立第三方观点的生存寻找到合适的理由,反而更加速了此种观点的消亡。

3. 代理人观点的论证。

通过对折中观点的评析,将建设工程监理的法律地位界定为业主的代理人,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即便如此,依然有学者对其提出了质疑。

有些学者认为,如果将建设工程监理的法律地位界定为业主的代理人,将无法保证其公正性与独立性,无法保证建设工程监理从公正的立场处理问

题,即中立第三方的地位。建设工程监理中立第三方的地位本身就存在缺陷,已在上文中予以详细分析,所以此理由不成立。

反对代理人观点的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建设工程监理是以自己的名义对建设工程项目进行的管理,尤其是对承包商的监督管理,其监理的法律效果直接归属于建设工程监理,并且建设工程监理要承担由自己的不当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63条明文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持此观点的学者的反对理由有三:其一,建设工程监理是以自己之名义,非业主的名义实施监理;其二,建设工程监理要对自身的不当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而非由业主承担;^[10]其三,建设工程监理实施的监理行为不仅有法律行为还包括事实行为,而代理实施的仅是法律行为。

笔者认为,首先,建设工程监理与承包商之间是监理与被监理的关系,但是建设工程监理与承包商之间并无直接的合同法律关系(法律上也不允许他们之间有任何经济利益关系),为何承包商愿意接受建设工程监理对自己实施监理呢?建设工程监理之所以有这种职权,源于业主与承包商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业主与建设工程监理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业主通过委托监理合同授权建设工程监理代表自己对承包商实施监理,承包商根据其与其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接受建设工程监理对自己的监督管理,建设工程监理与业主之间并无直接的合同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中规定的权利义务是用以约束合同双方当事人,因此,建设工程监理只能以业主的名义对承包商实施监理,若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监理将无法约束承包商。再者,我国《民法通则》确实规定“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这是针对第三人(即被代理人的相对方)来说的,第三人根据此条款的规定有权直接要求被代理人承担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代理人无须对被代理人承担责任,只是这种责任是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通过委托合同或其他途径确定的,与第三人无关。在监理制度中,将建设工程监理视为业主的代理人,则承包商即为第三人。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建设工程监理若有明显过失、指令错误、违反合同约定等行为,给承包商造成损失的,承包商都只能向业主提出赔偿,由业主向承包商承担责任。而后业主根据委托监理合同的相

关条款向建设工程监理追偿,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从承担责任的角度,业主与建设工程监理之间的关系恰好符合“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最后,法律行为是指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因意思表示而发生一定私法效果的法律事实;而事实行为,指事实上有此行为就可产生法律上的效果。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差别在于是否有发生当事人所预期的私法上法律效果之意思表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建设工程监理在实施监理过程中,有些行为,例如对隐蔽工程的检查,是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本文认为,监理基于其代理人的身份代表业主实施监管,类似对隐蔽工程检查的行为,是基于能够使业主获得所期望的工程质量的这一私法效果而作出的意思表示,是业主在委托监理合同中授予的代理权限范围之内应为之行为,是法律行为而非事实行为。

建设工程监理之所以会出现中立第三方的职能,与我国的监理制度在建立之初的各种内外法制环境有莫大的关系。首先,我国的监理制度是在参考国际通行的咨询工程师制度并以 FIDIC^① 合同条件为蓝本建立起来的,FIDIC 合同条件自 1957 年初版之后,历经多次版本修订。在 1977 年版 FIDIC 红皮书中,确是明确规定咨询工程师必须具有“独立性”(independent),但在之后的 1988 年版本的第 2.6 条第 d 款就将工程师必须具有独立性的规定予以删除,改为工程师应在契约条款规定内,并兼顾所有条件之情况下,作出“公正”(impartial)处理。在 1999 年版本红皮书中,直接将 1988 年版本的第 2.6 条第 d 款的规定删除,使工程师的角色逐渐向业主靠拢而失去其独立性,而只提到“按照契约作出公平(fair)的决定”^[3],同时将工程师定义为“雇主的人员”,完全否定了其独立于业主的可能性。此外,工程师原来在争端解决程序中的地位(类似于“仲裁员”的职能),也被争端裁决委员会(Dispute adjudication Board, DAB)所取代。我国监理理论的发展滞后于国际上通行的理论是造成目前之现状的主要原因。另外,我国在建立监理制度之前,对建设工程项目的监管主要由政府职能部门来执行,监理制度建立之后,

政府部门将本应属于公权力机关的一部分监管职能交由一个普通民事主体——建设工程监理来执行,这也是产生监理中立职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建设工程监理的法律地位只能是业主的代理人,其代理权限来源于它与业主所签订的委托监理合同中的约定,它不具备也不可能具有中立第三方的职能,若使其具有中立第三方的职能将会出现令人难以忍受的结果,即业主不愿意请监理,承包商不信任监理,政府和社会对监理的法定职责不满,监理必将处于一个极度尴尬的地位,甚至会成为业主、承包商甚至是政府部门承担法律责任的“替罪羊”。因此,应当将建设工程监理的法律地位明确界定为业主的代理人,这样作为普通民事主体的工程建设各方才能平等地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也才能公平地承担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 [1]王冠男,朱宏亮. 工程建设监理的法律地位及其公正性初探[J]. 建筑,2003(11).
- [2]许健. 监理工程师的法律地位及其与业主承包商的关系[J]. 建设监理,1997(4).
- [3]古嘉谔,刘志鹏. 工程法律实务研析(一)[M]. 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
- [4]朱玉华. 关于完善建设工程监理制度若干问题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 重庆:重庆大学,2004.
- [5]崔建远. 合同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 [6]余延满. 合同法原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 [7]王泽鉴. 民法总则[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 [8]黄立. 民法总则[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 [9]陈卫佐. 德国民法总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 [10]蔡福田. 一个被忽视的问题的误区—监理单位是业主的代理人吗?[J]. 建设监理,1996(2).

(责任编辑 光 翟)

^① FIDIC 是国际工程师联合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Ingénieurs Conseils)的法文缩写,中文称“菲迪克”。FIDIC 的本义是指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这一独立的国际组织,习惯上有时也指 FIDIC 条款或 FIDIC 方法。自 1913 年组建以来至 1998 年止,该联合会已拥有 68 个代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咨询工程师专业团体会员国,是被世界银行认可的国际咨询服务机构。我国于 1996 年正式加入。FIDIC 文本是 FIDIC 编制的一系列与建筑工程相关的示范合同文本的统称,因各文本的封皮颜色不同而被戏称为“FIDIC 彩虹族”(FIDIC rainbow)。

战国秦汉之际诸子学衰微析论*

杨思贤

(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诸子学在战国秦汉之际的衰微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课题, 过往的研究一般认为秦始皇“焚书”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这两种观点都偏重从政治史角度的考察; 若从思想发展的内在结构出发, 则可发现战国秦汉之际的诸子学发展经历了一个思辨性逐渐消退、结构性逐渐增强的过程; 结构性的增强说明子书要为即将或已经到来的新秩序建构存在依据, 而思辨性减退则消解了先秦诸子对旧秩序批判的特征, 最终导致诸子学的衰微。

[关键词] 诸子学; 衰微; 思辨; 建构

[中图分类号] B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88-07

在先秦时期风光无限的诸子学, 发展到西汉, 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败, 这是学术史不争的事实, 历来的汉代学术与中国思想史研究一直在探寻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本文则在立足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 尝试对这一问题提出新的解释。

一、两个传统论点的辨析

秦始皇“焚书”一般是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导致诸子学衰微的原因。关于“焚书”导致古代文化中绝的说法, 古今皆有辩驳。郑樵《通志·校讎略》云:

其所焚者, 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 皆归之秦火, 使学者不睹全书, 未免乎疑以传疑。然则《易》固为全书矣, 何尝见后世有明全《易》之人哉! 臣向谓秦人焚书而书存, 诸儒穷经而经绝, 盖为此发……自汉以来, 书籍至于今日, 百不存一二, 非秦人亡之也, 学者自亡之耳。^{[1](P. 1083)}

而在现代学术中, 胡适则较早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意见, 他在讨论古代哲学之中绝时曾言:

政府禁书, 无论古今中外, 是禁不绝的。秦始皇那种专制手段, 还免不了博浪沙的一次大

惊吓; 十日的大索也捉不住一个张良。可见当时犯禁的人一定很多, 偷藏的书一定很不少。试看《汉书·艺文志》所记书目, 便知秦始皇烧书的政策, 虽不无小小的影响, 其实是一场大失败。^{[2](P. 278)}

郑樵认为书籍在流传过程中的自然淘汰远过于秦火的焚毁; 胡适则从秦时政府的控制力角度推测书籍的保存程度。郑、胡二氏都强调了“焚书”政策影响的有限性, 而钱穆的研究则告诉我们, 即使“焚书”政策确实起了相当的作用, 但是诸子书则是各类书籍中受到影响最小的一类:

秦廷此次焚书, 其首要者为六国之史记, 以其多讥刺及秦, 且多涉及政治也。其次为诗书, 即古代官书之流传民间者, 以其每为师古议政者所凭藉也。再次乃及百家语, 似是牵连及之, 并不重视……故自西汉以来, 均谓秦焚书不及诸子。^{[3](P. 188)}

根据钱氏的论证, 触及现实政治的六国史记是焚书的首要目标, 而在学术文献中, 焚毁的重点是诗书古文, 而非代表后起百家新学的诸子书。另有学者指出, “焚书”的做法在先秦时期早已存在, 甚至

* [基金项目] 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诸子文献与东汉学术转型”(项目批准号:11CZW024); 江苏教育学院“优秀青年学者培养计划”资助项目。

[收稿日期] 2011-12-20

[作者简介] 杨思贤(1982-), 男, 江苏连云港人, 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 文学博士。

认为孔子感叹的“文献不足征”的状况就是“焚书”导致的^①。虽然这个推论目前还难以得到文献的普遍证实,但是秦国的情况却是如此。秦国焚书并非始自始皇,据《韩非子·和氏》记载:“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4](P.97)}秦始皇焚书固然有现实因素的触发,同时也是继承了秦国一贯的文化政策,这个政策的依据就是韩非所说的“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4](P.452)}。对以“诗书”为代表的“先王之语”的排斥,实际上却给了代表新兴学术的诸子学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我们知道,作为先秦学术的总结,《吕氏春秋》是诸子文献中唯一具有官方背景的子书,而它恰恰产生于具有“焚书”传统的秦国;秦国之所以能够强盛并进而统一的文化根基也是作为诸子之一的法家思想;而秦统一后,诸子皆立博士^②,更可见秦对诸子学的宽容。因此,秦始皇“焚书”对诸子学衰微的影响微乎其微。

与秦始皇“焚书”一样,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般也被认为是导致诸子学衰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个观点亦有继续辨析的必要。武帝为何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般的历史教科书都从西汉“大一统”的政治形势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需求这个角度作出解释,得出这是“必然趋势”的结论。但是历史的发展并非总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所谓“历史的必然趋势”其实充满了偶然性,在每个历史转折的关头,重要人物(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喜恶往往会对历史的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武帝之于西汉学术即是如此。在武帝之前,从高祖立国到文景之治,儒生们(或者有儒家学术背景的士人)一直试图利用自己的学说或政策建议对当政者施加影响,希望这个来源于平民阶层的新兴政权能够按照儒家的理论运转,从陆贾、叔孙通到贾谊莫不如此,但是由于缺乏最高统治者的首肯,儒家学说始终未能在诸子中脱颖而出,景帝时齐诗大师辕固生与黄生的争论就是典型例子:

(辕固生)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

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5](PP.3122—3123)}

汤、武伐桀、纣是否合理,这是一个在先秦时就颇为流行的话题。辕固生作为儒学大师,他对这一问题的解释继承了先秦儒家孟子和荀子的观点;而作为守成之君,好“黄老”、喜刑名的景帝在内心中自然倾向黄生的意见,但是又要为刘邦代秦寻找合法性的依据,所以他也不能公然批驳辕固生。但是所谓“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实际上就是把“取消问题”作为问题的答案,用回避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儒家“受命放杀”的理论终因帝王的反感而暂时消歇。辕固生又因为讥讽《老子》为“家人言”而差一点命丧好“黄老”的窦太后之手,更说明了最高统治者个人的好恶对学术走向的影响,而文景之后,儒家在诸家中脱颖而出无疑与汉武帝个人的“好儒”有重要关系。

“好儒”与“抑黜百家”是紧密关联的,因此,对武帝“好儒”原因的探究就成了解释“抑黜百家”的前提。与普遍采用的从“大一统”的政治形势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需求这个角度作出的解释不同,钱穆的观点则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带来了启发:

丞相卫绾之徒,皆椎朴非学士。武帝以十七龄少主,初即位,制诏贤良,已卓然有复古更化之意,比必有所由来。考《史记·儒林传》:“兰陵王臧,受《诗》申公,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即位,臧乃上书宿卫上,累迁,一岁中卫郎中令。”郎中令掌宿卫宫殿门户,职属亲近……是王臧尝傅武帝,特见亲信。帝之好儒,渊源当在此。^{[3](P.196)}

钱氏认为武帝“好儒”与他的老师王臧出身儒家有关,亦即与帝王个人所受的教育有关,应该说,这个观点与西汉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西汉皇室特别重视对贵族子弟(尤其是太子)的教育,这应该与贾

^① 钱存训言:“焚毁书籍的方法,实际上早已为一些封建诸侯所采用,因为早在春秋时代,已有文献不足征之感了。”钱存训:《书于竹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② 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考证曰:“殆诸子、诗赋、术数、方伎皆立博士,非徒六艺而已。”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5页。

谊的大力提倡有关,而贾谊本人也两次担任皇室的师傅^①。在著名的《治安策》中,贾谊就认为暴秦的覆亡与其皇室教育的失败有关,并进而阐述了皇室教育的重要性:

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从者,是不法圣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6](PP.3676—3684)}

贾谊在《治安策》中的许多建议都是针对暴秦的改弦更张,重视皇室教育,注意对接班人的培养,就是他非常重视的一条。贾谊在《治安策》中同时提出了教育的内容,即理想中的“三代文化”。《诗》《书》《礼》《乐》是三代文化的代表,它们也是三代时期的教育内容^②,而我们同时又知道,至少在战国中晚期,儒家就被认为是这些经典文献的直接继承者,《庄子·天下》曰:

(古之学)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7](P.1067)}

儒家并没有像墨家那样的固定的组织结构以及一以贯之的学术理论,所依据经典的一致性(五经)是儒家唯一能够确定的标识,因此贾谊所提倡的三代文化教育其实也就是儒家教育。

西汉皇室推行儒家教育的效果在汉武帝身上得到了初步的体现,但是在董仲舒对策和卫绾建言的武帝初年,皇室和社会的主流思潮仍是“黄老”,所以力推儒术的王臧、赵绾皆被迫自杀,征召而来的鲁诗大师申公也被病免。虽然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已经从理论上详细阐发了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必要性,但是武帝还是认识到了强制推行儒术、罢黜百家可能会招致崇奉“黄老”的势力的反扑,而公孙弘切实的建议使他选择了一种更加策略性的措施,即将施行于皇室的儒家教育推广到整个国家的教育制

度中,并与仕进制度挂钩。《史记·儒林传》载:

(公孙弘等曰)……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5](PP.3118—3120)}

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初置五经博士,而公孙弘的建议(此奏当在元光年间,前134—前129)使得五经博士的设立真正成为西汉学术发展的转折。由先前的诸子皆立博士到专设五经博士,并且官方为其设置弟子,使得发源于战国稷下的博士由顾问的闲职转变为职掌国家意识形态、对备选官吏进行教育的学官。至此,汉代整个的国民教育内容被儒家崇奉的经典垄断^③,而官员的选拔又以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为标准。武帝并没有选择像秦始皇那样极端的文化政策,他没有对诸子学术实行打压,事实上,先秦诸子之学在两汉的传承始终不绝如缕^④,但是在“大一统”的帝国中,诸子学未被官方教育体系和仕进制度容纳,无疑是对发展的沉重打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抑黜百家”与“独尊儒术”并非同时施行的政策,并不是并列关系,“抑黜百家”应该是“独尊儒术”所导致的自然结果。

二、胡适观点的启发与局限

“焚书”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从政治变迁的角度出发对诸子学衰微作出的解释,但这个问题毕竟应该是思想史的课题,因此从思想发展内在逻辑展开的考察就成为当务之急。研究仍然从过往学术的回顾开始。在现代学术中,胡适较早从思想本身对先秦诸子学的衰微作出解释,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末章《古代哲学之中绝》中有如下表述:

现今且问:中国古代哲学的中道断绝究竟是为了什么缘故呢?依我的愚见看来,约有四种真原因:(一)是怀疑主义的名学,(二)是狭义

① 贾谊先后为长沙王太傅与梁怀王太傅,其被贬与召回后都担任皇子师傅,固然由于其博才多学,恐怕亦和其大力提倡皇室教育的态度有关。

② 《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

③ 王国维先生考证,汉代除了较高级别的五经教育之外,普通学校传授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尔雅》等小学之书,另外就是《论语》《孝经》这两部儒家经典。《汉魏博士考》,第179页。

④ 柳诒征先生在其《中国文化史·两汉之学术及文艺》章中对先秦各家在两汉的传承有详细的举例,可参见。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61—362页。

的功用主义,(三)是专制的一尊主义,(四)是方士派的迷信。^{[8](P.280)}

《中国哲学史大纲》乃是胡适根据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修改扩充而来,其前后研究的旨趣一脉相承。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对他的研究对象和目的有明确说明:

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这篇文章是要研究中国哲学的最初期,特别是关于哲学方法的发展。因此,这一研究的主题构成了中国古代逻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9](PP.4-11)}

胡适要从思想本身来研究哲人或学派,而不是其他外缘因素,具体来说,就是每一位哲人或学派的知识思考的方法。胡适很明确地认为,先秦诸子学在中国哲学史乃至整个思想史上独树一帜的主要标志就是诸子们知识思考的方法——逻辑思辨——而不是其他。胡适为古代哲学(即诸子学)之中绝所找出的四个原因是否能组成一个有效的解释体系,我们将在下文进行讨论,而在这之前,首先需要对诸子知识思考的方法——先秦逻辑思辨的发展作简单的梳理考察。

众所周知,在古代文明研究领域,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的“轴心时代”(Axial Period)理论颇为风行,为理性文明的发生研究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立场。雅斯贝斯指出,在经历了史前和前理性时代之后,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段时期内,在世界范围内,各大文明区域几乎不约而同的发生了理性的启蒙,“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10](P.10)}。而在中国文献中,《庄子·天下》对这段历史的总结最为精辟:

古之人其备乎!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7](PP.1067-1069)}

《天下》篇的作者所悲叹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首先导源于因西周末天下秩序变动而造成的王官失学,《史记·历书》曰:“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侯,或在夷狄。”^{[5](P.1258)}这种情形并非是生于汉代的

司马迁或者刘向、歆父子的历史想象,作为古典文化集大成者的孔子已经相信了这样的说法,《左传·昭公十七年》:“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11](P.1389)}

王官之学的散落自然导致作为平民学术的代表的诸子学的兴起,面对以三代文化为代表的旧有秩序的崩溃,诸子们的智慧被极大地激发,开始对先前世界和固有观念展开大胆的怀疑与批判,对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对人类自身有了全新的理解。他们讨论的方法——也就是胡适所强调的知识思考的方法——则基本上就是就各个命题展开逻辑思辨,这从诸子发展的顺序上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

关于诸子出现的先后顺序,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我们认为,由于先秦去今久远,文献与实物遗存均是零星散落,因此,从考据学上断定诸子的年代顺序几无可能,在这种背景下,以各家思想的内在逻辑来推定应该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李零有如下的判断:

儒、墨相诋是正统和异端,批判和反批判的关系,彼此对立,道是对立的超越……关于儒、墨、道三者的关系,我的看法是,如果不管具体的“人”或具体的“书”,从思想发展的脉络讲,从大的潮流和趋势看,正像《老子》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们的关系是儒一、墨二、道三。^{[12](P.292)}

我们认同这样的判断。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无疑是最先出现的诸子学派,所谓“正统”,无疑是因为他们直接继承了三代文化,他们开出思想的方式是对代表三代文化的“六经”进行整理、重新编排和诠释,而非建立在破坏基础上的重建,西方学者指出,在“轴心时代”所发生的“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中国的方式和态度最为温和,即是指此。但是继孔子而起的墨家的阐述思想的方法却与早期儒家很不同,他们并不对古代经典进行重新诠释,而是通过对早期儒家所提出的概念进行批驳辨析来展现。我们在《论语》中看不到孔子对其他学派的批判,但是《墨子》中却是大量的对孔子的言论主张进行的概念对称式的反驳。到了《孟子》(也许从“七十二子”时代就已开始),儒家打破了早期的“温柔敦厚”,对墨子、杨朱等展开了激烈的回击。而老子虽然像一个孤独的智者在一旁独语,《老子》全书几乎都是无头无尾、背景缺失的片段箴言,但它其实“是采取釜底抽薪的方法,绕到孔子的后

面,跳到孔子的上面,用更具终极思考的东西,贬低它、消解它、超越它、包围它,把它浓缩在自己的概念里”^{[13](P.13)},可见《老子》的针对性依然很强。而到了诸子后期,我们所熟知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等文献,都是通过对其他学派乃至本学派内部的其他派别进行批驳辨析而展开自己的思想。这些学派之间的发展线索之所以在逻辑上有比较清晰的线索可循,正是由于他们知识思考的方法基本上采用逻辑思辨——对先前或同时的其他学派或者本学派内部的其他派别所提出的概念主张进行辩驳——此刻对先前进行辩驳所得出的结论,又成为后来辩驳的起点。

现在让我们回到胡适为诸子学中绝所列出的四条理由。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除了第四条理由“方士派迷信的盛行”之外,其他三条其实都可看作诸子逻辑思辨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或者三种类型。比如所谓的“怀疑主义的名学”,胡适分析到:

在哲学史上,“怀疑主义”乃是指那种不认真理为可知、不认是非为可辩的态度。中国古代哲学莫省于“别墨”时代……看那些人所用的方法和所研究的范围,便可推想这一支学派,若继续研究下去,有人继长增高,应该可以发生很高深的科学和一种“科学的哲学”。不料这支学派发达得不多,便受一次根本上的打击。这种根本上的打击就是庄子一派的怀疑主义。因为科学与哲学发达得第一个条件,就是信仰知识的精神:以为真理是可知的,是非是可辩的,利害嫌疑治乱都是可以知识解决的……到了庄子,忽生一种反动。庄子以为天下本没有一定得是非,“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因此他便走入极端的怀疑主义,以为人生有限而知识无穷,用有限的人生去求无穷的真理,乃是最愚的事。^{[8](P.280)}

胡适受十九世纪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极为深刻,所以他比较偏爱墨子、惠施和公孙龙等倾向科学验证的思辨类型。但是我们认为,“信仰知识的精神”对于科学来说是前提,但是对于哲学来说却并非必需。《庄子》的“怀疑主义”也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庄子》内七篇已经建构起比较完整的思辨体系,也就是说,他在用思辨的方法反对思辨的立场或风尚,其本身就是思辨的一个阶段,他的内在体系展现了思辨的一个类型。所以,即使我们认同胡适对《庄

子》立场的判断,但也无法直接推论出所谓的“怀疑主义”对整个先秦诸子的逻辑思辨有遏制作用,因为在先秦,并没有政治权威为庄子的主张作支撑,“墨辩”等与《庄子》只是平等的并列关系,后者并非是前者消解的原因。胡适提出的另两条导致诸子学中绝的理由:“狭义的功用主义”和“专制的一尊主义”(主要是《荀子》和《韩非子》),亦可作如是观。因此,对于诸子学中绝的原因,我们必须另寻可以贯通的内在理路。

三、思辨性与建构性的消长:诸子学衰微的一种解释

胡适对惠施、公孙龙等有极高的评价,而他们的“名辩”之学也确实是诸子逻辑思辨的顶峰,但顶峰其实也往往是衰亡的开始,我们考察的目光就从他们身上展开。《庄子·天下》曰:

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卵有毛……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曰天地其壮乎!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7](PP.1105—1112)}

这里列出的“卵有毛”等二十余个命题,都带有浓厚的诡辩色彩,而从《天下》篇作者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论辩的内容在惠施、公孙龙那里已经退居到了次要的地位,重要的是能够达成“天下辩者相与乐之”、论辩“终身无穷”的效果,获得“胜人”的满足。此时,正如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所说,“语言和事实发生了分离,成了纯粹运思的符号,进而,辩者把这些符号任意挪移,并有意识地违反语言约定俗成的内涵与外延,使变异的语言本身成为哲理思辨的内容”^{[14](P.193)},成为了真正的“离事而言理”。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以“六经”为文献载体的三代文化的重要特点是“事理结合”,章学诚所谓“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即是此意,“六经”中类似“殷鉴不远”的观念所在多有,因此,惠施、公孙龙(也包括墨翟、魏牟、邓析等人)的这种极端的“离事而言理”,与传统的历史思维,有着极大的落差;不仅如此,战国中后期的时势也要求各家的理论

能够给现实开出可资借用的良方^①，所以这种“职业论辩”招致了普遍批评，《荀子·非十二子》认为它器、魏牟、惠施、邓析等人的论辩“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却又批评他们“好治怪说、玩琦辞”，“泉乱天下”^{[15](P.91)}；而《战国策》虽然是以言辞著称的纵横之士的教科书，却也有“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16](P.119)}的感叹。这一切都向我们表明，诸子以思辨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人们对宇宙、社会和自身的思考需要运用新的方法，开启新的方向，而其代表文献，就是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

先秦诸子的逻辑思辨以批判为手段，以破坏和解构为主要目的，为了战胜对方的学说，他们的论辩经常出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情形乃至“诡辩”的局面，而《吕氏春秋》的情况却是：在它的行文里，我们几乎见不到那种在先前诸子中普遍存在的智慧且犀利的辩驳，相反，它却广泛征引其他各家各派的言论主张来为自己的理论大厦添砖加瓦。根据徐复观先生的粗略统计，《吕氏春秋》之中引述《诗》十五、《逸诗》一、《书》十、《易》四、《春秋》、《论语》、《孝经》各一，言音乐者多与《乐记》相通；提及孔子二十四次、墨子六。孔墨并称八、孔墨弟子多次、老子四、孔老并称一、庄子二、列子二、詹何三、子华子五、田骈二、尹文、慎子、田子方、管子各一、与邹衍密切联系之黄帝者十一、邓析一、惠施六、公孙龙四、白圭三、神农、后稷各二、孟荀提及思想而未出其名多次^{[17](PP.1-2)}。统计的数字表明，《吕氏春秋》确实体现出了一种对三代经典与诸子百家的大融合姿态，而这种融合又不仅体现在文献引用的形式上，更体现在它对新的宇宙、社会和人生体系的建构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关于“十二纪”的设置。“十二纪”依照天道循环往复，以四季十二月为纲，建构起一个能够包容万物、沟通古今的解释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宇宙时空、社会历史、物候天象乃至人生道德伦理，都可以得到有序的安置。正如《吕氏春秋》的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此书“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

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而这个体系的建构，却是综合了道家、阴阳家乃至儒家的思想和数术方技的知识为基础的。先前的诸子们通过思辨去怀疑乃至破坏旧有的秩序，《吕氏春秋》则通过融合出新来建构新的秩序。两相比较，诸子书的思辨性明显消退，而结构性显著增强。

这种融合与建构是主动的，但是我们不免要对这种主动性背后的原因作一番探究。首先，融合来自沟通，来自各家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多。这种沟通不仅是地域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②，更是由于相互论辩所产生的借鉴、吸收与创新，批评乃是沟通的开始，比如脱胎于道家的《韩非子》中就有《解老》《喻老》这样的文章，说明了法家对道家的批判吸收。

其次，思想与理论的出新离不开知识的拓展与进步。战国时期数术方技的极大发展为新宇宙观、人生论的建构提供了知识基础。我们知道，《吕氏春秋》新体系的建构与以邹衍及其后学为代表的阴阳家的思路有莫大关联，而在《汉书·艺文志》中，阴阳家被分别置于《诸子略》“阴阳家”和《数术略》“五行类”，所以陈振孙说“阴阳之于数术，亦未有以大异也”，他们是“此论其理，彼具其术”^{[18](P.369)}，由此可见思想与知识之关联。

再次，建构是由于原有体系的缺失。我们知道，作为诸子的开山，在孔子及早期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不足，那就是缺乏对“形而上学”的建构，他们的目光比较多地关注于现实世界中的道德伦理和治乱得失，在关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评价体系，但是这个体系却并没有所谓的“终极依据”作为支撑，子贡曾经感叹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19](P.184)}，而这种对本体论建构回避的态度也被处在儒家对立面的老、庄、墨、韩以及名家所继承，在群经及大部分诸子文献中犹如空谷足音^③，而《吕氏春秋》的建构则在理论上弥补了这种缺憾，虽然《吕氏春秋》建构的宇宙体系和道德体系并没有

① 这与胡适所提出的“狭义的功用主义”有所区别。荀子、韩非等人的理论虽然是“功用主义的”，但是它们仍然有自足的思辨架构，仍是一种理论学说。导致一种理论消亡的并不是另一种理论本身，而是另一种理论背后所代表的现实诉求。

② 这方面的研究，以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最为详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另可参考严耕望：《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李零：《先秦诸子的思想地图》，《何枝可依》，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③ 杨树达先生在其所著《论语疏证》之《凡例》中说：“《论语疏证》，首取《论语》本书之文前后互证，次取群经诸子及四史为证，无证者则阙之。老庄韩墨说与儒家违异，然亦时有可发明孔子之意者，赋诗断章，余窃私取义尔”，故其书对先秦两汉文献中能于《论语》发明者广征博引，但于“性与天道”之说下却付之阙如，可见此说的寂寥。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23页。

被汉儒完全照搬^①，但它对建构风尚有滥觞之功。

《吕氏春秋》之后最重要的一部子书当属《淮南子》，虽然《淮南子》的理论基础、思想来源与建构目标与《吕氏春秋》都不尽相同，但是其变思辨为建构的特征却与《吕氏春秋》一脉相承，甚至其自我期待都与《吕氏春秋》极为相似，其《要略》云：

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20](P.700)}

到了西汉建立，随着天下形势的稳定，这股发端于战国末期的学术建构风潮愈发显示出它的优势和必要性，因为它启发了整个知识阶层在一个全新社会环境中的学术努力方向：为这个亘古未有的全新帝国寻找合法的依据。而具体到诸子学，这种方法论上的建构倾向又逼出了“定于一”的思维模式，所以尽管先秦诸子之间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显而易见，但是司马谈在论述他们时，却要以“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5](P.3288)}来开头，为他们找出最终的一致性。当然，这种思维模式最明显的体现当然是《汉书·艺文志》：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21](PP.164—165)}

这段对诸子的总论最核心的观点是强调诸子乃同出于古王官之学，仍然是强调他们的一致性的一面，无论是刘向、歆父子还是班固，都试图将异彩纷呈的诸子纳入一个可言说的、稳定的结构中，虽然这个关于古王官之学的体系虽非空穴来风，但其基于西汉现实诉求的建构色彩仍然十分浓厚。“定于一”的观念发展到《汉书·艺文志》的阶段，已经显现出从思想变为意识形态的趋势，思想和意识形态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思想可以讨论，是非标准不一，而意识形态则只能被证明是正确的。既然是王官之学分裂之后的碎片，那么，在汉代的新王官之学——也就是意识形态——经学建立之后，诸子存在的学理依据就被消解了。在同一个结构之中，在

“定于一”的大背景下，学术的努力方向是解释这个结构的合理性而非质疑、批判它，诸子在汉初的衰微是不可避免的，而它的下次兴起则需要这个结构或者这个结构所支撑的秩序再次发生危机之时。

[参考文献]

- [1]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
- [2]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3]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A].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4]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6]王先谦.汉书补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7]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8]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9]胡适.先秦名学史(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 [10][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1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2]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 [13]李零.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 [1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 [15]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6]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增补本)[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 [17]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18]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9]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20]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1]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责任编辑 南山)

^① 战国秦汉之际的儒家对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建构体系有所增饰和发展，定型于董仲舒。参见钱穆：《〈易传〉与〈小戴礼记〉中之宇宙论》，《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38页。

白居易诗歌本体论命题之内涵、价值及经学影响^{*}

刘疏影 吴建民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 “根情”、“实义”说是白居易诗歌本体论的基本命题,这一命题将诗歌本体确立于感情与思想的基础之上,从而完善了古代诗歌本体论。“根情”、“实义”说既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又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不但揭示了古代诗歌的本质特征,而且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白居易的诗歌本体论也受到经学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 诗歌本体论; 命题; 经学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95-03

“命题”是建构古代诗学的重要理论形式,这一形式因其具有稳定的理论内涵和显著的表达效果,而为历代诗论家所乐于使用,并导致古代诗论史上大量命题的出现。白居易作为古代诗论史上的重要理论家,其诗学思想主要就是通过一系列命题的提出而表现的。如论述诗歌本体时,他提出了“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命题^{[1](P.960)};论述诗歌创作时,提出了“感于事”、“动于情”、“形于诗”等命题;论述诗歌功能时,提出了“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裨补时阙,救济人病”、“以诗相勉”^{[1](P.1370)}、“以诗相慰”^{[1](PP.960-965)}和“讽君海臣”^{[1](P.2)}等命题,这些命题构成了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系统。而在白居易的诗论体系中,本体论是最重要的内容,因为白居易的其他诗论都在本体论的基础上展开并受其影响。白居易从情、言、声、义4个方面阐释对诗歌本体的看法,而核心思想是“根情”、“实义”说,这一核心思想既有丰富之内涵,又有重要之价值,并与经学又有密切关系。

一、“根情”、“实义”说之内涵

“诗者根情”这一命题是白居易对诗歌本体的最基本看法。此命题强调诗歌以情为根,其基本内涵主要有三:一是说诗歌之“根”在于情,“情”是诗歌之本体所在,有情才有诗,无情亦无诗;二是说诗歌的

内容是诗人之情,诗歌是根于诗人之情而作,“情”是构成诗歌的基本内容;三是说诗歌以抒发表现诗人之情为使命,诗歌就是要表现诗人之情,诗人若有审美感情,必然借助诗歌而抒发表现。由于这3种内涵揭示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最本质特征,因而,“根情”说也就成为古代诗歌本体论的最典型命题。

对于以情为根的诗歌本体论,白居易从诗歌创作论和诗歌功能论两个角度进行了有力论证。《策林·六十九》云:“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在白居易看来,诗歌的创作过程是:感于事——动于情——形于诗。诗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简单摹写,只有在“感于事”之后,才能“动于情”,最终“形于诗”,“情”是诗歌创作的核心和关键。《与元九书》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白居易认为,诗歌具有“感人心”的功能,“情”是实现这种功能的重要保障,有情,诗歌才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由此可知,“情”作为诗歌本体,对诗歌创作和诗歌功能来说都是关键因素。因此,白居易将“情”提到诗歌之“根”的高度,是基于对诗歌创作和功能的深刻认识。

“实义”说是白居易对诗歌本体的又一重要看法,此观点认为诗歌以“义”为实,强调了思想意义对

^{*}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经学与古代文学批评理论”(项目编号:10YJA751088)。

[收稿日期] 2012-04-10

[作者简介] 刘疏影(1988-),女,江苏南京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吴建民(1955-),男,安徽亳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于诗歌本体的重要性。“实义”说的基本内涵主要也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认为“义”为诗歌之本体。“义”即思想意义、义理道理,诗歌包含着思想意义、义理道理,“义”是诗歌构成要素的基本成分。二是认为思想意义和义理道理的表达是诗歌的基本使命,既然“义”为诗歌之“实”,诗歌创作就离不开对“义”的表达,以诗达义是诗歌创作之使命。三是表明“义”为诗歌的内容,“实义”之诗,其深刻之思想意义、深远之义理道理必然是诗歌的基本内容。

白居易提出“实义”说,立足于他对创作实践及诗歌功能的深刻认识。就创作实践来说,中唐时期社会问题日趋严重,一些社会责任心强的诗人,如元稹、李绅、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在创作诗歌时,都表现出了对社会问题的热切关注和深沉担忧,诗中“义”的成分日渐突出。在此背景下,白居易提出“实义”说实属正常。另外,他认为诗歌是“感于事”而作,诗中必然要表达所感之事的义理道理,他的讽谕诗中就有多篇对“事”之义理的议论,50首《新乐府》、10首《秦中吟》,都是“感于事”而作的“实义”之诗。对于诗歌功能,他提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裨补时阙”等观点。在《读张籍古乐府》一诗中又说:“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此诗宣布了白居易的诗歌功能主张:以诗“讽放佚君”、“诲贪暴臣”、教化“悍妇仁”、“薄夫敦”,一句话,诗歌要服务于国家和社会。诗歌要有这种功能,必须是达“义”之作,这样的诗歌又必然以“义”为实、为本。白居易持这种诗学主张,提出“实义”的诗歌本体论,是很自然的。

二、“根情”、“实义”说之价值

虽然“根情”与“实义”说都是白居易诗歌本体论的基本命题,但由于内涵不同,所揭示的诗歌本质特征不同,其价值也不同。

“根情”说之价值主要有二。第一,强化“情”对于诗歌的本体意义,准确抓住了古代诗歌的最根本特点。白居易之前,以情为本的诗歌本体论已经诞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吟咏情性”^[2](pp. 270-271)、“诗缘情”^[3](p. 71)等,都是针对诗以情为本体而提出的重要命题。但“根情”说将情上升为诗之“根”,从诗之“根”的高度肯定情对于诗的决定性作用,是白居易的独特贡献。“根情”说吸收并超越前人的思想观点,将诗之本体牢牢确立于“情”的基础上,不但进一步强化了情对于诗歌的本体意义,而且揭示了中

国古代诗歌的最根本特点,因为抒情诗作为三千年中国古代诗歌的主流,都是以情为根。第二,为诗歌创作论、功能论等提供了理论依据。就创作论而言,情为诗之“根”,诗歌创作亦应以情为本,白居易说“动于情,形于诗”,这种创作原理实以“根情”之本体论为根基,因为诗人若无“动于情”,亦难以“形于诗”。就功能论而言,“根情”说揭示了诗歌打动人心根源所在。《与元九书》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诗歌之所以具有打动人心的功能,关键在于情。诗中有情,则有“感人心”之功能,无情之诗,也就不可能具有“感人心”的功能。

实际上,“根情”说不但在古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在当代亦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对于当代人认识、欣赏、研究古代诗歌具有指导意义,它告诉当代人,对古代诗歌的欣赏、研究必须紧紧抓住情这个“根”;另一方面也启发当代人,诗歌及所有的文学艺术创作只有以情为“根”,才能产生打动人心的无穷力量。

“实义”说之价值主要有四:一是此论的提出打破了“诗言志”和“诗缘情”的两极格局,使中国古代诗歌本体论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白居易之前,诗论家论诗或倡“诗言志”,或主“诗缘情”,亦有情志兼论者,然皆离不开情、志二端。白居易则把“义”纳入诗歌本体论领域,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古代诗歌本体论,使之得到进一步完善。二是强调了思想意义、义理道理对诗歌的重要性。在白居易之前,人们对思想意义、义理道理在诗中重要性的论述不多。事实上思想意义、义理道理本来就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内容,或者说“义”本来就是中国古代诗歌之本体。自《诗经》以来,楚辞、汉乐府、建安诗歌、南北朝及初盛唐诗歌,都有大量的“实义”之作,只是诗论家们主要关注情、志二因素,而忽略了对诗歌之“义”的关注。白居易提出“实义”说弥补了前人的不足,强化了人们对诗歌中思想意义重要性的认识。三是顺应并影响了诗歌创作的发展。自魏晋文学自觉以来至盛唐时期,诗歌创作一直以“尚情”为主流。到了中唐,由于社会趋衰,当时主要诗人的诗歌如元白之诗、韩孟之诗、柳宗元、刘禹锡、李贺诸人之诗,均充满对时局政治、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诗中的达“义”成分日趋渐浓,白居易的“实义”说正顺应了这一诗歌创作潮流,是对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理论概括。另外,在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的中唐,白居易从理论上对诗歌提出“实义”的要求,强调诗歌必须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并通过“实义”之诗的创作而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引起统治者的重视,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不失为一种积极而现实的诗学态度,体现了儒家经世致用的诗学观。四是此论对于各种形式主义创作倾向都具有批判意义。“实义”说强调诗歌必须要有积极充实的思想意义,按此要求创作,就能有效地避免单纯追求形式美的形式主义创作倾向。

实际上,“实义”说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值得提倡。因为思想意义不但是当代理论家对各种形式文学艺术作品的基本要求,也是当代文学家、艺术家创作时所应恪守的共同原则。空洞无实之作亦是无用之作,只有“实义”之作才有服务于现实社会的功能,这一点古今皆然,也是“实义”说的当代意义所在。

三、经学对“根情”、“实义”说之影响

虽然“根情”、“实义”说的提出与白居易的创作实践、中唐的社会状况及诗歌创作潮流等因素都有关系,但是,就更深层次的原因看,与经学的影响也密切相关。经学历来对于“诗”给予高度重视,因为《诗经》作为十三经之一,属于经学之元典,具有极高的地位。经学对“诗”之功能、特征等问题展开讨论、探索,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和观点,从而构成了“根情”、“实义”说的思想渊源和生成背景。

经学对古代诗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对诗歌本体展开深入探索并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观点。“诗言志”^{[4](P.19)}、“吟咏情性”、“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发乎情,民之性”^{[2](P.272)}等诗歌本体论命题皆由经学提出,白居易的“根情”、“实义”说与经学的这些观点具有微妙复杂的渊源关系。

“根情”说的提出与经学影响密切相关,因为以“情”论诗、将“情”与诗之本体联系起来的做法,始于经学。孔子作为“经学之创始人”^{[5](P.17)},对诗的论述就包含着以情为本的思想萌芽。《论语·阳货》篇所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其中“兴”和“怨”就离不开“情”。“兴”的内涵比较复杂,朱熹阐释“兴”为“感发志意”,能够“感发志意”,必然有情的存在。孔安国阐释“怨”为“怨刺上政”,怨诗也必然包含着怨恨之情。《毛诗序》作为经学论诗的经典文献,提出“吟咏情性”、“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发乎情,民之性”等命题,这些命题实际上明确揭示了以情为本的诗歌本体论。因为从这些命题不难看出,情是诗之根本所在,对于诗歌来说具有本体之意义。就“情性”对于诗歌的重要性而言,《毛诗序》的这些观点对于白居易之论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因此可以说,“根情”说与《毛诗序》的“吟咏情性”说具有一脉相承之渊源关系。虽然之后陆机提出“诗缘情”这一重要命题对白居易具有

直接性影响,但就最早的思想根源看,“根情”说这一诗学本体论命题应渊源于经学。

“实义”说的提出亦与经学影响分不开。经学对于“义”与诗的关系虽然鲜有直接性论述,但高度重视诗歌的思想意义,一直是经学论诗的基本态度和优良传统。《尚书》提出“诗言志”这一诗歌本体论命题,就包含着“义”的思想因素。因为“志”作为诗人的志向理想,也包含着义理、思想的成分。孔子认为诗可以“事父”、“事君”,学诗可以“授之以政”、“使于四方”,诗的这些实用功能,与“义”是不可分开的。反过来说,诗歌若无义理、思想,也就不可能产生“授之以政”、“使于四方”的政治外交功能。《毛诗序》论诗歌之创作、功能,都与“义”相关联。如论诗之创作云:“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这样的诗必然是“实义”之作。论诗之功能,提出“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化下”、“刺上”等,这些功能要求诗歌必须以“义”为本。经学的这些论述虽然都没有把诗与“义”直接联系起来,但都包含着重视义理、思想的诗学观念。至南朝梁代,裴子野在《雕虫论》中提出了“陈诗展义”这样一个命题,将“义”与诗直接联系起来。裴子野论诗,提出“彰君子之志,劝善惩恶,王化所本”,强调“止乎礼义”等,这些论述不但体现了坚定的儒家经学立场,也表明他所说的“义”主要就是儒家经义,“陈诗展义”就是要求诗歌应以儒家思想为本。“陈诗展义”说对白居易的“实义”说具有直接的启发性,因为白居易所说的“义”,包括“补察时政”、“讽君”“海臣”、教化“悍妇”“薄夫”等义理思想,与裴子野之论是完全一致的,都体现了经学的诗论态度。因此可以说,“实义”说的思想根源仍在经学。只是经学之诗论对“实义”说的影响更为曲折隐晦而已。

[参考文献]

- [1]白居易.白居易集(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陆机撰,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4]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5]马宗霍,马巨.经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1.

(责任编辑 南山)

柳宗元的花木种植与审美

俞香顺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柳宗元在永州、柳州期间大量种植花木。种植花木是他担任地方官的惠政,也为个人疗病之需。他借花木种植与审美来养志、言志,寄寓了个人的身世感慨。他南迁楚地,对屈原作品中所描写的“香草”目验心证,花木成为品德、人格砥砺之具;他借花木种植阐发了他的人才观点、治民理念。

[关键词] 柳宗元; 花木; 种植; 审美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098-03

中唐时期,无论是诗歌题材或是风格,都产生了新变。日本学者市川桃子发现了诗坛风气、题材的一个动向:“中唐诗……更关心具象的事物”、“自白居易、韩愈以降,……普遍流行欣赏植物的风气”、“这个时期,许多植物都被人欣赏,它们的姿态描绘在诗中。爱花而至于自己种植,自然会观察得更加细致,描写得更加具体,而且感情会随之移入到作为描写对象的植物中去。”^[1]笔者将对白居易、元稹、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等中唐诗人的花木种植与审美活动有系列考论。

柳宗元的花木题材作品数量颇多,但专题研究尚不足,袁茹认为:“柳宗元将南国许多特有的植物引入花木诗,较其之前的诗歌是一大创新。”^[2]本文在袁文的基础上做拓展与深究,通过研究柳宗元的花木诗去“想见其人”。

柳宗元早年为京官,种树艺花活动已不可考。永贞元年(805),他因参加“永贞革新”而被贬永州;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旋即又被贬柳州;元和十四年(819)卒于任所。永州司马、柳州刺史任间,柳宗元大量种植花木,粗略统计,有药草、松、竹、桂树、柑树、漆树、柳树、芍药、海石榴、木槿花等。他的花木审美具有鲜明的个人印迹。

他的花木种植是担任地方官的“惠政”之一。在

永州时,他栽植了漆树,《冉溪》云:“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漆树的经济利用价值很高,有木材、油料、涂料之用,柳宗元这里用了《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宏传》的典故:“父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费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在柳州时,他栽种了柳树,《种柳戏题》:“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这首诗笔调轻松戏谑,篇末用了召公《甘棠》诗的典故。

他种植花木也是为了疗病。他所栽种的仙灵毗、白术、白囊荷等都是药草。此外,他借花木种植与审美来养志、言志,寄寓了个人的身世感慨。他南迁楚地,对屈原作品中所描写的“香草”目验心证,花木成为品德、人格砥砺之具;他借花木种植阐发了他的人才观点、治民理念。

一、种植药草与养生养志

花、药往往联缀而言,许多花卉兼具药用与审美价值。文人种植药草,出于“清玩”者居多,而柳宗元却不同,确实出于治疗沉疴之目的。

永州、柳州为蛮荒瘴疠之地,湿气过重,加之心情郁积,柳宗元南迁之后,众病辐辏。他患有脚气

[收稿日期] 2012-05-17

[作者简介] 俞香顺(1971-),男,江苏溧水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病,《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仆自谪过以来,益少志虑。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新唐书·柳宗元传》:“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耗重腿,意以为常。”“重腿”即脚肿,柳宗元在病发时,只能借助杖策勉强而行,《种仙灵毗》云:“杖藜下庭际,曳踵不及门。”此外,他还患有痞气(脾脏肿大),《与李翰林建书》云“仆自去年八月来,痞疾稍已。……用南人槟榔余甘,破决壅隔太过,阴邪虽败,已伤正气,行则膝颤,坐则髀痹。所欲者,补气丰血,强筋骨,辅心力。有与此宜者,更致数物”;《与杨京兆凭书》:“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

他在邻居的开导之下种植竹子,《茅檐下始栽竹》“瘴茅葺为宇,溽暑常侵肌。适有重腿疾,蒸郁宁所宜。东邻幸导我,树竹邀凉飏”,竹林清幽的环境有益于他的休养。他还种植了灵寿木,期以扶持病体,《植灵寿木》:“敢期齿杖赐,聊且移孤茎。……安能事翦伐,持用资徒行。”古代皇帝授予年高者以行杖,是为“齿杖”。柳宗元以逐臣之身,不敢期望“齿杖”恩典,唯有“自求多福”。灵寿木是上好的杖材,《汉书·孔光传》:“赐太师灵寿杖。”灵寿木木质坚硬、枝节光滑,稍加削制即成杖形。

中国历史上精研本草以利众生者不乏其人,但是种植药草、专以“利己”者不多,柳宗元颇具代表性。柳宗元有《种仙灵毗》《种术》《白囊荷》,这些都是对症之药。如仙灵毗,又名“淫羊藿”,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可以补肾阳、强筋骨、祛风湿,《种仙灵毗》云“神哉辅吾足,幸及儿女奔”,可见颇为奏效。此外,他还种有“芍药”,芍药对于痞气也有功效^[3]。

早年的柳宗元蹈厉风发、锋芒外露,积极抗争;而南迁之后,英华内敛,“不屈志、不降身”,《送萧炼登第后南归序》云:“君子志正而气一,诚纯而分定,未尝标出处为二道,判屈伸为异门也。固其本,养其正,如斯而已矣。”柳宗元的种植药草与道家的服食养生迥异其趣,仍然是以儒家价值观念为主导;换言之,“养生”是途径,而非目的,“养生”是固本培元,以期养气、养志,如《种术》“悟拙甘自足,激清愧同波。单豹且理内,高门复如何”;《种白囊荷》:“崎岖乃有得,托以全余身。”

二、南国风情与乡关之思

中唐时期,伴随着众多诗人的南迁,南国花卉开始大量进入审美视野,如白莲、木芙蓉、杜鹃等。^[4]柳宗元“发现”了海石榴、榕树、木芙蓉、红蕉等南国花木。《袁家渴记》:“其树多枫、柃、石楠、榿、楮、樟、

柚;草则兰、芷,又有异卉,类合欢而蔓生……”,所记载的花木也大多为南国特产。

纷红骇绿的南国花木带来了“陌生化”的审美体验,也引发了柳宗元的故园之思。我们看海石榴与橘柚两例。

海石榴即山茶花,^[5]中唐以前的诗歌中鲜见,柳宗元有两首吟咏海石榴的作品。山茶花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繁花满枝、岁暮开放,其《新植海石榴》:“弱植不盈尺”、“莓苔插琼英”、“徂岁为谁荣”均抓住了海石榴的植物特点。南国花卉的艳质与诗人的衰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益增伤感,《始见白发题所植海石榴》:“几年封植爱芳丛,韶艳朱颜竟不同。从此休论上春事,看成古木对衰翁。”

橘柚为偏义复词,往往仅指橘,这也是盛产于南方。《同刘十八院长述旧言……》:“寒初荣橘柚,夏首荐枇杷”、《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蒹葭淅沥含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两首作品都点明了橘柚的时令特点。《南中荣橘柚》诗则描写了橘柚的地域、时令、果叶,更为详细,而且藉此抒发了自己的故园之思:“橘柚怀贞质,受命此炎方。密林耀朱绿,晚岁有馀芳。殊风限清汉,飞雪滞故乡。攀条何所叹?北望熊与湘。”屈原《橘颂》云:“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受命”句即用《橘颂》典故。橘树为南国树,柳宗元则为北方人,虽然南北有别,但都是“深固难徙”,“易地则皆然”。柳宗元以南窜之身不免睹南物而生思乡之情。“北望熊与湘”,“熊”即熊耳山,在河南卢氏县内,“湘”即湘山,又名君山,在洞庭湖中。

“天涯”羁旅之思时时横亘于柳宗元心中,有时种植花木就是无聊之举,《种木槲花》:“上苑年年占物华,飘零今日在天涯。只因长作龙城守,剩种庭前木槲花。”

三、香草比德与政治寓意

中国的花木“比德”有两个源流,相得益彰。其一是《论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刚贞取向,其二是《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的芳洁取向。前者偏向于儒者的“社会”表现,威武不能屈;后者偏向于儒者的“慎独”表现,道德自治。如果更细究,这两种取向也体现了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的不同意趣。柳宗元是中唐儒学复兴的重要参与者,其作品中的花木“比德”体现了这两种取向;由于南迁的独特经历,柳宗元对于《离骚》传统更是“别有会心”。

先看前者,《茅檐下始栽竹》:“贞根期永固”、

《酬贾鹏山人郡内新栽松寓兴见赠二首》：“劲色不改旧”、“植灵寿木”：“柔条乍反植，劲节常对生。”竹与松都是传统的“比德”意象，柳宗元借松竹的贞姿劲节来抒发“君子固穷”、“穷且益坚”之志。再看后者，《戏题阶前芍药》：“凡卉与时谢，妍华丽兹晨。欹红醉浓露，窈窕留馀春。……愿致溱洧赠，悠悠南国。”柳宗元与屈原“萧条异代不同时”，被贬南方之后，得地利之便，对屈原其人其作悠然心会，他撰有《吊屈原文》，也继承了屈原《离骚》所开创的“香草”比兴传统。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十四：“花卉九首……元裕之尝请赵闲闲秉文共作一轴，自题其后云：‘柳州（柳宗元）怨之愈深，其辞愈缓，得古诗之正，其清新婉丽，六朝辞人少有及者……’”所谓“正”，其实就是柳宗元与屈原在精神上的一脉相承，而六朝文人却往往只是流连光景、刻镂形似。《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楚客怜皇树”即用屈原《橘颂》之典。

南国植物往往具有常绿的特点，与时令抗行，于岁末、秋冬开放，柳宗元作品中的南国花木体现了芳洁与刚贞“合流”的特点，如《南中荣橘柚》：“橘柚怀贞质，受命此炎方”；《红蕉》：“晚英值穷节，绿润含朱光。以兹正阳色，窈窕凌清霜。”《离骚》开创了以“香草”比喻政治命运的模式，柳宗元于此也有继承，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惊风乱飏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这并非泛泛写景，“芙蓉”与“薜荔”都是《离骚》中出现的“香草”意象，俞陛云《诗境浅说》“丙编”曰：“子厚柳州诗多哀怨之音。……三、四句言临水芙蓉，覆墙薜荔，本有天然之态，乃密雨惊风横加侵袭，致嫣红生翠，全失其度。以风雨喻谗人之高张，以薜荔芙蓉喻贤人之摈斥，犹《楚辞》以兰蕙喻君子，以雷雨喻摧残。”

四、花木种植与人才观、民本观

韩愈《师说》针砭时弊，柳宗元的《师友箴》《答韦中立论师道说》等都为同声相应之作，时有愤激之语；《师友箴》云：“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答韦中立论师道》云：“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然而，柳宗元在当时却是“师”望甚隆，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柳宗元也以擢拔、培育人才为己任。

《酬贾鹏山人郡内新栽松寓兴见赠二首》云：“青松遗涧底，擢莠兹庭中。”“涧底松”出自西晋左思的《咏史诗》：“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比喻沉沦不

偶的英俊人才。后人沿袭了这一意象，如刘希夷《孤松篇》：“吁嗟深涧底，弃捐广厦材”；李华《尚书都堂瓦松》：“宁知深涧底，霜雪岁兼封。”柳宗元与此前对“涧底松”的徒然“吁嗟”感叹不同，起而行之，“迁于幽谷”，改变了松树的命运。“树木”即为“树人”，这与屈原《离骚》的“滋兰”、“树蕙”也是遥接的。再如《自衡阳移桂十余本植零陵所住精舍》：“离披得幽桂，芳本欣盈握。火耕困烟烬，薪采久摧剥。……南人始珍重，微我谁先觉。芳意不可传，丹心徒自渥。”桂树也是《楚辞》系统中的芳树。这一首作品中桂树的命运与上面所提到的“涧底松”相似，受困于“火耕”“薪采”，柳宗元慧眼辨材，将之“移”栽于所住的精舍。正因为对人才拳拳在念，当他看到对人才的摧残时不免大声疾呼，《行路难》：“群材未成质已夭，突兀崿豁空岩峦。……君不见南山栋梁益稀少，爱材养育谁复论。”

中唐时期，置办园林、莳弄花木成为文人风尚，在园林花木实践中，感悟与印证“政道”者亦不乏其人。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可以与白居易的《东坡种花二首》互相参照：“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划土壅其本，引泉溉其枯。养树既如此，养民亦何殊。将欲茂枝叶，必先救根株。云何救根株，劝农均赋租。云何茂枝叶，省事宽刑书。”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柳宗元的花木种植与审美活动具有时代文化、地域文化的特点，折射了柳宗元的政治观念、人格修养，也体现了柳宗元的内心情感。解读柳宗元的花木诗对认识中唐文化、南方文化以及其人其作都有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 [1] [日]市川桃子. 中唐诗在唐诗之流中的位置——由樱桃的描写方式来分析[J]. 古典文学知识, 1995(5).
- [2] 袁茹. 柳宗元的花木诗[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5(1).
- [3] 张绪伯. 柳宗元诗《戏题阶前芍药》中的芍药不是牡丹[J]. 柳宗元研究(12).
- [4] 俞香顺. 白居易的花木审美贡献与意义[J]. 江苏社会科学, 2011(1); 俞香顺. 元稹花木审美特点刍议[J]. 阅江学刊, 2011(4).
- [5] 俞香顺. 海榴辨[J]. 文学遗产, 2004(2).

(责任编辑 南山)

《西游记》“指”的艺术功能分析

丰 竞

(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作为现代汉语的多义词,“指”的词义简单易懂,使用频繁,但《西游记》对“指”的大量使用,使其在文学世界中设计细节、刻画心理、营建戏剧氛围的艺术功能,实现了超常的表现;而神秘世界中,手指对于信息与魔力的承载与传递,尤其是“指化”的作用,更使其艺术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为魔幻小说创作中必不可少的建构元素。从《西游记》对“指”的文学描写中,可以窥见人类早期对于物质存在与运动方式的基本认知与把握,以及中国魔幻手法的独特性。

[关键词] 咬指; 示; 指化; 信息传递; 行为文化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101-05

《西游记》中佛祖的五指化作五行山,似乎并非只是五指与五行在数字上的偶合。中国古代哲学把金、木、水、火、土看作构成万物的元素,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与多样性。战国晚期阴阳家邹衍综合前人关于五行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富有神秘色彩的“五德始终说”,即五行既相互促进,又相互排斥。五行可对应五方、五季、五音、五色、五味、五脏、五志等,还可与人的五官相对应,但却没有与人之五指的对应。耳、目、口、鼻、舌五官,不论在形状上还是在功能上,都有着视、听、言、嗅、尝的明显区别,而五指在形态上只是高矮胖瘦略有不同,功能上相握相助,分工似乎也不明显。因此,五指分工合作的关系不易引起人们的重视。这种对于五指的认识必然会影响读者对于《西游记》中手指们精彩表演的驻足欣赏。另一方面,人们对五指在人文领域中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书法的握笔、古琴的按拨与中医的“脉诊”上,其中尤以后者为甚。《西游记》第六十九回中就写到了五指在中医诊病上的使用:“行者接了线头,以自己右手大指先托着食指,看了寸脉;次将中指按大指,看了关脉;又将大指托定无名指,看了尺脉。”^[1](P.621)]

中医认为,五指连接着人体的各个脉络,所以手

指亦可探知人体内部隐蔽的信息。孙悟空给朱紫国国王号脉诊病,当然只是个噱头。作者对于手指脉诊的精细描写,目的在于刻画孙悟空一本正经、故弄玄虚的滑稽相,因为孙悟空并不需要通过五指来探知信息。类似如此对手指的精彩描写,在《西游记》中比比皆是。现实中,人们手指相勾、指天发誓、破指为盟等行为,已远远突破了手指生理功能的使用范围,而在《西游记》中,这种对手指的超常规使用,明显有别于其他的明清古典之作,这也是其魔幻小说的性质所决定的。

一、手指是刻画人物心理、营造喜剧气氛的重要元素

“指”为形声字,从手,旨声。手指是能给人带来方便与快乐的重要的身体部位。手指的心理功能首先见诸儿童,儿童对手指的吮吮是其婴儿期行为的延续,也是一种生存遗传的本能和逻辑思维自我训练的依托方式。儿童在离开母乳后,尤其在紧张不安、无所适从的情况下,以吮吮手指的方式来寻找类似于来自母体和食物的安全感,所以,“吮指”既是一种心理焦虑的反应,又是一种心理安慰的方式。当然,焦虑的同时一定伴有“为什么”或“怎么办”这样

[收稿日期] 2012-05-16

[作者简介] 丰 竞(1965-),女,内蒙古自治区包头人,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的逻辑思维萌芽的出现。有趣的是，“吮指”在《西游记》中被替换成了同样是“述宾”结构的“咬指”。“吮”和“咬”只是幼儿与成人在咀嚼和消化器官是否健全上导致的区别，并不产生情绪与心理上的区别。但是，如果“吮指”或“咬指”这种儿童的习惯性动作出现在成人的身上时，就会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1. 唬得那陈玄奘滚鞍落马，咬指道声：“天哪！天哪！刘太保前日打的斑斓虎，还与他斗了半日；今日孙悟空不用争持，把这虎一棒打得稀烂，正是‘强中更有强中手’！”（第十四回）^{[1](P.118)}

2. 八戒见了，咬着指头，对沙僧道：“我们也错看了这猴子了！平时间剿言讪语，斗他耍子，怎知他有这般真实本事！”（第四十六回）^{[1](P.426)}

唐僧和八戒对孙悟空展露的本领，通过“咬指”这一动作，表现出了惊讶中又带有些许的赞赏，因为孙悟空的本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显露无遗的，要一点点地展示，让人不断地产生惊讶与赞叹；同时，八戒的嫉妒也随之滋生并不断膨胀，所以，“咬指”之于八戒，还掺有几丝“嫉妒”的成分。

3. 那些猴不知好歹，都来拿那宝贝，却便似蜻蜓撼铁树，分毫也不能禁动。一个个咬指伸舌道：“爷爷呀！这般重，亏你怎的拿来也！”（第三回）^{[1](P.24)}

4. 那和尚打了个寒噤，咬着指头道：“这般一个丑头怪脑的，好招他做徒弟！”三藏道：“你看不出出来哩，丑自丑，甚是有用。”（第十六回）^{[1](P.136)}

5. 沙僧听说，咬指道：“这泼贱也不知从哪里就随我们将来，把上项事都知道了！”（第五十五回）^{[1](P.504)}

如果说猴子们对学成而归的猴大王的本领惊讶中夹杂着一丝怀疑，那么，和尚们对丑陋的孙悟空竟然是美男子唐僧的徒弟，则表现出了更多的疑问。当然，人们在进行怀疑的心理活动时，必然伴随着思考的心理活动，这在沙僧的“咬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6. 好大圣，将身一晃，只见满洞红光，预先走了。似这般手段，着实好耍子，正是那：聚则成形，散则成气。唬得个老魔头魂飞魄散，众群精噬指摇头。（第三十四回）^{[1](P.308)}

7. 三藏听言，遂变了颜色，……四老见三藏发怒，一个个咬指担惊，再不复言。（第六十四回）

回)^{[1](P.586)}

8. 好大圣，拽开步，跳上独木桥，摇摇摆摆。须臾，跑将过去，在那边招呼道：“过来！过来！”唐僧摇手。八戒、沙僧咬指道：“难！难！难！”（第九十八回）^{[1](P.877)}

大圣的手段和唐僧面对美女时的凛然正气，都让妖怪们产生了解甚至恐惧；当然，例8中难以克服的自然困难也会让人产生恐惧。“咬指”反映的“惊讶”、“怀疑”的心理活动发展到极至，就是担心与害怕了。

有趣的是，师徒四人中只有孙悟空没有“咬指”的动作，即他少有甚至没有诸如惊讶、怀疑、害怕的心理，确实是火眼金睛、明察秋毫的智者与英雄。不论是惊讶、怀疑，还是担心、恐惧，都是儿童面对不确定状态下的人或事所产生的心理活动，“吮指”就是这类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吮指”或“咬指”几乎不可能发生在理性思维成熟并擅于掩饰的成人身上，根据“反常态”、“反常规”的滑稽生成原则，作者把儿童惯用的动作用在成人身上，不仅使人物尽显幼稚可笑的滑稽相，为情节增加了强烈的喜剧效果，而且外化了人物丰富细微的心理活动。

二、手指是探知信息与传递魔力的重要工具

由于手指的灵活与方便，除基本的日常使用功能外，人们最初对手指的使用是以“指”代“数”进行计算，如“原来那唐僧捏指头儿算日子，熬至十二日，天未明。”（第九十四回）^{[1](P.848)}唐僧的手指只是一个计算工具，算不得神奇。“指”的神秘性主要体现在占卜上。汉民族最初以筮草代数计爻占卜，即筮占，《周易》就起源于筮占。后筮占发展为较为方便的以“指”代数的指占，即“掐算”。筮占和指占都是数占。这便赋予了“指”以“示”的神秘含义。《尔雅·释言》：“指，示也。”^{[3](P.787)}《说文》：“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4](P.2)}《易·系辞上》：“辞也者，各指其所之。”孔颖达疏：“谓爻卦之辞，各斥其爻卦之之适也。”^{[3](P.787)}这里的“指”、“斥”皆为“示”义，讲的是卦辞是对爻卦所示进行的解释与占断。所以，“掐指”可测算神事，传递信息：

1. 我今早扶栏看花，却不见这厮出拜。掐指巡纹，算着他在此成精，害你师父，故此未及梳妆，运神功，织个竹篮儿擒他。”（第四十九回）

回)^{[1](P.454)}

菩萨可掐算妖精的所在,很符合神仙的做派,神仙的手指既是探明信息的工具,又是传递信息的媒介。

2. 那怪物又叫声“者行孙”。行者在底下掐着指头算了一算,道:“我真名字叫做孙行者,起的鬼名字叫做者行孙。真名字可以装得,鬼名字好道装不得。”却就忍不住,应了他一声。颺的被吸进葫芦去,贴上帖儿。(第三十四回)^{[1](P.311)}

“者行孙”、“行者孙”本是孙悟空的戏言。孙悟空掐指装相,不知就里,最终被吸入葫芦。“掐算”也是现实中算命先生的专职,用在神仙的身上,虽突出了其神秘的一面,却也使其掺杂了几分故做姿态的世俗成分和表演成分,这在孙悟空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由名词“指”引申而来的动词“指”,其动作具有方向的确切性与外倾性。所以,“指”是对信息的定向发出,而非接收。《西游记》第四十五回中,行者与妖道赌雨,事先与天上诸神串通,约定以棒为号,一指放风,二指布云,三指打雷,四指下雨,五指天晴。这类“指”传递的仍然是一种信号、信息,也不够神奇。“指”最神奇的功能是作为传递魔力的工具,使魔力不受时空的阻碍,直接作用于物体,使物体的存在方式或运动方式发生突变:

3. 行者道:“你看手段!”好行者,把金箍棒捻在手中,使一个‘解锁法’,往门上一指,只听得突蹶的一声响,几层门双锁俱落,唿喇的开了门扇。八戒笑道:“好本事!就是叫小炉儿匠使搵子,便也不像这等爽利!”(第二十五回)^{[1](P.220)}

4. 你看他让唐僧先行几步,却念个咒语,使个移山缩地之法,把金箍棒往后一指,他师徒过此峰头,往前走了,却把那怪物撇下。他再拽开步,赶上唐僧,一路奔山。(第四十回)^{[1](P.364)}

悟空指门门开,指山山移,反映的都是事物由静到动的运动方式,事物本身并没有消失。但是,这种运动方式为突变,没有量变的积累过程。

5. 这行者喝了一声,用手一指,教:“莫来!”那一指,就使个定身法,众官俱莫能行动。真个是校尉阶前如木偶,将军殿上似泥人。(第三十九回)^{[1](P.356)}

悟空让众官呆如木偶泥人,这是中国武侠小说和魔幻小说中所谓的“定身法”,而定身法主要就是

靠“指”来传递内功与神力。与“移山缩地法”不同,“定身法”是事物由动到静的一种运动方式,仍然具有突变的特点,事物本身也没有消失。

6. 他将杨柳枝往下指定,叫一声:“退!”只见那莲台花彩俱无,祥光尽散,原来那妖王坐在刀尖之上。(第四十二回)^{[1](P.388)}

7. 菩萨却用手一指,叫声:“退!”撞的一声,天罡刀都脱落尘埃,那童子身躯不损。(第四十二回)^{[1](P.388)}

菩萨一指,莲花台、祥光、天罡刀都不见了,这类“指”反映的都是事物由有到无的隐现方式,事物本身消失了,突出的是事物的“隐”。

8. 众怪都不看见,二魔用手指道:“那不是?”那三藏就在马上打了一个寒噤;又一指,又打个寒噤。一连指了三指,他就一连打了三个寒噤。心神不定道:“徒弟啊,我怎么打寒噤么?”(第三十三回)^{[1](P.295)}

9. 行者笑道:“师父啊,你那里知道?西方路上多有妖怪邪魔,善能点化庄宅,不拘甚么楼台房舍,馆阁亭宇,俱能指化了哄人。……”(第五十回)^{[1](P.458)}

邪魔一指,唐僧就产生了寒冷与恐惧的感觉;妖怪一指,平地就会立起亭宇楼台。这两例反映的都是事物从无到有的隐现方式,突出的是事物的“现”。事物因被“指”而发生的或由静到动,或由动到静,或隐或现的突变,称为“指化”。“指化”还包括一物变为另一物的一种更为神奇的突变:

10. 毗蓝道:“容易。”即上前用手一指,那道士扑的倒在尘埃,现了原身,乃是一条七尺长短的大蜈蚣精。(第七十三回)^{[1](P.668)}

11. 妖精轮利爪刁他一下,被佛爷把手往上一指,那妖翅膀上就了筋。飞不去,只在佛顶上,不能远遁,现了本相,乃是一个大鹏金翅雕。(第七十七回)^{[1](P.705)}

道士被指,现出蜈蚣原形,妖精被指,现出金雕原形。“物1”瞬间变为“物2”。这种“指化”在《西游记》中运用得最多,也最为神奇,使“指”的艺术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正如第四十四回中的道士所云,“我那师父,呼风唤雨,只在翻掌之间;指水为油,点石成金,却如转身之易;所以有这般法力,能夺天地之造化,换星斗之玄微,……”^{[1](P.402)}至于“物1”如何突变为“物2”,“指水”如何“为油”,“点石”如何“成金”,作家无心或无力解释,更主要的是,突变的

原理与过程是人们潜意识中永存的幻想元素,如果解释清楚了,魔幻世界就失去了其最宝贵的特质——神秘性。

“掐指”与“指化”是中国神秘文化中的两个重要内容。前者重在对信息的接收与传递,强调“指”之“示”的功能,反映了汉民族注重与“天”所代表的宇宙世界进行勾通的原始信念和“天人合一”的认知观;后者重在对魔力的承载与传递,强调的是“指”之“化”的功能,寄托了人们渴望拥有超自然力量的质朴理想。与西方神秘文化中习惯借用魔棍、魔杖等工具不同,中国的神秘文化更强调人体与未知世界的直接沟通,成为传统行为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手指是设置细节、刻画形象的重要角色

手指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最灵活的身体部位。一方面,五指各秉其性,各司其职,难以相互替代;一方面你呼我应,配合默契,宛如一个五口之家。五指中,小指应该是最有神韵的一位了,戏剧中的兰花指就少不了小指那一翘间的妩媚。小指的妩媚在《西游记》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1. 却才举杯,那花儿已散,就露出虫来。妖精也认不得是行者变的,只以为虫儿,用小指挑起,往下一弹。(第八十二回)^{[1](P.745)}

2. 那道士扑的倒在尘埃,现了原身,乃是一条七尺长短的大蜈蚣精。毗蓝使小指头挑起,驾祥云,径转千花洞去。(第七十三回)^{[1](P.668)}

作者在写人物的动作时,常常让灵巧的手指们参与其中,并特别指出是哪一只手干的,有了细节,文字就生动了。老鼠精的小指及时挑出酒沫里的小虫,让孙悟空想钻进妖精腹中的计划落空,从而改变了情节的发展方向,也让读者的心随之紧张了起来;比起降妖后的文殊骑上青狮,寿星跨上白鹿,级别较低的毗蓝菩萨用最纤弱的小指挑起七尺长的大蜈蚣,显得更加可亲而不失潇洒的风度。

无名指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地方,只是在拿东西的时候暗中起个承托的作用,这种不起眼的地位和不高扬的个性被孙悟空看中了,他把替和尚们藏匿毫毛的任务交给了无名指:

3. 好大圣,把毫毛拔了一把,嚼得粉碎,每一个和尚与他一截,都教他:“捻在无名指甲里,捻着拳头,只情走路。无人敢拿你便罢;……”(第四十四回)^{[1](P.406)}

和尚们的无名指没有辜负孙悟空,全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无一根毫毛丢失。中指个大居于掌中,中国古代医学认为,中指与五脏中的心脏相应,应该是家里的领导,又称“将指”;古时以中指中节的长度为一寸,可见,中指亦有“标准”之义,有资格撑起五指之家的门面:

4. 那大圣睁圆火眼金睛,低头看时,原来佛祖右手中指写着“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大指丫里,还有些猴尿臊气。(第七回)^{[1](P.58)}

5. 他前者在雷音寺听佛谈经,如来见了,不合用手推他一把,他就转过钩子,把如来左手中拇指上扎了一下。如来也疼难禁,即着金刚拿他。他却在这里。(第五十五回)^{[1](P.507)}

孙悟空选择在佛祖的中指上写下自己的留言,并非偶然,因为在中指这个门面上书写才显得更加正规醒目;而蝎子精瞄准了如来的中指来盯,既让他疼到心里,又让他颜面大失。

食指又称示指、盐指,人们常用这只手指品尝食物的味道。食指是这个家庭里最勤快、最能干的主妇,不怕脏不怕累,所以与它相应的动作就比较多:蘸、顶、掐、挠、抠、捻、揉、指、点等等。

6. 弥勒将右手食指,蘸着口中神水,在行者掌上写了一个“禁”字,教他捏着拳头。(第六十六回)^{[1](P.601)}

不仅凡人俗子用食指蘸着唾液翻书、数钱,就是弥勒佛也是蘸着“口中神水”写字,仅凭这一小小的动作,弥勒就不可能免俗。

拇指,又称巨擘,有力大和与其他四指相分的意思。其专职似乎只有“按”,这是个体力活儿,多数情况下只是配合其他手指完成弹、捻、掐、捏的任务,给人以老实憨厚的印象,但是,《西游记》中的拇指却是个神秘的角色:

7. 妖魔道:“不打紧。你请起来,我这里有件宝贝,只在你那疼上摸一摸儿,就不疼了。却要仔细,休使大指儿弹着;若使大指儿弹着啊,就看出我本相来了”(第三十一回)^{[1](P.279)}

8. 只将左手大指头捻着那柄儿上第七缕红丝,念一声“咽嘘呵吸嘻吹呼”,即长一丈二尺长短。这宝贝变化无穷!那怕他八万里火焰,可一扇而消也。(第六十回)^{[1](P.550)}

奎木狼的内丹舍利若被大指弹着,会使他现出本相;罗刹的铁扇也需大指捻着才能扇灭八万里火焰,一向老实憨厚的拇指在《西游记》中却成了最为

神秘的一位。所以,孙悟空一会儿假扮奎木狼的老婆,一会儿又假扮罗刹的老公,都是为了套取天机,最终发现拇指是隐藏或泄露天机的关键所在。至于第七回孙猴子被压于五行山下之前,曾在如来佛祖的大指丫里撒了一泼猴尿,纯属小瞧了拇指,拇指伙同写有留言的中指,有力地证明了孙猴子是翻不出佛祖的手掌心的。这里还有一个需要刨根问底的细节:为什么罗刹的铁扇发功时,强调要用左手的拇指捻柄上的红丝?难道这只是作者的信手之笔?巧合的是,《红楼梦》中唯一一处详细描写手指的使用,也是左手的大拇指:

9.黛玉笑道:“这‘大’字‘九’字是用左手大拇指按琴上的九徽,这一勾加‘五’字是右手钩五弦。并不是一个字,乃是一声,是极容易的。还有吟、揉、绰、注、撞、走、飞、推等法,是讲究手法的。”宝玉乐得手舞足蹈的说:“好妹妹,你既明琴理,我们何不学起来。”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养性情,抑其淫荡,去其奢侈。……”(第八十六回)^{[2](P.1240)}

这是《红楼梦》中黛玉论琴最精彩的片段。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其弹奏时手指的分工是右手拨,左手按,而左手使用最多的就是无名指和拇指特别要求大拇指要按得实、有力度,所谓“入木三分”,这也是古琴弹奏的一个难度所在。虽然还不能断言左手的大拇指在音乐世界和魔幻世界中都暗藏某种玄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确实是《西游记》与《红楼梦》的一个美丽巧合。五行是现实世界中可见的物质元素,可以代表整个物质世界;五指是人们重要的身体部位,在《西游记》中,则可描摹人物百态,代表了人物复杂的心理世界和丰富的情感世界。

《西游记》作为一部精彩的游戏之作,“指”不可避免地参与其中,其代表动作就是“咬指”、“掐指”和“指化”。“咬指”是一种白描手法,经济实用,是刻画人物儿童心理的神来之笔;“掐指”代表了对信息的接收与传递,“指化”代表了对魔力的承载与传递,都是手指神秘功能的展示。而“指化”最能突出作品的魔幻性质,所谓“举头一指太阳昏,天地鬼神皆胆怯”(第八十八回)^{[1](P.798)},使“指”的艺术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从中可以窥见汉民族对于事物动与静、有与无的存在方式与运动方式的初步认知以及重结果,轻过程,重感性,轻逻辑的思维特点;“指”在戏剧和小说中穷尽人物形相,描摹人物心理的作用,都是中国传统行为文化中的重要内容。至于如来佛的五指与五行的关系,应该是作者巧妙利用了数字上的偶合。当然,“五指”化为“五行”,应该有“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隐喻,而用“五行”给压了孙悟空五百年的山来命名,或许也包含了对孙悟空命运的某种暗示。作为一种行为文化,“指”的含义颇为丰富,不论是赵高的指鹿为马、屈原的“指九天以为正”^{[5](P.6)},还是俗人的指鸡骂狗、仙人的指水为油,都在提醒我们重新审视人类的双手和人类的心灵世界。

[参考文献]

- [1] 吴承恩. 西游记[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 [2] 曹雪芹. 红楼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 [3] 汉语大字典[M]. 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5.
- [4] 许慎. 说文解字[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 [5] 屈原. 楚辞[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南山)

《山海经》研究述评(2000年—2011年)

顾晔峰

(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近十多年来《山海经》研究领域人才辈出,学术视野进一步开阔,成果丰富,是前一个时期研究的深化与发展。该研究领域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某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还需要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对《山海经》研究的展望和走向,更需要作出科学的分析。

[关键词] 《山海经》; 研究; 述评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106-04

《山海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内容包罗万象,但由于记载的时间年代久远,所述不甚明了,因此它被称为“语怪之祖”,其中所记载内容,常被认为荒诞不经。西汉司马迁对其评价是:“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1](P.2380)}但其神秘莫测吸引着众多研究者对其进行探究,试图解开它的神秘面纱。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山海经》的研究研究呈逐步深入态势,无论是从研究者的数量还是研究成果来说都大大超过前人。从研究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内部研究主要是指《山海经》基础研究工作:文本的整理与校注、作者与成书年代的考证、篇目与版本的确定以及图文关系等;外部研究有这样一些子项目:《山海经》的性质确认、地理范围的考订,神话及神物的研究等。进入新世纪以来,《山海经》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为了将《山海经》研究工作更好的进行下去,我们就一些研究的新特点、新变化作一番梳理和总结。

一、《山海经》基础工作的建设

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指《山海经》的文本整理、校注、图文关系的研究等。这项工作在1980年代神话学研究大家袁珂先生作了重大贡献,袁先生于1962年完成了《海经新释》,70年代又校注了《山

经》,后又将两书合而为一,名《山海经校注》接着又出版了《山海经校译》。袁先生的这两部注本和他系列研究论文,代表了20世纪《山海经》研究的最高成就:“袁珂先生的《山海经校注》是系统研究《山海经》的重要注疏……书籍出版后在海内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先后有日本和法国的著名学者引用此书多处。袁珂先生的《山海经校注》……是了解中国四千年前地理资料、认识原始混沌时期的巫术文化、研究中国上古图腾社会珍贵史料、领略古代神话传奇的必读著作。”^[2]因其巨大影响,2000年之后,后继学人多另辟蹊径从不同角度对《山海经》作全方位、多 viewpoint 的研究。这方面的著作有张步天教授的《山海经解》,张氏在其提要中指出“‘解’不等同于传统的‘疏’或‘传’,而是欲藉现代科学观念破译全部经文”。^{[3](P.3)}安吉的《〈山海经〉新考》则偏重于文献比较的方法和音韵学方法,作者对《山海经》的诸多问题如《山海经》的版本、研究史以及对文本中得人神、禽兽、物品、地名等进行了阐释,拓宽了研究的视野。普及类的注书还有:陈成《图文本山海经》、沈薇薇《山海经译注》等,都是不错的入门级读物。单篇论文有:《〈海经〉新笺上、中、下》(2001),作者在文中也指出:“是在袁珂《山海经校注》一书的基础上,旁罗古籍,并参以出土的甲、金、竹、帛文献资料,对其中的《海经》部分的一些事物、语词作了新

[收稿日期] 2012-07-28

[作者简介] 顾晔峰(1978-),男,江苏盐城人,江苏教育学院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

的解释”。^[4]上述著作或论文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袁著的不足,使其注释工作更加的完备。

基础工作中有关《山海经》的图文研究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成果。《山海图》的研究尽管是个古老的课题,但当代学人第一次系统的对这个问题进行梳理,形成了较好的研究体系。这个方面成就最大的当属马昌仪教授,其著作的《古本山海经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是专心致志地正式研究这个课题的第一本书,并连续就《山海图》问题发表了系列论文。在《古本山海经图说》一书中努力收集历代古本《山海经图》,探索《山海经图》的来龙去脉,重点剖析了明清两代《山海经》图本的特色与文化意蕴。马先生在《中日山海经古图之比较研究》(2005)一文中将视野拓至域外《山海图》,比较了中日《山海图》的异同与渊源,更是具有创新与启发意义。沈海波《略论〈山海经图〉的流传情况》则重点考察了《山海经图》亡佚的时间,指出其亡佚“大致可推定在汉宣帝至汉成帝之间。”^[5]该作者在2002年《论〈山海图〉产生的时代》论证了《山海图》产生于春秋中晚期。张春生的《试论山海图》(2006)则在否定禹九鼎说、楚汉壁画说的基础上,通过对《山海经》的据图叙事形式,所表述的地图要素以及涉及的地域范围等方面的论证,认为“《山海图》是一幅综合性、多功能的世界大地图”。^[6]此外,张祝平《宋人所论〈山海经图〉辩证》(2001)一文针对马文主要对明清时期《山海经》图文作分析,将研究视点深入宋代几位学者关于《山海图》的说法进行了一些梳理辩证,是马文的有效补充。以上诸文对《山海图》的发掘与研究,纠正了2000多年来人们对《山海图》的偏见,是《山海经》阐释视角的又一大突破。值得一提的是,与上述诸家不同的是,汪俊先生据刘歆《上〈山海经〉表》、裴骃《史记集解》等文献资料证明,《山海经》不存在“古图”,“最早为《山海经》配图的是晋代的郭璞,关于《山海图》的记录均是东晋以后的记载。”^[7]论证较为充分,可备一说。

二、《山海经》作者、版本、成书时间研究

《山海经》作者的认定和成书时间的考证是紧密相关的,《山海经》研究者一般会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讨论。具体来说,顾颉刚认为是秦人的作品,蒙文通以为是巴蜀人的作品,袁珂以为是楚国或楚地的人所作。90年代这一论题相对沉寂,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2000年以来,关于《山海经》的作者、性

质以及版本问题又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袁先生的观点得到进一步的阐述。唐世贵先生从考古学、语言学、文献学角度对《山海经》的比较分析指出,“《山海经》巴蜀图语本成书于西周前期,战国初中期,华文本《山海经》由定居蜀地的楚国贵族后裔综合图语本、口头流传,再加入楚地神话以及中原、海外历史地理知识编写而成。”^[8]贾雯鹤博士在《山海经两考》一文结合《山海经》语言学研究成果,进一步缩小其成书的时间:“其上限当是战国初年或中年,下限当是战国末年。”^[9]金荣权《〈山海经〉作者应为巴蜀人》亦有相类似的结论:“作者将西南地域作为后世主要文化集团的发源之地,帝俊、伏羲、颛顼、夏后启、炎帝、祝融都与巴蜀之地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山海经》极力突出巴蜀地区文化地理的中心位置,具有明显的重西南的倾向;有意将西南纳入华夏中心地带,并且称之为天地之中;西南是《山海经》作者眼中的长生之地和快乐之乡。”^[10]其实不管是“定居蜀地的楚国贵族”还是“深受北方文化影响的巴蜀人”,在李炳海教授的《〈山海经〉江汉沿岸的冢陵传说及楚族的自川入鄂——兼论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关联》一文中都可以找到佐证:“反映出先楚集团及楚族迁徙的轨迹,以及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密切关联”。^[11]对于《山海经》的版本问题,2000年以来更多的关注《山海经》的内部版本考察。如张国安《〈大荒经〉与〈山海经〉关系新论》:《大荒经》早于《山海经》,其内容是对商代某象征天圆地方原始宇宙观的神秘主义建筑之结构及其壁画内容的记录与描述。《山海经》则晚于《大荒经》,内容属于东周时代颛顼后裔的产物。王红旗《郭璞版〈山海经〉中次一经是从北次二经脱落下来的》(2011)认为:“郭璞版《山海经》中次一经是从北次二经脱落下来的,原版中次一经已经失传,其记述的地理方位大体在今日汉水上游及其支流丹水一带。”^[12]对于《山海经》内部版本的考证有利于解析《山海经》文本的内容,从而把握《山海经》的真面目。

三、《山海经》地理考证

地理学的解读一直是《山海经》研究的热点。这个时期较为瞩目的是《山海经》世界地理说。最早将《山海经》与西方世界联系起来的是19世纪末的法国学者,上世纪初章太炎先生发表《法显发现西半球说》,开中国学者探讨这一问题之先河。随着80年代《山海经》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在90年代获得更多的呼应。徐显之《山海经探原》

一书认为《大荒西经》描述了美洲事物,又说“寿麻”“实为对热带沙漠地区的描写”,“正是西方非洲赤道沙漠地区的情况”^{[13](P.78)},不过没有具体点出国名。宫玉海先生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在其专著《〈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中提出:“现在肯定地说,《山海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理书,它又是一本博物志,一本不可再得的珍贵的世界古代文化史料。”^{[14](P.7)}进入21世纪,《山海经》的世界地理仍有不少附和者,如胡远鹏《澳大利亚土著来源之谜——从〈山海经〉等古文献看最早的移民来自中国》(2002)、《〈山海经〉中的“东山”区位地理考古研究》(2004),张敏《深入〈山海经〉研究,探索美洲文明起源》(2007)。研究的多样性可以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如果论述过程中推断大于实证,假想多于考订,尽管说法颇为新颖,似有哗众取宠之嫌,结论更是值得商榷。例如前文所引胡文之所以认定《山海经》和澳洲发生牵连,是因为“澳大利亚一词来源于‘於菟’,即老虎。《山海经·大荒南经》中写作‘胡余’”^[15],除此之外就是一些传闻加之说明。诚如萧兵先生所指出的:“从论证的依据来看,如此一些事关重大的判断主要是从语音方面推导得来的,即把汉字读音同西文地名发音相近者作为立论根基,这未免过于单薄,而且有古今音不分之嫌。”^{[16](P.351)}因此有人明确反正这种地理研究的扩大化,张中一先生在《〈山海经〉并非世界地理志》(2007)一文中,采取从文本出发逐条批驳了《山海经》与美洲、澳洲等地的关联。

本世纪以来随着地方文化研究的展开,许多地方文化工作者充当了地方文化资源的挖掘者和阐释者,他们乐于从《山海经》中探寻和本地区文化相关联的蛛丝马迹:王宁《〈西藏山经〉记述的地狱及作者新探》认为,《山经》是战国时代齐国的夏朝裔民东夷族的作品,它记述的是夏王朝故国的山川风貌,其范围大体是以今山东省为中心,故对《山经》的研究,应当列入齐鲁文化加以探讨。《〈山海经〉中成都坝子》(2003)、《〈山海经〉中河洛地区》(2008)、《〈禹贡〉、〈山海经〉所记湖北古地理》(2009)一文认为《山海经》记载了湖北古地理的许多山川、河流、物产。《〈山海经〉中“昆仑”地理位置新探》(2007)指出“昆仑”是指贺兰山,等等。我们认为这单一的研究手段本身就是有所欠缺的,上述“拉郎配”式地理研究更是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山海经》因其特殊的成书原因,上述做法无异于盲人摸象,我们不妨介入一些新的研究视野。上个世纪80年代,政治地理学逐渐步

入学者视野,依据政治地理学的观点,“地理学的产生,发展和实际应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非地理的因素制约,特别是政治和军事的因素(广义的政治又可将军事包括在内)《山海经》虽然表面看起来确实像一部地理书,甚至还给人以科学实录的假象:不厌其烦地罗列山川河流,地形地貌,物产资源,方向里程等等,但这些仅仅是些虚实难辨的陈述,总体上呈现出一幅政治想象图景,是服务于特定功利目的的。所以,古往今来试图用纯实证的方法对《山海经》内容加以考实的种种尝试均不能令人如愿。我们若能从政治地理的观点去考察,也许能说明《山海经》构成的奥妙。”^[17]与政治地理学具有同样启发意义的则是叶舒宪先生的神话地理学:“《山海经》产生的年代只有神话地理而没有地理科学。”因此“承载神话观念的《山海经》一书,与其用地理学的实证标准去考证其客观性的真实存在地,不如用神话地理的视角去诠释其主观发生的真实过程。”不仅如此叶先生还以《山海经》中“熊山”为例论证了“华夏文明的熊神信仰及其在史前宗教中的地位”。^[18](2010)叶先生这一说法颇具有开创意义,大大拓宽我们的研究思路。鉴于这两种不同的技术手段,我们若把《山海经》当作社会学、神话学的对象来研究,要比把它当作单纯的地理知识来研究更具有学术价值。

四、《山海经》神话研究

这一时期对于《山海经》神话研究,呈现出两个特点:

1. 从内容上讲研究视角更加开阔。比如所谓的“四大神话”研究在80年代乃至90年代一直是关注的重点,但2000年至今,有关“四大神话”的研究论文只有2篇,仅占这时期神话研究论文总数的0.4%。对于这一时期《山海经》神话研究来说,学者除了神研究之外比如:《后羿射日考》(2008)、《夸父逐日新说》(2009)、《精卫填海神话考释》(2010)等。还将目光延伸至《山海经》神话群系研究:《〈山海经〉神话群系”的传承流变》(2006)、变形神话研究、神话思维研究:《山海经的神话思维》(2003)、《山海经神话思维的演变和特征》(2008),此外还包括乐园神话研究:《山海经乐园神话研究》;海洋神话研究,如《〈山海经〉与海洋文化》(2003)指出《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写海洋的经典”^[19],以及《从〈山海经〉等海洋神话探索东海岸海岛先民的生存状态》(2009)、《〈山海经〉的海洋小说“母题原型”及其海洋文化特质》(2010)。从上述列举的论文中不难看出

出这个时期对于《山海经》神话研究已经不是停留在具体的神物的考释层面,而是涉及《山海经》神话元素的特点、性质的分析,从更微观的角度对《山海经》中神话作进一步探讨,大大拓展了《山海经》神话研究的视野。

2. 从研究方法上看,2000年之前,研究者更多的是运用考证、文化人类学等方法来研究《山海经》神话。较少涉及到《山海经》的比较研究,仅有几篇论文涉及比较的方法,但又都是从史学的角度。如赵荣《试论〈禹贡〉与〈五藏山经〉的关系》(1986)一文考证《五藏山经》写作时间的,指出,“在内容上,《五藏山经》取法于《禹贡》,而不是《禹贡》“取材”于《五藏山经》。从而否定了在写作时代上,《五藏山经》早于《禹贡》的流行观点。”^[20] 安吉的《〈山海经〉史料比较研究》,等零星的几篇论文。但近几年来,《山海经》的神话比较研究俨然已成为一个研究的重要手段,从比较的对象来说,涉及《楚辞》、《镜花缘》、《逸周书》、《华阳国志》、《伊利亚特》等。如纪晓建博士一直致力于《山海经》与《楚辞》神话比较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楚辞〉与〈山海经〉山水树木神话之互证》(2006)、《〈楚辞〉〈山海经〉灵巫之互证——〈楚辞〉《山海经》神话比较研究》(2007)《〈山海经〉《楚辞》鲸神话差异的文化成因》(2007)通过比较作者认为:“《楚辞》、《山海经》的神祇具有明显的趋同性特点。不论是主宰天地人间、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至上神,还是具有贤德睿智、地位显赫的人类各族祖先神,或是掌管自然界各种具体事物的功能神,在称谓和司职上都有众多相同或相近之处。这种趋同反映了《楚辞》、《山海经》在文化渊源上的同源关系。”^[21] 此外还有《〈山海经〉与〈逸周书·王会篇〉比较研究》(2004)《〈山海经〉对〈镜花缘〉的影响》(2005)、《〈华阳国志〉与〈山海经〉比较研究》(2006)等。我们认为这种神话学上的比较研究有助我们横向把握《山海经》及其同时期文本神话的性质、特点,更能在纵向构建上古神话的发展线索,在动态中了解中国神话的发展过程。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这十多年来《山海经》的研究是上个世纪的延伸与拓展,在诸多方面取得不俗的成绩。但在这热闹表面背后,我们更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在研究的手段上更多是“粗放式”的增长,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如同一个矿场,我们只是在努力增加矿石的产量,而未能充分挖掘矿石的出产率。《山海经》研究亦是如此,文

本的内容、所涉资料都是有限的,更加需要我们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其进行重新定位,这才不失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道路。

[参 考 文 献]

- [1] 司马迁. 史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2] 郭华. 山海经校注评介[J]. 求索,2011(2).
- [3] 张步天. 山海经解[M].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
- [4] 王宁. 海经新笺(中)[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2).
- [5] 沈海波. 略论山海经图的流传情况[J]. 上海大学学报,2000(5).
- [6] 张春生. 试论山海图[J].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06(3).
- [7] 汪俊. 山海经无“古图”说[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3).
- [8] 唐世贵. 山海经成书时地及作者新探[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6(7).
- [9] 贾文鹤. 山海经两考[J]. 中华文化论坛,2006(4).
- [10] 金荣权. 山海经作者应为巴蜀人[J]. 贵州社会科学,2004(6).
- [11] 李炳海. 山海经江汉沿岸的豕陵传说及楚族的自川入鄂——兼论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关联[J]. 江汉论坛,2011(7).
- [12] 王红旗. 郭璞版山海经中次一一经是从北次二经脱落下来的[J].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11(1).
- [13] 徐显之. 山海经探原[M].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1.
- [14] 宫宝海. 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
- [15] 胡远鹏. 澳大利亚土著来源之谜——从山海经等古文献看最早的移民来自中国[J]. 化石,2002(4).
- [16] 叶舒宪,萧兵,郑在书. 山海经的文化寻踪[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 [17] 刘国旭,辛晓十. 山海经中的地理学思想[J]. 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6(9).
- [18] 叶舒宪. 山海经与神话地理——以山海经“熊山”考释为例[J]. 中国社会科学学报,2010(3).
- [19] 文牧. 山海经与海洋文化[J].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3(6).
- [20] 赵荣. 试论禹贡与五藏山经的关系[J]. 西北大学学报,1986(2).
- [21] 纪晓建. 山海经楚辞鲸神话差异的文化成因[J]. 南通大学学报,2007(4).

(责任编辑 南山)

论陆游所撰碑志文

赵永平

(四川理工学院人文学院, 四川自贡 643000)

[摘要] 作为宋代散文大家,陆游为他人撰写的碑志文共有53篇。其碑志文所涉及的思想内容较丰富,并贯穿着儒家文化观念。也有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在写作上,受韩愈的影响较明显,但也体现出明显的个人创造性,其情感色彩、文学性都较突出。

[关键词] 陆游; 碑志文; 思想内容; 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 I20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110-05

中国古代的碑志文大致可以分为纪功碑文、宫室庙宇碑文和墓碑文三类。纪功碑文是用来记述人物的功德的;宫室庙宇碑文主要是用来记载有关建筑物兴建的原委、规模,一般还要对神灵作一番赞扬和称颂;墓碑文埋于墓的一侧,是为死者而作的记叙文字,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坟地变迁、地理变动等可能带来后人无法识别墓主,因此在石上刻录死者姓氏、生卒年月、家世、经历、事迹等信息,以待后人辨识、稽考。^{[1](P.440)}从碑志文的作者构成看,有默默无闻的民间文人,也有不少知名的、甚至地位显赫的文坛名流。尤其是出于后者之手的碑志文,由于写作者的文化素养和写作水平普遍较高,往往具有较多的信息量。从广义的散文概念考察,其艺术价值也通常在水平线之上。

陆游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作为宋代散文大家,陆游一生为他人写作的碑志文共有53篇,从体裁看:有碑6篇,墓志铭33篇,圻记1篇,塔铭8篇,墓表5篇。这些文章是陆游散文创作的一部分,然而由于为其诗名所掩,人们往往不予关注。

—

众所周知,陆游一生坚决反对和议,力主恢复中原。对于爱国人士,他从来都是投以青睐的目光,在

文章中对于他们的爱国行动和精神极力予以褒奖、颂扬。他撰写的碑志文也不例外。

《德勋庙碑》中的张俊,是宋高宗时三大名将之一。在著名的柘皋之捷中,张俊沉重打击了猖狂的入侵者,立下了汗马功劳。对于他的杰出才略与奋勇精神,陆游给予了高度赞扬,称道张俊“以山西豪杰,入侍帷幄。龙飞顺动,避狄南渡,公则有扶天夹日之功;萧墙衅起,群公暗拱,公则倡勤王复辟之大策。氛侵戎马豕突,公则奋却敌御侮之奇略;巨盗乘间,群凶和附,公则建剪除安辑之成绩”。《右朝散大夫陆公墓志铭》中的墓主陆窳,当金人入侵京师时,众人都惊慌失措,而他“独不动,以便宜招集燕山戍卒数千,杂以保甲,日夜部勒习教,命旧将张宪统之,扼据要害。”陆游称其“措置号令,赫然有大将风采。”《傅正义墓志铭》中的墓主傅伋,在任沧州无棣县主簿时,“会女真陷全燕,乘虚南下,两河皆震,吏士相顾无人色,或委官去。”而临危受命的傅伋,虽是“南方书生,平生不习金鼓,”却“得檄即行,不暇秣马,冒兵往来,军赖以无乏。”陆游于简洁的叙述中流露出褒扬与赞叹。这些爱国将领,因为陆游的碑志文记载而一定程度上为后人了解,从这个角度说,陆游的碑志文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

对于手无寸铁却衷心爱国的文人、作家,陆游同

[收稿日期] 2012-07-15

[作者简介] 赵永平(1973-),女,山东鱼台人,四川理工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样是赞美的。他在碑志文中也留下了他们的影像。例如，江西派诗人曾几是一位爱国作家，也是陆游的老师。陆游在为其撰写的《曾文清公墓志铭》中有这样一段动情的叙写：

元颜亮盗塞，下诏进讨，已而虜大入，或欲通使以缓其来。公方卧病，闻之奋起，上疏曰：“遣使请和，增币献城，终无小益，而有大害。为朝廷计，当尝胆枕戈，专务节俭，整军经武之外，一切置之。如是，虽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陛下降诏，诸将传檄，数金人君臣，如骂奴耳，何词复和耶？”

曾几的爱国之心和真挚的情感跃然纸上。在这样的叙述中，陆游的爱国思想也得到了呈现。在《程君墓志铭》以及《严州乌龙广济庙碑》中，陆游表达了同样的爱国思想。

关心百姓疾苦，反对苛政贪官，是陆游一贯的主张。在为那些中下层官吏所撰写的墓志铭中，陆游寄寓了对廉洁自律、奉公守法、以百姓之心为心的为官之道的期待。在《右朝散大夫墓志铭》中，陆游叙述墓主陆案的几件小事来表现墓主的廉洁作风。陆案担任台州宁海县丞时，“会省丞官，父老送公出境，争赆金帛，公拒之不可，至或泣下，乃取丝一钩。”陆案通判真州时，“州多大陂泽，用事者方兴水利，官吏人人怀希望，意谓且得厚赏。公独不肯与。”除江南东路转运判官时，“部中饥，公便宜留上供米六十万石，损直予民，而余于他郡，官无所亡失，而民赖以济。”《傅正议墓志铭》中记叙的傅伋，生前对于百姓的疾苦也是常常挂于心间。《王公尚书墓志铭》中的墓主王佐看到“岁饥，畿内小民，或以农器蚕具抵粟于大家，苟纾目前，明年皆有失业之忧”的情况，于是“出令，断自东作之日，先以还之。俟蚕麦讫事，而归其子本。大家不遵令，小民负约皆坐罪。”“令下，农家相庆。”

如果说上述墓志铭中人物的廉洁奉公行为，陆游还只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谈，那么像张瑄、石继会、张郊等人，陆游在墓志铭中则是多方面地来展示他们的廉吏形象。

《朝奉大夫直秘阁张公墓志铭》中，张瑄在常德府武陵县任县丞时，“武陵大水，犯县城，不没者三版，门不得阖，水且入城。”情势十分危急，而张瑄当时是暂时代理县衙之事，来不及请示上级，“亟命实土于布囊以窒门，俄而水定。”水灾得到控制后，又“设方略，募舟救民，且亲载粟，户给之，泥行露宿无

所惮。”又在此地兴修水利，造福百姓，“县三里港，灌溉甚广，久弗治，数遇枯旱，公为筑之，不愆期讫事。”知隆兴府奉新县时，看到百姓因缴不上赋税而被逼得家破人亡时，极力请求减免，而得不到答复，一气之下，“则欲弃官去”。为百姓不怕丢官罢职，这才是老百姓的父母官。老百姓在他的呵护下，终于得到生的希望。《朝奉大夫石公墓志铭》逐一记叙了石继会作为廉吏的表现。在新城做主簿时，由于“谨簿书，扼吏奸，以善其职闻，”得到“移于潜丞”的提拔。其工作不但得到上司的重用，而且得到百姓的拥护，听说他要调走了，百姓“謹于境上曰：‘奈何夺我主簿？’久乃涕泣辞去。”在楚州，办案公正、详明，不会为捞到好处而随意地处理案件。“属县一日获盗十辈，意且得醲赏，同僚为言语：‘君虽恕，然不可纵盗。’公正色对曰：‘盗诚不可纵，罪亦不可入，囚辞亦不可不尽。’同僚退，相顾曰：‘尉赏不谐矣。’然惮其正，不敢复言。狱成，真盗才五人，余破械遣去。”在德兴壮县，推行仁政，教化为先：对于好斗者，不以刑惩罚，而以情感化。“德兴壮县，俗喜负气，健斗而终讼。……有兄弟宗族争讼者，辄对之泣下，多感愧而去。俗为一变。”同时，“缮治学宫，聚经史，丰膳羞，尊延耆老，而宾友其秀民，又创小学以诱进其童子，诵书之声，闻于行路。”这样做，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会科诏下德兴，与荐送者二十有三人，比他邑为最盛。”关心贫穷者。“县之远郊，贫民惮多子，或不能全，公举行胎养之令。”加强治安管理。“置保伍以察之甚悉，而盗攘因不得辄发。”把石继会的好处一一列出，客观上描绘了一个克己奉公的官吏，从创作主体层面看所表达的是作者的期待，因而其意义迥非一般。

陆游所写的47篇墓碑文中有14篇是为女性写的。这些女性身上体现出的孝敬公婆、贤惠、端庄、淑柔等传统美德，大抵可以视为陆游的妇女观。

《费夫人墓志铭》里的费夫人就是这样一个尽孝道的模范。丈夫在外地作官，她在家侍奉婆婆，其孝道比平时还要出色，谨慎，以至于“虽有疾，强自持不怠，至疾平，太夫人或终不知。”《青阳夫人墓志铭》中的青阳夫人也是如此。婆婆的衣食，她都安排得非常妥当。《夫人孙氏墓志铭》中的孙氏、《留夫人墓志铭》中的留氏、《杨氏夫人墓志铭》中的杨氏、《夫人陈氏墓志铭》中的陈氏、《孺人王氏墓表》中的王氏等具体表现虽然不尽相同，但在孝敬公婆道这一点上是没有区别的。在陆游看来，一个好的妇女还要

帮助丈夫成就功名,做一个贤惠的妻子。《陆孺人墓志铭》中的陆孺人“承议平生所与游,多名士,每客至,辄信宿留。孺人执刀匕,白首无倦色。”相夫教子是女人的天职,陆游深以为然。《留夫人墓志铭》中的留夫人,在儿子很小的时候,丈夫就去世了,与儿子相依为命。儿子长大后,想膝前尽孝,不忍出外访师求学。为了不耽误儿子的学业,留夫人便督促儿子外出,而且每次见到儿子回家谈论学问文章时,便大加赞赏,以此鼓励他上进,不要总是守在自己身边。看到母亲如此,儿子才放心远游,以致最终取得“学识卓然闻于世”的成就。她们大多温柔,善良,端庄,顾大局,识大体,有着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些中国传统女性的特征,并没有突破自汉代以来古列女传中所设计的那些束缚女性言行举止的种种条条框框。这暴露了陆游在当时来说并不先进的妇女观。显然,陆游的妇女观始终没有离开传统文化背景,他心目中的妇女就是“承先祖,主中馈”这样一种角色。

二

陆游的碑志文中有一篇很特殊的文字——《何君墓表》。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碑志文,因为它对墓主何逮的生平介绍相当简单,仅寥寥数语;大量的用来谈诗论诗,并提出了某些有价值的观点。这在同类文体中也是较为少见的。

前人论诗,较多强调诗在表达创作主体心灵世界方面的功用。“诗言志,歌永言”;“在心为志,发言为声”;“心之精微,发而为文;文之神妙,咏而为诗”等等都是这个意思。而陆游在《何君墓表》谈诗似乎不同于前人,他提出“诗岂易言哉?一书之不见,一物之不识,一理之不穷,皆有憾焉”之说。显然,他不是从诗在表情达意方面的角度切入,而是更多站在创作主体的层面予以审视。陆游在此更加重视诗人的生活积累和现实观察在诗的成败方面的影响。在他看来,要写出好诗,诗人就要多读书,多见识事物,多思考问题,多明白道理,否则写诗时就不可避免地留下一些遗憾。这种认识多少见出了某种现实主义的思维,体现出某种反映论的精神。当然,陆游的这种思想前人已有所涉及。“不学博依,不能安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作诗须多诵古今人诗”等都表达了类似的思想。

《何君墓表》有这样一段话:“同此世也,而盛衰异;同此人也,而壮老殊。一卷之诗有淳漓,一篇之诗有善病,至于一联一句,而有可玩者,有可疵者,有

一读再读至十百读,乃见其妙者,有初悦可人者,熟味之使人不满者。”这段话可以视为陆游对诗歌创作以及读诗的独特认识与感受。他谈得很好像很简单,但却揭示了文学界的某些现象。他的意思是说:同时代的诗人,其诗作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同一诗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艺术趣味;有的诗初读不怎么样,久读真味无穷;有的诗使人一见就喜欢,但不耐咀嚼等。这些见解既是对特定时期诗歌创作问题的观察,其实也隐含着陆游对文学史的某种总结和评价,同时大概也是陆游从事文学创作经验的夫子自道。他曾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见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郤。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陆游在《何君墓表》中还提出:“大抵诗欲工,而工亦非诗之极也。锻炼之久,乃失本指,斫削之甚,反伤正气。”这就是说,一个诗人如果只是在文字句法的雕琢中求工,是不可能得到成功之道的;作诗固然离不开形式技巧的锻炼,但锻炼过甚,忽略现实,则有伤诗的根本。这也是陆游关于诗歌创作中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深入思考。如果我们联系他在《文章》一诗中所强调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疵瑕,岂复需人为。君看古彝器,巧拙两无施。”以及《读近人诗》中所指摘的“琢雕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骨气多。君看太羹玄酒味,蟹螯蛤柱岂同科?”我们就可以看到陆游是多么旗帜鲜明地反对写诗过程中的形式主义。

《何君墓表》还对墓主何逮的淡泊名利作了肯定。陆游借此发挥道:“虽曰名不可幸得,以名求诗,又非知诗者。纤丽足以移人,夸大足以盖众,故论久而后公,名久而后定。呜呼艰哉!予固不足为知此道者,亦致其意久矣,顾每不敢易于品藻。盖彼皆广求约取,极数十年之力,仅得其所谓自喜者以示人,而我乃欲一览而尽,其可乎?”在陆游看来,作诗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要想创作出佳品来,必须下一番苦工夫。如果想在短期内以作诗求名,那是根本不懂得作诗。从而认为精品佳作是作家长期惨淡经营的结果,需要经过时间的严正考验才能确定的。“呜呼艰哉”这四个字是陆游发自内心的无限慨叹,是对何逮的赞美,同时也是他从事诗歌创作的经验之谈,又是对当时南宋诗坛上流行的浮躁风气的一种严厉批判。

陆游还对墓主何逮的诗作了评点。“予年近九十，病卧镜湖上，凡以文章来者，积架上，不能省。一日，取思顺诗读之，不觉起坐太息曰：‘今世岂无从事于此者，如思顺盖未易得也。不以字害其成句，不以句累其全篇，超然于世俗毁誉之外，予之恨不一见其人，甚于其人之愿见予也。’”这里所谓“不以字害其成句，不以句累其全篇，超然于世俗毁誉之外”，当然是赞美墓主诗歌的精粹干练的，但又何尝不可以看作是陆游对诗歌艺术精髓的深刻独特的理解。

三

碑志文最容易写得雷同。一般的碑志文，开篇皆是介绍墓主的祖宗三代情况。陆游所写碑志文则有意出新，尽量在文章开头处不断变换形式。《陈君墓志铭》以追述人物活动背景的形式开始，然后引出墓主陈彦声。过渡自然，一扫碑志文常有的板滞作风。《浙东安抚司参议陆公墓志铭》也是同样的形式。《杨夫人墓志铭》则以议论的形式开篇。另外，陆游的墓志铭有时是以记叙别人请铭经过开头的，如《留夫人墓志铭》、《尚书王公墓志铭》和《知兴化军赵公墓志铭》等。不过，陆游的这些写法在韩愈的碑志文中都能找到例子。因此陆子聿所谓“先太史之文，……于唐则韩昌黎，于本朝则曾南丰，是所取法”，大抵是切合实际的。

但陆游毕竟有自己的特色。除了上述几种主要形式的开头外，陆游还采用叙事与描写、抒情相结合的方法。如《惠定法师塔铭》中把自我的心路历程与对友人的赞美完美地结合起来，饱含真情地追叙与惠定法师的交往，且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其“不幸死矣”的痛惜。而《别峰禅师塔铭》的开篇方式更是别开生面，通过诗赋手法以山起兴，描摹、揭示自然景物，以引出别峰禅师，可谓笔锋婉转，意味深长。

陆游所写的碑志文墓主大多为他所熟悉的人物，或是其亲人，或是其恩师，或是其朋友，或是其同乡。由于大部分墓主与陆游是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所以情感性在陆游所写墓志铭中就体现得非常充分。

《山阴陆氏女女墓铭》是陆游碑志文中写得最为动情的一篇。“淳熙丙午秋七月，予来牧新定。八月丁酉，得一女，名闰娘，又更名定娘。予以其在诸儿中最稚，爱怜之，谓之女女而不名。姿状瓌异凝重，不妄啼笑，与常儿绝异。明年七月，生两齿矣。得疾，以八月丙子卒，敢于城东北澄溪院。九月壬寅，即葬北冈上。其始卒也，予痛甚，洒泪棺衾间，曰：

‘以是送吾女’，闻者皆恸哭。女女所生母杨氏，蜀郡华阳人。铭曰：‘荒山穷谷，霜露方坠，被荆榛兮。呜呼吾女，孤冢岿然，四无邻兮。生未出房奥，死弃于此，吾其不仁兮。’”陆游于淳熙丙午（即1186年）到严州作知州，时年62岁；随行赴任的家人有小妻杨氏。文中陆游对杨氏所生女儿闰娘十分爱怜，而她却不足一岁即不幸夭亡，这使陆游悲痛欲绝。这则文字看似平淡，实则哀婉深切，尤其最后几句铭文，将闰娘的安葬之所叙写得寂寥萧瑟，具有动人的情感力量。

真情的抒发不仅仅为亲人，也同样为朋友。在《青阳夫人墓志铭》中，陆游将诗人的纤细与敏感带进了墓志铭的写作中，并与多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水乳交融，使得板滞的应用文体在他的笔下焕发出诱人的艺术光彩。

有时，这种真情的抒发是因为朋友亲人的去世而想到了自己，强烈的感同身受，让陆游不能控制自己。《吕从事夫人方氏墓志铭》中叙写到吕祖平请陆游为其母写墓志铭时说：“祖平不夭，不得以斗升之禄养吾亲，视斯世尚何聊？惟图所以慰亲于九原者在墓隧之文乎？”这些伤心的话语令陆游想到了自己的凄凉身世，不禁悲中从来。

陆游平生交友甚多，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故友渐渐离世，于是他们的后代往往来请陆游为其撰写墓志铭。每当这个时候，陆游的那份敏感便会得到凸显，充满了对世事的良多感慨；述及故友，总是情意绵绵。《夫人孙氏墓志铭》写道：“予世家山阴，先太尉边夫人（陆游的曾祖母。——引者注），实与威敏夫人（孙综的曾祖母。——引者注）为女兄弟。予与宣义（孙综，孙夫人之父。——引者注），外兄弟也，少时交好甚笃。今夫人五十而歿，予乃及铭其隧，则予安得不老。”又如《监丞周公墓志铭》中的周必正是周必大的从兄，“某与益公（周必大。——引者注）定交五十年，且尝遇公于临川，适重九日，同集拟岘台，风度话言，尚可想也。”又如《孺人王氏墓表》中的王中是陆游好友王岬的女儿，好友司马伋的儿媳妇。“予与待制（司马伋）及季夷（王岬）少共学，情好均兄弟。……表孺人之墓，宜莫如予，乃泣而书之。”

陆游有高世之才，却屈居下僚。不得志的郁闷让他常常难以获得心理的平衡，所以他要将愤懑抒发出来。而碑志文这样一种文体给陆游恰好提供了一个发泄此等情绪的通道。为他人撰写墓志铭的时

候,墓主的不幸遭遇常常让他联想到自己,于是陆游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磊。

如《朝议大夫张公墓志铭》一开始就以较多的议论文字围绕张郟的不得志大发感慨:“呜呼!士有才足以任重责成,谋足以折冲经远,而不见知于人,不获用于时者,世固有矣,人犹未以为憾也。至于知之而不尽,用之而不极,利安元元之功,卒不克见,则后世读其事,至于悲伤叹息,有不能自己者。”陆游为张郟(在当时那样一个不怎么知名的人物)抒发如此强烈的感情,显然是在借题发挥。抒发对于不得志的人们的同情,并时时与自己的命运相联系,这种“代言的抒情方式”在陆游的碑志文中并不少见。在《孙君墓表》中,陆游对于孙椿年的不幸更是愤愤不平:“晚预特奏名,人皆谓公且遇合,乃复以不合有司入下第。……君年未六十,识者以为学识如此,安知终不合,而君不幸死矣。”仕途不顺,寿命亦不长,此乃天不佑善人乎?陆游对此发出疑问,他在铭文中发出了不平的声音:“呜呼!义修而命窒,施丰而报啬。”

陆游在《吏部郎中苏君墓志铭》中写到秦桧对正直之士胡铨、苏师德等人的迫害:

正议(苏师德)尝为枢密院计议官,同僚胡公铨上书诋时相,胡公既贬窜,正议亦株连去国,不调者久之。及来平江,适王晌为守,揣时相意,日窥伺正议。正议廉且公,无所肆毒。既去,而正议权府事,适中丞常公同卒于海盐,公为文歆之,语颇及时相。晌得之曰:“此奇货,可以逞。”即为告密之举。时相大怒,嗾御史劾奏,且曰:“常同,师德之友婿,且其子玘之妇翁。遣玘致祭,以库金三千缗贖之。”虽究得诬状,正议犹徙汀州,公坐停官。

这一段看似平静的叙述里实际隐含着陆游嫉恶如仇的怒火。这种抒情方法也许正是欧阳修在《论尹师鲁墓志铭》中所说的“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的“《春秋》之义”和“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的“诗人之意”。这是一种意在言外、婉而多讽的创作方法。

既然碑志针对死者,写作者往往要叙述墓主的身世、行踪乃至描述他(她)的言行举止,因而碑志文本身实际有一种塑造人物的可能性。陆游所写的碑志文也刻画了一些人物形象。《曾文清墓志铭》中写曾几在秦桧死后得到朝廷重用,召至行在所,因上论

称皇帝意,“太上大悦”,得到高宗的嘉赏,“除秘书少监”。作为一般的碑志文到此也就结束了,可是陆游不然,他在这里插入了一个细节。“公既以老臣自外超用,名震京师,及入朝,鬢鬚皓然,衣冠甚伟,虽都人老吏,皆感歆,以为太平之象。”一个历经沧桑、有着人格魅力的诗人形象呼之欲出。可见陆游刻画人物,往往寥寥数笔,顷刻之间就让人物跃然纸上,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又如《陈君墓志铭》写陈彦声,“有溃卒阻林莽,且数百人,彦声驰一马自往招之,皆感泣,愿效死。”一个勇敢有威望的将才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当得知陆宰一家去投奔他时,“越百里来迎,旗帜精明,士伍不哗。”凸显的是一个治军有法、纪律严明的军人形象。陆游还善于摹场景来刻画人物。《吏部郎中苏君墓志铭》有“闲无事,时出门徜徉,扶一童立里巷,老稚遥见,稽首祝之曰:‘愿吾父寿百千岁,为穷民归。’”的描写。通过这样一个场景,衬托出百姓对于苏玘的拥戴,说明了人心之所向。

中国古代碑志文在体式上很有特点,一般是前有散文,后有韵语。碑文前面的散文部分通常称为“序”或“志”,主要用于记事、叙理,或用散文,或用骈文。碑文后面的韵语通常称为“铭”,主要用于抒情、颂德,多是四言句式的颂体,但也有少数采用骚体(如韩愈的《柳州罗池庙碑》)、诗体(如陆龟蒙《野庙碑》有句云“既而为诗以纪其末”)、歌体(如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曰“使歌以祀公”等)。一般来说,碑文序长铭短。碑序由于要交代作碑原由、叙述事物发展始末,作者往往会把这部分内容写得较为冗长。^[2]总起来看,陆游的碑志文基本上遵循上述写作规则,但其艺术方面并未超越上述人等。由于这种情形,后人在研究古代碑志文时常常忽略了陆游的碑志文。实际上,陆游所撰碑志文一贯体现了其人其文的独特风格,个人印记是比较明显的,像他在《何君墓表》中表达的诗学思想,岂是可以忽视的吗?

[参考文献]

- [1] 褚斌杰.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2] 吴承学, 刘湘兰. 中国古代文体史话——碑志类文体[J]. 古典文学知识, 2009(3).

(责任编辑 南山)

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中的爱欲类型

孙 婧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通过对主人公的性心理和潜意识的挖掘,表现了文明与爱欲之间的冲突,根据冲突双方的强弱,大体可分为3类,第一类作品表现的是文明对爱欲的抑制,第二类作品表现的是爱欲的异化,第三类表现的是爱欲战胜文明的伟大力量。在他笔下,爱欲被提炼升华为一种理性的激情,这种肯定人性爱欲的作品,在今天的社会中依然会受到重视。

[关键词] 施蛰存; 心理分析小说; 爱欲; 文明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115-04

文学发展到20世纪,作家开始更为关注对人内心的探索。由于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加之其孤寂内倾和耽于“妄想”的性格,施蛰存开始了心理分析小说的写作。李欧梵曾说:“作为一个有原创性的作家,他是一个先锋,一个拓荒人,因为他敢于探入人全然陌生的内心世界,并大胆回眸那无理性的力量。他可能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派作家,在他的小说世界里,他很有意识地征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描述性压抑的潜流,一个既现实又是超现实的世界,为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提供了活的标本。”^{[1](P.168)}施蛰存用细腻的笔触去深入都市,深入尘封的历史,深入人的潜意识,描写人性和爱欲,堪称中国心理分析小说第一人。本文试图结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具体分析施蛰存小说中的爱欲与文明之间的冲突。

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构成理论,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3个部分构成。本我即原我,是指原始的自己,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主要由性本能即力比多驱使。本我按快乐原则行事,它不理睬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它唯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本我的目标乃是求得个体的舒适、生存及繁殖,它是无意识

的,不被个体所觉察。自我是自己可意识到的执行思考和判断的部分,自我的机能是寻求把外界的影响施加给本我及其倾向,并努力用现实原则代替本我的快乐原则,它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本我的爱欲和要求,又要用超我的理性和意志压抑和提醒本我要遵守社会文明规范,不能任意蛮干。超我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它按社会文明规范对本我冲动实施压抑,超我的特点是追求完美,所以它与本我一样是非现实的,超我大部分也是无意识的,超我要求自我按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满足本我,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本我是产生各种原始本能爱欲冲动的地方,它常常被压抑在无意识深处,处于人格最底层。因此“一个人出现在别人面前的形象就常常不是一个本来的‘我’的形象,而是一个压抑了本我,有着理智的自我,有时这种自我还带有不少超我的成分。”^{[2](P.162)}“文明以各种形式压制着人类的爱欲:或直接以外在道德规范剥夺性爱自由的权利,或以内在道德良心(外在道德规范的内在化)剥夺性爱自由的勇气。”^[3]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以精神分析为切口,复活一个个挣扎在文明压制下的城乡男女、英雄以及圣僧等,发掘他们本我中潜藏的爱欲和挣扎。

[收稿日期] 2012-06-20

[作者简介] 孙婧(1988-),女,安徽宣城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笔者认为,施蛰存在其心理分析小说中以爱欲和文明的冲突为题材,根据冲突双方的强弱,他的作品大体可分为3类。

一、文明的力量:文明抑制爱欲

第一类作品表现的是文明对爱欲的抑制使得人陷入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困境。弗洛伊德认为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具有三重人格:本我、自我和超我,后两者经常交织在一起形成双重人格。当外部环境的强大力量使自我感到无法调节现实与本我的冲突时,它就会产生有关外部世界的现实性焦虑;当在实际行动中违反了超我的“至善原则”,超我就以强烈的自卑感和内疚感来处罚自我,使它产生道德性焦虑;同样,当本我强烈的爱欲和本能无法实现,也会迫使自我产生神经性焦虑。

《梅雨之夕》是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的代表作,细腻地描写了都市人爱欲压抑尤其是性压抑所产生的微妙细微心理变化,展示了都市人紧张焦灼的“一种情绪,一种气氛,或是一个人格,而并不是一个事实”^{[4](P.353)}。小说的情节很简单:青年职员“我”在一个雨天里打着伞步行回家,在街头与一个躲雨的陌生姑娘邂逅,主动伴送了一程之后旋即分手。故事中情节淡化,人物形象也较为模糊,现实故事性的匮乏却为主人公提供了一次做白日梦的机会。在伞的遮蔽下,与陌生姑娘并肩同行的“奇遇”令“我”在平日里隐形的内心爱欲和难以言说的心理体验浮出意识之表。陌生少女仿佛是自己少年时代初恋的那个苏州姑娘,“我”怀疑她是在故意哄骗自己;同时,“我”觉得街上行人都朝自己投来质疑的眼光,甚至忽然发现自己的妻子“用着忧郁的眼光,看着我”。在与姑娘共同行走的短短路程里,“我”思绪不停涌动,始终笼罩在焦虑、猜疑、不安的情绪里。姑娘对“我”的防范和冷漠,“我”对姑娘的猜疑以及对路人的顾虑都显示出都市人相互隔膜、彼此猜忌的普遍心态,正如《梅雨之夕》中“我”所说:“上海是个坏地方,人与人都用了一种不信任的思想交际着。”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隔阂、不信任、冷漠的大都市里,人们内心的孤独和抑郁可想而知。主人公“我”过着极其单调无味的都市生活,过度的压抑导致“我”只得雨中漫步,在观察行人的过程中寻找乐趣,这种喜欢漫步街头的习惯正是人们内心孤独的外在显现。主动邂逅一位陌生姑娘,对“我”而言是内心爱欲压抑的一次勇敢的大释放,是“近几年来我并不曾有过”的经历,主人公的一系列联想和想象仅仅是他自己

被压抑的爱欲的一种释放和表达,而这种释放和表达却遇到了不可避免的阻碍——道德上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的感性投射便是主人公在路边看到的柜台边的女子。主人公始终觉得妻子就是那个“依在柜台上用嫉妒的眼光看着我和那个同行的少女的女子”。这次“奇遇”唤起了“我”潜意识中的某种爱欲、期待和幻想,却同时更加造成了“我”的困惑、怀疑与焦虑。对妻子,更准确地说是对社会所规范的文明的负罪感的始终存在使得主人公被压抑的性欲无法释放,从而最终陷于慌乱。

小说集《善女人行品》描写了一系列半新半旧的女性,都市现代文明带给她们很大冲击,然而传统的道德观念惯性又将她们抛入与都市环境格格不入的尴尬境地。例如《春阳》主人公蝉阿姨由于抱着牌位成亲而获得了大宗遗产的继承权,却只能过着清心寡欲的寂寞生活。她想丢掉财产去追求新的婚姻,但潜意识的本能爱欲在传统道德观念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小说着重刻画了蝉阿姨被压抑的本能爱欲的一次骚动。她在一个春光融融的日子到上海银行去取钱。温暖的“春阳”使她产生了一阵骚动,年轻的职员与中年绅士成了她爱欲的对象。她在自己的白日梦中做了一次反抗,但一切都归于失望。蝉阿姨的形象代表着一群受都市诱惑却依旧受到传统文明压抑的人,比如《雾》中的素贞小姐,《鸥》中的小陆等,她们在内心深处渴望去拥抱这五光十色的大都市,然而面对现实和传统的对抗,她们同《梅雨之夕》中的青年职员“我”一样,长期受到精神和人性的压抑,渴望改变却无力改变,经过一番内心挣扎后,最终还是在爱欲中退守,再次回到原先“好男人”或“善女人”的生活轨道中。

《上元灯》集子中的《周夫人》也显露了这一点。周夫人是个不愁衣食的寡妇,并且可以与邻居在骰子中消磨时光。但是作为一个“人”,她也需要感情与生理上的慰藉,然而她长期得不到,人性的欲求长期受到压抑。于是在碰到“我”眉目传情,在拥抱抚摸“我”的幻想中求得精神的满足。这是生命本我意志在现实压抑中的病态表现。

二、爱欲与文明的斡旋:爱欲变态

第二类作品表现的是爱欲的异化和变态。文明建立在压抑本能的基础之上,文明越发展,人类所遭遇的约束和禁忌也就越多,人只能不断牺牲本能爱欲的满足换得在公众中的合法生存。弗洛伊德认为爱欲受到压抑后长期不能得到适当的宣泄,便会导

致性心理的变态或其他心理障碍,反而使爱欲以变态的方式发泄出来。

在《石秀》中,施蛰存把石秀从历史语境中的“拼命三郎”还原成现实语境中的凡夫俗子,形象地写出了石秀从对潘巧云的爱恋到对自我的道德拷问,从对欲念的压抑到最后变态施虐的过程。“他暗恋潘巧云,对她想入非非,在窥探中获取性的满足,可是他在与潘巧云的现实交往中又感到恐惧,显得畏缩而无所适从。人物的这种矛盾心态,似乎是由于对杨雄的友情而产生的,但这只是一种假象,真正的原因是石秀根本上就是一个性变态者”^[5],在“朋友妻,不可戏”的传统道德观下,他的爱欲只能借助一种变态的刺激获得满足。施虐是石秀最为突出的性畸变倾向,弗洛伊德认为“当一个人不得不放弃一个性对象时,在他的自我中常常会发生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只能被描述为对象在自我之内的一种复位,就像在抑郁症里发生的那样”^{[6](P.130)},性的本能由于不能得到满足会产生变态反应,便“走向反面”即由爱生恨,在对原来爱欲对象的施虐行为中感到性的兴奋。“性本能的施虐狂部分是本能融合服务于一个有用目的的典型事例;施虐狂促使它自身独立的这种性反常行为则是解离……出于发泄的目的,破坏性本能习惯上是为爱欲服务的。”^{[6](P.138)}石秀进勾栏,在和青楼女子的厮混中,他想象着潘巧云看到后所感受的羞耻和悲哀,兴奋起来,“一个施虐恋者的施虐目的,是要通过使对方受罪,激起她的情绪,从而也激起自己的情绪”^{[7](P.261)}。石秀的这种报复,正是一种施虐的表现。当小刀划破了青楼女的手指,女人的血“像一粒透明的红宝石,又像疾飞而逝的夏夜之流星”呈现时,石秀体内的性欲被重新燃起,这种变态的满足触动了石秀的杀人念头。看着被分解的“桃红色的肢体”,石秀的强烈的爱欲终于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

《在巴黎大戏院》细致地摹写了一个已婚男子在恋爱中的患得患失,在狂躁的爱欲冲动和无法忽视的道德焦虑中,他从开始怕人看见到最后除下结婚戒指,在与文明的激烈斗争中,爱欲逐渐占了上风,与此同时,长时间得不到正常宣泄的爱欲也使他逐渐产生了一种心理畸变,即通常所说的“恋物癖”。吮吸着粘有鼻涕和痰迹的女伴的手绢,他竟感到有一种微妙的麻颤,有“抱着她的裸体的感觉了”,在这种舔舐手绢的恶心行为中,他的变态情欲得到发泄。

“性变态为社会和道德所不容,这就导致焦虑。

为了避免焦虑,性冲动就化装,以不带性色彩的神经症状表现出来,这样既可以使受压抑的性欲得到满足,又避免了道德的谴责。神经症状是性满足的替代物,是非理性爱欲的象征性满足。”^{[8](P.272)}焦虑、恐惧和荒诞的色欲想象交织在一起,《魔道》《夜叉》中主人公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这样一种精神病态。《魔道》中的主人公“我”在荒诞的想象中燃烧着超现实的色欲,幻想着去亲吻“古代的美貌王妃的木乃伊”“散着奇冷的麝香味的嘴唇”,这个“超现实主义色情”使“我”恍惚迷离,在陈君的家中,面对着美艳的陈夫人,“觉得纳在嘴里的红红的番茄就是陈夫人的朱唇了”,同时“我”一直对穿黑的老妖妇的恐怖印象耿耿于怀,既耽于美色,又将美貌王妃的木乃伊、陈夫人、村女的母亲、咖啡女子等一一附会为会魔法的黑衣老妖妇的化身,一方面情不自禁被吸引,一方面又不断地恐惧逃避,这些变态的情绪和行为其实都是主人公平素久经压抑的性心理一种非正常的展露。

三、爱欲的力量:爱欲战胜文明

施蛰存小说的第三类爱欲主题表现的是爱欲战胜文明的伟大力量。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爱欲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力比多,它是不可能完全被文明所克服的。文明对爱欲的压抑严重违背自然人性,最终是要被爱欲的强大力量所冲破的。

《将军的头》描写“种族与性爱的冲突”^{[8](P.804)},作者把花惊定由战功赫赫的大将解构为陷入情爱纠葛的普通男子。有着吐蕃血统的花惊定奉命征讨进犯大唐边境的吐蕃军队。在进军途中,他陷入了“替大唐尽忠”或者“归还到祖国”的矛盾中。当他看到那位美丽的汉族少女,“骤然感觉了一次细胞的震动”,即使感受到被他正法的首级的嘲笑,即使国家责任与民族大义的矛盾都退居其次,也无法驱散他对少女的爱恋。他表达自己爱意的坚决:“即使砍了首级,也一定还要来缠扰着姑娘。”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被吐蕃将领砍下首级,没了头的花将军依照誓言,跑回到少女身边,少女的嘲讽使他感到一阵空虚,最后倒地身亡。在这里,没了首级依然奔跑的超现实主义描写,恰恰表明本能爱欲战胜文明的强大力量:将军并没有因失去首级而死,却因支撑他生命的性欲本能的消失而亡。

《鸠摩罗什》是“中国人写的佛教徒肉肉冲突的记录”^{[10](P.343)},鸠摩罗什从神圣的佛堂走到了声色犬马的人间。身为高僧的他未能抑制己之爱欲而与

幼时相好的表妹结婚。婚后,他为自己的行为深感悔恨和焦虑,他陷入了“一种是如从前剃度的时候一样严肃的想把自己修成正果,一种是想如凡人似地爱着他底妻子”的矛盾中。正当鸠摩罗什试图以妻子的死为契机来摆脱尘世爱欲的羁绊时,然而,她临终前的那个吻却象征了俗世爱欲的符咒,注定将纠缠他一生。随后娇艳的名妓孟娇娘的出现触动了鸠摩罗什久被压抑的爱欲,在情欲与宗教戒律的夹击下,他一步步逸出了原有的生活轨道,当国王赐给他宫女和妓女时,鸠摩罗什清醒地认识到“自己非但已经不是一个僧人,竟是一个最最卑下的凡人了”。小说结尾,国王决定由鸠摩罗什处理僧人的宿妓,鸠摩罗什不得已之下只得以吞针的魔法来证明自己卓越不凡的功德。在吞食最后一把针时,妻子幻影的出现使鸠摩罗什发生了偏差,有根针刺在舌头上,无法吞咽下去。于是,这个作痛的舌头成了作品中最为鲜明的意象,它指涉着鸠摩罗什内心深处无法消弥的爱欲。将军也罢,高僧也罢,都抵不过爱欲纠缠。

“爱欲”两字在中国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都是一个禁忌。不论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统治策略,还是为“发乎情止乎礼”的道德要求,爱欲都被大部分文人政客隔绝于正史记载里。直到五四时期,爱欲才正式走进文学的殿堂。鲁迅通过描写两性之间的爱欲来揭露国人肮脏病态的心理;郭沫若通过描写潜意识里的性欲望去表现“自我”意识,彰显人的尊严和个性解放;郁达夫则通过挖掘潜藏在内心的性欲去揭示主人公苦闷挣扎的灵魂;沈从文通过肯定人作为自然之子的性欲去唤回人的自然生命形态;张爱玲通过笔下人物的爱欲纠缠去表现时代解体中小人物的命运和对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的追求。在施蛰存这里,爱欲描写不是表现手段,也不服务于任

何其他目的,心理分析本身便是作品的目的。他揭示人的爱欲与文明的冲突,展现文明对人的爱欲的扭曲与压抑,力图将主观感觉投射到描写客体中去,利用多样化的结构方式和古色古香的语言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审美世界,在他笔下,爱欲被提炼升华为一种理性的激情,这种肯定人性爱欲的作品不仅在30年代堪称独步,在今天的社会中依然会受到重视。

参考文献

- [1] 李欧梵. 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2] 王宁. 文学与精神分析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 [3] 韩彬. 徘徊在爱欲和文明之间——试论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J]. 潍坊学院学报,2006(1).
- [4] 陈子善,徐如麒. 从亚伦坡到海敏威[A]. 施蛰存七十年文选[C].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 [5] 花家明. 一个施虐狂的心灵历程[J]. 名作欣赏,2007(8).
- [6]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自我与本我[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 [7] [英]霭里士. 性心理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8] 郭永玉. 孤立无援的现代人——弗洛姆的人本精神分析[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 [9] 陈子善,徐如麒. 《将军的头》自序[A]. 施蛰存七十年文选[C].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 [10] 苏雪林. 心理小说家施蛰存[A]. 苏雪林文集(第三卷)[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师 语)

漫舞的喜剧 灰色的羽翼

——论中国90年代以来喜剧电影的灰色幽默

张 冉

(宿迁学院教师教育系, 江苏宿迁 223800)

[摘要] 区别于黑色幽默,灰色幽默成为90年代中国电影共同拥有的喜剧风格,文化承载赋予幽默以深度,给予喜剧电影以厚重,让观众含泪而笑。它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融,注重空间表现,以小人物英雄为主要形象,洋溢着浓厚的生活色彩,反思深入文化层面。这种风格在中国的土壤上产生和生存有其独特的原因。

[关键词] 喜剧电影; 灰色幽默; 黑色幽默

[中图分类号] I207.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119-04

喜剧源于古希腊酒神祭祀的民间歌舞,是为了庆祝五谷和葡萄的丰收,并向酒神表示感谢,举行的载歌载舞的祭祀。喜剧可以追溯确凿的源起,却没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国内喜剧的定义可以从《现代汉语词典》中可见一斑。喜剧是“戏剧的主要类别之一,多用夸张手法讽刺和嘲笑丑陋、落后的现象,突出这种现象本身的矛盾和它与健康事物的冲突,往往引人发笑,结局大多是圆满的”^[1](P.1350)]。这种定义既有中国本土特色,又有其局限性,即:将喜剧的表现对象局限在“丑陋、落后的现象”,表现手法局限在“夸张”“讽刺”和“嘲笑”。在《现代汉语词典》定义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喜剧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喜剧指在戏剧冲突中,不断释放前情,通过巧合、误解、突转等结构和叙事技巧的运用,形成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不协调,引人发笑,最终走向和谐,并传达一定的对社会、人生价值思考的剧种。广义的喜剧指轻松搞笑的戏剧。本文倾向于狭义的喜剧,因为广义的喜剧无疑囊括了一些艺术价值尤其是人文价值微薄的打闹剧。

当喜剧的特质通过电影手法的运用被诉诸影像时,喜剧就发展成为喜剧电影。世界喜剧电影可以追溯到法国卢米埃尔的《水浇园丁》,可谓历史悠久。

而中国的喜剧电影创作一直处于压抑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娱乐性的探讨兴起,中国的喜剧片创作才越来越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娱乐需求的日益增加,尤其是进入90年代这个大众文化为主流的时代,作为主要娱乐形式的喜剧片创作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犹如漫天飞舞的雪花,在兴起娱乐化浪潮的中国大地上融化,并且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外延宽广的片种。

一、漫舞——90年代以来喜剧电影的创作

中国电影一直贯穿着民族化的现实主义美学。在众多电影人的辛勤劳作中,中国电影迎来了百年华诞。如何评价百年的中国电影学术界颇有争论,各位学者的评价体系也不一样。但在一定层面上也形成了共识,即:一方面,中国要与世界接轨,借鉴好莱坞美学的商业性、技术性、明星制等,另一方面,又要向电影的民族化、本土化、区域化投入更多的目光。“特别是那些文化权力相对弱小的民族/国家,如果没有坚守自己的民族文化特性,以文化的差异作为开拓民族文化的国际生存空间的武器,便极有可能使文化的流动与交换变成单向的,一味被动地

[收稿日期] 2012-03-01

[作者简介] 张冉(1984-),女,江苏宿迁人,宿迁学院教师教育系讲师,硕士。

接受强势文化的入侵,进而在全球化进程中沦为巨服的对象。”^{[2](P.90)}以屈服的姿态放弃民族文化,来进入全球文化语境的道路是不可取的。回顾百年中国电影,从第一批拍摄的戏曲片,到新电影运动,再到十七年电影,无不闪烁着民族文化的艺术光辉和对民族、社会、个人生存状态的关注与反思的现实主义美学的光芒。既有民族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现在越来越成为理论界趋同的基本评价原则,尽管具体的评价体系尚在完善之中。

这种电影文化的承载姿态,曾一度使得中国的喜剧片处于压抑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的多数喜剧片天生便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90年代国外大片涌入,国产电影出现了颓势。然而,喜剧片的创作一直在默默地以其特有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与国外大片分庭抗礼。张艺谋导演的《活着》(1994)、《有话好好说》(1997)、《幸福时光》(2001)以独特的幽默和艺术魅力征服了观众。第五代的另一位宿将黄建新,以一贯不事张扬的风格拍摄了《站直啰,别趴下》(1992)、《背靠背脸对脸》(1994)、《打左灯向右转》(1996)、《埋伏》(1997)、《睡不着》(1998)、《说出你的秘密》(2000)、《妈妈到了更年期》(2001),用喜剧的形式对现实予以理性的关注。路学长的《卡拉是条狗》(2003)、陈大明的《鸡犬不宁》(2006)、宁浩的《疯狂的石头》(2006)等赢得中国观众的青睐。尤其是游走于商业和艺术之间的冯小刚更是中国的喜剧片英雄,屡屡创造票房的神话。从《甲方乙方》(1997)开始,先后导演《不见不散》(1998)、《没完没了》(1999)、《一声叹息》(2000)、《大腕》(2001)、《手机》(2003)、《天下无贼》(2004)、《非诚勿扰》(2009)、《非诚勿扰2》(2010)等形成了“冯氏”喜剧风格,也形成了中国观众对国内喜剧电影审美的期待视野。

近3年的喜剧电影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观众,比如宁浩的《疯狂的赛车》(2009)、田蒙的《倔强的萝卜》(2009)、李蔚然的《决战刹马镇》(2010)、叶伟民的《人在囧途》(2010)、孙达的《房不剩防》(2011)。喜剧片有了肥沃的存在土壤和广阔的生存空间,同时承担了本土电影对当下民众的生活、工作、生存、人性等的思考。而其他一些名声在外的片子,不是倾力表现武侠奇观,如《英雄》《十面埋伏》,就是将摄影机转向过往的岁月,如《孔雀》《青红》。这些电影习惯性地逃避当下现实,忽略中国人当下的喜怒哀乐,将此重任旁卸给了喜剧电影。于是,喜剧片就在当代文化的承载中起舞。

文化承载赋予幽默以深度,给予喜剧电影以厚重。深度的幽默给中国大地上漫舞的喜剧电影插上了灰色的翅膀,这也是近来中国喜剧电影不同于好莱坞喜剧电影的一项独立而又孤傲的文化品格。笔者将此类喜剧电影中的幽默称为中国特色的“灰色幽默”,以区别于美国六十年代兴起的黑色幽默。

二、灰色——灰色幽默与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是一种绝望的幽默,带有深厚的悲剧意味。这种幽默在美学上属于喜剧,但是它的“黑色是指可怕而又滑稽的客观现实”^[3],它的“幽默指的是有自由意志的个性对这种现实所采取的嘲笑态度”^[3]。它藐视黑暗的现实,举重若轻地对待这个将人压迫到生存边缘的社会,甚至嘲笑死亡。幽默中的黑色成分大幅度增加。黑色幽默电影中的人物,通常像欣赏艺术品一样,欣赏着自己或他人身上的伤痕。“荒诞滑稽与冷漠恐怖的融合,构成了黑色幽默的独特性。”^[4]黑色幽默电影常常会引起恐惧的观影心理,观众笑的同时,也难免不寒而栗。因此,黑色幽默也被称之为“大难临头的幽默”“绞刑架下的幽默”等。

与黑色幽默比较,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灰色幽默。灰色幽默是充满温情的含泪的笑。它大多不具有危险性,即它通过不导致恐惧的不协调引人发笑,又通过笑引发思考。笑得不轻松,但也不恐惧。正如法国超现实主义大师阿拉贡所说,让人“既笑得浑身颤抖,而又止不住眼泪直往上涌”。与黑色幽默相比,灰色幽默往往是“无人受到伤害”^{[5](P.102)}的喜剧。

三、漫舞中的灰色——国产喜剧片的主要类型

90年代以来的喜剧电影,多具有灰色幽默的美学风格,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的新式喜剧电影,有别于传统意义上鲁迅所界定的“把不好的东西撕破了给人看”的喜剧。当然,中国喜剧电影也出现了黑色幽默的色彩,如冯小刚导演的《大腕》、陆川导演的《寻枪》,但是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绝望的喜剧”,而《大腕》这类喜剧电影,只能称为带有黑色幽默色彩的“灰色幽默”。正如导演冯小刚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大腕》这部作品称不上黑色幽默,充其量也就是个灰色幽默。国产喜剧片中充盈着灰色幽默,而非黑色幽默,具体从以下5个方面体现出来。

1. 从影片的表现形态上看,注重空间表现。喜剧电影通常把讲述的故事放在空间层面上展开。时间退居二位,从属于影片的空间表现。影片通过空

间场景推进带动情节进展。如冯巩导演的《心急抓不了贼》，影片选择贼多的地方作为事件场景，从马路上到公交车上、歌舞厅中，抓了贼后，押送公安局。冯小刚的《甲方乙方》，不同的梦就是一个不同的场景转换，在独特的人为营造的场景中，讲述故事。《天下无贼》中，冯小刚甚至直接把故事发生的场景大部分投放在火车上。当观众观看了一部喜剧片后，他们印象最深的也正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多少年后，当人们重新谈论起《天下无贼》，或许会淡忘影片中的经典台词，但绝对忘不了故事的发生场景——火车。

喜剧电影注重空间表现的原因在于空间有利于构造幽默，主要体现在空间中的灰色幽默。《甲方乙方》中，书店老板想当巴顿将军，于是，造梦人营造了战场，在与现实环境的对比中，令人啼笑皆非。这样一个虚构的场景，观众在喜悦的同时，也深深地体会了主人公对理想的期盼，以及理想受挫的无奈、困惑。灰色幽默便在空间的塑造中自然而然产生。如果在空间中竭其所力地夸张、对比，灰色幽默的效果将更为明显。中国灰色幽默电影中空间场景的选择不同于国外的黑色幽默电影。国外的黑色幽默电影所选择的场景多阴森恐怖，常常把人逼到绝境，如《肉食店》的主要场景肉食店就是一个杀人、卖人肉，将每个旅客都逼到死亡边缘的环境。

倾向于空间的故事讲述方法，也有其叙事原理上的合理性。罗伯特·麦基在他的编剧理论著作中曾述：“理想的场景即是一个故事事件。”^{[5](P.42)}一定程度上，这句话可以追溯为空间叙事的理论依据。值得注意的是，笔者所说的空间叙事，仍然是以时间为依托的，并非后现代的无规则拼接。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时间，但没有取代时间。当时间不存在，或者成为从属于人的精神状态的主观体验范畴时，这种叙事方法便成为意识流叙事，远远超出了本文的探讨范畴。

2. 从影片的哲学归依上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融。中国的喜剧片中融合了后现代性的元素。90年代，后现代这股风吹遍了理论界和创作界。后现代“是三头六臂、从不同的方向挥手而来，转眼间便是既老又年轻”^{[6](P.113)}。传播的速度很快，报刊杂志到处都是关于后现代年轻而又老成的论述。喜剧片的创作中也融入了后现代的元素，并且在这些后现代元素中体现着灰色幽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调侃和戏仿。冯小刚等导演的影片中，王朔式的调侃语言俯拾皆是。调侃本身就是消解，消解社会观

念、价值观念，消解历史和权威。戏仿是一种在原著的基础上采用夸张等各种手法消解原著的严肃性和原创性。刘镇伟编导的《大话西游》就是典型的例证。

更能体现灰色幽默特质在于中国喜剧片在后现代的消解中，依然有所建构，有破有立。几乎每一部国产喜剧片都有明确的主题或探寻的方向。如黄建新的《谁都有秘密》，在夫妇俩的互相猜疑中，依然建构着爱情、亲情，依然回归了社会的伦理道德。尽管“破”和“立”在香港和大陆的喜剧片中各有侧重，但“立”仍然或多或少存在于每一部喜剧片中。而黑色幽默是后现代的典型表现，它极端地藐视生存和死亡，藐视自己，在没有丝毫生气的调侃中灭亡。

3. 从影片的人物塑造上看，以小人物英雄为主。黑色幽默塑造反英雄，而灰色幽默塑造小人物英雄。反英雄常常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嘲笑自己所尊重的，破坏自己所建树的，否定自己所肯定的，抗议自己所接受的”^[3]。而中国灰色幽默片所塑造的是“灰色英雄”，或者称为“小人物英雄”。导演们将关爱的目光投向社会底层的人、日常生活中的人。这些小人物一方面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对自己的生活境况不乏自嘲，另一方面身上也有闪光的道德亮点，是社会底层小人物中的英雄，承担着大众的伦理建构。无论是《埋伏》《谁都有秘密》《谁说我不在乎》，还是《天下无贼》《大腕》等等，塑造的主人公都是这种类型的人物。2005年冯巩导演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中的主人公刘好，他调侃自己的生活，从自己的生活中寻找乐子。尽管他是个生活艰难的三轮车夫，也不忘帮助其他人，把自己仅有的五千元拿出来帮助不相识的卖菜的陈红。“从生存艰难的角度说，（喜剧）也是人类对自己生存状态的一种反抗形式。”^{[7](P.185)}小人物反抗着现实生活，但他们的精神是充实的，在悲苦中偷着乐。

4. 从影片的表现内容上看，具有浓厚的生活色彩。灰色让人联想起土色和俗气，其实灰色幽默也正具有这种生活原生态“俗”的色彩。中国的喜剧片将镜头对准了大众的生活。浓厚的生活色彩是中国喜剧片的一大特色。如黄建新、冯小刚、张艺谋导演的喜剧片，都以生活为取材的对象、思考的对象。《谁说我不在乎》讲述了普通家庭主妇在家里翻天覆地找结婚证的故事；《手机》表现了已经深入千家万户的手机这一媒介，对大众生活产生的负面影响；《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是普通老百姓生活嫁娶的影像呈现……讲述老百姓自己生活的故事，喜剧片为自

己,甚至是中国电影赢得了观众。中国的喜剧片创造性地利用了民众既有的文化心理积淀,从民间大众的历史和现实意识出发,建构自己的影像。甚至通过此,喜剧片实现了大众文化的连续性建构和统一性认识,形成了观众特定的中国喜剧片期待视野。如冯氏喜剧已经成为了中国大众每年岁末的期待,成功地营造了商业氛围,形成了人们欣赏的连续性,也就保证了票房,更是从电影发生学商业特征上,保证了电影生产的连续性。

中国喜剧片将镜头对准大众的日常生活,是有其深层原因的。“对中国而言,工业化时代刚刚到来,一种肯定大众物质生活主角身份的大众文化也刚刚开始。”^{[8](P.142)}工业时代,大众的物质生活主角地位才第一次得以确立,经济决定政治、文化,物质生活的主角必然规约文化主角地位的确立。而大众文化的确立必然规约文艺表现大众的生活、心理和集体无意识。

5. 从影片的文化承载上看,反思从社会层面到文化层面。中国近十年的喜剧片带有现实主义色彩。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在喜剧片中反思问题比照相艺术更真实,甚至比生活更真实。正如B.日丹在《影片的美学》中所述:“艺术的真实(因而)要比记录式的逼真性和照相式的准确性更为深刻。”^{[9](P.131)}社会真实通过艺术得以浓缩。

导演在喜剧片中的反思不断深入,从社会层面发展到文化层面。随着第二次文化转型(改革开放)的到来,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贫乏的、政治化的、单一的生活方式被抛弃,人们越来越追求富裕的、世俗的、丰富的生活方式,发现了世俗的感性生活,重新发现了人。因而,近年来的喜剧片多杂取生活的种种百态,从文化层面来反思人。如《天下无贼》从善和恶的对比中,展现人道德良心的挣扎,思考弃恶从善后的结果;《求求你表扬我》中一个生活贫困的人要求精神上的表扬。这两部片子无疑都将人从社会层面提高到了文化层面,从精神层面展现人的堕落、人的觉醒和人的自我提升。

结语

灰色幽默已经成为了中国喜剧的一大特色。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灰色幽默产生的主要原因。儒家文化要求人“不愠不喜,冥兹愠喜”(《世说新语》),使得中国人生性含蓄稳重,即便是笑,也是一种含蓄的笑,会

心的笑。同时儒家文化倡导和谐,崇尚节制,所以“讽刺”“批判”“悲剧”一切都有节制,黑色幽默中的绝望在中国最多只是灰色幽默中的同情。第二,第二次文化转型给中国人带来了后现代等一系列的西方哲学思想,人们越来越成为波德莱尔构想的“巡游者”。这是一类人,他们在人群中游走,脑子里是不断地被嵌入、随即又消失的行人的面孔和城市的意象。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传统的节日和一些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逐渐丧失。人们越来越懒于思考,安于享乐。灰色幽默一方面是幽默的一种,现代人愿意接受,另一方面幽默中的思考可以悄悄地潜入大众的脑海,提高中国大众的电影欣赏水平和文化层次,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第三,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拥有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他们将关切的目光投向社会底层,使被忽略的阶层成为被关注的中心。在影片中,他们都有意识地投入了自己的思考。如黄建新拍摄《求求你表扬我》时说:“在这部电影里我是呼唤单纯、信任和理想。我用的方法是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不断剥离。”^[10]深厚的人文关怀使他们的喜剧电影深思为主,幽默为辅。

[参考文献]

- [1] 丁声树.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 [2] 孟建,李亦中,[德]StefanFriedrich. 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 [3] 赵焕茹,孙雪娥. 黑色幽默:荒谬的真实与绝望的喜剧[J]. 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3).
- [4] 修侗. 当代中国电影中的黑色幽默[J]. 电影艺术, 2005(1).
- [5] [美]罗伯特·麦基. 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
- [6] [澳]约翰·多克. 后现代与大众文化[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 [7] 周星. 中国电影艺术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8] 蓝爱国. 后好莱坞时代的中国电影[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9] [苏]B. 日丹. 影片的美学[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
- [10] 李韧. 《求求你,表扬我》:将荒谬进行到底[J]. 电影艺术,2005(4).

(责任编辑 师 语)

论假想敌与卡夫卡创作思想的关系^{*}

黄 晖

(扬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2)

[摘要] 对卡夫卡笔下的父亲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 探寻卡夫卡形成假想敌创作思想的各种因素, 并通过分析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以及卡夫卡对克尔凯郭尔的批判, 来探究卡夫卡假想敌思想的形成根源。

[关键词] 假想敌; 父亲; 卡夫卡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123-04

假想敌是指为了达到某个目的或者目标而假想出来的对手。每一个作家都在寻找自己的假想敌, 或具象或抽象。它是作家创作的源泉, 也是作家挥之不去的心理暗示。在卡夫卡的笔下, 父亲是他最大也是最直接的假想敌。他是那么高大魁梧, 以至于一辈子都要生活在他的阴影中: “我又瘦, 又弱, 又细; 你又壮, 又高, 又宽。” “你在我眼里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我牵着你的手, 作为一副小小的骨头架, 光着脚站在木板上站都站不稳, 怕水, 又没有能力模仿你的游泳动作。”^{[1](P.397)}外表上的巨大差距在卡夫卡心中深深地埋下了自卑的种子, 当这颗种子发芽长大之时, 卡夫卡内心对父亲的反叛也到了极点, 现实的压抑在写作中得到释放。

一

《判决》中的格奥尔格就是一个典型的父亲形象。年轻的商人格奥尔格满心欢喜地觉得将要掌管自己的全部世界, 父亲的一句“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就结束了他的生命。投河之前他还低声喊道: “亲爱的父母亲, 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弑父的结果是自我牺牲, 父权的威严再一次巩固了它那不可动摇的地位。卡夫卡企图在文学作品中完成对父亲的叛逆, 但始终未能如愿, “那个巨大的人, 我的父亲, 审判我的最后法庭, 会几乎毫无理由地向我走

来, 而我在他眼里就是这样无足轻重。”^{[1](P.396)}

与格奥尔格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 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大得吓人的甲壳虫, 但这只是悲剧命运开始。父亲一开始就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拳头敲着门大声叫喊, 催促格里高尔去上班赚钱养活全家。当看见儿子变成甲壳虫时, 父亲竟羞愧难当, 不闻不问。最后父亲扔出的苹果砸到了他的背上并且陷了进去, 要了格里高尔的命。人变成虫也不能逃脱被父亲摆布的命运, 卡夫卡用近乎荒唐的想象诠释了父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让人唏嘘不已。

在卡夫卡的另一篇小说《司炉》中, 16岁的卡尔·罗斯曼一开始便被他的可恨的父母亲送往美国, 原因是他受家里一个女仆的引诱, 而且这个女仆还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小说就以卡尔的被放逐为开端, 讲述他在异国他乡的遭遇。儿子的被放逐成为故事发生的导火索, 这似乎也是对父权世界的一种控诉。儿子原本应该带给父亲荣耀, 让父亲脸上生光, 犯错后, 并不会得到改正机会, 放逐是理所当然的。卡尔被抛弃了, “就像人们把一只惹人生气的猫扔到门外那样”。虽然他的过错“只要把它一说出来就足以获得别人的谅解了”。这样的惩罚是父权野蛮的表现。

*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08 年度项目“后殖民统散文学”(项目编号:08JC752009); 国家社科基金 2010 年度项目“小学诗学研究”(项目编号:10CWW010)。

[收稿日期] 2012-04-20

[作者简介] 黄 晖(1971-), 男, 江苏丰县人,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学博士。

在《致父亲》中，卡夫卡详细回忆并描写了父亲的一言一行对自己造成的巨大影响。卡夫卡曾托母亲转交此信，但母亲阅后恐得罪父亲，影响父子之间的关系，便退还给卡夫卡。虽然这封信并没有到达父亲的手中，但卡夫卡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他与父亲这个巨大的假想敌的决裂。

童年的商店记忆给卡夫卡留下了恐惧的印象，这种恐惧来自父亲的一言一行。父亲会把他平时不希望与其他商品搞混的东西猛地一下从柜台擢到地上，然后命令店员捡起来。卡夫卡觉得只有愤怒时失去理智才可以稍稍为父亲开脱。父亲常常对一个身患肺病的店员说：“你死了算了，这只病狗。”他还把职工称为“受雇的敌人”。父亲的这些言行使卡夫卡感到自己积聚了越来越多的犯罪感，后来他在保险总公司因为无法忍受那里的骂人而辞去工作。这种痛苦的敏感，卡夫卡在家里已经根深蒂固。卡夫卡同情店员，同情公司职员，其实更像同情自己在父亲的阴影的笼罩下无法自拔。

父亲的教育方式让卡夫卡窒息，斥骂、威胁、讥讽、冷笑还有奇怪的自责在卡夫卡身上从未失效过。父亲骂人的字眼层出不穷，在家里、在店里，几乎无处不在。幼年的卡夫卡被这些骂声震得麻木不堪，那些骂声就像打在自己身上的鞭子，疼痛难忍。卡夫卡总是把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因为他觉得被骂的那些人肯定不比自己坏，而且父亲对他们的不满肯定超过对自己的不满。这种潜移默化的心理转移让卡夫卡愈加坚定了对父亲的叛逃。更加让他不满的是，把骂人当作日常生活的父亲，却在别人骂人时加以谴责与禁止，这些也像日常生活一般自然。父亲“谜一般的无辜与不可侵犯又显示出来了”。

父亲的威胁让斥骂更具威力，卡夫卡的恐惧也就更深。童年的卡夫卡对父亲类似“我要把你像条鱼一样撕碎”的威胁深信不疑，这与他对他伟岸的父亲的大力量的想象相符合。更让卡夫卡觉得可怕的是，父亲总是吼叫着围着桌子跑，做出要抓住谁的样子，巨大的身躯扑向瘦弱的卡夫卡，的确足以让他魂飞魄散。父亲的威胁有时更像是诅咒，当卡夫卡开始做一件父亲不喜欢的事情时，父亲就用失败来威胁他。父亲的威胁像无法挥去的咒语始终缠着卡夫卡，直到事情跌入失败的深渊。显然，卡夫卡越来越没有自信，而缺乏自信的后果就是父亲有了越来越多的证明他没有价值的材料。父亲的不断强化让卡夫卡没有了反抗咒语的可能，对自己动摇不定，疑惑

不已就是最终的结果。

讥讽是另外一种对待卡夫卡的方式，这也最能表达父亲在自己面前的优势。可以想见父亲说出“这事当然不能要求儿子先生去做了”时脸上恶意的笑与恶意的表情。父亲的讥讽更多的源自对他人的不可饶恕。不宽容的心境让讥讽变得非常刻薄。“那个胖姑娘喜欢坐在离桌子十米远的地方。”父亲总是“生气地坐在椅子上，毫无喜悦或带感情色彩地、像个死敌般地夸张地模仿她那不合胃口的坐相”。这样的场景让卡夫卡觉得父亲并不是生气，而是去发泄心中早已积累的怒火，生气只是这一切的导火索。

卡夫卡对父亲的不好印象还来自与好得无以复加的母亲的强烈对比。“母亲无意中扮演了狩猎中哄赶者的角色。”^{[1](P.406)}当父亲吼叫着围着桌子跑，试图抓住他时，母亲总是做出救他的样子。一旦父亲的教育让卡夫卡产生抗拒、反感甚至仇恨时，母亲就如同一个温暖的港湾，温柔体贴、谆谆劝诫。可是，这个温暖的港湾并不能保护卡夫卡，当他再次被赶回父亲的圈子，随之而来的是父亲更加严厉的教导。

二

可以说，卡夫卡的父亲“假想敌”一开始是从两者的形象反差上出现的。父亲高大魁梧，自己瘦弱细小。在父亲面前，卡夫卡的自卑心理是显而易见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经指出：在人与社会的交往中，身体条件对人的心理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身体强壮与个人的安全、自由、尊严、幸福与充实是密切相关的。它是保障个人不会产生精神焦虑的物质基础。^{[2](P.170)}由此可见，卡夫卡的自卑与恐惧首先来自对父亲强大健壮的震撼。

卡夫卡对父亲的畏惧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他往往把父亲当作偶像来崇拜，把父亲权威化。这种现象与人类早期经验十分相似，“一个人是不自觉地按着自己的父亲的形象描画上帝的。而相反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那就是像卡夫卡这样敏感的人，用他们对上帝的经验来丰富、扩大他们对父亲观念，并充实他们的眼界。”^{[3](PP.35-36)}父亲权威在犹太文化中得到进一步加强，“信仰上帝和信赖家庭是联系在一起的，将上帝奉为父亲往往蜕变为将父亲视为上帝。”^{[4](P.16)}卡夫卡的父亲意象往往和上帝画上等号，这也使他与父亲的对抗几乎没有胜算可言。

在心理上无法对抗父亲的事实让卡夫卡选择了

逃离。1912年至1913年期间,他曾两度致信出版社,希望把他的《司炉》《变形记》《判决》合成一部书,取名为《儿子们》。1916年,他又希望出版社能将《在流放地》《变形记》《判决》放在一起以《惩罚》的名字出版。卡夫卡总是喜欢用父亲、儿子、判决、流放、惩罚等词语来描述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所有的创作更像是一种“从父亲身边逃离出来的企图”。

然而,在逃离的过程中,父亲的“假想敌”形象不断被强化,最后使卡夫卡无法自拔。在卡夫卡的创作中,他明确地向父亲宣战,“我写的是关于你的事,我在那里发泄的仅仅是在你的怀里不能发泄的。这是有意拖延与你的告别,只不过,这种告别虽然是由你逼出来的,但却是朝着我选定的方向发展着的。”^{[5](P.432)}现实生活中,父亲还是那个父亲,但在卡夫卡心底,与父亲的决裂已经成为一场战争。卡夫卡要战胜的不是那个业已老迈的父亲,而是他自己心中无法挥去的“假想敌”。

父亲原型是人类潜意识里最常见的、也是最古老的原型之一。在这个耐人寻味的原型存在着一些明显的悖论,其中最重要的悖论是:一方面,父亲象征着权威、力量和尊严,是儿子的保护者;另一方面,父亲又显得令人恐惧和高深莫测,他处处教导儿子,告诫儿子种种禁忌,但又从来不解释其中的原因,他限制着儿子的行动和自由,是儿子压抑的主要来源。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推进,父亲原型往往更多地被移植到上帝、国王身上。比如古代希伯来神话中的上帝耶和华创造了万物和人类,但又制定了限制人的活动的十诫。他在伊甸园中种植了智慧之树,但又将胆敢挑战权威偷吃禁果的人类始祖赶出乐园。^[6]在人们的感受与想象当中,国王与父亲总有结合在一起的倾向。像父亲一样,国王作为一国之主也是权威、力量和秩序的象征。他制定种种法律,要他的臣民遵守,然而又从不解释其中的原因:一方面保护了他的臣民,另一方面又限制了他们的活动和自由。^{[7](P.137)}

和父亲原型相对应的自然是儿子的原型。它的模式是儿子、人类、臣民。在人类的潜意识当中,父亲实质上代表了人以外客体世界的主宰力量,而儿子则是人自身的象征。儿子和父亲、人类和上帝、臣民和国王之间始终包含着既相互对立又互相依存的关系。这种复杂关系的作用在于,它表现了人在外部世界无形的力量面前所产生的依赖却又恐惧的矛盾心理,以及人对自身能力的忧虑和困惑。

人类古老经验中的父亲原型清晰地存在于卡夫卡的创作中。卡夫卡自己曾经说过,父亲就像“上帝”,写作犹如虔诚地“祈祷”。他承认自己对父亲的依赖,自己无法摆脱父亲,觉得父亲有时也是慈祥的:当父亲“离家庭和商店越远”的时候,他“便越和气,越迁就、客气、体贴人、关心人,这就像一个君主,一旦出了他国家的边界,就没有理由仍然摆出暴君的架子来,于是,甚至可以和善地同低贱的人打交道了”^{[5](P.426)}。但同时卡夫卡又描述了父亲形象的高大威严:“你是真正的卡夫卡,强壮、健康、胃口好、有支配力、能说会道、自满自足,有优越感、沉着果断,有鉴别人的能力,有一定的慷慨大度。”^{[5](P.405)}这种带着家族式的宿命论来源卡夫卡挥之不去的压抑和恐惧,并在写作这种虔诚的祷告中反复加深。

卡夫卡的表达方式和所叙述的内容都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父子关系的范围,所涉及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父子之间的不和。他把父亲与“上帝”相提并论,将父亲和“暴君”“独裁者”进行类比,这分明透露出某种象征和隐喻。因此,我们只有把其中的父亲形象同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加以沟通,并将其视作卡夫卡对强大权威的内心体验的载体,或是卡夫卡对世界秩序的一种体悟,这在理解上似乎才更为贴切。

三

作为一个“典型的西方犹太人”,卡夫卡的创作和思想曾经受到很多作家与思想家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影响最为重大的是丹麦的克尔凯郭尔。这是因为他对卡夫卡的影响持续时间最长,而且表现得最为深刻和明显。卡夫卡写作中最常用的一个关键词——恐惧,便直接来源于克尔凯郭尔的影响。

1917年卡夫卡在疗养期间,曾经对克尔凯郭尔的著作《非此即彼》进行专门的研究,提出批判性的意见,“由于克尔凯郭尔后来成了存在主义最直接的思想先驱,所以,他对卡夫卡持续的影响,实际上已注定卡夫卡与后来的存在主义之间的不解之缘;同时也因为卡夫卡对于克尔凯郭尔接受逐渐地转变为一种理性的批判,这也决定了卡夫卡与存在主义哲学之间早已横亘着一道永远难以消除的沟壑”^{[8](P.96)}。

卡夫卡认为自己确认克尔凯郭尔“就像是一个朋友”。他对于克尔凯郭尔接受的原始动因是因为他们曾经遭遇到或正在面临着相似的生存困境。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一书中明显地折射出其与父亲之间的那种复杂而又紧张的关系。这恰恰是

卡夫卡当时最为在意的问题,两人很快便形成了共鸣。在卡夫卡接下来的创作中,“儿子”系列的3个著名短篇《司炉》《判决》《变形记》充分表明了卡夫卡当时的创作心理,他更多地考虑了自己与父亲、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种潜移默化的引导对于卡夫卡的作用显然是巨大的。同时在体裁以及内容上的相互吻合给了卡夫卡更多的创作源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婚姻问题上,克尔凯郭尔给卡夫卡带来的影响进一步得到加强。克尔凯郭尔曾经也遭遇了是否和恋人结婚的重大选择。当卡夫卡面对相似问题时,他自然会去参考“朋友”的前车之鉴,“这段时间,他正在阅读克尔凯郭尔的一部选集《判决书》,对于他来说,克尔凯郭尔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之间的相似性,变得清晰了。”“他开始阅读这些书,那是因为他正在寻思:在他们俩的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牢固的相似性——那个哲学家残酷地结束了自己的婚约,然后把这一事件作为其早期作品的基础——这些或许会使他与菲莉斯的分手一事变得明朗一些。”^{[3](P.168)}

可以说,早期克尔凯郭尔对于卡夫卡来说是一个参照物,一个可以效仿的榜样,让他不断地发掘自己的生活,并从父亲、恋人身上汲取创作的灵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克尔凯郭尔是卡夫卡用来确认自己的生活与其具有一致性的另一个人物。在这期间,卡夫卡用了直接来自克尔凯郭尔的“恐惧”的概念以表达他本人当时内心的真实状态。他强调自己的文学创作“有一个巨大的愿望就是写出完全发自内心的全部恐惧不安”^{[5](P.134)}。与此同时,卡夫卡创作中的假想敌也在克尔凯郭尔的引领下变得愈发牢固。作为一个后起之秀,卡夫卡的敏感、疑虑远远超过了前辈,父亲、婚姻等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那么可怕的人和事在他的思想中变得那么地令人恐惧,在他的笔下流露出来。

然而,饱受肺结核折磨的卡夫卡在体验了与菲莉斯分手带来的刻骨铭心的深切痛苦之后,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体会。他试图以另一种眼光来审视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和创作思想,此时,他已经和之前

的“朋友”决裂了。当他再次阅读《非此即彼》时,他觉得这部书“就是用最尖利的笔所写,然而它们却把你逼近绝望。就像正当你满怀激情地阅读时可能发生的,你偶尔会有一种无意识,觉得它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书,甚至是最健康的肺也因此感到呼吸短促。它们是这样一些书,唯当一个人最起码真正地略胜一筹时,才能够书写和阅读它们。然而如此一来,它们的可恶性就在我的手底下生长起来了。”^{[5](P.197)}

卡夫卡通过对克尔凯郭尔的批判完成了自我审视,实现了思想的突破。这其实也是卡夫卡对于自己重新认识、重新定位的过程。但我们不得不说,这种影响是伴随卡夫卡终生的。恐惧在卡夫卡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他认为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罪性,在恐惧中可以体味到原罪,感受到与上帝同在。恐惧的与生俱来,预示着卡夫卡假想敌的一直存在。他无法摆脱这样的恐惧,只能将它视为信仰,以求安身立命。

[参考文献]

- [1][奥]卡夫卡.卡夫卡文学代表作[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 [2][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 [3][奥]马克斯·布罗德.卡夫卡传[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 [4][英]查姆·伯特曼.犹太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 [5][奥]卡夫卡.卡夫卡全集(第七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 [6]张德明.论布莱克诗歌的神话原型模式[J].外国文学评论,1991(1).
- [7]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 [8]胡志明.卡夫卡现象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南山)

试论史蒂文斯诗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杨 梅 仲 颖

(苏州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苏州 215009)

[摘要] 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歌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诗人认为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息息相通的,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但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又不断地破坏着自然并遭受着自然的报复。所以史蒂文斯希望人类对自然所持的态度是顺应自然和尊重自然,建立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关系。

[关键词] 史蒂文斯; 人; 自然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127-03

史蒂文斯是一位描写自然以及人和自然相互关系的诗人,他的诗歌体现了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热切关注。他看到了自然中的生命和人与自然的平等,看到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及对自然的破坏。对他而言,自然能帮助人类找到自我,自然是“命运的母亲”。^{[1](P.132)}

一、人与自然是平等的

在过去,保护资源的活动是为了征服自然,为人类提供长期的物质利益。然而,史蒂文斯对此却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他把自然当作人类的平等存在,这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环境保护论的观点类似。“你可以砍掉我的双手,我将依然活着……你可以拿走我的双眼,我也将依然活着……拿走太阳,我将死去。拿走植物和动物,我将死去。所以我为什么要认为身体是我的一部分而不是太阳和地球呢?”^{[2](P.23)}

在史蒂文斯的眼中,植物、动物和其他物种不再是人类的附属,它们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有自己的思想、感受和灵魂。

这小小的和黑暗的,那是
它的所在,那是
它成立的地方。在那儿

鸽子低声嗥叫,像思想
在脑海中盘旋,或者像人
坚持寻找自己的身份
那是它的所在和它成立的地方……它嗥叫
因为更大尺寸的外灌木丛
和怀疑的极大痛苦。^{[3](P.461)}

在这首诗歌当中,鸽子有它自己的思想,像人类一样,它也需要寻找自己的身份。通过“嗥叫”,它想告诉整个世界它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它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也渴望表达自我。这和华兹华斯在他的诗歌《序曲》中的表达类似:“对每一个自然形式,岩石,水果或花朵,/甚至是铺砌高速公路的松散的石头/我给他们精神生命,我看到他们的感受/或者将它们和一些感受联接:大多数/躺在活跃的灵魂下,所有/我看到他们呼吸着内在的意义”^{[4](PP.124-129)}。史蒂文斯诗歌中所有的自然形式都随着生命而脉动。他看到它们说话,呼喊,呼吸。“今天树叶在叫喊,悬在被风吹打的枝头,/但冬天的虚空还是减少了一点,/尽管到处依旧是冰冷的阴影和有形的积雪。树叶在叫喊……这叫喊与任何人无关。”^{[3](P.460)}

在诗人的眼中,树叶是活着的个体,它们通过叫喊表达自己的情感,宣布自己的存在。史蒂文斯尤

[收稿日期] 2012-04-20

[作者简介] 杨 梅(1984-),女,安徽宿州人,苏州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

仲 颖(1984-),女,江苏泰州人,苏州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

其强调树叶的叫喊是独立于人类的主观意志和意识的。也就是说,人类不是意义的赋予者,而应该是自然耐心的倾听者。只有当人类扔掉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时才能听到自然里纯粹的声音。事实上,树叶真正需要的是简单的倾听,然后它们的呼喊就获得了意义。Voros 将这首诗歌解读为诗人已经和自然建立了成熟的关系,“他是树叶叫喊的一部分,他作为人类是自然世界的参与者”^{[5](P.142)} 所以我们应该尊重自然,应该为了能让植物、动物、水和土壤继续存在于我们的生命社区而争取它们的“生存权”。

史蒂文斯对待自然积极的态度来源于他对自然的热爱。如果他不能爱其他人,他可以爱星星,爱太阳,爱大海,爱田野。对爱默生,他可以说,“我在风中,在太阳下过着一根青草般的生活,除了天气我不关注其它事情”^{[6](P.222)}。在史蒂文斯的作品中,对自然的热爱是美丽的:自然允许人类无羁的想象力。史蒂文斯将自己的喜爱慷慨地给予了自然万物。他相信爱是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在史蒂文斯的眼中,人类和自然的其他存在形式没有任何界限,他们之间血肉相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史蒂文斯的诗歌中动植物和人类之间的界限经常是被打破的。在《黑色的统治》这首诗中,叙述者(或者诗人)在火旁有了幻想:房间里灌木和落叶的颜色反复地改变,就“像树叶一样,在风中旋转”^{[3](P.7)}。然后深绿色的孔雀变成了人踱进房间,这使得叙述者万分惊恐,想起了孔雀的啼叫。毫无疑问,叙述者的意识随着夜景发生了变化。这是叙述者参与自然的独特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他成为了房间内外风景的一部分。随着天色越来越黑,夜晚像深色孔雀一样踱进房间。此时,火堆中的火苗,叙述者脑海中孔雀的尾巴以及窗外的群星好像都变成了树叶,在风中旋转,融化了植物、动物和人类之间的界限。这是典型的“随着身体思考,随着思想感受”的生态模式。通过这种想象力的交流,史蒂文斯教会了人类如何作为自然的组成部分而生活。

二、人与自然是相互依赖的

在史蒂文斯看来,自然世界无论多么严酷,都是人类确定性的唯一源泉。人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依赖自然。在诗歌《卡罗莱那》中史蒂文斯表达了他的思想:自然是我们的“永恒的母亲”,并且用“薰衣草乳头”喂养了我们。诗歌内容是这样的:“新生的婴儿已经开始从母亲的声音/阐释爱情。/永恒的母亲,/为什么你的薰衣草乳头/流出了蜜汁?/我的

身体因松树而变得甜蜜,/我自己也因洁白的蝴蝶花而变得美丽。”^{[1](P.3)}从这首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是自然的孩子,是自然母亲的“薰衣草乳头”哺育了我们。自然给人类提供了一切物质,不断地将自然万物送到人类手中为人类所用。诗歌的最后两行告诉我们自然帮助抚慰了人类的情感和感受。和松树在一起,诗歌的叙述者感觉很甜蜜,而洁白的蝴蝶花使他更加美丽。在这首诗歌中,史蒂文斯看到了人对自然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依赖。他教会读者要尊重自然,欣赏自然,要把自然看作是活着的社区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在他的一封信中,史蒂文斯也建议人们把书本放在一边,尝试去欣赏美丽的自然,因为“在树林中……有这么多东西是在书本中找不到的。”^{[7](P.925)}

其次,自然帮助人类找到他们真实的自我。在《黄色的下午》中,诗人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诗歌开始写道:“只在泥土中/他处于自己的事物的/根部。”“只在泥土中”体现出了他的个人统一。诗歌最后总结到:“万物从田野/走向他。泥土的芬芳/比任何文字渗透得更深。那里/他就是自己。”^{[1](P.118)}只有从田野和泥土的芬芳中他才能找到自我,相信自己。史蒂文斯对自我的认识是随着他对自然的认识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深化的。史蒂文斯试图创造能在自然世界生存的自我。这和加里·斯奈德强调的“地方意识”是一致的。他说生态区的“地方意识”超越了地理位置的简单知识,“我们是谁”逃脱不了“我们身在哪里”:“两种条件——重力和冰冻和沸腾之间的适宜生存的温度——给了我们血和肉。我们攀爬的树和我们行走的地面给予了我们手指和脚趾。‘地方’(从广阔的,延伸的,平坦的)给了我们远眺的双眼,溪水和微风给予了我们万能的舌头和耳朵。大地给了我们思考的头脑。”^{[8](P.20)}所以人类应该尊重自然的平等和认识到人类感知和意识的有限。

在诗歌《红宫喝茶》中,史蒂文斯声称想象的自我在模糊自我和世界的界限方面是全能的。“我是自己在其中行走的世界,/我所见所听所感的来自我自己,那里我发现自己更真实也更陌生。”^{[1](P.26)}在其他作品中,史蒂文斯也识别了自我和世界。在《原理》中,他主张“我是我周围的实物”。人不能和他周围的环境分割,只有从环境中他才能找到自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他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所以,人类应该走进自然。在史蒂文斯的作品中,自然是慷慨的善良的,无私地给人类提供着阳

光、雨水、风、四季、健康和快乐。自然和人类紧密相连。回归自然,将自我沉浸在它的影响中,我们又能找回精神的完整。在“AngelSurroundedbyPaysans”中,史蒂文斯清晰地陈述了人类应该参与自然的观点。“我是地球必要的天使/因为,在我的视线中,你能再次看到地球。”^{[3](P.423)}

三、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与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史蒂文斯生活在美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的一些活动如核能、工业化、污染、过度开发资源、人口过多等问题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对于工业化社会和原始自然之间的强烈对比,史蒂文斯的倾向是很明显的。他在日记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我坐在山顶的一堆岩石上,背对着东方深深的,空旷的山谷”^{[3](P.925)}。史蒂文斯对人类对自然的所作所为很是气愤。他并不欣赏科技变革带来的变化。他把它们看作是人类的退化。对他而言,“像纽约一样的现代城市是一个充满了孜孜不倦的敌对利益的地方——虽引人入胜但却虚无缥缈...”^{[3](P.927)}

史蒂文斯笔下的自然还拥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诗歌《像黑人墓地里的装饰》的结尾诗人写道:“最弱的联合会演变成力量/而非智慧。所有的人,加起来,能报复/秋天的一片落叶吗?/但是智者的报复是用白雪建造城一座。”^{[3](P.128)}诗人以奇特的想象,通过反语句式 and 充满哲理的语言,不容置疑地向世界宣称:一片落叶背后所蕴藏的自然的力量和规律不可抗拒——无论是整个人类的智慧也罢,力量也罢,都没法对一片落叶进行“报复”,因为促使一片树叶凋落的力量就是促使斗转星移、海枯石烂的自然的力量。贾斯汀·昆因认为诗中人类对树叶的报复是指树叶所代表的自然要求人类社会对此做出相应的回答,这却是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所永远无法做出的回答,因为大自然在他们眼里主要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9](PP.53-71)}只有史蒂文斯这样的智者才能知道怎样对自然做出最好的回答:用白雪建造的城到了春天会融化,到了冬天又要重新建造,这样的消解和重建不正与叶落叶生的四季变化相一致吗?这正是史蒂文斯希望人类对自然所持的态度,即顺应自然,尊重自然,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一旦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对抗状态,对抗的失败者

一定会是人类,因为谁也“报复”不了“秋天的一片落叶”。

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相信“生物界的万物都有着生存,开花以及展现自我,实现自我的平等权力”^{[10](P.254)}。根据深层生态学创始人阿伦·奈斯的观点,人类只是生态社区的居民,而不是其他物种的主人,我们没有权力减少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以人类应该坚信自然是生存的实体,其中所有的自然客体都有自己的内在价值,自然对人类的贡献完全是无私的,因此,人类,反过来也要平等地对待自然。目的不仅是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且也是为了建构自然生态的价值观念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以便从整个生态利益的角度重新建立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参 考 文 献]

- [1][美]华莱士·史蒂文斯. 史蒂文斯诗集[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 [2] Buell, Lawrence.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M].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 [3] Stevens, Wallace. Wallace Stevens: collected poetry and prose[M].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97.
- [4] Wordsworth William. The Prelude or Growth of a Poet's Mind[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5] Voros, Gyorgyi. Notation of the wild: Ecology in the Poetry of Wallace Stevens[M]. Iowa City: Iowa University Press, 1997.
- [6] Emerson, Waldo. The Letters of Waldo Emerson[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9.
- [7] Stevens, Wallace. Secretaries of the Moon: The 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 and Jose' Rodriguez-Feo[M]. Durham, Duke UP, 1986.
- [8] Snyder, Gary. Practice of the Wild[M]. North Point Press, September 1990.
- [9] Quinn, Justin. Nature and Ideology in Wallace Stevens [M]. The William Stevens Journal, Spring, 2000.
- [10] Leopold, Aldo.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责任编辑 南山)

论《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叙事策略

刘卫平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常州 213001)

[摘要] 作为表现主义语言大师,德布林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对20世纪20年代魏玛共和国时期柏林大都市小人物弗兰茨·比勃科普夫的命运进行了充满同情和悲悯的追踪。本文着重分析德布林长篇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分段式叙事结构以及拼贴式的叙事方法,力图探究德布林的叙事策略与传统小说的不同之处,深入讨论阅读德布林小说对读者所提出的挑战,即读者需要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对小说进行二度加工和再创造。

[关键词] 表现主义; 蚯蚓式分段叙事; 拼贴式立体叙事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130-03

一、引言

赫尔曼巴尔这样评论表现主义:“从没有一个时代被这样惊吓,被这样的死亡恐怖所震动。从没有一个世界如此坟墓般地寂静。人从没有变得如此渺小,从没有这样畏惧。和平从没有如此遥远,自由从没有如此死亡。现在人在向自己的灵魂呼喊,它在呼喊救命。这就是表现主义。”^[1]表现主义文学大都受康德哲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强调反传统,不满于社会现状,要求改革,要求“革命”。在创作上,他们不满足于对客观事物的摹写,要求进而表现事物的内在实质;要求突破对人的行为和人所处的环境的描绘而揭示人的灵魂;要求不再停留在对暂时现象和偶然现象的记叙而展示其永恒的品质。表现主义小说的人物和故事都是现实生活的异乎寻常的变形或扭曲,用以揭示工业社会的异化现象和人失去自我的严重的精神危机。^{[2](P.105)}

作为表现主义文学巨匠,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作家阿德布林(1878-1956)从1928年到1929年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小说的副标题为“弗兰茨比勃科普夫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弗兰茨比勃科普夫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他发誓

要做一个好人,“不管有钱还是没有钱”,但是险恶的社会环境和大城市的诱惑使他一步步又走向犯罪的深渊,自己的爱人也被恶人杀害。在小说的结尾,比勃科普夫和死神进行了殊死搏斗,最终旧的弗兰茨死了,新人弗兰茨·卡尔·比勃科普夫出生了。成为“新人”的比勃科普夫做了一家工厂的门卫,并时刻准备以理性迎接新生活的挑战。

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情节松散,没有跌宕起伏和扣人心弦;这里的人物没有鲜明的性格,只剩下模糊的轮廓;这里找不到确定的、有约束力的信条,有的只是无数看似杂乱无章、实则依据一定逻辑和关联进行排列和组合的文本碎片。于是,读者将会遭遇和主人公比勃科普夫类似的经历,在汹涌澎湃的城市生活中,在行色匆匆的人流和车流中,同时遭受形形色色的声响、色彩和画面制造的视听轰炸”^[3]。如果我们对小说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方法加以分析,那么我们或许可以从晕头转向的迷宫似的文本中理出头绪,为小说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叙事主线。

二、蚯蚓式的分段叙事结构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叙事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18世纪初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维科的历史循环论的影响。维科认为人类历史出于反复更迭和不

[收稿日期] 2012-04-12

[作者简介] 刘卫平(1973-),女,陕西渭南人,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德语讲师。

断循环之中,每个周期包括“神灵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和“混乱时代”4个历史阶段,而后又回到起点,周而复始,循环不已。^{[2](P.122)}《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叙事结构和维科的历史循环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小说的第1章到第2章描述了弗兰茨刚刚从狱中出来和女友丽娜及其叔叔吕德斯其乐融融的生活,对应着圣经故事的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生活的“神灵时代”。第3章到第5章描述了弗兰茨为了生存而斗争,这部分与维科所说的“英雄时代”恰好呼应。第6章中,失去了胳膊的弗兰茨重新找到心理平衡,和米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情节则与维科所说的“凡人时代”存在着对应关系。而小说的第7章到第9章,米泽被杀害,弗兰茨在精神崩溃之后又获得了重生的情节则明显地反映了维科所提出的时代交替更迭、历史循环不已的哲学观点。显而易见,德布林所处的历史阶段正是维科所说的第4个阶段,一个社会动荡、文明衰亡、无政府主义猖獗的混乱时代。为了充分表现这一思想主题,小说采用了蚯蚓式的分段叙事方法。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标题即说明了小说的情节框架:1928年柏林东部的亚历山大广场的一群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圈子。《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共分为9章,德布林把这些章节称作独立的书(德语词Buch)。全书9个章节的目录都用10多个短句来预述本章的主要情节。仅仅是通过目录读者就可以大致了解主人公弗兰茨·毕勃科普夫在柏林大都市的三起三落直至重生的经历。除了目录以外,德布林对小说的各章节采取戏剧式的一幕幕展开情节,且每一“幕”的开始都安排有“序幕”,有的章节结尾还安排有“闭幕词”。

整部书的“序幕”给读者交代了这本书的主人公是谁,“我们的好人”陷入了什么样的斗争,他的人生如何经历了一个残酷的考验之后获取了一个新的意义。在每个章节开始的“序幕”以全知叙述者的角度对弗兰茨·毕勃科普夫的处境作以评价。例如第2章的“序幕”是这样的:“他发下了她的誓言,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不该就这样打住算了……然而,这个比勃科普夫,他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什么人,我把他交过来不是为了做游戏,而是要让他去体验他那艰难、真实和令人警醒的存在……我们将会看到,他的规矩做人长达数周。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一段宽限的日期。”^{[5](P.33)}这段“序幕”预示了弗兰茨坚持做一个好人的理想是不容易实现的。

在“闭幕词”的处理上,《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有的章节没有后序,有的章节则出于叙事需要而写了后序。以第5章为例,莱茵霍尔德在风雪交加的柏林郊区的夜晚把弗兰茨推倒车轮下面,弗兰茨一只胳膊被压断,躺在寒冷的雪地中。而这5章的“闭幕词”则描述道,地球继续在转,太阳照样升起,人们都非常开心地在取暖,从巴黎来了一位著名的女士,人们前拥后呼地热烈欢迎她……^{[5](P.194)}这段结束语用对比和反讽的手法烘托出弗兰茨被害而其他人漠不关心的情形。又譬如第6章的结束语中作者对弗兰茨的一生做了回顾和总结,这一段实际是为旧的即将死亡的弗兰茨写了一段追悼词。而第7章的闭幕词中描述的森林中暴风雨吹着树叶呼呼作响的场景则营造了米泽被杀害的阴郁氛围。在第9章,旧的弗兰茨·毕勃科普夫死了,新的弗兰茨·卡尔·毕勃科普夫活了。作者为此写下了结束语:“走向自由,走向自由,旧世界必须灭亡,醒来吧,早上的空气。”^{[5](P.436)}这段“闭幕词”和全书的“序幕”遥相呼应,为弗兰茨·卡尔·毕勃科普夫的新生揭开了历史新篇章。

三、拼贴式的立体叙事方法

莱辛在其《拉奥孔:论画与诗的界限》中将造型艺术和文学创作区别为形体的塑造和情节的塑造的不同,而20世纪的文学作品则重新将造型艺术的创作手法引入了小说创作。德布林认为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和一定的思维方式以及周遭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那种独立的个人英雄形象已经退到幕后了,当今社会是由一系列没有关联、颤动的、川流不息的动作和存在方式组成的。电影和报纸的影响已经犹如织布的过程被织进了文学的纤维。为了让读者体验到如今社会的人的生存状态,作家必须描述每时每刻有着新的变化的街道景象,街上的企业名牌以及车来车往。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德布林借用未来主义立体画派、现代音乐、俄国纪录片以及早期广播剧的表现手法,运用柏林方言黑话、书面语、口语和无数象声词将天气预报、报纸摘要、流行歌曲、诗歌、成语、医生诊断、物理公式、统计数据、交通报告、街头广告和政治用语等等通过无孔不入和无处不在的拼贴组合和无数的碎片穿插进主要叙事过程中。

在这里,我们将重点讨论穿插在主要叙事情节中有关圣经故事和经典民间故事的拼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主要拼贴了《约翰启示录》中巴比伦大淫

妇的故事、《耶利米书》中的警告、《旧约·创世记》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故事、《旧约·约伯记》中约伯的故事和德国民间死亡之神的故事。对于柏林大城市的妖媚和诱惑,作者将其比喻为《约翰启示录》中的巴比伦大淫妇。小说中多次这样绘声绘色地写:“伟大的巴比伦坐在水边,她是淫荡和世间一切暴戾之母……她来自深渊,她领你走向地狱,你看她呀,那一颗颗珍珠,那种猩红,那一颗颗牙齿,她在咬牙切齿,她丰满而厚实的嘴唇沾满了鲜血,她就是用它们来喝的血。妓女巴比伦!恶毒的眼睛眨着金黄,肥颈膘肥!看哪,她在冲你大笑。”浮躁堕落的大城市景象跃然纸上,而弗兰茨·毕勃科普夫作为个体,他的思想简单得好像住在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从前,在天堂里生活着亚当和夏娃两个人。她们被主安置到这里,主还创造了动物和植物、天和地。而天堂便是那壮丽的伊甸园。这里长满了鲜花和数目,动物们四处玩耍,谁也不折磨谁。太阳升起又落下,月亮也是一样,这是天堂里一整天唯一的快乐。”^{[5](P.33)} 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故事用人类的原罪暗示了大城市对弗兰茨的惩罚才刚刚开始。弗兰茨被吕德斯欺骗之后心情郁闷,作者则插叙了约伯和上帝的对话用来类比弗兰茨怀疑上帝是否公平的质问。对于反面人物莱茵霍尔德,作者则以迎面而来的阴森气氛,寓意着“他人即地狱”,传达了人类基于生存需要,必然以恶面对他人的阴暗性的一面的发现和悲凉的慨叹。莱茵霍尔德外表上面容病态憔悴,他不喝酒,只喝便宜的咖啡和柠檬汽水,但事实上他却是一个充满血腥体力惊人的职业犯罪分子。此外,莱茵霍尔德还是一个在性方面有着病态的痴迷,他多次让毕勃科普夫把自己玩腻的女朋友介绍给别人。如果毕勃科普夫拒绝的话,他就会给毕勃科普夫送一些礼物为诱饵,最终弗兰茨完全变成了莱茵霍尔德的逼良为娼的帮凶。作者以“死亡”比喻莱茵霍尔德的恶魔形象。文中描述道:“有一个割草人,他的名字叫做死亡。他有着伟大上帝给他的权力。今天他磨刀霍霍,那把刀已经快了许多。”^{[5](P.207)} 莱茵霍尔德不仅仅和弗兰茨进行作孽的女友交易,而且还以找工作为由诱骗弗兰茨去参加普姆斯集团的抢劫行动,德布林对弗兰茨的轻信作出了这样的警告:“耶利米说,这个男人该死,他相信人,他依靠他的肉体,他的心背叛上帝。”^{[5](P.178)}。小说的结局也确实是这样:弗兰茨·毕勃科普夫因为轻信莱茵霍尔德一步步走向了罪恶和死亡的深渊。

如果说德布林在叙事过程中穿插拼贴柏林街头景象和事件为主人公的命运轨迹营造了20世纪20年代光怪陆离的柏林大都市的时代背景,那么小说中无处不在和主要叙事情节如影随形的圣经典故和民间传说等则起着象征和隐喻的作用,反映了意志薄弱、头脑简单的弗兰茨·毕勃科普夫必然接受一再挫折最终死亡的命运。这种圣经故事和民间传说与主要叙事情节交叠出现互相纠缠的叙事方法也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艺术审美体验。正如让·保罗在《美学前言》所写的:拼贴手法可以赋予作品黑色幽默的色彩。有了拼贴,高尚的、粗俗的、轻浮的、沉重的……会令人吃惊地突然一起出现,高贵的和低贱的被拼贴在一起,两者就同时被消灭了。

四、结束语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序幕”写道,“对于众多的、同弗兰茨·毕勃科普夫一样有着血肉之躯的人,以及同这个弗兰茨毕勃科普夫有过相同经历,即对生活的要求多于黄油面包的人,对他们而言,研究和倾听这个故事将是值得的”^{[5](P.3)}。正如观看戏剧的人的意识和精神需要对原作做出二度理解,君特·格拉斯也这样评论德布林带给读者的“再创造”任务:“他会让您感到不安;他会让您的美梦变得沉重;您必须细嚼慢咽;您不会觉得他可口;他是不好理解的,也是不好消化的。他会改变读者。知足的人可要当心德布林。”^[4]由于表现主义叙事技巧和精神分析法大量和大胆的运用,对于习惯了传统小说的读者而言,阅读《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不啻于在意识和精神上进行一次穿梭于热带雨林般的头脑风暴。

[参考文献]

- [1] 刘敏. 德国表现主义戏剧的叙述方法[J].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2000(2).
- [2] 李维屏. 英美意识流小说[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4.
- [3] <http://www.netzliteratur.net/experiment/berlinal.htm> [OB/EL] (2011-12-20).
- [4] <http://book.sina.com.cn/new/n/2003-09-19/3/18460.shtml> [OB/EL] (2011-12-20).
- [5] [德]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责任编辑 南山)

试析乔治·奥威尔的“社会主义者”身份

汪霖

(江苏教育学院外语系,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国内对于乔治·奥威尔的阅读与研究大多带有概念化的倾向,“反极权斗士”已经成为奥威尔的标签,而奥威尔的政治观并不如此简单。本文力图展现奥威尔真实的政治身份,其中最主要的是他宣称的“民主社会主义”概念。

[关键词] 奥威尔; 政治; 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133-02

一、想象中的“民主社会主义”者

奥威尔将自己的政治立场定义为“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在《我为什么写作》中,奥威尔直白地表述了这种立场:“我在一九三六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根据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1](P.102)}这其中颇多可以追问之处——何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有何区别?

从奥威尔的作品和他人所作的传记中我们得知,奥威尔一直试图融入无产阶级。他的愿望过于强烈,以至于他采取的行为带有自虐的成分。在巴黎贫民区的落魄生活;在伦敦与流浪汉为伍;在维根与矿工们一起生活,并且带着肺结核的身躯亲自下矿,这些行为令奥威尔蒙上了一层圣徒的光辉。奥威尔的一言一行无疑都是一种政治声明,他要以此表明自己同无产者站在一边,从而令世人信服其社会主义者的身份。

在奥威尔的很多文章中,我们发现他在批评左派、批评保守主义者、批评极右分子时,下笔辛辣而不留情。事实上,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奥威尔,更多的时候在表达他反对什么,而极少阐述他赞成什么。这些零星的意见散见于奥威尔的散文、小说

中,远称不上系统的理论。或许是受英国文化传统的影响,这片土地上的哲学始终以经验主义为主流,而文学则向来以对现实的介入、作家经验的重组以及强烈的道德感而著称。这有些接近列维斯笔下“伟大的传统”,而奥威尔乃是这传统的继承人之一。

二、矛盾的政治观

无论在左派还是右派那里,奥威尔都是不受欢迎的人。左派不喜欢他对于斯大林的攻击,他们有意无视西班牙内战中对于托派分子的清洗,而奥威尔却要向所有人揭露这一点。他在描写西班牙内战时,并没有流俗地控诉战争的残酷与血腥,转而将笔墨更多地倾注在武器的匮乏、部队组织的混乱、各派系之间的斗争。如果用两个词来概括《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所营造的阅读氛围,前半部分可以归纳为“荒诞”,而剩下的就是“内斗”。在《阿瑟·凯斯特勒》中,奥威尔批评凯斯特勒所写的《西班牙的明证》,“大部分都受到西班牙政府方面的人民阵线官方宣传的影响。有一两处简直就像是专门应左翼读书图书俱乐部的要求所写的”^{[2](P.222)},进而指出“1933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左翼作家都有一个通病,即他们一方面反法西斯,另一方面又不反极权。”^{[2](P.222)}奥威尔显然认为,这些首鼠两端的左派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视俄国为其祖国、

[收稿日期] 2011-06-13

[作者简介] 汪霖(1963-),女,江苏扬中人,江苏教育学院外语系副教授。

为俄国政策辩护并以不惜一切的代价促进俄国利益”^{[2](P.236)}。而当保守派镇压工人运动时,高扬理想的左派又保持了惊人的冷静与漠视,这些都是奥威尔不能容忍的,也是他要与其划清界限的原因所在。

这样的批评还很多,不必一一列举,这些批评旨在表达他与英国的这些社会主义者泾渭分明的立场。首先,他反对苏联实行极权统治,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控制,奥威尔尤为深恶痛绝。其次,对于某些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政治经济理论,奥威尔并不赞同。他更关心普通英国人“体面”的生活,而非革命;对于工党的政策,奥威尔持否定态度;阶级斗争在奥威尔看来也是不必要的,虽然工人阶级缺乏教养,中产阶级庸俗势利,统治阶级愚蠢浅薄。但是,只要破除这些缺点,英国依然是一个健康、优秀的国家。

仔细阅读《在巨鲸肚子里》和《查尔斯·狄更斯》,不难发现,前者以赞赏的口吻描述了19世纪中叶美国生活中的自由与平等,虽然那时仍有“贫穷”与“阶级差别”,黑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不过人们依然可以“赚到体面的生活,而且不用奉承谁”,因此,这便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后者则表达对于狄更斯强化“不公正、暴行、谎言、势利”之不道德性所做的努力的激赏。这两则片段的共同点在于其表现出了奥威尔对于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信任(自由、平等),对于增强资产阶级道德感的热心(反对不公正、暴行、谎言、势利),对于提升资产阶级地位的期望(体面的生活)。

这一切都不能令我们将奥威尔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相反,这些例子无不暗示奥威尔自称的“民主社会主义”与通行的“社会主义”之间似乎仅存在着字面意义上的联系,这两个概念内涵差异之大,足以令我们需要为其中一项正名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三、自由之荣耀

正如前文所说,奥威尔的政治观点多是一些零星的意见,出版于1937年的《通往维根码头之路》中类似的“意见”就有不少。“在这部作品中奥威尔第一次阐释了自己的政治观,他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阶级问题,并表明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这本书成为奥威尔政治创作生涯的起点,其中表达的许多主要观点在他以后创作的小说和杂文中反复出现。”^{[3](P.91)}从思想史的角度确立了奥威尔作品的一个标杆。在这部早期的代表作中,奥威尔表示他对社会主义或者其他经济理论都不感兴趣,不过为了

消除阶级隔阂,各个阶级都必须改变他们的习惯与意识形态,最终阶级的不同仅仅意味着收入水平的高低,而非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与此同时,社会的基本价值应建立在“自由”与“公正”的原则之上。

迈耶斯称“《通往维根码头之路》是奥威尔对社会主义革命信仰的最高点”^{[4](P.196)}。然而,奥威尔高扬的社会主义信仰背后,却也隐藏着危险的倾向。历史学家阿瑟·布赖恩特似乎预见到了奥威尔观点的局限性,他从保守主义的立场指出:“这种论点的薄弱之处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不管革命性变革希望达到什么,伴随其来的不仅是一场大屠杀……而且还有失去个人选择的自由和民主政府的结束:俄罗斯和西班牙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4](P.195)}毋庸置疑,奥威尔对于社会改革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是他的改革有令个人失去自由选择与民主政府的可能。究其原因,乃是奥威尔思想中存在着家长制的因素,而直到《动物农场》与《一九八四》时期,他才真正摆脱家长制带给他的影响,不过这没有令他解脱,只是变得更加绝望。

时至今日,极权主义并没有成为主流,虽然也并没有消失。关于自由、平等孰先孰后的问题还在争论,并可能一直争论下去,荣耀当然不尽归于奥威尔。可我们应当庆幸,曾经有过这么一位“冷峻的良知”。奥威尔并没有为人类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可是他把那些最黑的路指给我们看。即使在艺术价值上,他无法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夫卡那般高度,然而考虑到他所做的那些尖锐的思考、痛苦的抉择,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因为这代表了人类良知与智慧所能达到的高度。

[参考文献]

- [1][英]奥威尔.我为什么要写作[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 [2][英]奥威尔.政治与文学[M].南京:江苏译林出版社,2011.
- [3]王小梅,从《通往维根码头之路》看奥威尔的政治观[J].外国文学,2004(1).
- [4][美]杰弗里·迈耶斯.奥威尔传[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南山)

超越宗教意义上的“瘫痪”

——试论《阿拉比》中蕴含的现代主义元素

叶 青

(江苏教育学院外语系,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阿拉比》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生动而又寓意深远地书写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小男孩在追求神圣爱情道路上遭遇到的挫折,以及最终实现了“精神顿悟”的故事。本文旨在跳出传统的批评模式,立足于现代主义的理论,挖掘出作品中蕴含的现代主义元素。乔伊斯通过大力渲染直觉意识和巧妙使用印象主义手法,隐晦地彰显出现代人难以逃出的“精神荒原”。

[关键词] 瘫痪; 荒原; 顿悟; 直觉意识; 印象主义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6-0135-03

詹姆斯·乔伊斯是20世纪英国文学史上最具有独创性的和影响力的小说家。在其扛鼎大作《尤利西斯》中,作家独具匠心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追踪他们绵延不断的意识的流动,大量使用宗教方面的象征和隐喻,真实而生动地书写了生活在现代社会里贫民百姓所遭遇到的困惑、无助乃至精神上的“瘫痪”。乔伊斯全新的叙事风格以及众多的哲学主题奠定了他现代主义先驱者的地位。

虽然不及《尤利西斯》那么声名显赫,作为乔伊斯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让人们开始关注和欣赏文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在作者笔触下,都柏林的芸芸众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平庸、沉闷,而又令人窒息的生活,而这种氛围彻底扼杀了人们的理想、希望与追求!这些小说基本依照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写成,其中的许多人物都可以在作者的亲戚与熟人身上找到原型。小说集由15个短篇构成,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主题,即“瘫痪和死亡”。它们像一部交响乐一样,分为四个乐章:童年、青年、成年和社会生活。这四个乐章又以“文明的失落、精神的空虚、宗教的虚妄、历史的虚

无、文化的迷失、爱情的变形”等几个副主题从多方面深化中心主题。

《阿拉比》是其中的第3篇,为乔伊斯童年时情感经历的艺术再现。故事的叙述者“我”是一个小男孩,大约十四五岁,刚刚进入青春期。出于对朦胧爱情和美好理想的本能追求,渴望在阿拉比集市为自己暗恋许久的姑娘——小伙伴曼根的姐姐买件礼物。经历了朝圣般的曲折旅途之后,小男孩终于抵达了心目中的圣地——阿拉比集市。但是,那天所经历的一切坎坷和艰辛,特别是集市上一个女摊主不仅对他冷言冷语,而且居然当着他面与两位男性朋友打情骂俏,顿时令他感到反感和恶心。耳闻目睹的这一切,他对爱情浪漫的憧憬瞬间被击得粉碎;猛然醒悟过来,不免陷入到莫名的痛苦和愤怒之中,也让他重新认识了自己,其结果就是直接导致小男孩降低了对自己的个人价值评估。

长期以来,中国许多文学评论家都习惯把《都柏林人》纳入到现实主义作品之列,当然也相应地遵循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对作品加以欣赏和诠释。“《都柏林人》(Dubliners)在素材的安排上同样遵循着巴尔

[收稿日期] 2012-09-01

[作者简介] 叶青(1967-),男,江苏南京人,江苏教育学院外语系副教授。

扎克的既有环境铺垫,又紧扣主题的模式,而且基本采用单线结构…。《都柏林人》总体上说仍然遵循着传统的结构模式,但其对精神的偏重以及情节的相对松散,预示了乔伊斯后期作品的结构模式。”^[1]。无独有偶,甚至《都柏林人》的中文译者孙梁也认为,“总的来讲,乔伊斯创作《都柏林人》(1914)的风格是:运用洗炼而有特色的文体,融合现实主义的形塑造(包括典型)、真实的细节描写、诗意盎然的象征性意象(symbolic imagery),以及顿悟(epiphany)与对照等艺术手法。”^[2]

诚然,作为小说集中的代表篇,如果不仔细阅读,读者会认为《阿拉比》仍然沿袭着传统的叙事结构,以人们熟悉的事情为题材,客观而真实地再现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小男孩的心里路程。不过仅仅站在现实主义的角度欣赏作品,无疑是隔靴搔痒,无助于洞察作者内心的愤懑,以及他对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反抗。作为现代主义的文学大师,他生活的时代恰逢现代主义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所以《都柏林人》的所有篇目都多多少少烙上了现代主义印记。下文以《阿拉比》为例,探讨乔伊斯创作中体现出的鲜明的人文观、独到的艺术手法和崭新的写作技巧。

一、精神的无边“荒原”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确立于20世纪的二十年代;但追本溯源,19世纪中叶诞生的唯美主义就已显现出一些现代派的雏形了。其间,重大的历史事件、政治经济运动以及文化艺术思潮都直接或间接地贯穿在当时的文本创作之中。“现代派在思想方面折射出文学家和哲学家们对西方现代文明所怀有的危机意识和变革意识,尤其感慨于人类心灵的扭曲和人性的异化: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四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思想。”^{[3](P.5)}

在人与社会的层面上,现代主义者自居于社会的对立面,以局外人、流亡者和精神贵族的身份向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伦理观念、商业文明、审美情趣和性道德等诸多方面展开全面的攻击。乔伊斯借助《青年艺术家肖像》的主人公之口大声疾呼:“流亡是我的美学,不管它的名字是社会、教会或祖国。”^{[4](P.84)}

《阿拉比》一开始的环境描写发人深省,“北里奇

蒙德街是条死胡同.除了天主教兄弟学校把孩子放出来时那段时间热闹一点之外,其余时间十分寂静.一幢无人居住的二层楼房,位于街上被堵死了的那一头,独自站着一块方形的空地.而其他的那些房屋,好像都意识到自己的住户都很体面,各自沉下了不动声色的褐色脸孔,相互冷漠地凝视着。”^{[5](P.37)}

短短一段中,“死(blind)”一词出现了两次,而表达“死寂”意思的词还有许多,如“寂静(quiet)”,“无人居住(uninhabited)”,“冷漠(imperturbable)”,无疑是在烘托现代社会中死气沉沉的氛围,无形中勾勒出人们生活丧失生机活力的“荒原”之上。同样,主人公已故的房客,是一位心地善良的牧师,“在他的遗嘱中,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捐给了社会事业机构,还把屋里的家具都送给了他的妹妹。”^{[5](P.38)}牧师仅在小说开始时用寥寥数语提及过,之后再也没出现。很多读者对此困惑不解,觉得他是个多余的人物,和小说毫无关联。其实,在欣赏这部小说时一定不能拘泥于现实主义的羁绊,要从表面情节的描写中大胆地跳出来,思考文字背后的象征意义和美学意义。牧师这个角色和故事情节的确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但和他相关的所有物品的描写,无一不是在描绘“破败”和“荒芜”的意象:发出霉味的房间、废旧报纸、几本书页卷曲而且潮湿的平装书、荒芜的花园中孤零零的苹果树以及几株零零落落的灌木、锈蚀的自行车打气筒。从主题意义上看,牧师是天主教的化身和代言人,他的离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人们宗教信仰的缺失。

乔伊斯在《阿拉比》中,通过情景的描写和动作的渲染,恰如其分地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他驾驭人物角色的超凡能力也使得他的作品寓意深藏不露。总之,我们大可不必把乔伊斯的“瘫痪”这一主题理解得过于具体和狭隘。其实,他所谓的“瘫痪”,与契诃夫的“人不能这样活着”,还有很多现代作家所关注的主题,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作为一个有思想、有良知、有品位的知识分子,对市民阶层、对上流社会的生活状态,特别是精神生活上空虚所发出的呐喊。对《阿拉比》的解读,如果完全局限在宗教上,甚至停留在“少年不识愁滋味”之类的懵懂爱情主题上,或者想当然地认为《都柏林人》就是书写发生在“爱尔兰”和“都柏林”的故事,那就人为地挤缩了阅读视野,忘却了人类生存及其悲剧性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最终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二、直觉意识的“非理性”张扬

作为一位爱国的爱尔兰人,乔伊斯为自己国家的民族精神日趋沦丧而痛心不已,认为在这种恶劣的社会环境中英雄早已死去,活着的都是一群行尸走肉而已。乔伊斯“认为整个英雄主义的构想都是十足的谎言”^{[6](P.54)},所以他以都柏林社会中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作为描写对象,塑造了一群非英雄化甚至“反英雄”的平民百姓形象,把他们的人生烦恼作为关注的焦点。总体上说,这也是现代主义作家的自我性格在西方异化世界中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科学对人性的重新认识动摇了传统道德的正统地位,人们不再幼稚地以为英雄人物必定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化了的角色。事实上,每一个尘世凡胎都有七情六欲,高尚与卑下,理智与欲望常常寓于同一个体之中。这种时代意识对乔伊斯也是有着深刻影响的,因此他倾向于非英雄化的性格塑造恰好说明了他对人性崭新的诠释,而这种全新的阐释是通过“顿悟”得以实现的。

“顿悟”一词原意指基督教徒在祈祷时头脑里突然闪现出上帝的圣像即显灵的那种瞬间意识活动。乔伊斯认为,人物主体在洞察现实客体时并不总是依靠细致的观察和理性的思维去理解和认识事物的本质属性;相反,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在突如其来的瞬间直觉中感悟到人生的无常,乃至生命意义的缺失。直觉顿悟的一刹那也是灵感勃发之际,人的思维活动进入最活跃的状态。此时,主体仿佛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不仅能够很大程度上挣脱理智、意志、推理等理性批判力的制约,同时借助于心理经验和文化无意识的共同作用,透过表象实现对事物真理性的认识,使得人类的审美实践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和境界。

《阿拉比》表面上描绘了一个少年最初心怀初恋的情愫,然后追求爱情,接着爱情梦想被无情的现实摧毁,最终认清现实、实现精神顿悟的心路历程。长期以来,文学评论家都认为对小说的解读不能停留在爱情故事的这个肤浅的层面上,同时考虑到这部作品多处提及到天主教的术语及典故——死去的房东是个牧师;当小男孩走在肮脏而杂乱不堪的集市上,感到“我仿佛正捧着圣餐杯在仇敌中间安然穿过,在我自己都不理解的奇怪的祈祷文和赞美词里,她的名字时刻蹦出我的嘴唇。”^{[5](P.39)},批评界普遍认为少年对爱情的失望其实反映了作家本人对天主教的失望与摒弃。

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大胆一些,跳出“爱情破灭”或“宗教破灭”的主题束缚,从更广的现代主义视野去审视作品。众所周知,现代主义关注的是人类理想的幻灭,正如“上帝死了”不能狭隘地理解成对宗教的不信任和摒弃,而是反映出现代人生活在精神的“荒原”上,《阿拉比》实则是一部现代主义的“宣言书”,是知识分子发自内心深处痛苦和无望的呐喊。

把顿悟活动本身当作描写的对象,实际上体现了小说视角由外向内的革命性的转向,随之而来的是人物心理意识成了现代文学家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人类历史虽然反映了物质世界从匮乏到丰富,但更重要的是它述说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变迁,所以哲学要以主体的直接感受和个人的内心体验来理解人类的精神发展史。现代主义诞生以前,理性方式只能把世界解释为封闭的整体而无法说明千变万化的生命现象,而现代主义者强调人们要靠直觉体验来捕捉每一瞬间的“自我意识”,把握生命冲动和意识绵延,进而去认识整个世界。乔伊斯以非理性的直觉活动作为创作思维的中心内容,实现了与现代主义思潮的契合。

三、色与光的视觉冲击

20世纪初,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手法只能“白描式”地描写人物的思想,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为了能揭示“心理的真实性”,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应运而生,其中包括印象主义。

印象主义最初起源于法国,一开始是西洋绘画中的一个流派,随着其影响日渐扩大很快也赋予了音乐一些崭新的风格。在绘画中,最具革命性的手法是大量借助于不同颜色及光线之间的强烈反差来吸引眼球,使得观众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画面的总体布局上,忽略局部和琐碎的细节刻画。再后来,印象主义被移植到文学领域,帮助作者再现过去在某个事件中的所闻、所见和所感。印象主义认为文学中的视觉效果是最重要的元素之一,语言就是用来捕捉人物瞬间感受,尤其是视觉感受的媒介,即要以声音、形态和色彩来表现出,或再现出我们正试图理解的美的形象,要体察到人物顿悟活动中“最精细、转瞬即逝的片刻”^{[7](P.148)}。为了突出这种奇特的艺术效果,印象派强调利用鲜明的色彩和反差的光线向读者展开生动而清晰的一组组画面,使一幕幕场景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能在读者的脑海中烙下深刻的印象,在不知不觉中文本的主题突然就彰显出来。

《阿拉比》中的印象主义首先宣告了传统意义上

所谓的全知全能叙述人的死亡和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的诞生。现代主义作家反对作者主观性的介入,主张作者本人必须以旁观者的姿态置身场外,要让读者忘掉作家,要他忘掉他是在阅读作品,以为他在亲身经历他所读的东西。因此,在《阿拉比》中,传统的全知全能的叙述模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我”,既是小说中心人物,又是事件重要参与者,在以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用自己的体验来叙述所发生的一切。客观地说,“我”所叙述的事件,是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掺杂着大量的个人情感和印记。

在小男孩的眼中,家乡小镇的街道都是灰蒙蒙的,死气沉沉,毫无生机可言;周六白天陪婶婶所去的菜市场呈现出嘈杂而无序的状态,一切都浑浊不堪;周六晚上所去的“心目中的圣地”阿拉比大集市居然也昏暗寂静,周围的人俗不可耐。小男孩心中神圣又美好的愿望被庸俗而丑陋的现实击打得粉碎,不经意间他实现了精神上的顿悟,而此刻的读者也融入到他的感情世界当中。

在《阿拉比》中,乔伊斯在描述主人公心中的爱情火花时,没有直截了当地描述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而是很隐晦地展示主人公所见所闻,让读者去用心感受小男孩的内心世界。为了体现“心理的真实”这一现代主义纲领,乔伊斯着重通过小男孩铺成出许多视觉意象,而这些意象可以帮助读者梳理出其中的象征意义,例如,颜色,光与影以及明与暗等视觉符号。

当暗恋的女孩第一次和他说话时,提及“阿拉比”这个名字那一瞬间,小男孩没有通过激情的话语抒发他的心声,甚至没有使用任何比喻来抒情,读者所看到的只有小男孩眼中平淡又真实的光、影、色,无形中构成了一幅精美的人物肖像画,“她边说话边把手腕上的一只银镯转来转去……我一个人站在栅栏边。她握住栅栏的尖端,俯首瞅着我。门对面的灯光恰好映照出她那粉颈的白色的曲线,照亮了她的秀发,又照亮了她扶在栅栏上的那手。照亮了衣服的一侧,映出了衬裙的白色镶边”^{[5](P.39)}。小男孩心中燃烧出的爱情火花,完全是通过对光、影、色的描写,带有很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成分,这是一个特定的人物在特定时候和特定地方,因为一个特定事件所引发的特定感慨,也许只有通过主人公的眼睛才

能看到这幅美丽的画卷。简而言之,只有恋爱中的人看他的恋人时,也只有怀有浪漫情怀的人,才能留有这种印象。虽然他没有传统的内心独白,读者依然能够从中读出主人公浪漫心理和对爱情的渴望。

四、结语

《阿比让》中的小男孩满怀对爱情的憧憬,进而历尽种种困难和挫折来到心目中的圣地——阿拉比集市,不料收获的竟然是深深的失望和挫败感,最终主人公从“白日梦”中清醒地走出来,意识到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毫无疑问的。结合20世纪初西方文坛兴起的现代主义思潮,不难看出乔伊斯以独特的印象主义手法,即依靠不可靠的叙述者,通过对光、影、色的真实的再现,引导读者体验主人公的在处理“青春期懵懂爱情”时的心理路程。面对挫败时突然产生的“顿悟”,不仅使得小男孩看清了所谓爱情的虚妄,更使读者认识到人生的无常和悲哀,而悲剧人生恰好是现代主义作品所要反映的一个永恒的母题。无论是从作品的主题,还是其创作手法,《阿拉比》都跳出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窠臼,越过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界面,使其带有标志性的现代主义文学色彩,为后来的《尤利西斯》的横空出世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参考文献]

- [1]戴从容.用真实撼动美的殿堂[J].外国文学研究,2003(1).
- [2]孙梁.《都柏林人》技巧探微[J].二十世纪外国文学,2003(1).
- [3]袁可嘉.现代派论·英美诗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 [4][英]詹姆斯·乔伊斯.青年艺术家的画像[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8.
- [5][英]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 [6][英]詹姆斯·乔伊斯.詹姆斯·乔伊斯书信选[M].上海:维京出版社,1975.
- [7][英]E·梅森和R·埃尔曼编.詹姆斯·乔伊斯批评文选[M].维京出版社,1959.

(责任编辑 南山)

美存在的不可能性

——评《快乐王子》

汪介之 尹子茜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王尔德童话作品《快乐王子》,极力颂扬了美与善的结合,同时表达了善意的美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原因有三,首先代表美善的理想世界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其次,理想世界不被现实世界理解;第三,理想世界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实现。虽然不可能存在,美和善可以在其牺牲和毁灭中展现与升华。即便如此,美能慰藉现实,理想可以照进现实,给现实以慰藉。

[关键词] 《快乐王子》; 王尔德; 美

[中图分类号] I10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5-0139-02

1888年,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的王尔德出版了首部童话故事集《快乐王子及其他》。王尔德,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极度鄙弃现实社会的庸俗愚昧,他通过童话故事传达给孩子他对世界的理解,告诉孩子什么是美,社会的面貌是什么。《快乐王子》中,王尔德在一直推崇孩童的纯真,嘲讽成人社会的势利。美和善是故事中的主角,也是王尔德认为最为高贵的东西,故事以悲剧的方式展示了美和善的魅力和价值,同时也表达了纯净的美和善在庸俗的现实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为帮助贫困中的人们,快乐王子身体残破心碎,燕子死去。这个童话中,有两个对立的世界: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美的不可能性表现在理想世界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为现世不能理解,也不可实现。但是理想可以照进现实,给现实以慰藉。

现实世界中大多数人平庸而愚蠢,为功利争斗不息,待人冷漠而残酷,胸怀狭隘,心中无一丝美好的念头。如既好奉承又自私自利的市参议员,不赞成孩子做梦的数学老师,剥削女裁缝反而责怪她偷懒的少女,将贫苦小孩赶入雨中的看守人。他们以自我为中心,

以自己的利益为重,毫不考虑他人的处境。

理想世界是美与善结合的世界,童话中从两处反映。一处是描写快乐王子的外表,“他满身贴着薄薄的纯金叶子,一对蓝宝石做成他的眼睛,一只大的红宝石嵌在他的剑柄上,灿烂地发着红光”。快乐王子的外表体现了一种纯净、光亮的美好,有一种富丽华贵的美。另一处是燕子口中的埃及:“寒冷的雪就快要到这儿来了,这时候在埃及,太阳照在浓绿的棕榈树上,很暖和,鳄鱼躺在泥沼里,懒洋洋地朝四面看。朋友们正在巴伯克的太阳神庙里筑巢,那些淡红的和雪白的鸽子在旁边望着,一面在讲情话。”在快乐王子失去双眼后燕子又进一步向王子讲述了远方王国的种种奇特景象:红色的朱鹭,司芬克斯,捏着琥珀念珠的商人,月山的王等等。燕子口中的远方是一个温暖和煦的世界,充满了友善与关爱。

首先,美存在的不可能性表现为理想世界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这分为3个方面。第一,无愁宫是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快乐王子本身是一个美的理想的化身,一直生活在无愁宫中,“悲哀是不能够进去的”。无愁宫由高墙围栏,与外界隔绝,虽然

[收稿日期] 2012-06-21

[作者简介] 汪介之(1952-),男,安徽庐江县人,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快乐无忧,但是不与现实世界接触,现实中的事物也无法进入无愁宫。第二,燕子迁徙的目的地埃及是遥远而难以达到的。埃及在童话中象征了一个纯朴、自然、未受人类物质文明侵犯的圣地。埃及距离快乐王子所在的城市无比遥远,唯有飞鸟可以自由到达。埃及作为一个理想世界在现实世界中也是不存在的。第三,童话中的天国不存在于大地上。天国是理想世界的栖息地,不仅现世中的万物不可能到达,理想世界中的事物也须经过挑选才可进入,天堂是理想世界的最高存在。

其次,美存在的不可能性表现为理想世界不被现实世界理解。孩子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理想世界的,如孤儿院的孩子能认识到快乐王子“他很像一个天使”。成人则既不能理解纯真和美丽,也不能理解孩子,如孤儿院孩子的数学老师鄙夷孩子的想法。市参议员对快乐王子的认识止于“他像风信标那样漂亮,只是他不及风信标那样有用”。燕子为传递王子的善心在寒天奔波,在鸟类学家眼里却只是一个研究性的题目。快乐王子将身上的金片散给了穷人,市参议员们只感到他变丑了,该换一尊了。自私自大、利欲熏心的心灵是无法和纯洁的理想世界产生共鸣的。理想世界的美和善只能遭到现实世界中成人的嘲讽讥笑。

最后,美存在的不可能性表现为理想世界在现实世界中是难以实现的。快乐王子牺牲自我帮助贫民不仅在范围上是有限的,在时间上也很短暂。一个城市中贫民数量是庞大的,王子帮助到的只能是小部分。他人物质上的困难是可以通过金钱救济很快解决,但是人精神上的堕落是不能以该种方式拯救的。这个城市最需要的是观念上的洗涤,只有洗去人们心中对名利的狂热,洗去人们的私心,在人心

中生发出温暖与和善,才能真正救助贫困中的人,同时也救助上流社会中深陷名利泥潭的人们。快乐王子身上的金片对于这个社会实质上的帮助是微乎其微的,即便快乐王子是由纯金铸成,身上有取之不尽的金片可以资助穷人,这个城市也并不能因此有根本上的好转。这个城市的弊病在于人们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那就是权利和财富至上。在这种社会风气的熏染下,我们不能保证穷困者受到接济,摆脱生理上的饥饿寒冷病痛后,他们不会变得和原先的上流社会富人一般自私狭隘而庸俗。快乐王子助人的局限性是他和燕子悲剧的一个主要原因。

即便如此,快乐王子和燕子的牺牲也不是徒然的,这给予了世界一种独特的震撼。美和善在其自身平静的存在中隐藏的能量通过牺牲和毁灭充分展现了出来,虽然不被世人理解,却是真实而永恒的。快乐王子的快乐,起初与世俗社会一样是肤浅的,在他成为雕塑后见识人间的疾苦而变成了痛苦的王子,后来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他重获快乐。王子的快乐发生了质变,变为纯真高尚的感情。快乐王子的快乐由平庸的快乐上升为因无私奉献而生的快乐。快乐王子的美,也在给予中得到了价值的最大体现。

王尔德用《快乐王子》的童话表达了心中对美及人生的看法。美需和善一同方能发挥最大力量,美是不与庸俗势力同流合污的。因为现实的污浊,美仅以理念的存在给予现实慰藉,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之中。既然美不能够现实存在,唯美主义又为何追寻美呢?王尔德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责任编辑 秋 阳)

Psychology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Teachers' Values

HU Yong-pi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Jiang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chang, Jiangxi 330029, China*)

Abstract: The teachers' values are individual teacher's overall view on his professional position, function, behavior criterion, etc. From th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formation of the teacher's values is a complex and difficult process of self-education. The process is a constantly conversion process from cognitive to emotion and from will to behavior, the process of improvement of cognitive, emotional edific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will and exercise of behavior.

Key words: the teachers' values; psychology analysis

On the Principles of Applying Teaching Language Skills

CHEN Zhi-jie

(*Wuxi Normal School, Wuxi, Jiangsu 214001*)

Abstract: Teaching language skills are the ingenious methods which are used by teach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Its proper application symbolizes the level of the teaching art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Teaching language skills are various and complex. However, we must follow the three principles in teaching practice: goal-oriented principle, cognitive principle and the principle of appropriateness.

Key words: teaching; language skills; objectivity; cognition; appropriateness

Analysis of the Ecological Relationships of Moral Education Process in Universities in the Real Environment

ZHOU Ho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Anhui 243002*)

Abstract: Universities need to optimize the component factors of the process of moral education by introducing the methods of ecology. They should reflect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moral education; analyze the phenomena of the imbalance and loss of resource input and output. Based on these, the structure of moral education should be optimized, the overall concep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healthy atmosphere should be built and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should be enforced.

Key words: mor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ecological relationships; imbalances; control and manage

Analysis on Constructing Innovative Teaching Personnel in Higher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WOT

GE Xie-tian HU Ren-dong

(1.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2. *Office of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In the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novation is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personnel are the key. Nowaday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undertake heavy burden of developing high-level talents;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teaching personnel is imminent. SWOT, as one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methods, has been used to analyze how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teaching personnel in higher education is limited by system construction, talents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personne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onstruction, and the article also puts forward the specific 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nstructing innovative teaching personnel.

Key words: innovation; teaching personnel in higher education; team building; SWOT

Imaginary Enemy and Kafka's Creative Ideas

HUANG Hu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2*)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Kafka's father image, exploring the various factors of the formation of Kafka's creative ideas. Kafka's writing and thought have been affected by Kierkegaard, in which we can find the source of Kafka's imaginary enemy.

Key words: Imaginary Enemy; father; Kafka; Kierkegaard